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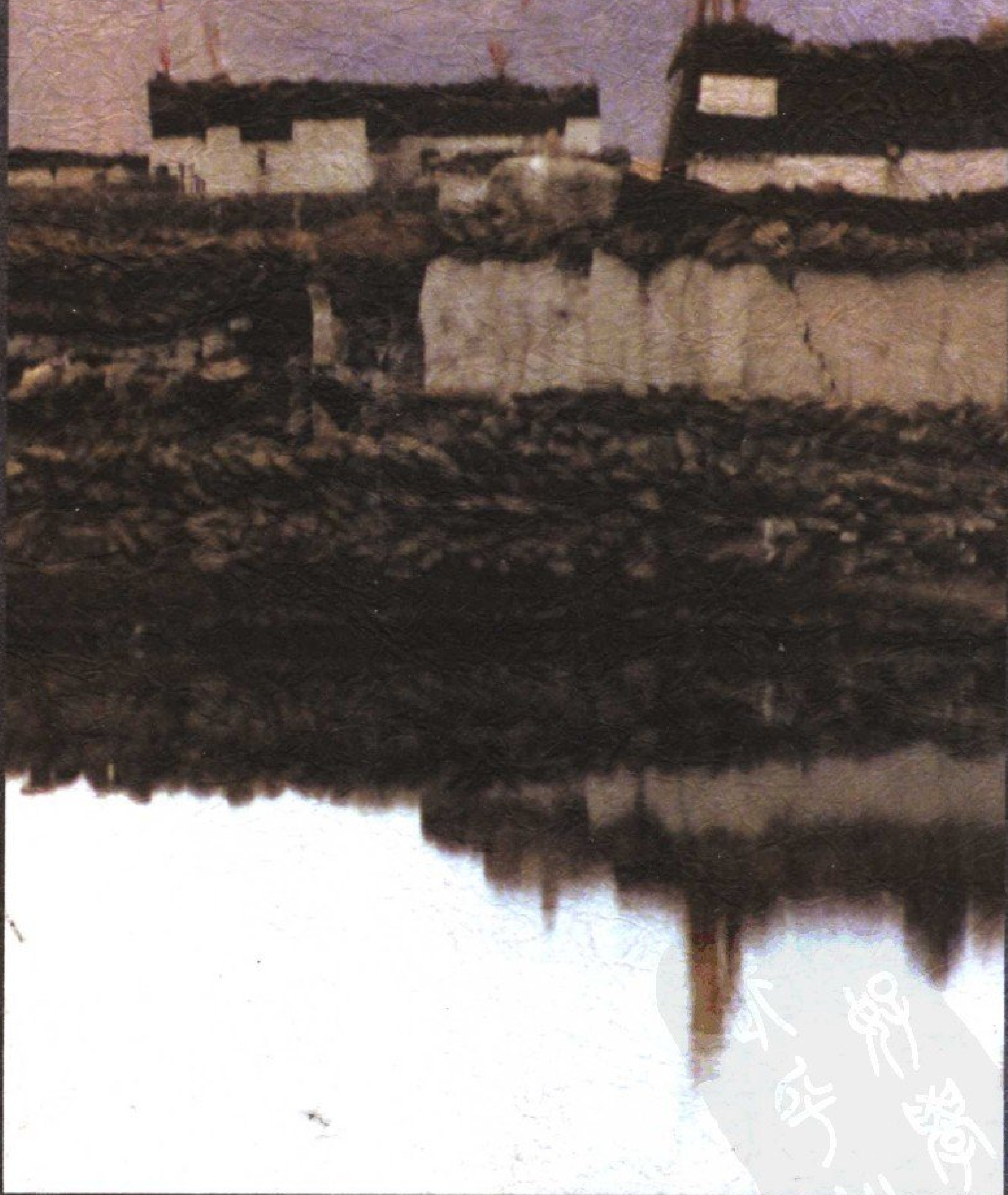
西藏是我家

口述 扎西次仁 Tashi Tsering

英文执笔 梅尔文·戈尔斯坦 Melvyn Goldstein

威廉木·司本石初 William Siebenschuh

中文译者 杨和晋 Yang Ho-chin



中国藏学出版社



ISBN 7-80057-6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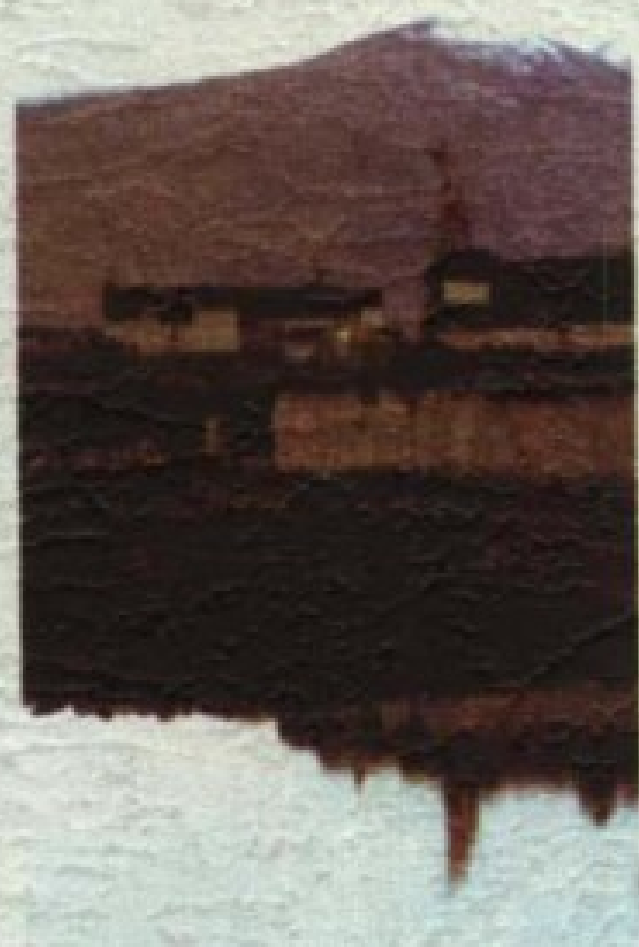


9 787800 576782 >

ISBN 7-80057-678-7/K·121

定价: 30.00 元

父心愛



西藏是我家

口 述 扎西次仁 Tashi Tsering
英文执笔 梅尔文·戈尔斯坦 Melvyn Goldstein
威廉木·司本石初 William Siebenschuh
中文译者 杨和晋 Yang Ho-chin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是我家/扎西次仁口述;杨和晋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ISBN 7 - 80057 - 678 - 7

I . 西... II . ①扎...②杨... III . 扎西次仁 - 自传

IV .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9045 号

西藏是我家

口 述 扎西次仁
英文执笔 梅尔文·戈尔斯坦 威廉木·司本石初
中文译者 杨和晋
出 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电 话 (010) 64892902
印 刷 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30 千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 - 80057 - 678 - 7/K·121
定 价 30.00 元

新华书店



1988年班禅大师去尼泊尔加德满都参加世界佛学大会，扎西次仁时任英语翻译。



扎西次仁(后排左一)穿着戏服，当时是达赖喇嘛的舞蹈团员(噶足巴)。



1957 年与朋友在印度



1960 年和罗伯特·顿南姆先生在威廉姆斯学院



1960 年在美国的同学家
门口



1960 年在美国的威廉姆斯学院与师生在一起



1963 年在华盛顿大学校
医院食堂里兼差洗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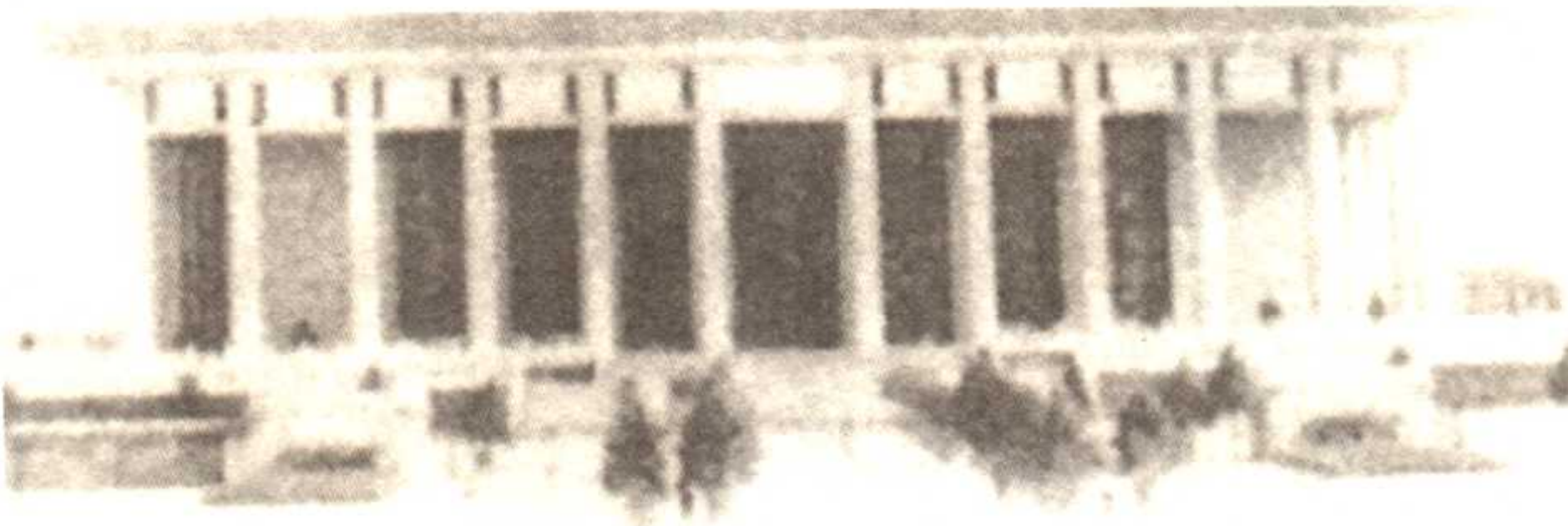
1963 年扎西次仁(左)和朋友们摄于西雅图



1963年和第一任妻子
萨迦泽青在西雅图



1966年8月扎西次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当时是和他学校的红卫兵一起去的。



1978年在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当时扎西次仁去北京向国务院请求为他平反。



1981年和妻子桑吉啦在西安



1992年与罗伯特·顿南姆先生在美国相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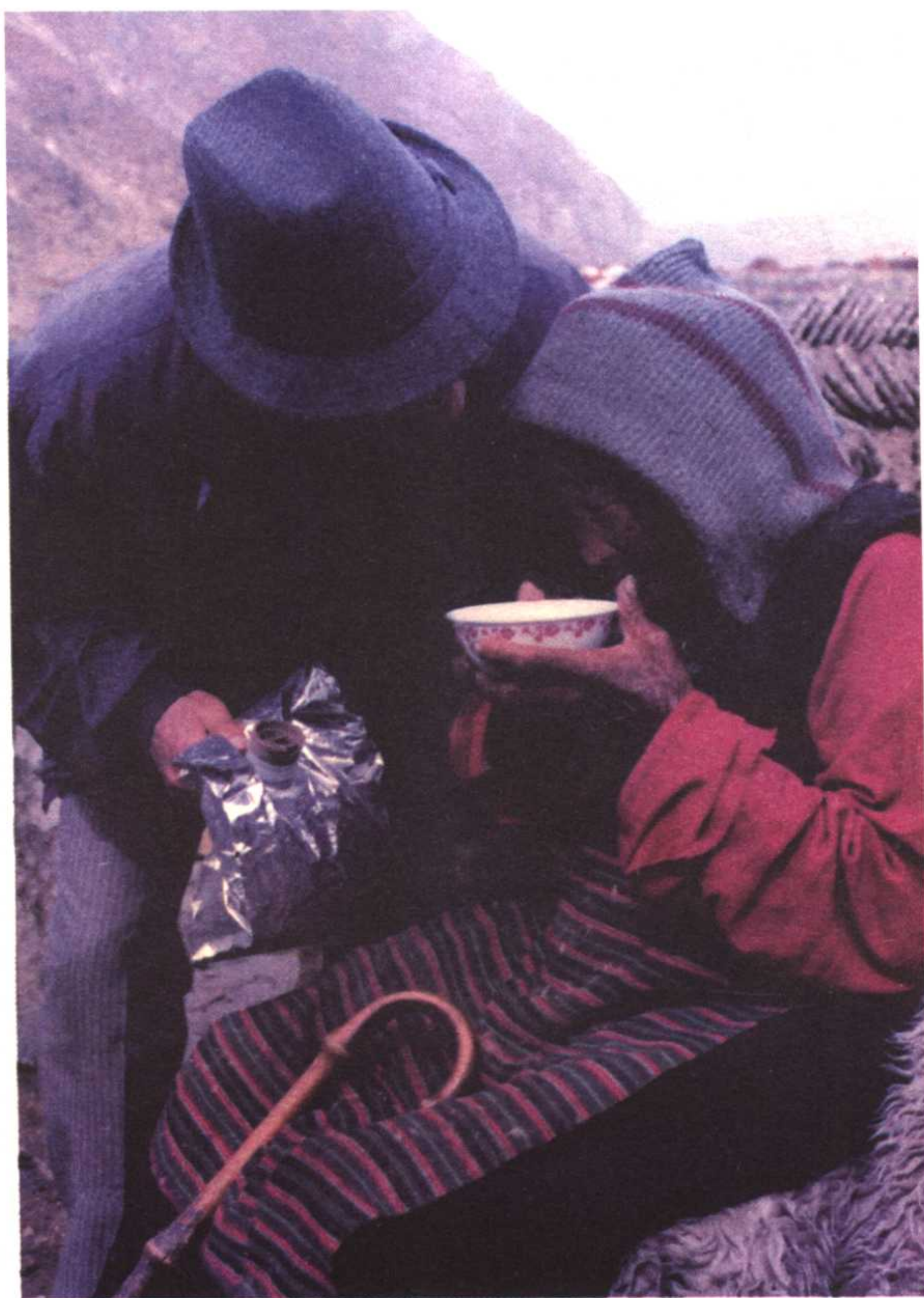
1964 年在美国林肯纪念馆前



1992 年与梅尔文·戈尔斯坦先生(中)在香港



1992 年在美国又见大学同寝室同学斯迪本(右一)



1992 年回家看望母亲



夫人桑吉啦在酿制青稞酒



扎西次仁的
儿孙们



1986 年在拉萨家中教当地孩子写藏文



学生在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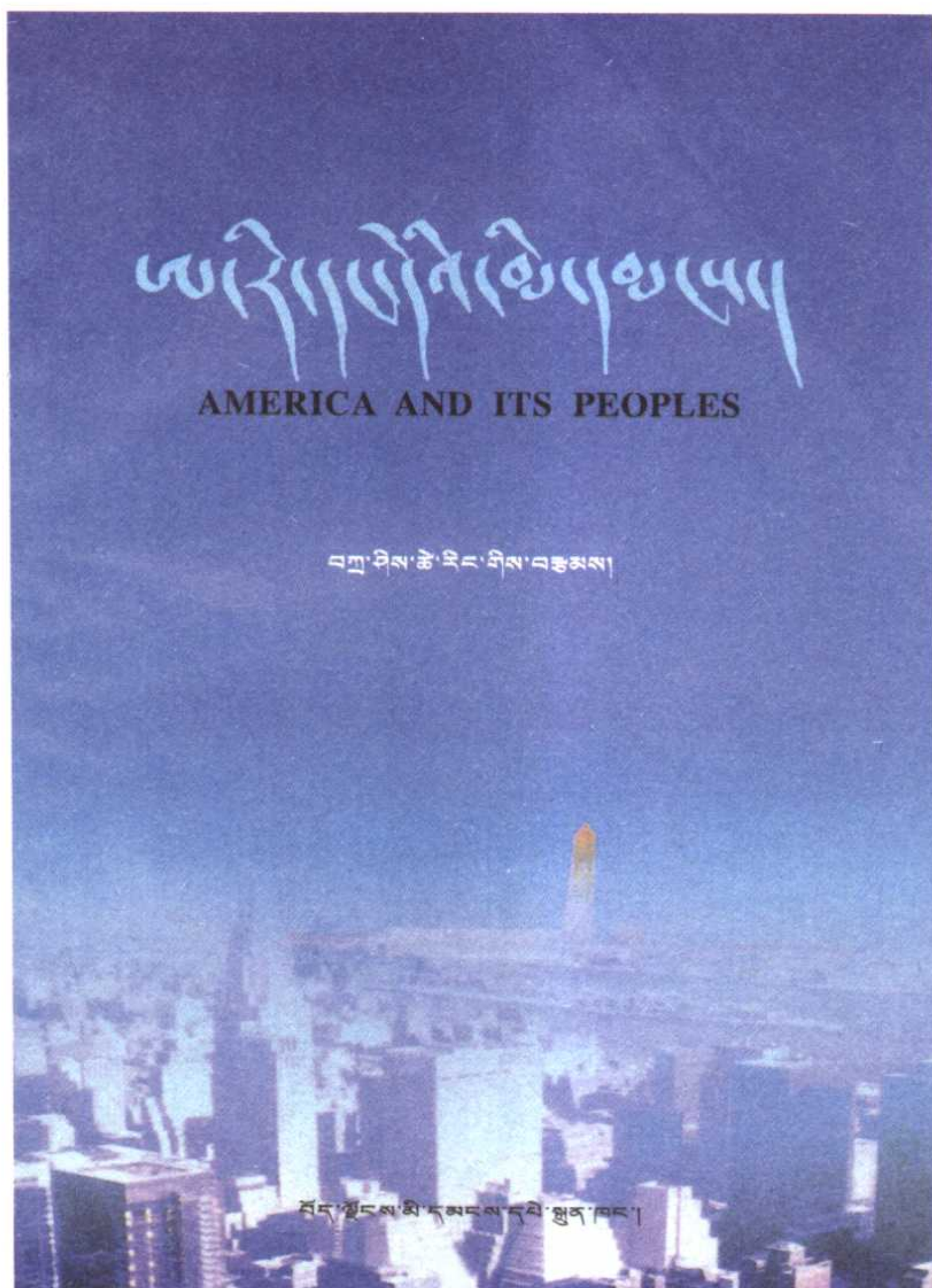
扎西次仁在南木林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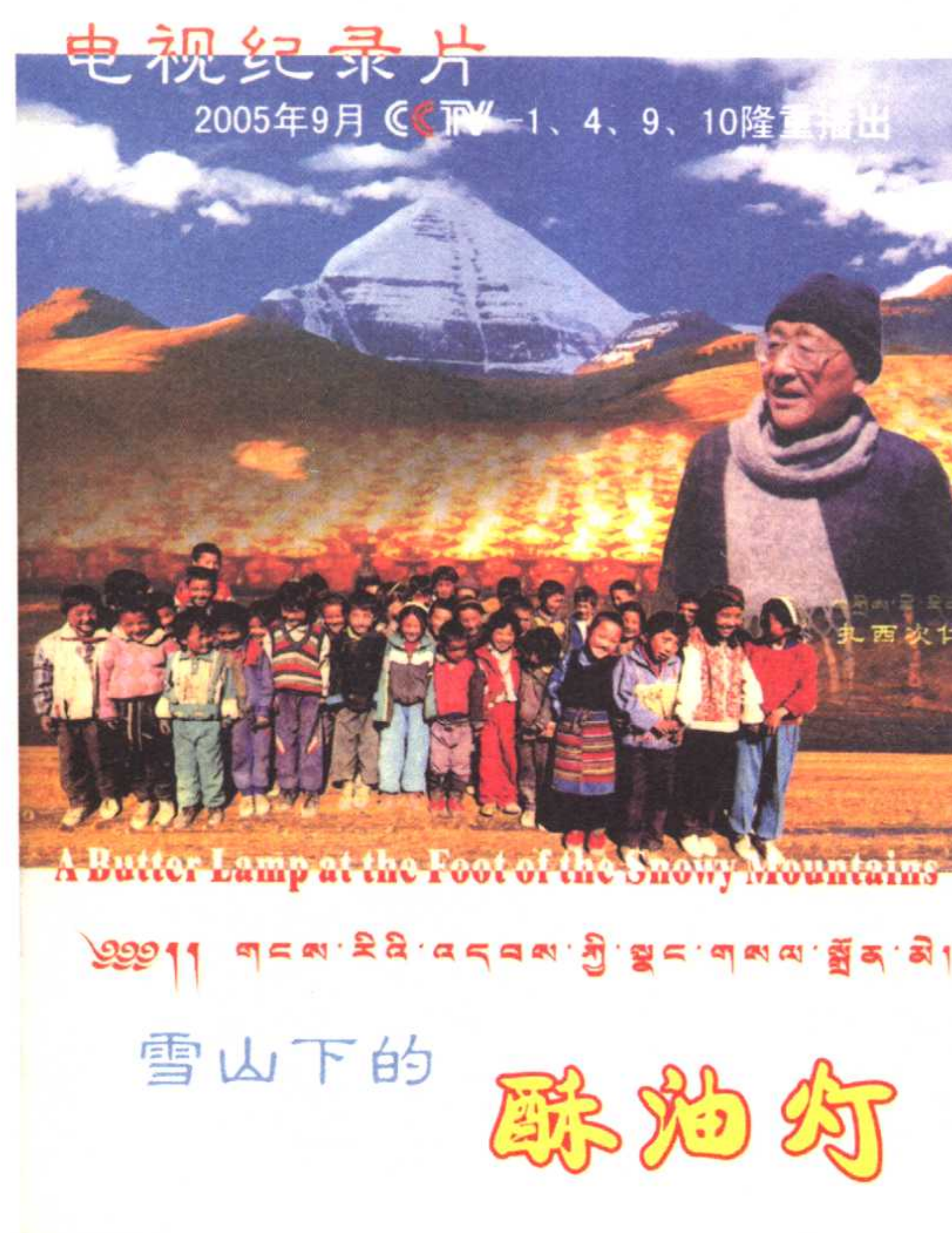


学校的女学生们





扎西次仁所著《美国与那里的人民》(藏文版)书影



中央电视台为扎西次仁拍摄的电视纪录片《雪山下的酥油灯》

归途：一个人的理想、命运与时代之潮

——《西藏是我家》序一

马丽华

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到本书出版的当下，这位可敬的老者已是寿登耄耋，七八十年间身历几个时代，个人命运也随之几番沉浮。至此，扎西次仁可以说，我一生历尽沧桑。还好，接下来他或许会说，我如愿以偿。

《西藏是我家》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沧桑和偿愿的过程。这本书是两位美国教授根据扎西次仁的口述录音整理出的一部传记，英文版书名《为西藏的现代化而奋斗》（《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海外版书名改为《西藏是我家》，可见前为理性，后为感情，一体两面地完整呈现了一个色彩强烈的主题。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踽踽独行的身影，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一系列连文学虚构也未必想像得到的始料不及，以及由某个信念贯穿的矢志不渝，读来不由不叫人怦然心动。几年前读它读到流泪，从此念念不能忘怀。有时就想，是什么打动了我，让我肃然起敬——他既非思想巨人亦非文化英雄，既非神佛（他自称甚至连宗教信仰徒也不是）亦

非超人。当我试图把他类型化,隐约想起或与忍辱负重办义学的武训有一点儿形似,或与离经叛道的独行僧根敦群培有一点儿神似,有类同,又是迥异的——扎西次仁实属难得一见的个案,自当别论吧。而此人之所以成为特立独行的“这一个”,或许只有从他非比寻常的人生途程找出可能的答案。

一、走出山村

扎西次仁出生在拉萨以西、日喀则以北、南木林县境内一个名叫古确的偏僻山村。在他出生的时候,古确村民还在延续着其地的传统生活:后藏地方政府的差民,半农半牧,文盲普遍,兄弟共妻——你看扎西次仁的家正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家庭结构:父辈兄妹六人,四姐妹均为在家尼姑,两兄弟合娶一妻。这样,扎西次仁就有了一位母亲、两位父亲和两个弟弟。按照传统给出的既定人生,将来若不打算出家为僧的话,他将会终生在家务农放牧吧,与弟弟们共娶一位妻子,生儿育女,重复着祖辈的命运。这命运其实已经开始:在三百只绵羊和山羊的簇拥下,八岁的扎西次仁甩起了“乌尔朵”(藏式牧鞭)。

但在牧童的心目中,自有朦胧向往,说是与生俱来也不为过。全村惟一能写会算者不是别人,正是扎西次仁的父亲。每当父亲埋头书写和计算的时候,沉浸其中的神态就让这个孩子感到既困惑又迷人:文字、数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风景一定与眼前所见不同,童稚心灵依稀生发出类似自我发展的念头。所以一当机会来临,那孩子便迎向前去,急不可耐。

按照惯例,达赖喇嘛的仪仗表演队要从富裕的农家子弟中招收舞蹈员,“噶足巴”,属于支差服役性质。男童扎西次仁的家境正好符合条件,尽管家人不甘不愿,他还是兴奋莫名地就此一脚踏入圣地拉萨。

二、拉萨奋争

十岁的男孩要在半年内被强化训练成合格的歌者舞者,虽说吃了苦,但比不过在寄居的人家里沦为家奴之苦。备尝屈辱的少年三番五次逃亡皆被追回,何谈文化知识的学习。后来命运提供的转机也同样富有特色:做了权势僧人、他的保护人的同性小伙伴,而且因此出名,竟成为不肖浪荡僧追逐的猎物——尽管事隔多年,我们的传主以平和语气提请读者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但诸如此类的习俗竟成为一地传统,西藏之外的读者莫名惊诧之余,也算长了见识,领会到“非香格里拉式的”含义。就这样,付出得到了回报,在他年满十八岁行将从歌舞队退役时,他的恩主帮他安排了低级职员的工作。曾有过短暂的婚姻,岳父虽然官阶甚低,但照样以那个时代的眼光睥睨乡村出身的女婿。不堪其辱的新郎逃了婚,开始发展另一段感情。女方家庭富有,其兄长身为僧官。我们的传主并不讳言当初试图借此跻身豪门、迈过那道无形门槛的动机,遗憾的是女方家人并不买账,让他重蹈了覆辙,在粗暴干涉下劳燕分飞。

历史行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兴学修路创办医院,扎西次仁感受到了此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崭新的观念和工作效率令他惊叹:短短时间内可以改善的事情,比他一辈子可能见到的,比西藏以往若干世纪所能做到的,还要多得多啊!一段时间里,年轻人满怀激动地参与着街谈巷议,并且一度动心。但是,变革时期的社会何其复杂,扎西次仁面临着选择的困境:一方面他认为旧制度需要改变,听凭本能他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想要鼓足与恩主背道而行的勇气谈何容易。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甘逆来顺受,最终,他决定从夹缝中抽身,远走他乡,先用知识自我武装。

三、求学印度

青年扎西次仁开始奔走于城乡之间，紧锣密鼓地为实现目标努力赚钱——经商才干在早年就凸显出来，这位精明的生意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赚取了颇为可观的收入。正当此时，一个突发事件加速了计划的实现：由于当年被选上了“噶足巴”，他的家庭倒是依例免除了差役，但总量未减，分摊在同村其他村民身上了。这只是公开的理由，也许还有属于乡野惯常的积怨结仇之类原因，总之他的父亲遭人殴打。血气方刚的扎西次仁闻讯，回乡报复，把仇家打个半死，结果是惊官动府。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诉讼里，扎西次仁决定即刻动身。时在一九五七年。

最初的一两年里，印度的生活还算是风平浪静。经当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介绍，一位名叫康明的英国退休军官做了扎西次仁学习英语的启蒙老师；其后又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人在异国，精神的自由却是从前所未曾体验到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进入一九五九年，西藏社会就发生了动荡，他眼见昔日的上层显贵们落荒而来。随后的一个时期里，他接受嘉乐顿珠的委托，帮忙访谈难民，整理相关材料。此时他的财政发生了危机：委托他人代理经营的钱财无法收回，需要挣钱养活自己，这样他又接受了为流亡团体看守银库的工作。扎西次仁意识到这一职责的重要，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接近上层了，但现实是，他再一次感到了那道难于逾越的门槛。当他的这位恩主以不屑的口气说道，西藏社会只有两种人，“吃糌粑的人和吃屎的人”时，他被刺痛，明白了在那样一个远非香格里拉式的世界里，自己将永远休想成主人而永远被关在了“阶级”的门外。再一次面临选择，再一次选择了逃避——越走越远，这一次是大洋彼岸美利坚。

四、大洋彼岸

在美国学习不足四年的时间,无疑是一个思想被照亮的过程,从而确立世界观和奋斗目标的过程。他学习历史、哲学、经济学,第一次接触到欧洲中世纪史、法国革命、美国南北战争,顺理成章地,他把欧洲中世纪与西藏旧制度作以比照;第一次接触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被字里行间的革命理念所深深吸引;他乘汽车旅行,近距离考察美国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美国本土存在的种族问题和暴力事件,观察思考的结果,以藏文写下一本名为《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看法》。当所有的新鲜信息在脑海中奇异地汇合,虽然由此产生的问题比所得到的答案要多得多,但越来越明确的信念是:我是一个现代化了的西藏人,我要为西藏的现代化而奋斗。我崇尚科学,崇尚革命。西藏的现代化不可能在旧体制内发生,旧式的宗教政体必须结束,共产党救了中国,救了西藏,西藏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西藏的现代化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成功。当伴随着信念而生成的勇气足以支撑行动的时候,他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抉择——回归中国,重返西藏。

此时的扎西次仁又一次结了婚成了家,有妻有子,虽然儿子并非亲生,重要的是已经有了安适的稳定生活。亲友同学们得知了他的这一决定,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支持者。此时嘉乐顿珠出场了,见面长谈,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时而舌枪唇剑,时而和风细雨。这位有身份的人极力想要打消他回国的想法,同时委以重任,许以高薪,希望他能去印度为他们工作。扎西次仁不为所动,表明了立场:现在印境的所谓政府只能代表老派的保守人物,而不能代表穷苦藏族百姓的利益,我决定接受共产主义制度,谢绝为不能代表西藏的人工作。

在哈瓦那,扎西次仁与中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从古巴乘船远

航广州。加勒比海—南太平洋—地中海—红海—南中国海,海水无边无际,太阳东升西落。五十七天的航程中,扎西次仁埋头读书,思考,写作,终于在旅行将要结束时,用英文完成了一篇巨长的文章:《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为本书附录,仅作少量节选,更名为《航行手记》)。此文放眼世界风云,纵论天下是非,声讨帝国主义,畅言革命斗争,满怀豪情,一腔热血——这是在南中国海,海轮名为“东风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伴着朝阳和心情在海轮上升起——无论将来幸与不幸,从此后,他的人生将与共和国一起经历,共同着命运和悲喜。

五、“文革”劫难

按照扎西次仁的个人计划,是在北京学习几年后再回西藏实现抱负。但是,计划内的求之不得,而计划外的,没想到的,却不期而至——甫一上岸,便被告知了一个此前未曾听闻过的城市,陕西咸阳,他将在那里的西藏民族学院读上几年书。略感失望的扎西次仁接受了这一安排,渐渐适应了与在美国反差很大的艰苦生活,适应了他未必情愿的学习方式,到他甚至乐观地全盘接受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以“革命者”的身份,和红卫兵一路同行,破除“四旧”,批斗“走资派”——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满怀激情地投身其中。这期间他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拉萨,他所见闻的现实虽在内心引发了疑虑,但正如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他认为这属于伟大运动中难免的代价和副作用。

一九六七年十月,厄运降临。起初只是被视为“特嫌分子”被批斗,受监视;多次受审后,是他自己承认了为流亡政府工作过的实情,性质一夜间改变,“牛棚”升格为监狱。这一段磨难之不堪回首,理想抱负与残酷现实的差距引发的幻灭感,曾一度令他崩溃过。从陕西到拉萨,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到一九七三年五月,牢狱之

灾三年后,重获自由的扎西次仁被送回咸阳,在校办印刷厂做装订工。重回公民行列,待遇依旧不公。当他意识到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决定结婚,以在拉萨安家为由调回拉萨。这一点也许出于功利盘算,但也由此做出了一生中最好的选择:他娶了一位好妻子。不过调动计划一再受挫,他的历史问题与可疑身份显然是一大障碍。

六、否极泰来

一九七八年九月间的赴京上访,再一次体现出扎西次仁过人的勇敢。好时候和好运气让他接连遇见了好人和认真负责的人。本书中的这一段落是我们的传主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昏暗走向了澄明,是我乐意反复读过的。边读边想,大时代的变迁或许用不着非要观照大气象,一滴水就可反射太阳的光辉;国家的形象、党的政策,也往往化身于某一个具体执行者;当说到民族关系之类话题,人们也往往忽略宏大叙事,而对自身所历的微细人事印象深刻。作为读者,我们会以为倘若不能为扎西次仁落实政策,说明了社会的不公不义,然而对当事人来说,他却会对那个公义的执行者终生感恩,这一点也令人感慨唏嘘。总之北京之行后不长的时间里,所在的西藏民院终于为他正名:承认当年的拘捕为非法,补发全部工资,重新安排工作。扎西次仁摇身一变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当即被派往西安外语学院参加培训,恢复英语水准——他奉命筹建民院的英文系。他提出的编纂一部英藏汉大词典的设想顺利启动,就此忘我地投入了工作。重获信任、尊敬和友谊,一个长期被孤立的人感到了甜美,找回了自信,从此拥有了被肯定的人格,这种有价值的新感受——实现理想、光荣生存、获得赞美的新感受持续至今。

一九八一年,当筹建民院英文系的计划取消后,扎西次仁立即决定回藏。这一次顺利通过,西藏大学的前身西藏师范学院接收

他为英语教师。

从此可谓一帆风顺。虽然在编纂词典的过程中遇到了人手、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但一经反映,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阴法唐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这部词典于一九八八年出版。

编词典的同时,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扎西次仁在八廓街首创了英语夜校,教授藏族青年学习英语。这一年中他还曾为西藏的教育问题上书,得到了重视受到了鼓励。此后他还担任过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每每建言献策,直陈己见。夜校办得红火,扎西次仁掘得第一桶金:抛去成本费用,第一年赚取纯利一万元!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当时的“万元户”几等于今天百万富翁的概念。面对这笔巨款,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别的,是身体力行办教育,就在家乡古确村办一所小学吧!他与南木林县政府和教育局取得了联系,商定了一系列的合办措施。这一善举不乏波折,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来自亲人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志在必得的信念。小学开学了,共有四十六名小学生前来就读。

由此开始,一发而不可收。他做起地毯生意,把藏式织毯远销国外,他奔走国内外各地募集资金,把挣来的钱、募来的钱全部投入办学,迄今开办合办了六七十所乡村小学,还有职业中学,让乡村的孩子们就近读书,以知识的力量改善命运,提升生活的质量,提高民族的素质。这一事业仍在现在进行时中……他的事迹经由报纸、广播和电视已经广为人知。历尽沧桑,如愿以偿。一九九四年,当年逾花甲的扎西次仁重返美国母校,与阔别了三十年的同学老友重逢时,心情何等激动。不错,当年你们极力劝阻和反对我的归国计划,你们预言的灾难确曾在我身上发生了,然而如果没有当初天真和愚蠢的乐观主义,我就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付出是值得的。

.....

如果把扎西次仁的人生比作河流,我们看到它从源头开始就选定了义无反顾的流向。它流经戈壁,险些干涸;它曾被山洪冲激,一度淤塞;它回流跌宕,终于汇入江河,奔腾入海,终于波澜壮阔。

如果把扎西次仁比作开路者,我们看到路的起始处并无人迹,是在棘丛中用自己的双脚蹚出。或许会在崇山峻岭中一度消失,时有跨越不过的沟坎,但当峰回路转,这路重又伸展,直到与大道会合。

通过对这位老人大半生的梗概回顾,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个人难以选择他生长其间的时代和环境,但他可以选择改变自己,校正人生轨迹,融入时代大潮。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无奈、左冲右突,只要矢志不渝,终得善果。这个世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梦想,人人都有梦想,要使梦想成真并施惠于人,是不是需要某些特别的品格。

西藏已然今非昔比,在朝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发展教育事业成为构建和谐西藏的基础,而农牧区的义务教育尤其被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一生为之疾呼并为之奉献的扎西次仁看到了、参与着、继续努力着。是不是可以说,他已在自身率先实现了现代化——首先是现代化的理念,同时辅以坚忍不拔的实践。这位可敬的老人在这片既冷又热的家乡土地付出了那么多,无论怎样的赞美也显得无力,就想到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西藏是我家》,也是我们的家。凡读过这本书的人,听到过他的事迹的人,不论是年轻的、中年的各族各界人士,还是他的同时代人、十八军老首长老战士,无不为之动容,知情知义,心心相通。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是我们的衷心所愿。老人欣然同意了这一出版计划,同意了我为本书写一篇读后感的文章。而我,更想借此机会向扎西次仁先生致敬,并借用他的名字的本义,衷心祝福他吉祥长寿!

二〇〇六年六月于北京

大爱无边

——《西藏是我家》序二

张子扬

到今年的八月,认识扎西次仁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是我现今这样的年纪,屈指算来如今他已经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二十年来我们在北京和西藏有过多次的见面,但是真正让我了解他,让我感觉到他的深沉善良,被他的传奇经历所打动、震动、感动的还是《西藏是我家》这本书。

一九八六年,我率摄制组进西藏去参加中断了二十八年的“雪顿节”的拍摄。这一次初进西藏的过程中结识了许许多多藏族的、汉族的朋友,在西藏工作生活有成就的一些文化人,让人敬重。其中有几位长者是我作为忘年之交一直到今天仍保持热烈往来的,这其中除却前几年圆寂的达赖喇嘛的宫廷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西藏分会的前主席安多·强巴先生外,还有西藏藏剧团副团长、著名的音乐家边多先生,还有作为学者和教育家、慈善家的扎西次仁先生。

和扎西次仁的相识非常有意思。记得当时我们初到拉萨,虽

然拍的是藏戏的专题片,但是对拉萨本土的文化特色和它已经被现代化的很多信息和文化冲击萌生出来的特殊的人文现象也非常感兴趣。当时在拉萨,国外的旅游者非常多,八廓街也不像今天这样充满商业气息,作为文物因素和有点原始色彩的买卖物品味道非常浓,很多的外国人和藏族人一块儿交流的时候,直接用英语,所以使得很多藏族人为做生意很愿意在英语方面有所学习和提高。当时拉萨还出现了第一个私人小旅馆,叫“巴朗雪”旅馆。小旅馆做得精致,有意思的是旅馆里除了张贴很多旅游者自己的个人启事(卖睡袋和自己不用的旅游用品等等)之外,还有一个通知栏,写着在这里开办的英语培训班,几点上课。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下午,我们正在琢磨着这个英语训练班将会是什么人参加,有多少人参加,是什么样的英语的培训。这时,走来一位壮年人,他很热心又很权威地向我们解释,大概有多少人,怎么怎么回事。说完就对我说:“我认识你,你是中央电视台的。”他说,昨天在罗布林卡看藏戏的时候,我就坐在你旁边。我想起来了,头一天我们看第一场罗布林卡藏戏的时候,除了一侧是边多老师外,另一侧坐在我和少数民族戏曲研究专家曲六乙先生中间的,的确有一位头戴短檐灰布遮阳帽的中年人。他黑红的面孔,穿着很普通,但是盘腿坐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看着这部戏,时不时也叨咕几句,乐在其中。他自己介绍说叫他扎西次仁,就是这个英语训练班的教师。我们非常惊喜,说你的英语在哪儿学的?他说我的英语是在印度和美国学的。当时我们就感到这个人身上肯定有着很多不凡的经历,背景复杂。而他则很热心地告诉我们,你们有事情可以找我,我家就住在八廓街,大昭寺广场拐角的二楼,你提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我在西藏大学教书,是教授。以后的日子因为工作忙,没有更多的打扰他,大概是在四十多天的拍摄之后,临走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家。推门第一个感到的热情和盛情,就是一位中年妇女,手捧青稞酒桶,由扎西次仁陪伴在门口迎接我们。他介绍:“这是我太太,桑吉啦,她是专门做青稞酒的,这个酒是她做的。”桑吉啦捧酒迎客的诚意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而且从那儿以后,每次到拉萨去扎西次仁家,我都相信只要桑吉啦没有出去卖酒,她一定会在门口等待我

们,向我们敬酒,然后我们进去聊天的时候,她就默默无言地进来,给我们一次一次地斟酥油茶或者是青稞酒。

扎西次仁家很宽敞,进屋子里面一看的确是学者之家。除了唐卡、佛像、酥油灯外,还有更多的书籍。因为当时大家并不是很熟悉,西藏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神秘,对于这样一位有一些背景的且比我们年长的学者,我们轻易不太好问人家的身世,只是聊了几句之后,互相留了一下电话,便告辞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私人人家也少有电话,但是扎西次仁家已经安了电话,可见他这个人现代化的意识很强,对信息的敏感在这里面就能看得出来。当时他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去北京了,去校对他主编的一部书,是中国第一部《英藏汉大辞典》,如果下个月去北京的话,他一定去找我。就这样,他是我第一次到西藏的时候,在拉萨街头认识的这样一位略显神秘,但是又非常热情好客的朋友。

一个月以后,中央电视台在民族宫录制由国家民委主办的少数民族歌舞汇演的演出,因为有藏族的歌舞节目,所以我也愿意来做录制这台节目的导演。就在开录的这天下午,我接到扎西次仁的电话,他说他就在北京,能不能见个面。我说我请你看节目,就在民族宫。他说巧极了,这台节目民委和出版社的人也邀请他去观看。在民族宫外边的转播车旁边,我们又见了面。扎西次仁向我介绍了他这本辞典校对的情况,说可能会在一九八七年底或一九八八年初的时候出版,他说“到时候我会寄给你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我们彼此都默契的认为大家算是很可交的朋友,是比较近的朋友了。

到了一九八七年年底的时候,我去西藏参加藏戏学会举办的研讨会,我带着论文去宣读。自然又去了扎西次仁家,虽然见面的时间很短印象却很深,因为仍然是桑吉啦在门口端着酒桶迎接我们,彼此介绍自己的近况,喝了几碗酥油茶就告辞了。返回北京之后不长时间,拉萨出现了一次比较有影响的骚乱,中央电视台准备拍一个专题片《关于西藏》以配合对外宣传,便派我又去了西藏。也就是这次,扎西次仁把《藏汉英辞典》很郑重地送给我。他一再给我解释,他的汉语阅读可以,会话不如阅读,而书写则更不好,所

以他在辞典扉页上分别用英文和藏文写上赠词：“使用自己的母语和别人交流，这是最大的幸福，同时还能用其他的语言和别人交流，这也是非常的快乐。能用母语和其他语言跟别人交流的人是幸福的人。”底下是藏文和中文的签名：扎西次仁。

大概在二〇〇〇年的冬天，我以全国译制片研究委员会理事长的身份，和几位秘书长一起进藏去评审西藏电视台的译制片节目。这期间将近小十年的时间没有去西藏了，所以自然又想去拜访许多老朋友，但是匆忙之间竟没有及时地和扎西次仁联系。直到临走的前两天，我在大昭寺广场二楼旁边的酒吧吃饭，便向咖啡馆的老板打听扎西次仁。很快，老板就回来了，“扎西次仁老师请你马上过去，正在给你准备酒呢。”就这样我就转到隔壁他家，一开门还是桑吉啦端着酒桶和酒杯，还是那样非常善良、谦和的微笑……老朋友见面也是开怀畅饮，一直聊到很晚很晚。就是这一天他告诉我，他几年前又去了美国，在美国口述了他的一个自传，并分别送给我各一本《西藏是我家》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的繁体版。

回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阅读《西藏是我家》，而这个阅读竟是一个通宵——让人泪流满面唏嘘不止的阅读。我为我的朋友在人间所蒙受的不平感到愤懑与难受……书中很多段落让人震动，比如他在旧时代里的一些经历，比如回“家”后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比如他因为这些不幸绝望了，在监狱里竟去喝尿桶里的尿，以为就可以自杀；比如他和桑吉啦的结合，还比如去为他自己的冤案平反，到北京……无论是他的喜，他的怨，他的怒，他的哀，都让阅读的我泪流不止。看完全书之后大概是早上六点多钟，我拨通了扎西次仁家的电话，谈了我的种种感受。扎西次仁那边也是声音哽咽——他说你确实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朋友就是理解，他说我之所以没有放弃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因为我周围有许多许多像你这样的好朋友，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

就是在拉萨赠书的那天晚上，我在扎西次仁家里还见到了西藏电视台的吴兴元和贡布两位编导。记得当时吴兴元告诉我，他们已经跟踪了老人五六年了，一直在拍摄一个有关老人自己自费办学的专题片，当初定的名字叫《我的梦》。扎西次仁告诉我，他的

梦是要在西藏自己捐助办一百所学校,当时已经有三四十所学校开学。那天,吴兴元和贡布也非常愿意让我来参与他们的拍摄,我表示:我愿意为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做我能做到的一切,无偿地全力地支持和帮助。

从那次阅读之后,使我对扎西次仁有了一种人格上的认同。他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一个西藏普通农民家的孩子,做过达赖喇嘛宫廷舞队的演员,他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的又是英美式的教育,对于家乡西藏充满自由、进步、文明的理想追求。从他幼年起就有一种志向,也是因为这种志向使他成为非常理想化的人物,居然能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毅然从美国返回祖国,由此在一段特殊年代里受到了极其特殊的、令人窒息的种种遭遇。但是他的执着、他的乐观、他的纯朴,又使他能够跨越这个时代,重新获得新生,包括让人羡慕和尊敬的一个家庭——特别是他的桑吉啦,以前我不知道她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会做酒的妇女,在读了她的故事之后,我对她又增加难以言喻的一种敬重之感。她的经历、扎西次仁和桑吉啦的这种超常规的情感组合,还有他们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从来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不般配、不和谐。我像上一次得到扎西次仁的辞典一样,加倍的、甚至是带点狂热地向我周围熟悉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因为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扎西次仁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在文化变迁、政治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迈向文明和进步是那样的艰辛、那样的沉重、那样的苦痛和那样的不屈和昂扬——扎西次仁真是一个浓重的缩影,我们经常谈论文化人类学的目的与意义,它侧重研究的文化和文明进程是由何而来的解析,我觉得扎西次仁的传奇历史,更能直接给我们一些诠释,那就是文明和文化是从哪儿来的,在哪儿停留了和又将向哪里走去。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认知,也是我对扎西次仁的认知。

大概是在二〇〇一年的夏天,我陪同从加拿大来的著名诗人痖弦、罗铎鸣和曹永正、曹禅父女等到西藏去采风,我安排他们与西藏文化圈的朋友见面,马丽华、叶星生、边多——当然还有扎西次仁,在他家作客的时候,都是用英语交流,直抒胸臆。他的故事,

他的经历,他的作品,都让当时去的朋友非常的感动和敬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之后,我曾经带《正大综艺》西藏摄制组在拉萨拍专题,其间,也向剧组的同事介绍了老人,并拍了一些短节目,包括我的儿子去西藏采风,也专门让他去拜望了扎西次仁。老人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他的故事也让儿子感到非常的神奇。

二〇〇五年,我和朋友们约好,陪着他们去西藏一游,结果因为工作调动,未能成行。李若弘、贺清夫妇和来自加拿大阿尔布特大学的副院长安迪、仙蒂夫妇都是第一次赴藏。我曾担心自己不在场有可能影响他们与我的西藏朋友之间的交流,但是他们到了西藏之后,恰恰是因为我不在,所有的西藏朋友在接待时都显示出了特别的热情和周到。尤其是在扎西次仁家里,因为语言交流的顺畅,使国外的客人感到了莫大的兴趣,因为不用通过翻译的传递。他们除了求购老人的辞典和传记书之外,还热诚地购买了老人专门经营的优质卡垫——我知道,这其中除了有他们欣赏卡垫工艺的精良之外,更多的是,他们也都知道卡垫销售是老人作为办学的捐助款的主要来源。

记得有一年,我去拉萨参加《西藏风云》的开机仪式。临行前的晚上,得知老朋友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刘伟刚刚回到拉萨,我便通过现为《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主编嘉措约刘伟一见。我们三个人在拉萨饭店小聚后,我说我还要去看一个朋友——扎西次仁,问他们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儿去。他们欣然前往。在老人的家里,大家互相做着详细的介绍和交谈,气氛相当热烈。桑吉啦的酒,我们喝了不少,酥油茶也几乎喝光。在这个热烈的气氛中,老人看着我们三个人用藏语调说汉语的方式非常高兴,自言自语:“哎呀呀!哎呀呀!在西藏住了这么多年,大家都互相知道,但是还要通过从北京来的朋友引进到家里来更深一步的了解,哎呀呀!哎呀呀!”让你感觉到他对结识好朋友的热诚,别样的一种快乐。

我们三个在八廓街上散步闲逛,我随口引用了一句忘了是哪一个朋友说的话,意思是说在拉萨,特别是在八廓街,说不定在哪一个窗户里边,在哪一个院子里边,在哪一个巷子里边,就可能传

出来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或者出现一个传奇人物。扎西次仁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秘密，这样一个传奇！但是他非常鲜活，他不是古董，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西藏确实确实是产生传奇、产生神秘的一个地方。它的文化、历史、自然和人文的特殊景观与风貌，都让人感觉到传奇和神秘无时不在，而作为一个人物来说，扎西次仁这个人本身就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意志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通过快乐和痛苦的心灵历练把他的理想践行，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也就是在上一次我没有成行于西藏的那段时间，老人从西藏打来电话告诉我，有关他的专题片，那时叫《我的梦》的专题片，已经做好了，后期的合成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希望我能给予指导和帮助。当时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受训，学习之余与贡布做过几次电视脚本的修改。之后，通过中央电视台领导和有关编辑部门的支持，这个专题片改名为《雪山下的酥油灯》，在中央电视台第四套、第九套以中文解说和英语解说播出，而且播出不止一次——因为二〇〇五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这个节目介绍了老人捐助的几十所学校，介绍了老人走过的七十多年的风雨坎坷的经历，也介绍了老人种种的学术上的成果。应该说，这个片子相当有影响，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给我打电话，或发信息到手机上，通过我这个“顾问”来向老人致敬。

随后的一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先是一句：是张子扬吗？然后就泣不成声，电话放下来。我觉得挺奇怪。又接一次电话，还是这一句，又是泣不成声。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是熟悉的，打了过去。的确是他。老人哽咽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啊！我知道他指的是这个片子的完成与播出。我急急地解释说，这不是我是好人，首先你是一个最好的好人，中央电视台非常重视西藏的宣传，重视你的故事，中央电视台的频道也尊重你和需要你的故事，你做的一切感动了我们。随后列举了几个我亲历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无边之爱：

——有一年的秋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一个残疾女孩求学奋斗的故事，让他非常感动，就直接给广播电台的栏目组寄去了几千块钱，但是至今一直没有回音。老人怕

这钱孩子没有收到。我就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张月明帮忙了解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老人汇款的时候没有注明自己的邮编和详细地址,当时编辑部还正为难找不到这个捐款人的联系方式呢,所以最后他们把捐款证书和相关纪念品寄给了他。

——“非典”时期,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们看了“非典”的新闻,很着急,很想做一些事情,我和桑吉啦商量,要参加“非典”救助活动,我们要捐一万块钱。这次吸取上次的教训了,请你建议我把它捐到什么地方?因为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高级顾问,和中国基金会副秘书长又兼中国红十字报社长李兰颂很熟悉,所以我就让李兰颂直接和扎西次仁老师进行了联系,让老人实现了愿望。

——我们在《雪山下的酥油灯》里也看到了,印尼发生海啸,他和夫人通过国内和国际上的相关组织,向受灾地区捐助了款项,献上了爱心。

所以我在电话里说:老人家不用感谢我,恰恰是因为有扎西次仁你这样的人,让我们感动。是你鞭策和感染我们,让我们努力地做一些对别人有用的,又是自己份内的一些事情。扎西次仁是朋友中的大好人,大爱无边啊……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看到了中央台播放的《雪山下的酥油灯》,当即给我打来电话,感谢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并说社里准备出版《西藏是我家》,这部专题片恰好提供了该书外版之后的新材料,想把解说词收录进来。我也当即表示:老人的事迹感人至深,我想为他写篇文章。

行笔至此,我便想起扎西次仁的名字——“扎西”在藏语里是吉祥的意思,“次仁”是长寿的意思,“扎西次仁”即“吉祥长寿”。同样,在汉文化里讲的又是“仁者寿”——一个人怀有仁爱之心,拥有大爱之情,他的晚年人生又何尝不会是吉祥健康呢?

扎西次仁生于藏历铁马年,今年七十五岁。

二〇〇六年七月

目 录

归途:一个人的理想、命运与时代之潮.....	马丽华(1)
大爱无边.....	张子扬(10)
西藏是我家.....	(1)
后记.....	(186)
附录	
航行手记.....	(190)
随感.....	(221)
译后记.....	杨和晋(235)
英文版作者前言	梅尔文·戈尔斯坦
	威廉木·司本石初(237)
电视纪录片《雪山下的酥油灯》解说词.....	吴兴元(242)

西藏是我家

“扎西次仁，站出来。”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我十三岁，是噶厦宫廷舞乐团——噶足巴——的队员，我的腿已经吓得发软了。

两天前，我忘了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正式演出。我应该是去吹角铃的，那是一种西藏的乐器，很像一种单簧管式的唢呐。那天全体队员都被叫到布达拉宫前面的林园里紧急集合。平常我们是每逢星期六才到那里去练习的，今天这个不寻常的集合，没有说明理由。

所有的舞蹈员围成一个半圆，坐在团长前面的泥地上。团长是个很严厉的人，我们在他背后叫他“麻子”，因为他的脸上长满了痘痕。他站在那里瞪着我们，于是我们知道他马上就要雷霆大作了。我们都胆怯地垂下眼睛往下看，以免引起他的注意。我一直就感觉到这次集合是因为我没去参加演出引起的，所以，免不了会偷偷地用眼角去窥视一下麻子的神态。令我懊恼的是，每当我的眼皮往上一提，就发现他正对我怒目而视。

“扎西次仁，站出来。”

这句话刺入我的耳朵，使我整个身体都充满了恐惧。我哆嗦着站了起来，用传统的方式恭敬地低着头往前走。虽然我知道这时绝没有人敢把头抬起来，但我每迈动一步就觉得似乎所有的眼睛都在朝我身上看。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其他队员已经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集合是由于我的缘故。

“你没请假就缺席演出，你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噶足巴是达赖喇嘛和政府的服务员，有全心全意服务的责任。”团长那种严厉的训话，声音就像吼叫一样。我不知该如何开口，真希望能想出一个自圆其说的方法来。沉默中的每一分钟对我来说就像一刻钟那么长。突然间他吼出：“怎么办，扎西！”于是我脱口说出：“我实在对不住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不过，我发誓以后绝不再犯。”

麻子的假笑让他那颗镶金的门牙露出寒光。他说：“哦，是吗？好吧，让我们来帮你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把裤子脱掉，脸朝下趴着！”当他转身去叫一个师父拿鞭子来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了他的眼珠子里，显露出了施暴者的那种得意神气。

这下完了！他们即将用细而长的树枝做的鞭子来抽打我的光屁股。这种古老的西藏式的处罚方式是让人最痛苦的打法。我想那样惩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恐惧和痛苦会让人工作更努力，也会更听话。我知道痛苦即将来临，心里害怕极了。

当我伸开手脚趴在地上的时候，一个师父拉住我的手，另一个师父压住我的脚，还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师父站在我的两侧轮番用鞭子抽打我。开始时我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随着次数的增加，皮肉裂开了，痛苦就很难忍受了。我想我要勇敢一点，于是，用想些别的事情的方法来减轻实际的痛苦。然而，由于那种痛苦实在太剧烈了，使我再也想不出任何一种办法来。我所能看到的只有团长那张带疤而又阴笑着的脸，我所能听到的只有嗖嗖猛抽的树枝声和鞭笞中的爆裂声。当我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我才开始尖叫。

后来我醒过来了。

汗水淋漓，浑身不停地颤抖。有好一会儿，我真的不知道身

在何处。当我的头脑清醒一点以后，我才开始辨认出我房间里熟悉的样子。那年是一九六二年，不是一九四二年；我不是在拉萨的那个无能为力的小孩子，我是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宿舍里自己的床上。

距离那次鞭笞已经有二十年了，而往事却仿佛在眼前。我确知梦到这种传统社会里的惨状绝非偶然。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艰难地思考着是否应该放弃在美国的舒适和自由，回去设法协助我的那些同胞。作为一个对传统西藏社会的封建和压迫各方面都持批判态度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回去和广大的群众共同创造一个既现代化又正直的新社会，而且还要有西藏的特色。但是，我也知道回去是相当冒险的事。

我反复地权衡着这两者之间的抉择。我一再自问：我如何能安心地留在这个温暖、安全而又舒适的西雅图，而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观望自己的故乡？我问自己：“我有勇气放弃这已发现的新生活而去面对那无法预测的一切吗？”那个梦像是给了我一个征兆，它在提醒我：对我的家乡和人民我是有责任的，而且是重要的。那好像是说既然我怨恨旧社会的不公平，我就该回去协助建立一个新社会。有好长的一些日子，我无法忘怀这个使命。我实在是心事重重，在课堂里几乎连笔记都不能做。

我真不知道自己回西藏去可以做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可能也是太天真，太理想化了。可是，同时那确实是一种真诚与深思的表露。我既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又有西藏人的身份，所以，我的何去何从，似乎仍然还是悬在天平之上。

两年后，一九六四年，我在古巴的哈瓦那上船，开始了我漫长的返乡之旅。这本书的故事是写我早年在西藏的生活情形，后来在美国有了政治醒悟，以及回家乡以后所遭遇到的苦难，同时也获得了成功的果实。

—

我的名字叫扎西次仁。在藏文里，扎西的意思是“吉祥”，次仁的意思是“长寿”。现在回想起我这一辈子的生命，我相信我的名字确有其预言性的意味。可是，有一段漫长的岁月却不如其所预言。不过，有关故事的内容，以后再谈吧！

关于我的童年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我一九二九年——“铁马”年——来到这个世界，出生在一个叫做古确的小村子里，它位于拉萨西边约两百公里的一个山区河谷地带。我出生时是现在所谓的“旧社会”，而当我长大的时候却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会有所谓的“新社会”。那时候我们只是过着我们传统的西藏生活。

我的头十年和大部分其他的西藏农家男孩子一样生活着。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在山坡和草地上只知道奔跑、游戏，自由在地玩，无所谓责任或义务。在那些快乐的日子，当我们山谷的气候够热的时候，我有时就和其他孩子们光着身子到处跑，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生活。虽然乡间的景物是粗犷的，但视野却很壮观。那儿有延绵不断的山脉和秀丽的河谷，我对那种从地形上感觉到的自由，由衷地喜爱。

古确和大部分西藏乡村没有什么不同。几百个村民散居在山脚坡地上的石屋群里。山谷里的溪流可以供应宝贵的水源，用来灌溉我们的农作物。那里的平顶房子都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大部分人家都是人住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楼上，底下第一层是用来喂养牲畜的，我家也不例外。

古确分成上下两村，我们住在上村。上村地势较高，农作物难于生长，可是牧草易找，适于放牧。因此，除了种青稞和豌豆以外我们还畜养牦牛、山羊和绵羊。基本上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我们吃来自畜群和地里的产品，穿自己做的衣服——实际

上我们是自己把羊毛用木织机纺线而后织成一种叫氍氍的毛料。西藏是有货币的，我们有时也会使用，可是像盐巴之类，我们会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去交换。我们和大部分西藏乡村里的人们一样，确实是能自给自足。我们家人口多，除我以外共有十人。我有一个母亲和四个姑姑，虽然姑姑们都已出家为尼，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家里，给我们家提供了相当多的劳动力。此外还有我的祖母、两个弟弟和我的两个父亲。我说两个父亲是因为在西藏农村兄弟们同娶一妻是常见的。后来当我住在国外时，才发现这种婚俗对美国人，甚至对其他亚洲人，包括印度人在内，是多么的让他们感到稀奇和震惊。我从前一直没有把这种婚俗放在心里考虑过，现在也不会为之所困。在我们的文化里，主要是在乡村，兄弟们和同一个女人结婚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这种婚俗视为一种保存家产的有效方法，而且还能增进家庭里物资上的福利。西方人类学家把这种风俗称为一妻多夫制。我们相信，这种婚姻制度可以防止一个家庭在几代以后把他们的土地裂成碎片。要是是一个家庭里每个儿子各以一夫一妻的方式结婚，娶回来的新娘彼此之间又没有亲戚关系，我们觉得这种家庭会不稳固，可能就会分裂，因而导致每个儿子和他的妻子儿女各自占取一块土地。相反的，一妻多夫制是只有一个妻子和一群同母儿女，因此，分裂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减少了。

对我们来说把兄弟们联结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但没有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来做家里的一切工作，而且我们正常的活动还经常牵涉到要差人去服徭役的问题。例如，我们必须差人带着牲畜去为政府的运输单位搬运货物和商品。一个家庭能用的劳动力越多，整个家庭就会变得越坚强。

我的两个父亲是同胞兄弟，我们真正叫他“父亲”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哥。他也是家长，和我母亲同睡的那个单独的房间是在我家石屋的二楼。他的弟弟是我另外的一个父亲，在我们那个地区他一般总是被称为“叔叔”。在我们家他睡在楼下，那儿也是我们圈牲畜的地方。现在我还记得有时我母亲会到楼下去和他同住，可是当时我对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感觉。在我们的乡村文化

里，作妻子的是把这种婚姻维系好的关键角色。她要负责按时去照顾所有的兄弟们，一定要让他们都满意，而且还要把婚姻和家庭的关系有效地协调好。我母亲一定很称职，因为我的两个父亲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

我们从来不担心生父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当中谁是我真正的父亲。我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我也就没有打听这种事情的念头。我想他们兄弟自己也不知道真情——谁都不管这种事。“父亲”和“叔叔”都叫我“儿子”，他们俩对待孩子都不会偏心。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能了解为什么除了西藏人以外，其他人会觉得一妻多夫制是那么的奇怪，甚至还会讨厌那种婚制。在美国，一个女人在她有生之年有过两三个丈夫，而且偶尔也会和不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在西藏也是这样，不同的是，有些时候两个丈夫同时在一起，而且他们还是兄弟。我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自然而且合乎逻辑。

以当地的标准来看，我家算是相当富裕的，所以我的童年过得自由自在，几乎是无事可做。大约到了七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做点零碎的家务事。我第一次负责一项比较像样的工作是在我八岁的那年，父亲叫我夏天去和那些大孩子们一样做牧童的工作，我高兴极了。我的工作真的不难，可是我感到非常的得意。每天，我要帮着把牲口（约三百只绵羊和山羊）赶到山上去，看着它们吃草，晚上再领着它们回家。夏天的日子很长，天空是那么的广阔，山谷是那么的美丽。我很高兴能为家里做点有益的事情。不过，我得承认，最主要的还是玩得痛快，因为我遇见了很多跟我一样的年幼牧童，当我们一边看着牲畜吃草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别的事情可做。天热的时候，我们这些牧童就到冰川里去玩。虽然佛教对我们的社会影响很深，而且强调生命神圣，我们却不顾这些，经常用弹弓抛石打鸟和野兔，甚至于有时还用手在小溪里抓鱼。当我们发现一条鱼躲在那儿的时候，就会把手弯成环状，小心翼翼地伸出去，以免唐突地把它吓跑了。然后我们便屏住气息，尽快地伸手去抓。多半时候我们是抓不到鱼的，不过也有时候运气来了，能逮条鱼上岸。当我们逮到了鱼的时候，我

们这些男孩子就会觉得那是值得庆祝的事，立刻用石头和牛粪做一个临时炉灶，用我们随身携带的打火石，点起火来。我仍能回忆起那种刚烧好的鱼是多么的有滋味。有些日子比较安静一点时，我们就把羊毛纺到用手工做成的纺锤上，或是缝制冬天穿的靴子。当那些我们看管的牲畜在山坡草地上放牧的时候，我们奔跑，偶尔也会打架，而最主要的是享受在长大成人以前的快乐时光！放牧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牲口就代表我们家庭财富的主要部分，可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大部分是好玩而已。

我家和村子里的人过着似乎毫无变化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且四季皆然。经过了这么多的年岁以后，而今当我回想起那种生活，我发现那是很容易把它理想化，同时也易于让人产生怀念感的，但是那也只能到达某种程度而已。大部分当年我所认识的人都没有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想法。他们努力地工作，是要改善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地位，而不会去改变他们的生活规律。他们不愿意离开已经习惯了的土地，也不想打破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可是，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喜欢我当时的生活，不过我也开始感到不满意。因为那时还小，所以很难指出不对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我想当时我是感到非常的疑虑和迷惘。也许，我当时想要的不仅是普通的生活，一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我却无法用字句去描述出来。我想这种感觉是出自我那坚强的求知欲——希望能读能写。

我从小就想学会读书和写字。这种欲望在我们村里不太常见，在西藏其他地区也不多。那儿没有报纸和广播电台，虽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对我们的村民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問題。生活在当时那种被传统束缚着的世界里，也不必有什么所谓的读写能力。那儿的社会和文化会让你知道你是谁，你应该做什么。我们那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很清楚他们在那种社会里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一些精力充沛的，或是有志向的，简直就不可能有所发展。你既不必多想，也没有人会鼓励你发问。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学校，因此，读书和写字这种本事，只有那些有钱的人

和政府官员才有，当然，僧侣也不例外。后来，当我住在美国的时候，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他们很重视教育，而且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也认为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种观念并不为乡间的西藏村民所关注。

我一直不了解有什么会让我那么想要去学习，不过，我想我的求知欲是来自对父亲的观察，他是我们村里两三个能够读书和写字的人员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不知道他的学识究竟有多高，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多么地喜欢坐在他旁边看他写字。我真喜欢看他那种熟练的磨墨技巧，小心翼翼地把墨水装在墨盒里，把他的竹笔削好，然后再写出一个一个的字母。描写这些字型他是从哪儿学到的？他怎么知道哪些是他要用的？我想他那种具有意义的肢体活动的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特殊的力量，那种力量也就是我自己所想要的。当我父亲在算数的时候，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西藏人用来计算的方法很复杂：用豆子、棍子和石头，来代表十、百和千位数字；排列在一个板子上，用挪移的动作来计算数目。从前，当我父亲灵巧地挪移那些豆子和石头的时候，我会看得目瞪口呆。当然我在那个时候是不会用这种字句来表达的。不过，回忆起来，我当时的着迷程度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一样。我确实很想了解我父亲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那些人所以知道的是什么。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村子里没有学校，我记得我曾经要求我父母送我到县中心去，从我们村子里走三四个小时才到得了，那儿有几个人会私下教小孩子读书和写字。可是我从未获得他们的同意。至今我还是不能了解为什么我的父母不送我去。他们老是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考虑考虑。”可是，据我看来，他们从未考虑过。只有一次最接近我的愿望，那就是我那个当尼姑的小姑姑教了我几星期的字母。后来她又不教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我说过，我们村子里的人对教育没有兴趣，他们不觉得教育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看不出读书写字和日常的实际生活，包括物质上的成功，有什么关联。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种连续的过去，那就正如同现在一样，大概和未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比他们已经知道的更多的事情呢？

虽然我当时很小，我仍旧记得我对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沮丧。真的，要不是我的运气好，我可能也会和我那些小时候的玩伴一样，长大以后变成一个文盲农夫。我认为那是运气好，而我的父母却不以为然。

我十岁那年是一九三九年，故事也从那时开始了。那年，西藏地方政府正需要召补噶厦宫廷舞乐团的舞蹈员，那些团员叫噶足巴。于是，政府就照例从西藏乡间挑选一些家境较好的幼年男童（八至十岁），就像抽人头税一样，被选为团员的男童将去拉萨受训。他们一直要服役到十八岁才能退下来，那时，另外一批新挑选的年轻团员又可以接替上去。一九三九年那年正是挑选团员的一年，所以在拉萨的地方政府通令一些地区物色人选作为噶足巴的候选人，每区选送两名男童到首府去参加最后的选拔，我们那个地区也接到了命令。

我们村里的人都怨恨这种人头税，因为，要是挑走了，实际上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儿子，也许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为了避免孩子被挑走，父母经常谎报孩子的年龄。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做过那种欺骗的事情，不过，要是他们真的做过，也没成功，因为有一天，我父亲接到了地区长官的通知，要把我送去参加初选考试。这个通知把我家搞惨了，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大声痛哭了一阵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全家都很震怒和惶恐。我这个他们以为可以继承家业的儿子，很可能就会失去了，每想到此，他们就免不了要伤心。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他们必须立刻找到一个可以避免送我去的法子来。在西藏若要对某些事情发生影响，典型的模式就是去找一个有关系的官员，送些适当的“礼物”，请求协助。我母亲立刻就开始行动：找到了地区里一个她认为可以在挑选男孩子的时候加以干预的次级干部，送了他五大坨上好酥油作礼物，请他帮我们家的忙。

这项活动多少减轻了我父母的焦虑，而我却对当时的情形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一点也不怕离开家，或是离开这个村子。正好相反，我倒是非常想去拉萨。夜里，我会睡不着，一直梦想着

圣城以及未来的新生活，包括到那儿去可以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等等。所以，不管我父母是多么的不高兴，我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县里去参加考试。事实上，在规定好要我们去县中心报到的那天，我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一大早起床，谁也不等，就先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我母亲曾在村子里到处拼命找我，后来才晓得我已经一个人先走了。从我们村子里去县中心开会的地方，走路要三四个小时。走了一半以后，我母亲才追上我，当时，她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想那也是因为她生怕失去我而带来的焦虑。但是，在那种时刻，没有任何事情会挫损我的锐气。我认为这次考试就是我的机运！

当我们到了县中心以后，我们被安排到县长的城堡里面的院子中去等县长大人来审视我们。在那儿已经聚集了约有二三十个其他的男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父亲或母亲陪着。大家都可以感觉到父母们是多么的紧张，孩子们则有的兴奋，有的害怕。空气里好像充满了电一样，我连一分钟都不能安安静静地站着。我母亲还在为我被挑到这件事生着气呢，她使劲拉我的头发和衣服，警告我不要乱动。她用了各种不同的法子想叫我不要招人家注意。“站着不要动，眼睛往下看。”她这样嘱咐我。可是，我从未到一个城堡里来过，我确实被里面的一切给吸引住了，所以不会被吓倒。我的精力充沛，跑到不同的窗口去看下面的市容；同时还试着去想想等一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于我还偷偷地看了一下其他的男孩子，看看和我竞争的对手是什么样子。

当官员们聚齐以后，他们要所有的候选人排成一行，他们一边走着，一边仔细地审视我们。他们好像只看仪表和外型，没有问任何问题。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决定人选的，但是，他们终于挑出了两个男孩子送去拉萨：一个正取和一个备取。我被选为我们县里的备取。我母亲听到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震怒，而我却心潮澎湃。我的梦想即将成真，我已更进一步地接近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向。

当我们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我母亲一直往那个次级干部那儿走，要他把当“礼物”的酥油还回来。听说她表演得很泼辣——

大吼大叫地乱骂一通。他是把酥油还回来了，可是并不能改变我的情况，不到一个月，我父亲就带着我上路到拉萨去了。

我母亲一知道我出发的准确日期就叫我和她同床而睡。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谈到深夜。有一天正当我们谈着的时候，她突然哽咽起来了，她说：“哦啰（对儿子的昵称），你这一走，我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你了。你要写信给我。”然后她又记起来了，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写字。可是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也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我会把干肉、酥油和保暖的衣服，找路过古确到拉萨的旅客给你带去。”

真正到了要走的时候，我也有难分难舍的感觉。在我们房子外面，我母亲和我及两位父亲大家会齐了，按照乡俗在我颈上挂上一条哈达。然后她给了我一整碗“酩”（传统式的青稞酒），而且把我的双手紧握在她的手里。她没多说话，她也真的不必说了，热泪从她那红肿的眼睛里一直不停地流出来。我看着她那双熟悉、坚强，且经过工作磨练过的手，情不自禁地意会到那双手曾经洗过我、喂过我、梳过我的头发，而且还捧过我的脸，于是，我的决心开始在我内心里崩溃了。离开我那温馨而又可爱的家突然间就变得极其可怕了。可是，事到如今，此行是去服差役的，不管愿意与否，责无旁贷。我们对这项差役是毫无选择的余地了。

最后，我母亲用她的前额碰我的前额，就这样，我们分手了。她和其他家人静静地站在那儿目送我们，泪如泉涌。我也哭了。虽然我是真的想要出门，可是我心里仍旧感到非常的悲哀。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去除那可能再也看不见母亲和家人的恐惧。

我们那八天旅程的头一段是很艰难的。我们一般是就近在路旁找个农家过夜。我们自己带了食物和卧具，所以我们只要付些煮饭用的燃料钱。我的内心是迷惘而空虚的，每天一起来就感到惶惶不安。幸而孩子时期的童心是有弹性的，旅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镇静下来了，到了第四天的时候，我的精神又高昂起来了。

当拉萨在望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那壮丽的布达拉宫，它

是拉萨所在地吉曲河谷最突出的景观。我无法想像天下还有什么会比它更伟大、更庄严。宫殿本身似乎就比我们家乡整个村子还大，好像是一顶巨帽盖着山顶。不管是好是坏，我知道我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

当时的拉萨仅仅是一个约有三万人的城市，可是对我这刚从小村子里来的孩子来说，那已经是巨大无比，我真怕一旦走散以后就找不到我父亲了。我们看见的任何东西都是那么的新奇，有些甚至于显得格外的光怪陆离。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很多热闹的茶馆里面供应着一种奇怪的印度茶，他们不加盐和酥油，而加牛奶和糖。我父亲却非常紧张和焦躁，他没有我那么兴奋。现在我才了解当时他不像我母亲那么坦率，他当时还抱着一个希望：因为我只是一个备取，我不会真的被选入那个舞蹈团里去。但也不知道是凭什么理由，我却深具信心，相信我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

到达拉萨不久，我就被召去见达赖喇嘛的侍从大臣，他是噶厦政府里一位很有权力的僧官。召见的地方是在他家里，当我们被引进客厅里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那儿挤满了人，正当我聚精会神的时候，侍从大臣的嗓音吓了我一跳。

“抬起头来，我才看得见你们的脸。”

他坐在一个像是宝座的高椅垫上，要我和其他的孩子们都面向着他，站在他前面。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不敢把视线往上抬，唯恐接触到他的视线。

“告诉我，你的名字、年龄、父母是谁。”

我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不过，那些细节也许是无关紧要。那位侍从大臣从他坐着的垫子上一个一个地端详着我们。我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棋是什么，可是，十来分钟以后，他便简明地说：“要是扎西次仁成为舞蹈团的团员，那是不会错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真正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即将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报到，马上开始为期六个月的加强

训练。我当时确实是很天真，相信自己的前途有了保证。事后回想起来，我现在看得比当时更清楚了，我真的是很幸运。我的生命能有如此戏剧化的转变，岂不就是碰上了运气，也许是命中注定了吧！当时，我正是他们所要找的人选，年龄也合适，再加上时间和地点的巧合，一切都变得如此完美。要是我没有被选为舞蹈员，除了出家为僧以外，一个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绝对没有任何机会脱离乡村的羁绊和传统的农人生活。因此，要是没有我以后的经历和视野，我想我是无法去应付那些急剧改变我们家乡和人民的生活形态的各项活动的。但是，当时我不可能会联想到这些问题。我已被侍从大臣挑上了，我充满了骄傲和喜悦，我相信我的机会来了。

二

“你把卧具搬到这儿来。在以后这六个月内，你就在这儿吃住。”

我们这批新挑选到的男孩排成一列，聆听侍从大臣的指示。他高踞在他的座位上俯视着我们，他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威严，神采奕奕。

“你们的工作是要学会二十八个噶足巴的歌曲。晚上，你们学歌词；白天，练习舞步。每月两次——藏历十五和三十两个吉日——你们可以休假。除此之外，你们就必须努力工作，好好地学习。这是一项光荣的职责。你们都是从很好的家庭里精选出来的。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感到你们是特殊的一群。政府会发制服给你们，那种制服别人是不准穿的。”

他停顿了一下，面露微笑。

“拉萨姑娘之中有这么一种说法：‘只有幸运的姑娘才能得到穿绛迪衣服的舞蹈员。’所以，作为噶足巴，而且在达赖喇嘛的起居殿堂内表演，是非常光荣的。但是（这时他的眼睛显得冷酷

起来)，成为噶足巴固然是一种很大的成就，你们未来的生活却不会很轻松。以后这六个月你们必须努力学习，也要忍受很多的艰苦。”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是多么地被他的词句所鼓舞。我恭恭敬敬地低着头，而我的心却因喜悦而狂跳。我非常得意自己能够入选，又能获得如此荣耀。我当时就已经能够想像得出自己即将为达赖喇嘛跳舞的样子了。我也看得出自己一定会读书，还能像我父亲一样会写出一手好字。现在我已经身在拉萨，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办得成。

没等多久，现实生活就开始了。我几乎马上就和其他孩子一起住进布达拉宫附近的一个大房子里去了，那就是我们头六个月强化集训的住家。我们就像是进了新兵训练中心或监狱。每五个学员有一个教师，而学习的过程却和想像的完全不同。我们的身心皆无法获得自由，而且感到疲乏、痛苦和卑屈。我们都不认识字，所以，我们只能死记硬背地学歌词，对于内容是全然不解，也没有人鼓励我们去想想歌词的意思。教师唱给我们听，我们就跟着他学。因为我们谁都没上过学，我们毫无学习的方法和经验可资借鉴。教师们用来激励我们的法子是对每个错误都迅速地、严格地处罚我们。他们经常打我们的脸、手臂和腿。他们以鼓励我们互相竞争来激励我们。譬如，每天一早，当我们跑去排队的时候，排头的第一个孩子要用打耳光的方法处罚后到的。每个孩子都要处罚在他下面或后面的那个孩子。真是可怕！我仍然还有一些从前几乎每天被打而留下的疤痕。那种待遇使我非常震惊，可是不久我就了解到，教师们的方法，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他们所做的正是他们的教师们用来对付他们的那一套，所以，那些方法被认为是完全正当而且合理的。

无论如何，我讨厌人家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也讨厌人家迫使我那样去对待别人。虽然我很努力，但仍旧很难记住那些传统歌曲的词句和音调，有时不免要发生错误，他们就处罚我，我觉得那非常的不公平。最令我难过的是，我当时那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我们只好接受那种训练，就如同比我们早期的学

员当时所必须经历的一样。噶足巴的训练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我们传统社会所暴露出的苛刻和残忍，给我的印象是既强烈又反感，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把我当时的感觉，完整地表达得具体、清楚。

六个月的训练好像永远都完不了似的，但是它最终还是结束了。于是，我们就可以参加演出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每星期六练习一次，在重要庆典时节去演出，经年如此。所以，强记歌词和舞步的压力没有了，我们是正式的噶足巴了，可是，仍然还有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尚待解决。因为我们的训练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就不能再住在那个老房子里了，我们必须负责找自己住的地方。政府不付我们薪金，这是我们的损失。而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他们是得到了“补偿”的，因为他们不必再缴税了。有些年轻的舞员因为在拉萨有亲戚家可住，或是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或是其他亲戚可以和他们同住。可是，我却没有这种条件，而且又因为我太小了，不能单独住，我父亲便安排我到一个人家里去住，那家人就住在布达拉宫底下那个四面有围墙的雪城内。家长是一个高阶僧官（基恰钦摩）属下的一个较有权力的仆役。虽然是个仆人，他倒比较像是一个财务管理员，本身就拥有许多奶牛。

一切安排都是直截了当的，在我们那种社会里大家都那么做。“好了，扎西，”我父亲告诉我说，“这家人从今以后会照顾你。你就住在他们这儿，他们会给你做吃的。他们还说会教你写字，我想那就很好了。我会从村子里运些粮食来补助他们，不过，你也得帮他们做点家务事。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他们的话，努力工作。不要给我们丢脸。”我当时所能说的就是：“是的，爸爸。”其实我也真的觉得一切都还算不错。

可是，我父亲一离开拉萨，我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噩梦中，而且比那六个月的受训期更坏。我那个新的家庭把我当普通的佣人看待。他们不给我吃饱，即使给我一点，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和我从前在家吃的那些可口的东西相比，真是大不相同。他们还一直表明给我吃的东西要和他们自己吃的不一样。他

们似乎就是要在每餐吃饭的时候明白指出我的身份是不如他们的。而且他们让我整天都有工作做，连夜里也有。每天一早，我要喂牲畜，然后收集它们的粪便，背出去，摆好，晒干成燃料。白天，我必须去卖酸奶酪或牛奶，用一只大桶装着，背在我的背上。晚上，我还得再照顾牲畜，包括挤奶。工作真辛苦，实在是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占用了，因为我是他们家惟一的“佣人”。在我们村子里，大家都很努力工作，却从来不会像我现在这样。我有无能为力的感觉，而且非常沮丧。我父亲临走时交代我要帮这家人做点家务事，所以我觉得必须听从他们的吩咐，然而，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如此刻薄。

最坏的是他们什么都没教我——连一个字母都没教我写过。要是我觉得在学习上能得到一点什么，我想我还能忘却一切其他的苦难。但是，我被当作佣人，什么成就也没有。我陷于一堆做不完的、令人消沉而又卑贱的工作中，其间还要按时去参加噶足巴的周末练习和演出。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那么小，他们又那么有权势，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听命。

就这样生活了两年以后，我实在是痛苦极了，于是，便开始慎重地考虑如何把自己从这个人家解脱出来。我曾试过传送信息回老家去，可是，当我得不到回音时，我就不知道我的信息是否传到了。所以，经过在心里冷静地自我省察以后，我终于决定必须逃走。逃跑其实是西藏人对压迫和剥削的传统反应。但是，在当时，我只知道我是不愿意在那里再继续当一个等于是无能为力的奴隶，而且还看不出会有任何方法去让那家人改变对我的态度。

有一天早上，我离开了那个房子，表面上我是去做点日常的零星工作，可是，我却走到拉萨的一个小寺院里去了，那个寺院一直就有僧人愿意提供食宿来换取小工。我找到了工作，但是，还来不及开始我的新生活，我以前住的那家人的父亲突然就出现了，而且把我带回去，还痛骂了我一顿，严厉地警告我下次不许再做这种事情。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在本地的所有寺院里都有朋友，通过他们就把我找到了。

以后几个月就和过去那两年一样，故事又重演了，所以，我再度决定逃走。这回我可是走出了拉萨，到了城西五里外的哲蚌寺。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大冒险，开始的时候还算顺利。那儿的工作很多，因为哲蚌寺容纳了一万多僧人，就像个僧侣之城。我立刻就碰到了一些要我替他们工作的僧人，他们很乐意给我些小工做，譬如说，我可以替他们挑水来交换食宿之类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仍旧是做仆人的工作，但是，情况好像又完全不一样了。那些零星的工作很容易做，每天用来做工的时间也不多，而且，关键还在我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随时都可以离开。但是，几个星期后，那位可怕的家长突然又出现了，而且又把我带回去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些仁慈的僧人曾如何地恳求他让我留下，要不然，最少也希望他答应不要对我那么苛刻，但是，他没听。“你们这些僧人只知道如何祈祷，却对世事一无所知。”他嘲笑着说。“这个孩子老是调皮捣蛋，他从来就没有正经地把我的工作做好。既然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最好闭嘴。”

回来以后，他们对我比以前更坏。自从我尝过自由的滋味以后，我在他们家的生活似乎完全无法再忍受了。虽然那时我才十四岁，我就已经体会到，如果我真的要逃走，就必须远离拉萨，到那不会被这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找得到的地方去。迫切的问题就是究竟到哪儿去好。

我听说过噶伦堡，那是印度的一个城，有很多西藏人住在那儿，大部分是经商的。那好像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安全避难所。于是，我开始搜集有关那里的资料，而且作好往那里逃的计划。但是，噶伦堡实在太远了，所以，最后我决定往西南走，那边有些城镇，诸如江孜、日喀则和帕里等，也许就是隐姓埋名的好去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当我在决定要逃走的时候，我的父母也终于得悉我生活得很痛苦，所以他们决定送一个姑姑到拉萨来租一个房子照顾我。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而且，在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就启程逃跑了。我没有钱，只背着些衣物，但是，这回我下了决心，非成功不可。离开拉萨后，我朝西南方向

走，大约是往江孜和日喀则那个方向，再远一点就是那崎岖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广阔的印度地区了。我其实并不知道要往哪里跑，我只是肯定地要解脱自己，离开那个家庭，要能掌握自己的工作和时间。

第一天，我跟着一群乡下人走，他们正在赶驴回家，因为他们也是往西南走的。我没有和他们交谈，我只是尾随而行，一直走到那条雄伟的雅鲁藏布江边。那条江从西往东流，把西藏分成两半，然后再往南转，蛇行般地穿过许多山脉，最后流入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曲水位于那条江的北岸，那里只是一个渡口，没有桥。过江的人要乘一个塑有马头的木船，而我却身无分文，无法过江。我决定就在靠近船边的岸上玩耍，跳上跳下，装成无意上船的样子。不久以后，就没有人太注意我了，于是，我便偷偷地混上船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去了。过了江以后，我一直走到那座高达一万五千八百英尺的岗巴拉山脚下。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人家，请他们给我食物和过夜的地方。他们发现我连自己用的碗都没有，便热心地给我吃的，还让我和羊群一起睡在畜栏里。那天晚上，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那是我跑得最远的一次。

那个山谷很美，我想也许我就在这里停下来找个工作，听说这儿找工作不难。但是，那位家长会找到我，而且还会把我拖回拉萨去的阴影，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所以，我决定这回不再冒险了。第二天，我继续移动，开始往甘巴拉山上爬。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蒙古僧侣，他们是去日喀则的，要到班禅喇嘛的驻锡寺院扎什伦布寺去。因为那也是我要去的方向，我就和他们一起走，跟着他们越过大山以后，还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才停下来过夜。他们好像不介意我紧跟着他们。事实上他们还注意到我穿的鞋子太烂了，就把一双他们不穿的旧鞋送给我。那条路上的石头很多，又不平坦，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恩惠。那些僧侣还给了我茶和糌粑，所以，那夜我睡得很平静。那时，我离开拉萨已有两天了。

第三天，我和一批从拉萨赶骡出来的人同路。骡夫们的粗野

和狂妄是出了名的，果然，他们不久就开始向我发问了。我很喜欢他们那种直截了当的态度，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告诉他们我曾受过训当噶足巴，因为逃避政府给你的责任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为了不招来麻烦，我编造了一个故事，告诉他们我是在一个贵族人家做佣人，如何做错了事，为了怕挨鞭笞，只好逃走。他们相信我，因为那种事情在西藏很常见，而且，他们觉得我还算聪明。事实上他们的确信以为真，而且要我和他们同行，一起到印度的噶伦堡去。那就是我原先有一点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问了许多有关印度的问题。噶伦堡听起来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但是，当我有了真正可以去的可能性时，我又开始犹豫起来了。我离我们村子和拉萨一天比一天远了，突然间我感到害怕，害怕我会和自己的根失去联系。我是想要和我生活的那个家庭离得愈远愈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担心自己究竟会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于是，我便开始考虑，也许还是直接到日喀则去最妥当，那儿离我们村子还不算太远。因此，我便把实情告诉了那些骡夫，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逃跑出来的噶足巴舞蹈员，请他们给我一些指点。他们的态度立刻就改变了，因为他们知道要是帮了我的忙，他们一定会给自己添加很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叫我回我村子里去和自己的家人商讨对策。

到了江孜镇以后，我就和他们分手了。在那儿，我在一个有钱的人家里找到了住的地方。同样的，我替他们做点事，他们供我食宿。不过，他们对于我的故事很感兴趣，问我是谁，从前做过什么。我很喜欢他们，于是，便据实以告。他们这个家庭本身就是政府的农奴，他们好像觉得我们颇有相似之处。他们一点也不怕帮我的忙，而且还告诉我在他们家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对于他们的慈爱和供我住宿的恩情非常感激，但是，三四天以后，我又呆不住了，于是，又上路了，这回我是去日喀则。那时，我还没决定要回家去，因为我知道我违背了父亲那明确的训示，不知道他会如何处置我，不过，如果我终于决定要回家的话，至少这儿离家已经近一点了。

在路上，我遇到一伙从印度回来的西藏妇女和她们的仆从，

于是，我立刻主动去帮她们拿行李。

她们同意了，而且答应供应我在路上吃的东西。当我们进城以后，我去拜访了一个我父母亲提起过的人家。我告诉他们我是逃跑的噶足巴舞蹈员，受过人家的虐待，现在需要住的和吃的。他们让我住在他们家，和从前一样，我用工作来换取食宿。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周周地消逝，我开始发现逃跑出来充其量也只能解决暂时性的问题，于是，我担心这种逃跑对于我未来的计划会有何种影响。他们对我并不坏，不过，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而且，所做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一个佣人所做的。我毫无长进，要不是那时好像是有一个奇迹发生了的话，我真不知道还要漂流多久呢。

有一天，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当时我正在厨房里工作，我很惊讶地看见我那位比较年轻一点的父亲就站在门口。我第一个反应是把自己躲到一个小壁橱里去，那里平常是人家用来存放燃料牛粪的地方。当时我叔叔就站在那儿开心地微笑着看着我。

“出来吧，哦啰。你所有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了。你父亲正打算去拉萨把事情尽量弄好。我来接你回家。”

“是的，是的。”我说，而且立刻就钻出来见他。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我是多么地想念家人，于是，我紧抱着我的父亲——叔叔，直到我的手臂发痛为止。当我们找到时间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全家人都听说我逃出了拉萨，而且到了日喀则城。我母亲担心得都要发疯了，所以我叔叔特地老远从我们村子里骑马来找我，而且要接我回家。收留我住下来的这个家庭似乎很为我高兴，并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当我们开始上路的时候，我叔叔让我和他一同骑在那匹马背上，令我安心的是他没有问很多问题。和我全家人一样，他非常识趣，知道我很困窘，绝口不提我在拉萨的事情。我自己当时确实是充满了快乐。尽管我曾有过勇敢的想法和大胆的计划，但我仍旧庆幸这次历险的过程已经暂时结束了，而且，我有机会回家了。

当我们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的谣言，说我在拉萨一定干了什么事，所以才要逃跑。可是，我把实情告诉

了我的家人，尤其是关于我被虐待得多么厉害那一段，于是，他们都很同情我。甚至于同村子里的其他人也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要逃。不过，对我最坏的事情虽然似乎已经过去了，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家该如何去应付目前的情形。他们很高兴能看到我回来，也很明白我的状况，但是，我的逃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我的父母送儿子去当噶足巴是一种损失，可是，那种损失，政府已经用免税的方法来补偿过了，就是免征一个单元土地的税。在财务上因此而得到的好处是相当可观的。可是，因为我逃走了，他们恐怕不但可能会损失税务上的好处，而且那块土地本身也可能会失去。在西藏，政府要求像我们这样的农家要奉公守法。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们决定我必须回去，而我则一直等到听完了他们的解释，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好法子，可以让我不会因逃跑而受罚之后，我才勉强答应回去。

那个计策简单而又巧妙。就是由我父亲自己一个人到拉萨去见噶足巴的团长，告诉他已经知道我逃跑的事情，但是目前却不知道我在哪儿。他会说马上去找我，不过可能要花点时间才找得到。无论如何，我父亲会答应把我带回去，只是请求他同时也要批准我的离开是为了休假。这个策略就和我父亲的预计一样，果然全部达成了。经过一席长谈，也送了等于是贿赂一样的礼物，那个麻子才向我父亲保证：当他把我带回来的时候，不会打我。

我父亲去拉萨的来回时间约需一个多月，为了让我这趟回来能感到甜美，我的父母同意我利用这一个多月开始学习读书和写字。我父亲说如果我愿意，他们可以送我去一个老师那儿学习。我在拉萨的问题并没有打消我求学的念头。相反地，那种挫折还真正加强了我要学写字和上进的决心。因此，当我父亲动身到拉萨去看看如何为我解围的时候，我就到一个叫卡孜的村庄去跟一个人学藏文去了。这家人招收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上下村庄有钱人家的子弟，我在那里读了三个月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求学机会，我兴奋极了。

我一到卡孜就知道时间不多，所以，要尽可能把基础打好。我在一个小房间里日夜学习。那位老师很慈祥，而且热心教学，

因为他的藏文学识很好，很喜欢教人家读书和写字。他有十来个学生，教我们写字的时候，是要我们写在一块粘上白粉的长方形木板上。我把字母画在白粉上的时候，每个字母就都显出原来涂在木板上的黑色。老师把我的练习改完后，我就把旧粉擦掉，重新把粉加在木板上，然后又从头开始。我在木板上学习三十个字母学了一整月。第二个月，我再学复杂的字母组合，那是典型的书写藏文形式。第三个月，我就开始在纸上写藏文的草体字。我一想到我也能像我父亲那样写出一手好字来的时候，就有点儿得意洋洋的感觉。我想我那种兴奋必定已经形之于色，我的老师可能也觉得有点好笑。不过，他好像了解我的感觉。有一天，当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藏族格言：“写字和读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不是用来谋生的最小工具。”我的老师好像知道为什么求学对我有那么大的意义，直到如今，每当我想起他的话和他那慈祥的态度，心里就充满了喜悦。

那时，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决心，已经比我上次离开家乡去拉萨的时候更坚定了。我已深深地了解，若要在拉萨的圈子里升官发财，学识是最大的关键。我在那儿看见过能读书识字的人比以前见过的更多，我还发现能读书写字的人比较受人尊敬，他们因此而成为能当得上官的人，而且还能占有更好的位置。当了噶足巴以后，我就已经有很好的机会了，因为按照惯例，我们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就有一批新的年轻舞蹈员来替代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份政府的工作。可是，有工作归有工作，只是那些可以升到最高阶层的男孩子，多是那些会读书而且还能写出一手好字来的。

对于真正的自我来说，我确实想要在拉萨找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但这种念头有时候也令我不自在。当我开始学习，并且还快乐地享受和家人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仍旧觉得住在乡村里是一个问题，因为那儿一点改变都没有。我已经见过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更广阔的世面。这儿没有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像我老师那样能了解我的企望和感觉的人真是太少了。当我觉得自己再次扮演旧时的那个角色，恢复到旧日的那种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时，

我就又开始渴望城市的生活了，总觉得那种可能性似乎不会离我太远。说实在的，除了有心求学以外，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一个很明晰的图景。不过，我却很明白自己究竟要远离什么。

所以，当我父亲和麻子的谈判成功了以后，我就再一次回到城里去了。那时，我已经赶了几个月的功课，尽量努力地学了一些东西。我父亲带了贵重的礼物给那些舞蹈团的官员，于是他们就允诺不阻止我回去，也不体罚我。当然，我没有回到我从前的那个人家里去住，这回父亲给我找到了一个很适当的房子，我在那儿也算是快乐地住了好些日子。然后，别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改变了我的生命流程。

三

我回城里来还没多久，就有人叫我送点什么东西去给一个很重要的僧官。在他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旺堆的僧人，他是那位僧官家的管家仆人。他非常客气，和我谈话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我看得出他很喜欢我。按拉萨的习惯，平常是高低阶层的人士当中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对我这样亲切，真是一个可喜的转变。我由衷地乐于和他相见，可是，不久就把这件事忘掉了。直到几天以后，麻子叫我到他跟前，宣称：

“有人叫我送你到旺堆啦（啦是加在名字后面的客气语尾词）那儿去，就是上星期你见过的那位僧官家的管家。”

他只说了那么一点，我立刻就知道话里的意思了。旺堆是要我做他搞同性恋的对象。拉萨的僧侣或僧官，按照正常的社交礼节，他们要征得我上司的同意之后才能找我，现在，我是给盯上了。我在那儿哑口无言地呆了好一会儿，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心里还真想快找出点话来说呢！麻子急了，又问：

“你怎么说呢？你要答应吗？”

那个问题相当明确，我不能避而不答，但是，我仍然不知道

真正想说些什么。自从我来到拉萨以后，已经遭遇过各种不同的困难，我不知道现在让自己和旺堆拉上关系，会带来新的困难还是会从此开始一个成功的起点。我是可以拒绝他的。我对他没有性欲上的感觉，其实我对任何男人都不感兴趣。不过我是喜欢他的，而且我也知道，跟一个与权贵阶层相连的人拉上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岂可轻易放过？所以，我决定同意这个要求，便吞吞吐吐地说，我愿意接受他的邀请。

我的这种决定和有些相关的情节，经常都会给人带来震惊或混淆，或两者皆有——那就是后来当我向外国朋友们解释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文化和认同点是那么的不同。但是，我当时一点都不会觉得那种邀请有什么奇怪。若要用公平的观点来察看这种事情，你就必须先了解旧日的西藏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我们的风俗习惯又是什么样子。西藏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处于神权政治的体制之下，管理政府的官员是由两种官吏组成的——普通官吏和僧官。因为西藏是神权政治，认为僧人应该参加治理国事，这就是当初会产生一批僧官的基本逻辑。然而，多年以后，这些僧官们就变成了象征性的出家人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既不住在寺院里，也不参加宗教仪式或祈神典礼，他们其实是一批受了戒的官吏。他们也穿一种僧袍，却做全职政府官员。他们和其他官员一样住在城内的房子里，掌握实权，享受社会地位，和那些贵族官吏不相上下，而且还共同主理政务以及一般的日常工作。不过，他们虽然大体上来说是“象征性”的出家人，他们仍旧要遵守出家人的独身戒律。

在传统的西藏社会里，独身戒特别指明要避免和女性发生性行为，甚而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就是不得有任何性行为，不论是和女性或男性来往，只要是涉及进入一个体孔的性欲，都要避免。由此而知，和男性肛交和与女性阴交，同样是必须严禁的，要是被发现了，就会被逐出僧侣的行列。

可是，人总是人，一些僧侣们根据多年的经验，竟摸索出了一个绕越严格的单身戒的计策。既然寺院规则中并没有论及有关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于是乎，僧侣和僧官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欲

望，通常是用不进入体孔的方式跟成年男子或男童搞性事。他们用一种类似“男上女下”的姿势，也就是僧官（主动者，男性角色）用他的阳物在他下面对手的交叉着的两腿之间行动。因为在理论上这并没有违背寺院的规章。

这种关系平常发生于僧侣之间——一个是成年的僧人（男角）和一个年轻的童僧。不过，有些没出家的幼童也会特别受到青睐，一是在藏剧里饰演女角的男童或青年男子，再就是年轻的噶足巴舞蹈员。

暂且不谈那些显而易见的类似处，这种“同性恋”和西方所谓的“同性恋”是大不相同的。首先，这种“同性恋”几乎只发生在僧侣和僧官之间，而且经常被认为只是一种规避戒律的传统办法。按照西方的观点来说，那些僧侣不会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因为西藏人不觉得那种行为是性别认同上的结果，而是由于某种生物学上的，或是文化上的因素而决定的。其实，一般来说，西藏普通人之间的非异性爱活动是会让人皱眉头的。不出家的人绝少会有同性别的爱人。这种僧侣之间的行为，其实只有在我们这种文化圈子里才会演化而成。因此，当噶足巴的领队作如是要求时，我不惊讶，那并没有影响到我对自己性别的认同感。

同意做旺堆啦的爱人这个决定，结果对我是有利的。虽然他自己不是政府官员，可是身为一个大官的管家，旺堆啦在高层社交圈里颇有名气。所以，我也就因为他与权贵的关系直接受惠。此外，从我们一开始交往，他就对我个人的事情非常关注。他对我很客气，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常送我礼物，尤其重要的是他关心我的工作，对于我继续接受教育和攀升的计划，他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旺堆啦能写一手好字，而且是拉萨政界通用的藏文书法体。他不但重视教育，而且还明白我的求知欲。为了分享我的价值观和抱负，他安排了一个官员收我为徒弟，后来又把我推介到两位最好的老师那里去学文法的各种结构和作文。我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主要还是靠旺堆啦的努力。

西藏话称处于我这种情形下的男孩子为“准博”。在我们的

语言里，这个字的原意是“客人”，但也是用来称呼“同性恋（被动的）伴侣”的婉转言词。因为旺堆啦的地位和知名度，我就变成了很出名的准博，有时候，我的名声还给我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麻烦。举例来说，有一次，一个色拉寺威武有力的僧人对我很有意思，曾经试过好几次要诱拐我，都没有成功。色拉寺里有很多著名的“多夺”，亦即“武僧”。那些奇异的僧人早已被社会所接受，他们带着武器在街上昂首阔步地行走，站立在人群当中显得特别醒目，因为他们的行为非常放肆，而且衣着又与众不同。他们自己互相斗殴的臭名也很昭彰，有时是为了斗狠，有时是为了抢夺男童。在拉萨上学的男童都是那些多夺们可以捕猎的对象，在他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设法成群结队地走，以防被劫。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打我的主意，而且有几次差点就被逮走了。虽然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能摆脱那种纠缠，事实上还是免不了会有那么倒霉的一天，所以，我终于被一个多夺逮住了。那是当噶足巴时有一次在拉萨演出以后发生的事情：他把我拉到寺院里他的寝室中去，并把我囚禁起来，威胁说，如果我要逃跑，他就要打我。那可真不是滋味，不过，两天以后他就放我走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使我对西藏传统社会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感觉。传统社会的残酷再一次深深地刺进了我的生命里。我很疑惑：为什么寺院里能容许那种恶人也披上庄严的袈裟？当我跟其他僧人和僧官们谈及那些多夺的时候，他们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社会上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旺堆啦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事情非常无奈与愤怒，可是因为拐绑我的那个僧人非常残忍与凶狠，是出名的恶徒，他也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更别提去采取什么行动了。不管旺堆啦的地位有多高，他还是怕变成被人报复的对象。像这类的事件发生了不止一次，所以情况愈来愈糟。因此有一段时期，我几乎是经常处于会被绑架的危险之中，有好几次我真的是被人劫走了。每次我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都会使旺堆啦愤怒不已。他不仅仅是因为被人斗垮而气愤，他确实是真正地关心我、照顾我，尽管我

对他没有性欲上的兴趣，却对他的关怀颇为感动。此外，我也很感激他能甘心为我的利益着想。所以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他的。我想那也许是因为他很同情我的求知欲，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几年，我们也共同分担了彼此许多痛苦的经验。于是一种极强的结合力就在我们之间产生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他辞世的时候。

我很明白，和一些对性行为有不同认识的人谈论这些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太大了，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举例来说，我就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我在认识旺堆啦以后的那几年，我还和一个女人有过关系。旺堆啦对别的男人会有嫉妒心，却不反对我和女人有关系。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也许会感到更奇怪。因为在这同一时期，我也结了婚。虽然为时不长，至少也是一个短暂的婚姻。我和旺堆啦有了几年关系以后，才认识后来跟我结婚的那个女人。因为那时候没有邮政设备，所以我和家人之间很难互通音讯。有一次，我母亲决定来看我，同时也朝拜拉萨的圣迹。因为我住的地方太小，住不下我们母子二人，她就租了一个房间自己住，大约住了三个月。当她住在那儿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邻居，那个邻居的丈夫是替达赖喇嘛服务的一名职位不高的官员。他们有个女儿叫泽贝，这两个邻居妇人出了一个主意，要我和泽贝结婚。我当时虽然已有十八岁了，但习惯上他们是不会在事先跟我商讨细节的。在结婚以前，我和泽贝见过几次面，但是对她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她是一个很娴静的女孩子，也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对她完全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她的家庭颇为富有，我想也许我母亲是对的，因为她看准了这桩婚事会对我有好处。因此我也就答应了，只是内心并没有热情。

一个噶足巴团员，在从事舞蹈工作期间就结婚是不常见的。可是因为我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两个母亲估计他们会通融一点，就向负责的官员提出申请，请他们额外开恩。事实上，泽贝家和噶足巴团长的关系很好，所以那位团长立刻就答应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就搬到泽贝家去，做了她的丈夫，也就开始睡在一起。当时并没有举行真正的婚礼。

泽贝和我从来就很少交谈，彼此也没有过感情上的交流。在西藏，这样子的关系并不稀奇，如果只有这种问题的话，那还不至于太让我难堪。事实上并不止于此。她的父亲和弟弟们对我的态度，几乎从一开始就让我难以忍受。虽然他们心甘情愿地让我跟他们家的女儿或姐姐结婚，变成他们家的一分子，但他们对我继续求学的志向，压根就抱着不支持的态度。他们好像只想控制我，让我成为他们家可以利用的新劳动力。尤其是我的岳父，他不能了解为什么我要那么努力求学。按照他的看法，再努力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扎西”，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在学习上是非常努力，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得到一个高层的职务。你所能得到的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低层工作，每天坐在那儿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干这种毫无结果的事情！”

岳父的观点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没错的。西藏旧社会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而且处于僧侣的统治之下。我是来自乡间的农家子弟，很明白自己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不论我有多大的本领。举例来说，我绝对当不上正式的全职政府官员，因为那些职务是贵族世袭的特权。不过，我仍觉得知识与学习是很重要的，我可以由此而成为一个有财富和有地位的人，还会获得更多的自由。我当时没有能力用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得很清楚，不过，我确实讨厌什么事情都必须听命于泽贝的父亲以及她的弟弟们。当时的情形就像又回到当初所接触的那个家庭一样，令我非常厌恶。因此，当我受了他们三个月对我求学一事的冷嘲热讽以后，就再也无法忍受了，便决心结束这个婚姻，去追求我的梦想。

后来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他们的家门，决心永远不再回去了。对我来说，这段婚姻真的就此告终了。

但是，马上就离开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泽贝这家人和噶足巴的团长有来往，若要离开还得好好地计划一下。所以，首先我打算在拉萨躲起来，看看是否能设法先逃到印度去一阵子，因为在那边就不会受到西藏法律的约束了。正当我要完成最后的计划时，那位难缠的老麻子发现了我躲藏的地方，立刻就派人来抓

我。

因为当初是麻子自己特准我的婚事，所以他对我的逃婚特别愤怒。他不停地对我又吼又打，为的是要我改变主意，回到泽贝那里去。我拒绝了。虽然我因此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我终于还是胜利了。麻子同意我不必回去，可因我的不告而别，一定要先接受处罚。他认为有一个合理的处罚是严加鞭打——在光屁股上用鞭子抽打二十五下。他实在把我打得很痛，而且让我觉得非常丢脸。不过，当他打完了以后，我的婚姻也就真正结束了。

在那段时期，我和旺堆啦的关系还是很稳定。他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仁慈的人，仍然为我的教育和学业继续提供帮助。他的同情、支持和赞许是非常重要的。渐渐地，我的精神又昂扬起来了。我把这段简短而不愉快的婚姻事故立刻抛诸脑后，重新求学。当时我对藏文的读写能力已经相当好了，好得甚至于还会令一些比我小的同学们羡慕我。当然，他们对我的赞美，也正好可以鼓励我上进。

幸运得很，就在我那失败的婚姻告终没几个月，我所有为学习藏文而付出的努力，突然间都得到了补偿。那是一九四七年，我十八岁了，当噶足巴的任期只剩下几个月了。在那种时候，我已经有资格去担任某些官方的低层职务了，当然，那也必须按照我的能力，分派到某个出缺的职位上去。比较好的职位，如全职事务员（藏语称为“绰拉”）之类，是很难碰得上的。我们这些退役的噶足巴经常都要等上好多年才能遇上有出缺的机会。我从旺堆啦那里得知，有个正在布达拉宫当财务管理员的老年僧官马上就要退休了。他是旺堆啦的朋友，所以旺堆啦觉得我应该有机会去接他的位子，问题是在时间的安排上。我当时实际上还在干舞蹈员的工作，在服务期满以前，不能去顶另外一个正式的缺。可是这种机会实在太难碰上了，若不去顶下来，实在是太可惜了。旺堆啦和我慎重地讨论了一下当时的情形，而且作出了一个计划。他的权力是相当有分量的，而且他对那个职务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按照非官方的消息，他发现我很有可能会被选上去担任那种职务。就凭着那个消息，我没有告诉噶足巴的团长，立刻

就去申请那个工作。

首先我必须通过书法考试——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为这项考试接受训练。考试的过程是先把写好字样交给试官。当年在西藏对于一个人的教育和文化程度，大部分是根据书写技巧来做判断的，字要写得好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职务。因为候选人可以参阅前任官员所写的字样，所以我就请求调阅一些文档，仔细地研习了一番。等我练习好了以后，就去向主考官报告，随后他叫我在他面前写上一页字。从他们的反应上来看，我好像考得很好，有可能得到那个工作。可是我还得突破另外一关：必须获得噶足巴团长的许可。那时，麻子已经过世了，接他那个位子的人，同样是个很擅权的人，毫无疑问，当他听到我的请求时，便大发雷霆。

“你是怎么得到那个职位的？”他怒气冲天地问我。

我把如何进行此事的细节据实以告，特别声明一切都是通过正当的渠道，但是，我很清楚他会怎样来对付这种事情。没有事先获得他的准许就去参加考试，就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冒险行为。不过我也知道，如果事先去征得同意，我的请求肯定会被拒绝。经验早就告诉我，如果要办成任何事情，就必须自己去全力以赴，以后再去面对问题。我当时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去解决那些重重的困难。那位噶足巴团长好像真的生了气，也许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

“你在已经得到了那个职务以后才来征求我的同意！你不就是在侮辱我吗？你应该在进行以前来找我商量，”他愤怒地说，“现在没有什么好做的了。”

那当然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知道我必须替他解围，给他留点面子。在旺堆啦的指点下，我去找了新团长的一位好友，恳请他替我转个弯儿。我甚至还想用茶叶来当礼物去贿赂他，可是他没有接受。不过他很同情我，他也认识旺堆啦，答应做个和事佬。慢慢地，事情就转变到对我有利了。那位朋友劝噶足巴团长可怜可怜我，终于把他说动了。解决的方法是：如果我答应付一笔罚金给舞蹈团，我就可以去接那个职务。大家还决定要我开一

个茶会招待全体同仁，我欣然同意支付所有的费用。从那以后，直到我服务噶足巴的期满以前，我仍旧匀出一部分时间来继续参加练习和演出，同时，也到我的公事房去开始干我的新工作。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的兴奋和骄傲。

我的办公室在布达拉宫里的财务处，工作人员包括三位主要的官员（两位僧官和一位有贵族身份的官员），三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低层办事员，亦即藏语所谓的绰拉，和三个打扫人员。我们负责供应达赖喇嘛每天的所需，如茶叶、酥油和哈达之类。多数工作人员以体力劳动为主，也有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可做。因为很多同事都不识字，所以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员就被分配去做些比较用脑及写字的工作。我要登记每天的行事录，注明各项活动和所涉及的人员，要把有关税务的事项登记起来，也要查明各项活动是否合乎规定。

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心境是多么愉快，不但为能胜任此职，还因我当时对初到拉萨时的悲惨岁月，仍旧记忆犹新，像那种挑粪、喂马和在第一次接待我的那个家里吃剩饭的滋味，一直难于忘怀。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爬上去了，已经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了一个稳固的地位。正因为那个职位是我第一个成功的证明，它给我带来的喜悦可真不小。那种成效，让我明确地感到：我为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付出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工作环境本身是相当舒适的。我们那些事务员每天早上都有酥油茶喝。如果工作不多，我们还可以坐在一起闲聊。办公室每天下午四时关门，我们在关门的时候也有茶喝。

我的生活算是过得相当不错。当旺堆啦一向服侍的那位长官调离拉萨的时候，旺堆啦也跟着去了。他走之前，介绍给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权贵。他住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一所大房子里，我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单独的小房间。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我的生命又有了意想不到的迂回曲折，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四

一九五〇年（当时我快到二十一岁），北京电台在新年广播中宣称人民解放军来年的任务是要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到了一九五〇年的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在西藏东部的长江上游集结整装待发，要去解放西藏。他们曾经想要说服噶厦派代表去协商，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在十月初，昌都战役打响，一个月之内，大部分藏军队伍就被瓦解了。于是，在解放军和首府拉萨之间，简直就没有任何阻力了。

毛泽东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所以在解放军旗开得胜以后，就不再往前进攻。西藏地方政府曾向美国、印度和英国求助，但是，在得不到任何支持以后，才不得不派代表去北京协商。结果，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按照《协议》的条文，西藏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达赖喇嘛的原有政府准予继续保留——至少也可以保留到人民都同意改善政府的时候。在那个时期，我们仍和以往一样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

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感到马上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听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而且是有钱人家的死对头。谣言满天飞，甚至有人还说汉人会吃人。汉人来了以后究竟会怎么样，没有人能说得清。其实没等多久，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到了一九五一年九月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官员就在拉萨出现了。

我个人的生活在开始的时候改变得很少。我的噶足巴任期在一九五〇年初就结束了，而且我已经在布达拉宫的财务处工作得很舒适。那里的环境让我开始享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交生活。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喜欢在夜间到茶馆去。那种茶馆不像美国的饭馆，而是像一种露天饮食部。每当我们在外面那个公用的桌

旁坐下的时候，就有人端出那种加了牛奶和糖的“英国茶”，以及受到英国影响的印度式蛋糕来侍候我们。我们不必每夜付钱，可以赊欠到周末再清账。

那是一种很有乐趣的友谊活动。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或是玩别的游戏，要不然就是谈些年轻人喜欢胡诌的狂言乱语。不过有时候也谈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些议论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的经验。我开始和一些曾在印度经商人家的子弟接触，也认识了一些有各种不同经验的人。很自然地，他们会谈论很多有关印度和英国的事情，以及各人自己的做事方法。听了他们的交谈以后，马上就引起了学习英语的兴趣。他们不但极为友善，还乐于把他们的所知都教给我。他们本来不是当老师的，但却很愿意帮助人。我的英文字母就是坐在茶馆里学来的。在那里，我同时还听到了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校，有些富有的西藏人就到那里去上学。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那些青年们对求学的态度，真是与众不同，尤其是和我那乡村里的人或是和我那位为时不久的岳父相比，更有天壤之别。我的求知欲非常能激起那些青年们的共鸣，对他们来说，那种欲望似乎完全是自然的事。虽然我当时没有体会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可那些议论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新的观念，我称之为对教育的现代化态度。

我当时非常热心也很随和，那种样子一定会让新朋友们觉得我这个人很好玩。无论是从书本上读来的或是在茶馆交谈中获得的新观念，都会使我极为兴奋。记得有一回我读了一本跟宗教有关的书，因为那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我还吃了一段时间的素。我开始每天打坐两小时，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手持念珠，嘴里念诵着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后来，朋友们告诉我必须吃肉才能有效地工作，也劝我不要走火入魔，他们终于把我说服了。那几年我学到的比我以往所学的全部加起来还多。而且愈学愈想学，于是，要问的问题也就更多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突然间开始变得麻烦起来，因此，我读书的时间也就非常有限了。

有一个麻烦的事情是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子。那时有一位名叫顿珠卓玛的漂亮小姐，经常到我住的房子来取牛奶。那年她十八

岁，非常羞怯，我对她真是一见钟情，开始整天想着她。她平常要去井里取水，每天还要到同样的那个房子里去取牛奶。等我把她每天的例行工作都弄清楚了以后，就装着“碰巧”遇见她的样子，尽量找机会去见她。就这样，我们慢慢地习惯了凑在一起聊天。不久以后，我就能把她邀到我住的地方来了。终于，她让我吻她，后来，我们的亲吻也慢慢地习以为常了。不过，就是这点亲密的关系，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变成可能的。她实在是很腼腆。

我只能在白天约她到我这里来，因为她家管得很严。那时，她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把她看得很紧，而且老是疑神疑鬼的。她哥哥身兼父职，显得更严厉。可是，我们终于开始同床了，从那以后，毫无疑问地，我们的事情就开始成了大家闲谈的话题。当我们的关系成了公开的秘密以后，她的哥哥和我的顾问都觉得我们应该有个交待。于是，我们便开始谈论婚事，而且谈了好些时候。

在这段时期，顿珠卓玛和我已经非常亲密了。那种婚姻和我以往被“安排”的婚姻完全不一样。这回我是深深地坠入了爱河，双方都有很深的感情。已经公开地承认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自然一点了。有时候我们会到城外去找个有东西吃的地方玩一天。天热的时候，有时就到河里去洗澡；天冷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呆在屋子里。我经常不去上班，整天跟她在一起。我的职位没有高到非得每天都去上班，其实要溜出来也非常容易。平常若不去上班，我会在当天请人带个信去告诉一下我的主管，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有一段时期，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我对这桩婚事也颇为动心。事实上我除了爱顿珠卓玛以外，也是因为她那位当家长的哥哥还是一位孜仲（僧官），颇为富有。我想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承认有意去攀附他们，现在回忆起来，不由得承认那种成为富贵家族一员的念头，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当时的环境是比从前好了一些，却绝对谈不上富有。而且，在西藏旧时代的制度里，我绝不可能擢升为像她哥哥那层阶级的全职政府官员。我有可能

成为一个财务处的资深绰拉，或业务员，但是，在我们的制度里，所有不是出家人的官员，都是从贵族当中挑选出来的。我无法企望我自己的家人能给我任何有效的经济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尽过他们的能力来协助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顿珠卓玛家有一所巨宅和大量的金钱，所以，若能成为这家人的女婿，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

当我悄悄地筹划如何加入我那心爱的女人的家庭时，她的母亲和哥哥却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由于我农人出身的背景，我不会是一个值得挑选的人。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说，我是个穷家人，我和她家结亲的结果是我会因此而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大大提高一步，而她们家却会因此而降低身份。当然，其他因素也还有。她哥哥心中早已另有一个妹婿人选。因此，我们谈论婚事的进展就滞而不前了。

后来我发现她母亲也跟我作对。她说她知道当时另外有一个女人在打我的主意。那个女人比我大一点，就住在拉萨北边的彭波，有很大的一片土地。当那个女人开始积极地追求我的时候，竟然公开地送食物和酥油等礼物给我。我那位准岳母把这些事情大肆渲染。即使她也知道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同过床，甚至连我自己也未曾同意和她拉上关系，而且，事实上我也真的对顿珠卓玛很忠实，她母亲却仍然反对我，尽力分化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她可能是用那个女人来当借口。实际上，她的母亲和哥哥都无意让我成为她们家的一分子，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初衷。

然而，自然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当我和她的家庭关系大大地冷淡了以后，顿珠卓玛和我的关系却愈拉愈紧。不久，很明显地，她已经怀孕了。在没有结婚以前就有了孩子，对她的家庭和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很尴尬的事情，我们紧张得很，不知该怎么办。从那以后，事情变得愈来愈糟。她家禁止她来看我，我们只好偷偷地找机会见面。现在回忆起来，我对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惊奇。当然，她的家人是不可能把我们分开的。有时候她会偷偷地来看我，有时候我也会偷偷地到她房间里去过夜。他们那所房子很大，很容易混进去，也很容易藏在里面一直

到黄昏时刻。她会把我隐藏在一个地方，一直到其他家人都睡了以后，再和我会合在一起。我们这样相会过很多次，在我的儿子出生（一九五三年）前后都是这样。

我们终于交上了厄运。顿珠卓玛和我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睡过，因为要凭机缘，看当时的情况而定。有一天晚上，是在我的儿子出生以后，正当我们三人睡着了的时候，她母亲发现了我们躲藏的地方。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她把我们弄醒了，大发雷霆，狠骂她的女儿，叫她以后不准再见我。同时也对我乱骂一通。她真的是怒不可遏，把她女儿从被子里拉了出来，毒打一番。因为我又不是她的丈夫，毫无能力去阻拦她。不过，我还是拼命向那盛怒之下的母亲哀求，请她住手。她终于停手了，还让我们在一起平静地度过了那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我才离开那个房子。

终于，我们的关系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自从在那个房子里被抓到了以后，他们全家人对我们的防御工夫增加了一倍，让我和顿珠卓玛连找个机会见面都变得很困难了。当我进一步了解了他们母子的关系以后，我也就不喜欢他们了。她哥哥非常自私、傲慢，不尊敬他母亲。当他生气的时候，对他母亲大吼大骂。我对那种行为大不以为然。对父母要尊敬的这种传统，是我所坚信的。所以，当我看多了他那种不尊敬长辈的态度，我就愈觉得这个家庭不是我所要加入的。同时，他们也继续表明不要跟我拉上什么关系。

有一段时期，顿珠卓玛和我考虑过要住在一起，自力更生。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所以考虑得非常慎重。最后，我们还是打消了那个念头，因为我们知道若是得不到她家的支持，仅靠我的薪水过日子，我们会很贫困。那不是我们任何一方想要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虽然我曾尽我所能地去照顾我的儿子，我们终于开始日渐疏远了。那段时期真是痛苦极了。

就在那同一时期，别的地方也刮起了“大风”。我的私生活因为我和顿珠卓玛的关系以及儿子的出生而变得那么混乱的同时，我的理性和社交生活也同样开始复杂起来了。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儿子出生的前一年——解放军已经在拉萨安顿下来了。

第一批军队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进城的，不过，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保持着很不令人注目的形象。当他们的人数增加以后，就变得比较活跃而且很显眼了。我很欣赏他们做事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相比，真是大不相同。他们用鱼钩钩着虫子到河里去钓鱼；在河边湿润而松软的地方，开垦新生地栽种粮食；到拉萨街上去收集人和狗的粪便当肥料。这样，他们就开始能在粮食上自给自足了。那些事情，我们从未想过去做。凭良心说，那些工作真会令人作呕。那些人绝不浪费任何东西，什么东西都不丢掉。所以，尽管心里有时会感到不太自在，我还是非常欣赏他们对工作和纪律的热忱。他们连一针一线都不会取之于民。

我参与工作的那个官僚政府可就大不相同了：工作的速度慢，毫无效率可言，而且还很腐败。就以我那个办事处来说，在我接手新职务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制度是非常的浪费而且又没有效率。我曾提过我在那里的工作有时候是相当地愉快，但是，慢慢地我就发现很多同事真的非常贪心，而且我们的制度还鼓励贪污和贿赂。我已经知道有些资深的事务员奉命去边远地区为政府收地租的时候，会把大笔钱财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而财务处的主任却视若无睹。我也知道有些派去印度为拉萨的财务处买东西的事务员，会利用公家安排的农民畜力运输队伍，在沿途搬运他们自己的货物，做他们自己的生意。有时候他们干脆把那些驮畜卖掉，把得到的钱占为己有。我们办事处有很多像此类的大小贪污案例。我相信我们办事处的三位主管一定知道很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去制止。那就是当时的办事风气。看到了解放军办事的态度以后，这才开始让我有一个可以用来做比较的根据，我终于能把我们的制度和别人的比较一下。老实说，我不但欣赏他们的效率和干劲，也对他们那种明确的理念着了迷。

那些汉人工作起来真是孜孜不倦，而且都有奉献的精神和目的。他们到达后不久，就在拉萨开设了第一所小学、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我必须承认，他们的那些实际行动真的感动了我，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直接见惠于百姓。他们在那么短的期间所

能改善的事情，比我一辈子所见过的还多——我敢冒昧地说，比西藏近几个世纪以来所能改善的还多。

那些汉人还设立了一个广播电台，还在八廓街区架上了喇叭扬声器。因为八廓街是市场中心区，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广播。他们以一种低姿态，很温和的方式做宣传工作，那些汉人不想用很快的速度把他们的理念强迫我们立刻接受。尽管如此，新的观念俯拾即是，令人无法忽视。我们那种老旧的、传统的、基本上是毫无变动的社会，突然间被一些奇怪的名词所轰动了，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其所包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根本就无法明了。我们自己的语言没有涵盖这些观念的字，即使我们实际上有那些字的存在，大多数的人也是无法知道的，因为西藏没有学校教那种课程。事已至此，新词汇必定是要造出来的，这样，我们才能用藏文来表达那些观念。不过，我们新造的词汇和学来的词汇之间，在意思上是不太吻合的。为“社会主义”而造出来的西藏字，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一群普通人集结在一起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意思就是“资本的制度”。当然，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懂这些字，不久，我们就慢慢地懂得了有些字的意思了，这种过程的本身就相当有意义了。在那个阶段以前，教育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学会写一手好的字和做些简单的算术。我那时在茶馆里和人交谈时，开始感觉到还有很多可学的东西，因为知识的领域是那么大。可是，我既不懂历史，也不懂科学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科学。要是说我对所谓的政治有一点了解的话，那也只局限于那种旧式的和传统的政治。在知识和政治的领域上，我是一张白纸，等待着把字句写上去。不过，我和许多我所认识的老官员们不同：我不只是等待，我是很积极的。

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当时接触到的那些新观念和理想，对有些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可也把有些人给吓住了。整个地区显得动荡不安，尤其是在西藏文化和政治中心的拉萨人。从一个角度来看，那些被传统社会迫害过的人相信任何改变都会对他们有利。那些富家人、贵族、当老板的，必定会因为他们的罪过而受

罚。那些受过苦的就相信他们现在会有好日子过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有权势的人——亦即将会有所损失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解放军来了以后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然而，如何把这些人划分成不同的圈子，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准则，因为事实上，有宗教信仰的藏人都会害怕任何的变动。他们怕那些无神论的共产党会毁灭他们所热爱的藏传佛教，而那个旧日的神权政府却可以让佛教继续存在。

另外有一批我所认识的，也比较富裕的年轻人，他们对可能改变的前景，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当中有些是年轻的商人，有些是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另外还有一些是僧侣，他们不觉得社会改革会对宗教有所威胁。他们就是最早支持汉人的那一群人，也支持他们的改革理念和平均主义。

汉人鼓励我们西藏人去扩大教育范围，当然，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教育我们。他们说要把西藏改善得更好，而且我们也能帮着做改善的工作。他们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就是让我们学到每天在市场上从扩音喇叭里听到的那些理想和观念。学习的时候分成“小组”，有些朋友参加了以后，也邀我跟他们一起去。因为我可以亲眼看到当时的改变，如新修道路和设立学校，我开始相信更大、更有意义的改革，真的就要在我们这个极其保守和闭塞的社会里发生了。当我想起在噶足巴时期的那种惨无人道的训练，滥用职权的风尚，对像我这种出身普通百姓家庭的人严格限制升迁，更谈不上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我开始在想：现在进行的这种改革，可能正是西藏所需要的。

然而共产主义并没有特别吸引住我。事实上我当时也无法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当时我真的认为西藏的佛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后来我才比较清楚我们传统西藏社会所需要的改革应该是怎么样的，而解放军的到达，正是促进改革的原动力。

可是，问题也就跟着来了。根增啦——我住在他家的那位僧官——和其他所有的僧官都曾经支持过我，是我的朋友和恩主，那时，他们正在死命反对共产党和当时的改革。他们一直都很为我的利益着想，他们应当考虑过我可能是在决定去接受当前的各

种机会，或者是把我参加汉人那方面的活动视为背叛他们。我真的觉得左右为难。有些在茶馆里或是在办事处认识的年轻朋友们都催我去参加一个新的组织。因为我渴望学习有关像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之类的观念，在我内心的深处，有一部分是很想参加新的组织的，可是，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我又觉得不能那么做，因为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背叛我的恩主，或是抛弃我那些多年的朋友。

既然我不能停滞不前，也不愿意逆来顺受，就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印度就是最佳选择。在茶馆里聊起过有关大吉岭的学校，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还真的考虑了很久，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上学。我希望能继续求学和成长，不只是学习书法而已，应该学更多其他的知识。我要知道“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含义，也想知道世界其他各地区的历史。我开始觉得西藏的有些事情是应该改革的，我真的认为开创改革的惟一法门就是要打破传统，也要用新的方法来正视问题。

我做的计划很简单，要到印度去学习三年。那似乎可以给我足够的时间去学英文和西藏以外的世界大事。可是，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有钱，所以我决定去做生意。我便向财务处请假，尽量向朋友们借钱，愈多愈好。在开始的时候，我只要先付利息钱。我就用那些钱在拉萨买了许多可以转卖的商品，然后把那些商品运到我家附近的乡村地区去卖，获利不少。后来，我又在我们村子附近各地区买了当地的粮食，再运回拉萨来卖。当时在西藏做生意不必缴税，也没有执照费或关税。我在拉萨替官家工作的实际经验给我带来了许多方便，我雇了人手帮我运货。我在拉萨卖过谷子、青稞、奶酪、酥油和桃子，在第一年就赚了不少钱。后来，料想不到的事情再一次左右了我的命运。

在我们村子以及附近地区经商大约一年以后，有一天晚上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发现父亲被人家打了。打他的是我们家的死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似乎当我住在拉萨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就已经对我家起了怨恨。因为我被征选去当了噶足巴，我家就可以获免一些税务，按照政府的惯

例，我们家免缴的那部分税责就要由村里其他居民分担。西藏的惯例是：税务是由全村来负担的责任。当我家获准免缴的时候，我们家本来应缴的那部分就由其他村民负责去交。很多村民都觉得他们所增加的负担是不公平的，其中有一些人就开始排斥我的家人，甚至于几乎就不和我的家人讲话。多吉次登是和我家最敌对的一家人的儿子。事情开始恶化的时候是由多吉次登和他的一些朋友围殴我父亲，把他打得非常厉害。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的时候，非常震怒，立刻就到政府那里去申诉。我把整个事件都向他们报告了，并且请求他们为我主持公道。他们很仔细地听我报告，却不采取任何行动。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伤心可气的事情。多吉和他一家人在县政府里面有朋友，我不可能在那里得到公正的调查，我觉得我们全家的声誉已经遭到了损害。决定要自己去了结这个案子。

在一九五六年刚过完新年的时候，我叫多吉次登在他家和我家的半路上见面。我下了决心，就要在那里为我父亲报仇。但是，多吉一定猜到了我的意图，因为他把我骗住了。当我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客气，很有礼貌。他承认犯了大错，求我饶恕他，答应从那以后会对我家好。我当时真笨，就被他那种礼貌和看起来很诚恳的样子给说服了，于是便决定让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不予追究。可是，过了几天我才发现，当多吉用花言巧语把我的怒气消除了以后，便偷偷地到县政府去谎报我用暴力威胁他。结果是我们两人都被传到县政府去，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决定不再把这种案子信托给政府官员去主持公道，也不愿意一直等下去。我有一把枪，那是旺堆啦给我的。我带着枪，同时也找了几个愿意帮我的朋友一起去设下一个圈套。

去县政府的时候，多吉和我都要经过同样的山路才能到那里。他一定也怀疑我会暗算他，因为他比我先动身骑着马走了。我看见他也带了几个朋友一起走，可能也带着武器。当我们在山路上转了几个弯以后，大家就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一直在他们后面跟着，远远地注意着他们那伙人的行动。他从未回头看过我，但显然知道我们这伙人是在尾随着他们的。他所不知道的是我已

经先派了人到一個很特别的地方去等着，那里路窄地险——一边是河，另一边是屹立的峭壁。

当多吉走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只比我们先到一会儿，我们埋伏好在那里的人就把他们的去路挡住了。

“多吉次登，我们都是朋友，”他说。“停下来让你的马休息一下吧！来跟我们一起喝点青稞酒，怎么样？”

话说得很客气，却又带着恐吓的样子，态度很冷峻。我们愈走愈近了，当时我可以看得出多吉的脑子转动得很快。我想他肯定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可是，在那种时候，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已经落入圈套了。他的前路已经被挡住了，我们这伙人则从他们的后面步步逼进。当我们走近了以后，多吉和他的伙伴们就转过来面对着我。正如我所料，他们带了短剑，马上就抽了出来。当他们看见了 my 枪以后，就知道已经不能再轻举妄动了。于是，我便毫不迟疑地利用我的优势，开始了我的报复行动。

“你一直横行到现在，”我对多吉说，“在县里你可以躲在你朋友们的后面。现在，就只有你和我了。你这个懦夫，马屁精！你打了我父亲，现在我要把你打个半死！”

我叫多吉的朋友把他们的刀子放下，把多吉的手反绑在他的背后。等我们把他的伙伴也全部都看住了以后，我就开始用鞭子抽打多吉，一直抽到我自己的肩膀都痛了，而且抽得我自己的呼吸都感到了困难。我真的打累了，便找了个适当的地方走下河边去弄点水喝，清醒一下自己。等我休息了一阵以后，又再一次开始抽打多吉。起初他大吼大哭，终于被我打昏了。当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被我打败了以后，才终于觉得这件事情总算是解决了。

当他恢复了知觉以后，我说：“现在我的仇已经报了。在我个人这方面来说，这件事情就此了结。我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你以后也可以安心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了。”

可是，当时他哪里都去不了，只能稍微挪动一下身子，实在无法到县府去了。那天，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是当他回头往村子里的老家走的时候。他当时已无法坐在马鞍上，只能像一袋谷子那样横趴在马背上。

这段插曲绝不是事件了结的终点，当然，我是曾经那么企望过。我们村里的人和县城里的人都因为我打多吉的事情而喧腾不已。有些人是站在我这边的，他们觉得多吉挨打是应该的。另外一些人则抱着不同的看法。县里的官员们却没有把这个事件看得很单纯。他们说我已经自己在处理这种法律事件，既然如此，县政府就不再干预了（其实他们是口是心非）。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叫我立刻就到拉萨城里的法院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自己不派执法人员来抓我是因为他们听说我有武器。如果当时就来抓我，他们怕有人会被打死。所以他们才送给我一个很严正的通知，叫我到拉萨去，然后再看下文。

我想当时我实在是幼稚极了。我从来就不知道政府人员会把这种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所要担心的是多吉那边的人会直接来报复我。以我自己的看法，整个事件是很单纯的：多吉打了我父亲，我就替我父亲打他。可是，现在已经惊动了拉萨的政府，我觉得别无选择，只有快回拉萨城里去。我知道政府当局为了顾全我的面子，叫我自动去拉萨，而没有派人到我村子里来，当着我的邻居和家人的面把我强拉出去。所以我就回到拉萨，开始了我的诉讼案。

所有的当事人都到了——多吉、我父亲，以及我本人。审讯的过程是件相当大的事情，要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我父亲要租一个住的地方，一直住到结案为止，而诉讼的过程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我感到惊愕的是，我发现有一个审判官很同情多吉次登，当他审问我的时候，把我弄得非常不愉快。他要我把我这方面的实情说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说明理由，还对我不屑一顾。他声称我父亲谎报他的伤势，也怀疑我的动机和所说的真实性。我反驳他有偏袒多吉的居心，但我的言词只能激怒他，对我更加不利。

审讯断断续续一直拖到第二年，那时已经是一九五七年的三月。看起来好像是永远都结不了案的样子，我对最后的结果也不敢抱乐观的希望。所以，当最后的判决终于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既惊讶又宽慰。因为我打了他，所以我被判罚金七百五十桑（当

时每一桑约值六美分)，多吉次登要付罚金五百桑，当作我父亲的医药费。我父亲则只要付更小一点数目的罚金。我真的高兴极了，多吉才是真正的输家。他不但肉体上挨了我的打，而且还要付罚金，同时还在我们村里和县里都受到羞辱。法庭对我的裁决也只不过像比打我的手心稍为严重一点而已。虽然我很庆幸，但也知道我已经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当我回顾最近几年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越想越觉得应该离开西藏，去继续接受教育。在我打多吉次登的事件发生和因而卷入那漫长的诉讼案以前，我已经存好了一笔钱，目的就是去印度求学。我确实认为如果我要采取行动，现在就是下决心的时候。

然而，一旦要离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所扎下的根比我所能想像到的还多。我和顿珠卓玛分居已有好几年了，我仍继续供应我儿子的一切所需。她已再婚，和新的丈夫又生了两个孩子。我心里感到非常的罪过，我真不该把自己的儿子丢下不管，乡下的村子里还有其他的家人。离开家人和朋友到外国去，远比离开我的村子到拉萨去更可怕。打人事件让我更能体会到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多么的强烈。我仍然担心我的家人在村子里的安全问题。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如今是木已成舟，非走不可了。我相信到印度去才会有前途，所以，我便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毅然上路，沿山往南而去。

五

当我在一九五七年要到印度去的时候，我所有的钱约比印度的两万卢比多一点，合美金五千元左右。这些钱是我做生意赚来的，其中也包括一小部分是我跟旺堆啦借的私人贷款。在去印度的路上我不想带那么多现款在身上，因此，我就去和共产党的商务局联系，因为他们经常为去印度采购的西藏商人安排各种方便。我答应承购农用器材，以铁锹和锄头为主，把它们运回拉

萨。商务局则答应把购货所需的钱先付给我，不过，我必须找两个高层的西藏官员保证我会履行应负的责任。最要紧的是商务局还同意接受我私人所有的西藏钱币，然后由他们开一张支票给我。那张支票我可以到加尔各答的汇丰银行去兑换印度的卢比。

我拟了一个很简单的计划：由我的大弟弟陪我去印度，帮我购买货物，然后把它们运回去交给商务局，以完成我所承诺的工作。我自己则留在印度求学，用我自己的钱维持生活。

当我把这些经济事务安排妥当以后，就向布达拉宫财务处的主管辞职，理由是去印度朝圣。他们批准了我的辞呈。随后我就去中国外事处申请去印度旅游的出境许可，该处亦欣然同意。一切都很容易地办成了，真是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喜悦。

我们旅行的时候没有带很多东西。钱财方面，我们只带着银行的支票，另外就是一些衣服，一只好手表，还有旺堆啦给我的那把手枪。就这样，我们兄弟俩启程上路，经过山区，往南进发。我们搭上了一辆货车，一路摇晃着离开了拉萨，朝西南走，先到达江孜镇，然后再往南走，到了地处锡金边界的亚东。锡金是一个藏族王国，受印度的保护。在亚东的道路不能通车，我们必须骑马继续前行。沿着不知有多少世纪的古老商道，弯弯曲曲地在西藏与锡金之间，越过高山峻岭，继续前进。又过了几天，我们旅行的目的地终于到了，那就是噶伦堡镇。

噶伦堡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海拔四千一百英尺，和印度的其他地区相比，这儿的气温较为凉爽，但和我过去所习惯的气温来比，我觉得这儿还是很热。那儿的热气耗竭着我的体力，在我初到那儿的时候，整天昏昏欲睡。吃的东西也需要慢慢地适应。我喜欢印度的炒饭、蔬菜和英国式的面包，尤其是土司面包。但吃不惯肉食。我想那是我的心理作用，不过，肉的气味确实难闻，尤其是羊肉，令我无法下咽。

很久以来，噶伦堡就是西藏对印度的主要商业中心，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藏人社区，可能有上千藏人在那里居住。西藏的噶厦在那里设有商务办事处，派了专人去负责。在西藏的商务代表当中，正好有我认识的人，就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一

个月。我利用那段时间，请了一位尼泊尔人教了我一点英文。不过，我不能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因为拉萨的中国银行在加尔各答的汇丰银行有户头，我要到那里去把带来的支票换成印度的卢比。所以不久以后，我和弟弟便到西立古日去搭火车南下到加尔各答去了。

加尔各答特别热，比我想像中的还要热。我想我们佛教中那个可怕的炼狱也不过如此。初来加尔各答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让我震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同一个地方成群地乱转，更不用说还有数以千计的乞丐，或躺或卧地横陈在街上。那里有众多的苦力——替人家挑东西为生的人——拉着人力车，在拥挤而又缓慢的人潮中东奔西窜。说实在的，我真怕走迷了路，被淹没在印度人的人海中。因为我无法让人家了解我的意思，甚至连路标也看不懂，只好请一位在噶伦堡经商的西藏朋友，把我要人家带我去的那个地址写在一张纸上。我没有说任何话，战战兢兢地把那张纸交给一个人力车夫，让他带我们到加尔各答那个小小的唐人街附近去找一个客栈，那个客栈的老板是一个汉人，他的妻子是西藏人。我们平安地到了那里以后，心里才感到莫大的欣慰。在那位西藏太太和其他几位住在那里的西藏商人的协助下，我把支票兑换成了印度的卢比，也把我弟弟要运回西藏的货物买齐了。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我们就把事情办完了。接着我们就回到噶伦堡，在那里，我弟弟立刻雇了几个赶骡人，把货物运回西藏。我则留在那里开始求学。

住在噶伦堡的西藏人，什么样的都有。有些是商人，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好了经商的地盘；而另外有些人则是单独从西藏逃出来的，为的是要逃避在家里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当初我所想要做的那样。其他也有一些是跟政治有关的人士。尼赫鲁曾经说过噶伦堡是个“间谍之窝”。那里也有一批非常可怜的罪犯。他们当中，男的平常犯的都是些小案子，女的则多半都是当妓女的。而最大的团体应该是一大群来来往往的商人和骡夫们。他们是带动双边实际贸易的骨干，把西藏的羊毛运到印度和美国，再把印度和西方国家的货物运回到西藏。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发现在印度有西藏妓女，其实，我真不该去管这种事情。平常我是不会去找妓女的，可是，就有那么一回，当我在加尔各答的时候，有一位经商的西藏朋友带我到一个妓院去，那是一个相当高级而且还比较贵的地方。那里有印度的妓女，还有一个漂亮的西藏姑娘。我叫了那个西藏姑娘，她说是从日喀则来的。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我在那里留下来跟她谈了一会儿，没有呆很久。起初，我真的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发现在印度的妓女，一般来说，表现得那么不同。对她们来说，只是钱的交易：“多少？多少？”在我们家乡的西藏妓女就比较微妙一点，她们的形态也不一样。虽然她们也是为了钱，可是不会把这种事情干得那么粗鲁和商业化。虽然我在印度住的时候只去了几次妓院，而且多半都是为了社交的原因——跟一些我在那里认识的朋友一起去——看见了西藏人在那里的情况，让我心里的负担增加了不少。我仍然记得在加尔各答有一个非常破烂的妓院，在那里我也发现有西藏人。那个房子又脏又暗又没有电。那种贫困的样子让我震惊。我跟那里的姑娘交谈了一阵子，真同情她们。后来，我给了她们一点钱就走了。我在大吉岭也见过一个妓女，她的丈夫其实在西藏的时候我还认识。他们很穷，那个男人为了面子问题，从来就不会把他老婆出卖自己的实情告诉人家。虽然我不敢说当时我就有西方人那种历史性的认识和全力关注社会的公德心，那些可怜的人所受到的痛苦，可真是触动了我的心弦。

不过，我没有意思要让人家觉得我的生活就那么一变再变。这些故事其实是我在印度所住的全部时间内发生过的。当我在加尔各答换了钱以后，我就回到噶伦堡去了。回来以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求学。那种因为不懂语言而产生的无助感觉，必须依赖一个人力车夫照着纸上写的说明带我找地址的困窘，更使我下定了决心，要学英文。

在我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钱中，我留下三千卢比自己用——维持我自己的生活和学费。那么，我仍旧剩下了约有一万七千卢比，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那时候我有二百五十印度卢比就

足够付一个月的生活费和学费。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估计剩下的钱最少也够用五年。所以又考虑把钱投资出去，希望能增加钱的价值，也许只靠利息就能够生活。洛桑坚赞从前是位高阶僧官，因为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就去向他请教。我们决定把钱留在他那里，由他去替我投资。他当过商务团的团长，认识有关的商务人员。他自己本身也很富有，是噶伦堡的知名人士，有一个老婆，一栋房子和一辆汽车。所以，我相信了他。可悲的是，我后来真的后悔莫及。然而在当时，我觉得已经把自己的经济基础打好了，我在那里停留的期间，就不必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于是，我就开始去找一个老师。

不久，我认识了另外一位西藏老乡——嘉乐顿珠，他对我在印度时期的生活起了莫大的影响作用。他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我们都称他嘉乐啦。他在汉地上过学，一九四九年当共产党胜利的时候，他就逃出去了，最后在印度落脚。后来我才知道，嘉乐啦参加了一个由西藏贵族组成的小团体，那些活动分子在印度北部从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嘉乐啦帮我安排了一个很实在的学英文的步骤，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退了休的英国军官，叫康明。

康明先生住在大吉岭的充然萨塔区，大部分欧洲人都住在那里。大吉岭是在印度的英国人很早就喜欢去的避暑山区。虽然在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了，还是有很多英国人和其他的欧洲人住在那里。我去见康明先生的时候，他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其实他是替别人管理那所房子，业主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尔各答。大吉岭和噶伦堡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两城面对面地各自位于两个耸立的山坡上。记得我去康明先生那里的时候，出租车要先沿着陡峻的山路一直往山底下的河边开去，然后再很费力地在另外一边沿着陡峻的山路往上开。

我答应每月付康明先生二百卢比作为食宿费和学费。康明先生并不是以教书为业的。他会说一点尼泊尔话，不会说藏语。不过，现在回忆起来，他的教学方法还相当不错，对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启蒙作用。

每天早晨我们的生活都有一个固定的过程。康明先生起床以

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广播。然后就端一杯上好的大吉岭茶给我喝。等我洗漱以后，我们就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早饭后，就开始学习。首先，他会给我一些模范句子，让我练习听和写。然后，我们就一起沿着山边散步，他会一边走，一边教。譬如说，当我们看见有人骑着马，他就会说：“那是一匹马。那个人骑着马。那是一棵树。他们从树旁边经过。”当我们在他的房子里的时候，他会很有系统地告诉我各种东西的名字：“这是镇纸，那是书架，”等等。每天例行的散步完毕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办公室去工作，因为他还是房地产的经理。在那段时间，我就去我自己的房间练习写一些他教我的短句子和刚学的生词。吃中午饭时我们再聚在一起。等到厨子侍候我们用完午饭以后，康明先生就改我的作业。他会把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句子写下来，让我当着他的面练习那些句子，而且也要我自己造些新句子出来。我们把一本破旧的老字典当作查审用的圣经。那是一本英藏字典，一九〇四年在加尔各答由一位锡金喇嘛编成的。我们用那本字典来回答问题，解决争议。

我在康明先生那里大约住了七八个月，非常愉快。我求学的意志非常坚强，那种过分坚强的态度，经常遭人非议。我曾听到有些西藏人在谈论我：“他会在路上拦住英国人问英文，”他们悄悄地说。我可能是太积极了，不过，我的求知欲是很坚强——事实上我竟坚强到还觉得自己学得不够快。虽然我很喜欢在康明先生那里按照固定进度的学习环境，我却想要进步得更快一点。终于，我通过西藏人在大吉岭的一些新关系，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我认识了一个西藏朋友，叫索南，是一个学生。他上课的学校叫做圣约瑟夫（是一所高中，也有学院课程），设立在城里的北角地区。索南啦很同情我的上进心，愿意协助我。拉旺先生是他的哥哥，颇为富有，在大吉岭打下了很好的基业，声望也很高。经过索南啦的请求，拉旺先生答应送我去圣约瑟夫学校上学。我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当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才开始学英文。

我必须获得一种特别许可才行，而且还需要有人在暗地里协助。我希望拉旺先生的影响力可以暗里相助。果然，他的影响力确实有效。

我不知道最后究竟是谁跟谁说了些什么，不过，很快就安排好了由该校的院长史丹福神父召见我。有一部分时间是由他陪我参观学校的设施。现在我还记得当我发现教育的范围会包括那么多不同的课题时，是多么的惊讶。史丹福神父是一位宗教人士，其实他也教非宗教的课程，如科学、数学和历史之类。（后来当我到了美国的时候，也看到过类似的奇特现象，对于那里教育的普及性，真是叹为观止。我记得在西雅图遇见一位八十岁的老年妇人，她刚在夜间部修完学士学位。其实当时的世界和我年轻时在西藏所认识的世界并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史丹福神父人很好，参观完毕以后，我们还谈了一会儿，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吧，扎西次仁少爷，我们给你一个特别许可，让你住在宿舍里，也可以去课堂里旁听。”我非常感谢他，起初却感到有点困惑。对于英国人通常称呼别人“少爷”的习惯，我一点都不了解。而且我只知道那个字还有“主人”的意思，那就更把我搞糊涂了。我会是谁家的主人呢？

我搬进圣约瑟夫学院宿舍那年是一九五八年，宿舍就在学院附近的北角地区。我自己有一个小房间，每天和一百七十多名学生一起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学生当中有非洲人、西藏人和缅甸人，而大部分是印度人。我总共付了三百卢比，用作食宿费和聘请一位英印混血的补习老师教我英文。除了私人补习以外，我也去旁听英文和历史课。

我尽量去跟其他同学混在一起，目的是能听到他们的交谈。我不再到街上去拦住人家跟我讲话了，不过会在学校里尽量抓住机会。我记得当时对那些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学生非常羡慕，所以我也决定要奋起直追，结果就导致了一些可笑的错误，就像当初我误解“扎西少爷”一词那样。举例来说，我平常都在宿舍楼上的公共食堂喝下午茶。有一天，我正坐在一个缅甸学生的旁边，他喝茶的时候也在吃一个面包。突然间，他对着我看，并且

指着那个面包问我：“扎西次仁先生，你们西藏话叫这个什么？”

“那是一个磅姆。”我说。“磅姆”是西藏字的发音，意思就是指那种面包。而他们都以为我在说“炸弹”，因为英文字的炸弹发音为“磅姆”。这一来，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却不知其所以然。

“那么，这个又叫什么呢？”他一边把面包切开，剁了些青辣椒放进面包里去，一边问我。

“那是磅切。”我很得意地说。

这下可真把全桌人都给逗笑了。从那天起，大家都喜欢称我为“磅切先生”。那个绰号一直就跟随着我（真的，不久以前，有一位锡金王室的亲戚路过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时，我遇见了她。她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说出来的话就是：“哈啰，磅切先生！”），这就是新学一种语言带来的乐趣。

我在圣约瑟夫学校过的日子极为愉快，而且学到了很多，现在回忆起来，仍旧非常甜美。和我生命中其他许多故事一样，老有好景不长的现象。以后数十年的生活，变动得更快，大局面的政治和历史的趋势，也开始改变了我原来拟定的计划。

西藏的局势变得日渐严重。一九五八年夏天，有一股从康区来的人展开了攻打解放军运输队和前哨基地的活动。一九五九年三月，大约是我在圣约瑟夫学校一年以后，拉萨的动乱就发生了，那个动乱是长期分裂的结果。共产党进藏后的头五六年间，未曾使用粗暴的方法，也没有使用所谓的铁腕手段，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继续行使对内的权力，宗教及寺院的活动也没受限制。他们以修路、建桥、设立学校和医院来施惠于民——那就是说，如果接受他们的到来，和赞同他们的理想，我们的前途保证就会像这些有目共睹的成果一样，皆大欢喜。

但是，紧张的局势却日渐严重。一九五六年，中央政府开始在西藏东面的一些四川藏区实行社会的和土地的改革，问题就开始发生了。那种变动引起了各区的地主和喇嘛们的愤怒，于是，他们就竭力反抗，结果就引起了流血的暴动。由此而起的结果也使许多藏籍人士从四川逃到拉萨寻找安身之处。虽然当时在西藏

本土尚未开始进行任何改革，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就引起了许多更大的问题：究竟会对我们的佛教产生什么后果？本土的文化是否还能保存？是否还能按照我们的传统方式来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变革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多少会是太多？多快会是太快？像这样的问题就和一阵阵的狂风一样，在我们崎岖的山脉间旋转着。

有些人是比较开放的——就像我一样——觉得改变可能会有好处，也可能会有坏处，而僧侣们和贵族们却很明了他们的感受，他们不要任何的变动。严重的关头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当时是解放军方面邀请达赖喇嘛到拉萨的西藏军区礼堂去看一个特别安排好的舞蹈表演。有人则认为那个邀请是一个圈套，说汉人方面正在计划把达赖喇嘛抓起来，并且要强迫他去北京。当时，大批群众涌上街头去阻挡他，不让他去出席。反汉的情绪愈来愈高涨，而且进展得非常迅速，由这个小事件开始，演变成了一个大的暴动。不到一个星期，局势就变得很严重了。达赖喇嘛决定逃到印度去。在他逃亡的时候，拉萨市内就大打起来，一个大规模的叛乱就爆发了，并蔓延到其他城镇以及西藏各地区。

当然，那种暴动实在是无济于事，很快就被平息了。贵族们和僧官们大批地逃离西藏，涌向印度北部边境。因为我和嘉乐啦的关系，也因为我自己的有些计划已经开始不堪收拾了，所以我就无法抗拒地被拉进了那个流亡藏人的活动分子群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得立刻辍学。当西藏的难民开始涌进印度北部的时候，嘉乐啦要我陪他一起到阿萨姆的一个难民营去协助我们的同胞。他要全世界都知道西藏人是如何地在中国人的手下受害，他说他需要我协助他去搜集难民们的谈话记录，这样我们就能把他们的故事公之于世。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多的采访难民，把我所得到的数据写下来。我很了解，这样一来，我就要暂时取消我学习英文的计划，不过，嘉乐啦是我所敬爱的人，当我在噶伦堡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就很照顾我，也很器重我。我很感谢他介绍我认识了康明先生，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他。

我们乘飞机去阿萨姆，在慕萨麻利访问了一个很大的难民

营，那是一个靠近西藏边境卓那地区的一个城镇。当我们到达该地区以后，我乘机到处看看，那里的情景令我大为震惊。那里的人好像都非常的惶恐，他们看起来是极度的疲劳，而且老是提心吊胆。很多人离家时走得那么仓促，除了一些可以带着走的随身物品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们住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还要遭受酷热的折磨。他们或是睡在帐篷里，或是用竹子搭成的棚屋里；卫生设备也只有挖些窟窿当茅坑；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少，他们只有一些浑浊的水可以喝，那种水的上面浮着一层薄膜，喝过以后，嘴里会觉得有一种怪味。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沮丧而悲哀。

在嘉乐啦的要求下，我用了大约两星期的时间到每个帐篷去访谈，而且我尽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谈一下。我尽量去搜集有关拉萨暴乱和逃亡者的亲身经历以及目击者的报道，很详实地用藏文记录下来。结果，我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比我所预料的要困难得多。绝大部分和我谈话的人都是文盲，没有任何有系统的或有逻辑性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意思。此外，他们的经验也是不尽相同。有很多人甚至连解放军在拉萨的任何行动都没有看见过，只不过是一些当西藏发生动乱时受到惊吓的群众，而且，他们的故事也只是因为在山区逃亡时所受到的痛苦经验，并不是解放军的残暴证据和实例。可是，我仍旧尽量去搜集资料。当我的采访工作完毕以后，嘉乐啦就把我带到德里去了，我们在那里把资料整理好，并准备把所找到的资料编成报告。我们住在一个素食旅馆里，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把搜集来的故事从藏文记录译成英文。我们把译好的资料和从其他难民营里搜集到的类似性质的目击报道编排在一起，后来，在一九六〇年，就把这些数据送到瑞士的日内瓦去交给国际法律委员会。该会撰成了一份著名的报告，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暴行。可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无人过问，地球仍旧和往常一样继续地运转。至于我自己，也和我原来所计划的理想漂离得越来越远了。不久我又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工作，那个工作和刚流亡出来的西藏人的财产有很大的关联。

一九五〇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局势看来好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大批金银就运到锡金去储存起来。在五十年代，虽然达赖喇嘛自己还在西藏，那些金银则存放在锡金王室的库房里。中央政府曾要求归还那些金银，但当时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等到拉萨暴乱发生以后，达赖喇嘛出逃，他们就宣称那些金银钱财不是达赖喇嘛的私人财产，而是应该属于政府的。就在那个时候，噶厦的官员决定要把那些金银钱财运到离边界更远的一个安全地方去，由于我和嘉乐啦的关系良好，他们就要我参与那项工作。那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

那些金子和银子有的是铸好的钱币，有的则铸成了块状。当我参与工作的时候，那些金银已用人力搬上了卡车，上车的地方是锡金首府甘托克，一直往南开到西立古日，因为在那里才有最近的一个小机场。在那个机场里，价值千百万元的金银财宝全部装上了大科达运输机，空运到加尔各答去。那些财富，后来就变成了维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主要基金。

当那贵重的运输机飞到加尔各答以后，所有的金子立刻就放进银行里去了，那些银子则暂时存放在一位很可靠的西藏商人家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守那些银子就是我的责任。我在那个放满了各种银币和银块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当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守卫。那真是我人生中最奇怪的一种经验。当时惟一的活动只是去把各种小银币熔化成大块的银子。除此之外，就是利用很短的一点时间离开那个房间去吃饭，而最重要的就是留在那里看守着。我曾利用时间做了一点功课，但是做得并不多。嘉乐顿珠委托我去看守那些银子，就是我的真正工作。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终于决定了如何处理那些银子，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不过，我和嘉乐顿珠的关系却未因此告终。

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我发现自己日渐有依靠嘉乐啦的倾向，希望他能给我安排工作。要和他拉紧关系的一部分原因是我由衷地敬爱他，他是我可以交谈的人，我很珍惜那份友谊。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所主持的各项工作都很有意思，让我觉得自己也很重要，居然可以真正参与一些能协助西藏地方政府的工

作。也有一部分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当时我的钱快要用完了。

我那原来打算用作生活费的三千卢比，那时已剩下不多了，主要的开销包括付给康明先生和在北边上圣约瑟夫学校的各项费用，以及我在加尔各答所用的钱。当时我就靠嘉乐啦给我的工资生活。我仍想继续求学，可是，我需要有更多的钱才行。我所遭遇的一个更严重的挫折，更增加了我的窘态。

除了从嘉乐啦那里得到一些工资以外，我仅有的最大一笔收入就是那笔交给洛桑坚赞投资出去的钱。我本来以为那是我留着救急用的。可是，当我和他联络的时候，才发现出了问题。洛桑坚赞非常歉疚。他好像是把我的钱借给另外一个西藏的商人了。他有写好的字据为凭，按照字据上的约定，那个商人同意用那些钱去买印度的货物，运回西藏去卖，因此即可获利。他答应要还我钱，并付利息。按照理论上的推测，那真是个好主意，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却成了一个大灾难。听说那个商人曾经来回好几次做过这种生意，可是，解放军方面终于抓住了他，把他的货物全部没收了。他自己则设法逃回到了噶伦堡，而我的钱却全丢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把那张全额借据交给了我，我还真的把那张借据保留了很多年（六十年代，当我坐牢的时候，那张借据被没收了，永远也找不到了）。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洛桑坚赞是否把实情告诉了我。可我却很清楚自己的情况：我的一切都泡汤了。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是把自己的钱放在很危险的地方，就那样轻易地不见了，我真的是伤心到了极点。当年我费尽心血才攒到那些钱，更糟的是有一部分钱还不是我的，真是罪该万死。当然那些钱中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是我一生中损失最多的一次。那笔钱本来可以保证我在印度读几年书，没有那笔钱，当然就无法继续求学了。当我发现自己处于那样可怜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真是怒不可遏，痛哭流涕，眼看着我的一切美梦都成了泡影。好在我还年轻，应该还有希望，所以我就去跟嘉乐啦谈了一下。他答应尽可能地帮我忙，当然也会有一定的限度。他对我过去几个月帮他做的工作很满意，所以他说，如果我继续替他以及那个日渐扩大

的西藏活动分子的组织工作，他也可以继续付我工资。不过，他的经费也有限，不可能长期供应我求学的费用（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西藏负责人，其实他们的经费相当充足）。他基本上答应给我一个继续工作的机会，以达成他所肩负的使命。

那份差事对我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一直是以做一个又好又忠实的西藏人为荣，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那几个月的工作经验中，我感到非常振奋。尤其是当我想到自己原来只是出身于山村里的平民，现在居然可以和达赖喇嘛的哥哥一起工作，真是光荣极了。可是，嘉乐啦并不能代表那些组成流亡政府的老派贵族们的心态。如果我决定留下来参与工作，我却无法了解我在那些贵族们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问题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真实身份了解得太过清楚了。

我觉得嘉乐啦和他的其他大多数同事们不一样。按照规定，他是西藏的贵族，而实际上因为他的弟弟被选为达赖喇嘛，全家都由平民变成了贵族。因此，他的生活经验就非常不同于那些老派的拉萨贵族们。何况他还到蒋介石时代一个最好的汉人学校去上过学，所以，当时他是我惟一看到的所谓“现代化”的西藏人。他非常向往民主，也待我非常宽厚。我能协助他就感到很荣幸了。在他那个团体当中的其他流亡政府人士却大不相同。他们是老一派的贵族人士和僧官，在他们的圈子里，是用不着我的。我可以替他们跑腿，做些书记工作，可是，我却不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以他们的观点来看，我永远不可能变成他们的一个成员。我还记得，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拉萨暴动的消息以后，在噶伦堡的一个私人住宅里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嘉乐啦和所有的其他贵族以及僧官们都被请了过去，我也就跟着去了。可是，当他们进到里面去商谈的时候，却叫我留在外面。那就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无论怎么说，那边永远会有一道门——一道特权和阶级的门，恐怕我是永远会站在门外的。

那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气愤，其实我跟他们一样有民族的自尊心和各种情怀！我真是伤心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他们

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有些人不信任我，所以不让我知道一些事情的底细，可是，我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我究竟做了什么？在某一种层次上看来，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歧视，却很难直接找得出问题的答案。从另外一个层次上来看，则又很容易明白其中原委，因为那只不过是传统西藏的等级态度。记得有一次在德里的旅馆里帮嘉乐啦把一些难民的故事从藏文译成英文，我们正在讨论用哪一个英文字比较合适时，我猜那个情况使嘉乐啦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突然间开口便说：

“在西藏的社会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吃糌粑的，另一种是吃屎的。”

当时，我似乎明白他是在区分好人和坏人。一直到后来，当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以后，才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中讨论到阶级和剥削。可是，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我才明白那正好指出了西藏旧社会中存在着强烈的阶级态度，而且那种作风一直在继续影响我的人生。恐怕我第一任妻子的父亲当年对我所说的话还一直具有其真实性：因为我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我只能爬升到一定的高度，不论我的意愿和能力如何，也无济于事。我当时尚未准备就去接受那种早已注定的角色。在过去那几年，我一直在思考着：什么事情会在西藏发生？我自己的感觉又是怎么样？我似乎觉得自从共产党进藏以后，那种永远不变的旧式传统社会已不复存在，这项事实是毫无选择余地的。理所当然的问题应该是：将来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记得当我离开西藏的时候，这么想过：如果共产党方面要进行一个全盘化的变动，我可能就不准备回去了。回到哪儿去呢？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故乡变得太过分。不过，我也记得我还存着一个希望：希望那些即将到来的改革不会太过分，却能改善得让大家都能受惠。我不喜欢旧时代的处事方法，也不喜欢旧时代那种限制像我这种人的态度。我跟那群贵族和僧官们不同，我不怕改革。我对中央政府修建的那些道路和学校仍旧觉得非常兴奋。我开始明白到西藏若要赶上现代世界的脚步，还真不知道要费多少年的工夫！而且这条路线还非走不可，因为那会对西藏命

运的影响愈来愈大。因此，即使我对西藏非常忠诚，我也开始害怕那个终于不可避免的选择：究竟要选择那个老家的西藏——意指那个人民仍旧生活在那里的——还是那个在印度的西藏。我是多么地希望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我真不愿意去作这种选择。所以，我努力去借钱，希望能继续求学。

我跟洛桑坚赞和嘉乐啦都谈过，可是他们两个都无法帮我的忙。当时我非常愤怒和沮丧。要是我继续替嘉乐啦和他的同事们工作，我的生活就会很安定。可是，那毕竟不是我想要的。我仍旧认为若要圆我自己的梦想，继续求学才是惟一的路子。我经常和嘉乐啦讨论这个问题，当他明白了我的意图以后，就开始给我施加压力，希望能强留我帮他的忙。他是很聪明的人，我想他一定开始明白我不会同意他和他那些朋友们对西藏未来的看法。不管理由是什么，总之，他一点也不同情我有继续求学的心愿。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必去上学了，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像他和他的朋友们要我去做的这种事情，不需要到学校里去学习。那就是我们互不相让的几个问题之一，有时我们会争得面红耳赤。在那段时期，我们经常见面。我们有时一起去看电影，或上酒馆，无论去哪一个地方，我们都有可能聊上这个问题。有一天，竟然吵得不可收拾，彼此都出过重言，所以他骂我是个不好的西藏人，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可是，我心里想，我真是个好西藏人，而且完全跟他一样的好！

在那段期间，我觉得非常的困窘。嘉乐啦是一个好朋友，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此外，他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我却是来自山区的一个农家孩子。不过，我明白自己的理念，也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甚至于觉得我已经知道理由在哪里了。在我们的旧社会里，西藏人可区分成两种类型——上层阶级和普通人民。这两个团体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处事的方法也不一样，可是，在旧社会里，只有上层阶级的观点才算是一回事。而我却深信，所有的观点都必须受到尊重。嘉乐啦的看法则未必全然如此，尽管他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我觉得我还是有权不同意他的见解，因为我觉得我不但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了整个无声的西藏阶层。我觉得我就

是不能放弃这个观点。如果说那时候我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什么哲学概念，那是不对的。可是，我从前很清楚地看见过一些事情。那些我在拉萨财务局看见的事情，一直让我气愤和失望。一般的人民把他们应付的税和奉献以钱和实物的方式送进来，而僧俗两种官员则各取所需。那里是有账册登列着砖茶、酥油、布匹、金子和银子的数目。我看见过一些账册登记着一些比较有权势的僧侣，尤其是那些贵族人家和达赖喇嘛的家属来“借”一些他们所需的东西，却从未归还过。那里没有总账，也不查账。官员们和他们的朋友们以及家属，都能来任意拿取库存的东西。我亲眼看到他们那么做。我觉得我去给那些流亡出来的贵族和僧侣们做事，就等于把那个同样的旧制度重新建立起来，那也就意味着要协助保留那种传统的态度。而且，那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人就要站在同样的老地方——门外——当“他们”在决定要如何去管理我们的家乡的时候。我不想永远离开西藏，可是我也不想把一切都加以改变。不过，我想可以改善的地方很多，改善以后就可以为普通百姓增加幸福，而且一定会有妥善的方法可以达成目的，不必去毁灭或严重地损害西藏社会里的宗教和民族的完整性。

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可是因为我没有钱，要不是有那么一个奇迹出现，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那个奇迹出现得简直就是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人。

一九五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还在替嘉乐啦工作，住在德里的一个旅馆里，就在那里，我第一次遇见了罗伯特·顿南姆。旅馆里的房间安排，正好让我们住在邻室，很自然地我们就认识了。罗伯特是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父亲是得克萨斯州的富商。他正在利用从威廉姆斯休学的机会旅游世界各地。在德里停留以后，顺路再去东京，打算在那里工作六个月左右后，再回美国进研究院继续深造。我们立刻就相处得很好。他很喜欢听我谈论有关西藏及西藏旧社会的情形，因为西藏当时已是经常报道的热门新闻。我告诉了他有关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从难民营里听来的故事。不久，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把我的有意继续求

学的心愿以及目前的一些困难告诉他。这些事情我们讨论了好几个星期。突然有一天，使我感到诧异的是，他愿意协助我到美国去继续求学。

很多有关达成这项计划的步骤，我都被蒙在鼓里。电话打过了，希望之火点燃了。后来又是好一阵子的沉静与等待。就在罗伯特离开的前夕，他给威廉姆斯学院写了一封信，推荐我申请奖学金，当时并没有发生效果。从那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彼此保持通信，就在那个期间的最后阶段，我接到了通知：威廉姆斯学院决定给我一个巴尔地温奖学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奖学金，听说好像是特别为外国学生设的。很显然地，我当然不必去追根究底，最要紧的就是我知道有关此事的委员们开了会，决定把那个奖学金给我。

然而，当那意外的惊喜平静下来了以后，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更多的困难。我不知道如何去申请护照，也不知道是否准许我离开印度。更重要的是，那笔奖学金并不包括到美国去的那个为数不小的旅费。当时的情况真像是一个残酷的玩笑：我那刚刚点燃的希望看来就要破灭了。好在我的运气不错，让我能一切顺当。我设法从印度政府那里取得了“无国籍”的证明，在该证明书上，印度政府同意我可以回去——那就是一种给无国籍的人的护照。该项证明书让我可以申请到去美国的签证。而且，托尔斯泰基金会同意付我到纽约去的机票（后来我才知道托尔斯泰本人曾经服务于战略工作处，并于一九四三年参加过在西藏的特别任务。我很荣幸地在纽约见到他，并曾当面感谢他协助我到美国来）。因此，我的希望没有破灭。二十五年前，我曾光着身子在老家到处乱跑，在山涧里抓鱼，等待着有一天我能担负起替家里放牛放羊的责任。如今，我即将去美国接受教育，谁也不会知道那种教育将来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六

我的旅程第一段是从德里到孟买，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国内线。然后，我生平第一次坐上的一架波音七〇七飞机，把我从孟买带到开罗，再从开罗到伦敦，途经罗马和巴黎。最后再从伦敦到纽约。大部分飞行都是在大西洋上空。当我发现那架飞机能超过云层那么高的时候，真是感到无限的惊讶。冲破云层以后，又看见了下面那亮丽的蓝海距离得那么遥远。当然，那不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我在噶伦堡住的时候，有时我要飞往加尔各答，也飞到一些难民营地区去过。可是，那些都是小飞机，以前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像波音七〇七那么大的。

那也是我飞得最长的一次。在拉瓜地亚机场着陆那天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也就是离开海士若七小时以后。若从德里和孟买算起，已经旅行了十六个小时了。国际学生办事处的人曾经协助过我，知道我到达的时间，所以派了人来机场接我。他帮我把行李领出来，并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来帮忙的学生。那位学生带我去搭公共汽车，一直把我送到旅馆里去。

在纽约第一次搭公共汽车的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左转右转地穿插于挤满着汽车的街区，我目不暇接地什么都想看个仔细。当时真把我转晕了头，也不知道究竟看见了什么，因为我是从一个很不同的环境背景中来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奇特。当然，大家都知道有关美国的事情，也经常谈论着美国，甚至于在西藏的人也有这种经验，可是，在我的心目中，还真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更不知道我究竟会看见怎样的一个新世界。我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和我从前所见不尽相同的事物上。譬如，光是看见了那么多的私家车、卡车和公共汽车，立刻就把我给吓住了。一群群的汽车，或是平行着开，或是一个跟一个地往前开，看起来就像看见了一群群的鱼在水中游，或一群群的鸟在

空中飞着的情形一样。我对印度城市的记忆是：那里充满了人群——而且比较脏！在纽约，那里的路比较干净，比较宽阔。在街上的人们都比我已往见过的更干净些，穿着也好一点。此外，那么多又高又大的建筑物，当然会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当我搭的公共汽车进入市中心时，那四面八方的摩天大楼让我想起了老家的高山峻岭，高得有时把太阳都挡住了。在加尔各答或德里是看不见这种景观的。

来帮我忙的人把我带到了纽约的基督教男青年社，学生接待组在那里替我预订了住两夜的房间。我在第二十七楼，当我从窗户往外看时，所能看见的就是高悬在空中的玻璃窗，而各大楼的门面是看不到的。我感到无限的孤独与迷惘。在印度，我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西藏人，甚至还能找到乡亲或故旧。我在纽约的头一天真像处身于另外一个星球上。不过，幸而我没有时间呆在那里可怜自己，因为我必须面对现实，设法解决那些实际问题。

我最急切的需要是找一份工作。从九月开始，我在威廉姆斯学院的主要费用已经有了着落。可是，那时只是夏初，我口袋里只有四百印度卢比（约合八十美元），距离开学还有好几个月。因此我必须赚点钱。这里是著名的“机会之地”，我如是推理，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个工作。这样去假定是非常愚蠢的，可是，运气来了的时候，什么也挡不住，而我居然是个幸运儿。

等我把东西在房间里放好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找那两个接济我的人：雷门先生和托尔斯泰先生。雷门先生是国际学生组织的主任，该组织负责接济我并安排我和威廉姆斯学院联系。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他热情地跟我握手，并且欢迎我到美国来。我们谈得很投机，当时他告诉我说，经过他们办公室安排来美国的几千个外国学生当中，我是惟一的西藏人。“我希望，”他说，“你能好好地接受美国的教育。”我告诉他我已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而且要比别人都更努力，因为和美国的学生比起来，我的基础实在太差了。雷门先生非常客气，尽量鼓励我，当我告诉他，我急需找个工作赚钱来维持夏天的生活时，他就给了我一些可能

找到工作的地址。

然后我就去见托尔斯泰先生，他的基金会替我付了来美国的机票。我在他的公寓里找到他以后，立刻就向他表示我实在很感激他的基金会给我的援助。我还送了一条印度领带给他作礼物。他好像很喜欢我给他的礼物，所以很诚心地谢了我。后来他就带我参观了一下他的公寓，还拿出了一盒子黑白照片让我看，那些照片是他从前在西藏拍的。有些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照片拍得非常好看。其中有一张是托尔斯泰自己，当时穿着精致的藏式皮毛大袍，骑马站在帐篷前面，旁边还堆放着各种旅途所需的物资。那些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正在游历中国。在告辞的时候，托尔斯泰先生说：“好吧，次仁先生，我真高兴能帮你一点忙。现在你的家乡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想你需要很多的帮助。”跟雷门先生以及托尔斯泰先生谈完话以后，我心里觉得好多了。第二天（我在美国的第三天），我拿着雷门先生给我的那些地址，开始踏勘纽约的街道。

曼哈顿的市区设计得很合逻辑，虽然走遍了許多街道，也摁了不少门铃，我还是没有迷路。大城市的神秘性和无法捉摸的观念，好像减少得多了。找工作的第二天，按着地址一个接一个地去找，我发现自己到了曼哈顿的西区，大约是在第九街和第四十六街的交叉处。我面对着一栋六层高的红砖公寓房子，那栋房子并没有列在我的地址单上。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停下来去敲门，也许是希望用自己的方法看看能否在那里找到什么工作。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银发女士出来应门。

“哈啰，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她问。

“我叫扎西次仁，是从西藏来的。我刚到纽约，想找一个夏天的工作。”

那位女士面带笑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她说：“我没有什么工作让你做，不过，欢迎你住在我这里当客人。”

她是那么的仁慈，而且还给我一个住的地方，真让我高兴极了，立刻就接受了她的款待。

那位女士的名字是麦克培小姐，那栋公寓房子看起来是一个

大型房地产门下的一部分，现在当作一种寄宿所经营，就像旅馆一样（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麦克培小姐究竟是业主还是经理）。结果我就在那里一直住完了那个夏天（约两个月），每夜房钱只付两元。而且，麦克培小姐从一开始就让我感到很自在。在那栋房子里可供住用的约有四十个小房间，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多个房客了。早饭和午饭我们各人自己去吃，晚饭却是大家坐在一起吃，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围着一张长桌就座。有时是麦克培小姐自己任厨，和我们同桌吃饭，把菜饭传给大家取用。我初到美国的那几个星期对我来说确实相当困难，她的仁慈相助，真如天赐之福。没有她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当时的局面，因为她实在帮了我很多的忙。她甚至还替我救回了一份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我住在基督教的男青年会馆，当我搬到新地方去住的第二天，我就在该会馆的洗衣房找到了一个差事。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六时到下午三时，好像每星期大约可以赚到六十五元。我所做的工作够单纯的了：把人家送洗的东西收下，装包，加上标签。当人家回来领取时，我就去把他们的包包找到，收钱。我也做收存行李的工作，穿着青年会发的特别制服。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忙乱一阵子。你也不能光在那里闲散着。我有七个同事，包括一个匈牙利人、一个拉脱维亚人和我们名叫饶尔夫的主管。他是个粗鲁的人，烟抽得很多，而且老用粗话。

在青年会工作了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位《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来跟我谈话。麦克培小姐已经告诉过他一些有关我的事情，所以他要我告诉他，我早年在西藏的生活以及在印度的经历。我把我有生以来的大概情形告诉了他，在那年秋天，他就把我的故事发表了。不过，我用了不少时间才讲完故事，所以回去工作时就迟到了。我们上下班是用时钟打卡的方式登记时间，当我回去的时候，无法隐藏我迟到的事实（我想大约有一小时）。饶尔夫非常生气。“你干脆就转身回家去吧，”他吼叫着说，“我不要你再在这里工作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只好回家去见麦克培小姐。当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以后，她很生气。因为是她安排那位记者来采访我的，她觉得我

丢掉了工作应该由她来负责。她给青年会的总经理强森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故事的原委以及我为什么会迟到。她真是伟大极了。我记得她甚至还滔滔不绝地告诉那位总经理这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多了解西藏，美国人也应该有知道这种事情的权利。她觉得安排我去和记者交谈是很重要，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就算是因此而迟到了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那就应该让我丢掉工作吗？那位总经理斗不过麦克培小姐，几乎是在她把话说完以前，他就已经屈服了。他叫我马上就回去工作，亲自在那里见我并向饶尔夫解释。“好吧，”他说，“这种事情在美国有时候是会发生的。这回就算了吧——下次可不能再发生了。”

麦克培小姐是我见过的人中最仁慈的一个。圣诞节放假期间我从威廉姆斯回到纽约，因为她曾打电话向我说过：“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到纽约，随时欢迎你来我家。”我接受了她好几次的招待，她决不食言。她永远为我留着一个房间，不肯让我付钱。几年前当她去世的时候，我非常悲戚。她真是一位好朋友。

当我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以后，我还交上了一些朋友，而且能在城里到处去看看。譬如说，我发现达赖喇嘛的另外一个兄弟叫洛桑三旦的就在纽约上学，我还到他住的公寓去看过他。有时我们做点西藏菜饭，喝美国啤酒，谈到深夜。我发现他同意我的见解，我们都觉得西藏的社会制度应当改善，宗教和政治应该分开，而且西藏人应该享有现代化的教育。

我也遇见了一位名叫格西旺加啦的蒙古僧人，他在拉萨的哲蚌寺学习过，在那里获得了寺院的格西高等学位。他住在新泽西州的法明德尔，就在哈德逊河的对岸。他邀我去他家好几次，总是做西藏传统式的酥油茶和羊肉给我吃。当时他有十个弟子跟他学佛。

格西啦对我很有好感。有一天在谈话时，他跟我说：你既不是出家人，在这里又举目无亲，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家。他有意替我安排一门亲事，让我在此有个家。不久我就知道了原来他要给我介绍一位喀尔玛克的蒙古姑娘，带我去见她，到她家去做了一

天客。那位女士名叫巴布拉，她也曾到城里来找过我几次。可是，我和嘉乐啦的长谈的情景仍旧在我的脑子里记忆犹新。我是来美国求学的，将来还要把所学到的用来帮助在西藏的同胞，所以我实在无法同意那种安排。虽然那是他的好意，可是，最后我表明了态度：由于我的计划尚未确定，所以我还不希望去寻求那种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见识了不少事情，在那短短的一个夏天，在我到威廉姆斯去上学以前，还真的认识了不少人。为了赚点额外的钱，我曾利用时间去兜售了一些从西藏带来的小东西及首饰，也去参观了一下自由女神像。我有一个信佛教的朋友，名叫佐治，我到格林威治村去看过他。我参观过博物馆，特别欣赏那里的画，那些画来自“各门各派”。事实上我对那些新潮印象派的画，印象尤其深刻！在夏天完结以前，我去看了一次百老汇的表演，到过一個很有名的夜总会，叫做拉丁区，也看了几部美国电影，其中包括《飘》。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联合国的所在地。我真高兴能就近去看个仔细，因为就在那个夏天，赫鲁晓夫抨击美国的政策，为了强调抗议的动作，还特别把鞋子脱下来敲桌子。经我亲自实地察看过联合国大厦以后，对于赫鲁晓夫所表演的姿态，就很容易了解当时所产生的效果了。那年夏天，我也乘机到帝国大厦的顶层去了一趟。在那么高的顶层看见的景观，当然令我叹为观止。不过，那种景观也让我想到当年修布达拉宫的建筑人员的丰功伟业。帝国大厦是比较高，可是，布达拉宫是几百年前用手工堆砌而成的，当时还没有现代的科技和建材可资利用。想到这种建筑工程，不由得让我感觉到西藏目前是多么地需要进行现代化，当然，我们也应该对自己光辉的传统文化和成就感到骄傲。

九月初，有一位住在纽约的同学开车带我到威廉姆斯学院去。正巧那位开车的就是我的新同屋，他叫史提夫。到达学校的时候，我又见到了老友罗伯特·顿南姆，而且马上就住进宿舍去了。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结果是比我想像得困难的

多。

到校后不久，我去见学生部主任。他问了我一些问题，也问到打算选修些什么课程。我告诉他我要选哲学和经济学，可是，正式开课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力不从心，而且很快就困难重重了。事实上，我有一阵子几乎觉得无法跟上课堂里的进度。我只学了几年的英文，有一部分时间只是跟着康明先生转转而已。我真的还未曾超过“磅切先生”时代的英文水平，当时我的英文程度曾让在大吉岭圣约瑟夫学校的同学们取笑过，现在我的英文能力也好不了多少。而今，我竟被扔进了一个大学程度的课堂里和一些学识优良的美国同学为伍。虽然我听得懂教授们所讲的大部分内容，要把笔记做好却非常困难，而且指定要读的数据那么多，真把我烦死了。像我这样英文程度低劣的人，实在无法应付那么多应该研读的数据——多数都是高度深奥的。

我像疯子一样地用功读书。我的同屋及朋友们当然也很用功，但他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约会，去找朋友玩。我除了去找我的朋友罗伯特·顿南姆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不出去。此外，别的我什么都不做，就是读书。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过了半夜以后才就寝。我找了一个人替我补习，以增强我的英文读写能力。不过，用我现在的目光来看，我当时显然是想在短期内完成一项不太可能的任务。如果我那时比较懂事，或者比较有眼光，可能就不会那么蛮干，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不自量力，后来反而让我感到高兴！我不顾一切地埋头苦干，尽力而为。那些交给老师的作业，持续不断地退了回来，上面布满用红笔改过的错误，连我当初所写的原文都看不清楚了。我选修的课有英文、历史和经济，得到的成绩从未高于丙等和丁等。我并不气馁，因为大家都曾尽力帮忙（替我补习英文的是主任自己给我找的——他的儿子，免费）。虽然我的成绩很差，还是学到了一些理念，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

在历史和经济学的课堂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洲中世纪史、法国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在我开始研读中世纪史时，得到了一项启示，当我开始想到中世纪时代

的欧洲——关于那些大教堂、寺院、封建制度、拥有全部土地和权势的贵族和僧侣，以及那种政教之间的紧密关系——我就看见了和我幼年时代的西藏社会颇有相似之处，因为西藏的旧社会也有神权政治，而且基本上也有封建制度。让我震惊的是，我因此而发现了西藏贵族与农民之间有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鸿沟，由极少数人控制着土地的权利，宗教领袖和政府的首领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凡此，我和全部西藏人本来都以为只是西藏才有，如今才明白那并不是西藏所独有的现象。今日伟大的欧洲国家，从前也有点像西藏一样。可是，他们竟能加以改善，终于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

一般来说，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大部分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相当清楚，对我却是一种特别的启示，因为我一辈子都以为西藏的固有生活方式是我们惟一可以遵循的，传统的神权政府也是惟一可能的政治形态。又因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文化，紧系得牢不可破，我一直就认为：若不能以绝望的心态去撕毁我们的宗教组织、民族文化以及种族的认同，我们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革新。可是，现在我发现还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典型。很多欧洲的社会经过有效的革新，已变成了强而有力、可与其他国家匹敌的现代化国家，却并未严重地损害其固有文化、价值观，或是基本的民族性。因此，我的新希望便油然而生，希望有一种类似的改变也可以在西藏发生，我并不太担心我这种希望改革的念头是否会让人家说我不忠，或会不会起一种破坏的作用。当时我好像渐渐地明白了，那种由神权和封建的社会转化成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历史上一种很普遍的趋势。当然，那种认识并不是在一瞬之间就能形成的，那是一种继续不断的成长过程，我所选修的那些课程就是关键。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我读得愈多，就愈能萌发各种念头，开始去考虑西藏可能会有的前途。

一九六〇年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理由很多。那是总统大选年，肯尼迪和尼克松参与竞选。我和大家一样也特别注意选情。那是我初次接触到美国政治的运作，和当地的公民一样聚精会神地看他们的辩论会。我记得当时我就觉得尼克松输

了，最少是在第二轮的辩论上，因为肯尼迪问了他很多问题，他竟无法提出答案来。当然，有很多他们讨论政见的细节我并不知道，不过那些大一点的主题我是很清楚的。我主要的心得是看那种表面上的戏剧——有人性的戏剧——那就够刺激的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对那种辩论观念的本身，感觉到既兴奋又惊讶，因为那种公开辩论和自由交换意见的精神是非常不同于我所习以为常的经验。在这里，重要的人物当众讨论——或互不同意——关于什么是对美国及其前途会最好的意见。在我自己的家乡，不管是现在或过去，都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当然看过在印度的民主选举，却从未见过有人用这种辩论和自由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表达民主的精神。我认为那是难以相信的事情。虽然我在课堂上看书看得很慢，写的东西也不完善，可在威廉姆斯那两个学期，我所读的书以及发生在我周遭的事情，已经打开了我的视野。第二年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时候，我对政治就有了彻底的醒悟。

在威廉姆斯念完了第一年以后，我就到西雅图去了，原因有好几个。其一是因为我在威廉姆斯学院只有一年的奖学金。另外一个原因是我那些在威廉姆斯的朋友们都在替我担心学业上的困难，我曾尽力想要赶上那些美国同学的进度，可是我的教育背景和经济支持都不足以维持我在那里继续下去。我们考虑的结果，都认为在华盛顿大学继续求学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因为那里有一个大规模的西藏研究计划。那里可以提供我主要的生活经费，而且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小西藏社团，那就可以让我比较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所以，在一九六一年的夏末，我在纽约搭上了长途汽车，旅行了三千英里，六天六夜以后，就到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我搭长途汽车是因为在我离开纽约以前，曾向麦克培小姐请教，问她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可以看到美国，尤其是要能看到以农业为主的广阔地带。“扎西，你当然必须搭长途汽车，”她回答说，“你真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好奇的人。你总是在找一些新的资料来了解美国。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经常都不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当

作一回事，有时还不去珍惜它。你是从一个有大变动的地方来的，我想你会觉得你所看到的都有价值。”我很高兴接受了她的建议。

首先我对公路本身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从未见过比美国公路更好的道路。美国公路的宽大让我感到震惊。有的是四线道，有的是六线道，车辆可以同时双向进行，时速七十英里，有的还开得更快。美国的公路四通八达，既方便又经济，即使是最普通的家庭和广大的群众都可以利用这种交通设施。

长途汽车变成了旅行之家。我们在预定的车站停下来睡觉和吃饭。当我们穿过中西部的农业地区时，那里的土地特别肥沃，我对那时看到的农场和耕作的情形很感兴趣。我看见了农场——有的其大无比——和很多牛，可是羊群却远比不上我们村子那边的西藏高原的那么多。就像在纽约城一样，我对那么多的机器和高楼大厦感到震惊——在这里却是拖拉机、小型收割机、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巨大的牛棚和仓库，以及灌溉用的机器。而且让我惊奇的是几乎就看不见真正的农夫，在田地里工作的人很少。我想当时我觉得最奇怪的是，看不见大批的农夫以及在田里工作的人，因为和我从前在西藏和印度所看见过的完全不同，也因为那种现象证实了我在课堂里读到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像美国这种农业先进的国家，只需要少数农业人口去生产就足以供应全国甚至全世界所需的粮食和农产品。可是，在农业和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全部人口当中即使有大部分的人都在田里耕作，也难以供足本国人的所需。我心里想，这些理由足以说明西藏非现代化不可！

当长途汽车开到了堪萨斯城的时候，我停下来去参观了一下蔡培修道院。该院距离堪萨斯城只有几里路远，里面有七十位完全静默的僧侣。他们一起在寺院的农场里工作，用自己的劳力来维持大部分的日常所需。僧侣们同在一个大食堂里用膳，遵守着很严格的静默戒律——连用膳时也不例外。我是被史坦雷神父邀请到寺院里去的，他对米拉日巴的传记故事很能领悟。米拉日巴是十一世纪时的一位西藏隐士，他以静坐终其一生。史坦雷神父

把这段故事告诉了我，让我非常高兴，而且让我再一次觉得，采纳了麦克培小姐关于参观美国的建议，真的给我带来了乐趣。

当我最后终于到了西雅图而且找到了华盛顿大学的时候，特瑞魏理教授以热烈的欢迎接待我。他告诉我他希望我在这里能找到一些西藏老乡，比较有个照应，就像是在自己的家乡一样，不会再像我在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样，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我比较有在自己家乡的感觉了。大学里的远东研究系给了我一个奖学金，也给我找到了一个暑期工作，由我负责把藏文的宗教仪典文献翻译成英文。

秋季学期开课时，我选修了远东史和西藏史。在后来的一年半内，又选修了政治学和哲学。这回我在学业上的困难少一点了，而且我的成绩也好得多了。

我再一次接触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头一次我是在威廉姆斯学院读过一点，现在我也读一点毛泽东的著作。我从前并不是而且现在也不是一般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不过，我被他的哲学理念吸引住了，该理念是主张让农民和工人有更大的权力和机会。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的历史循环或阶级的概念，他们认为宗教有时会用来奴役或妨碍普通的民众，也认为大部分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在历史上都发生过革命，而且那些革命都有其重要性。我研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是关于马克思因政治见解而遭遇到的困难——各种政府对他施压的方法以及他被放逐了一段时间的原因。在列宁的传记里，我对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工人们如何起来推翻沙皇那部分特别着迷。我也记得一年前读过的法国大革命，农民们如何把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简而言之，同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的重要性和各种事件发生时的暴力行为，那种暴力行为对我来说是有点可怕。

就是在这段时期，我想我真的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式的、“现代化的”西藏人。我已经不再被那种只顾自己利益的宗教意识所蒙蔽了。那种宗教意识很有效地掩护着少数一部分宗教和贵族的名流人士去完全控制着广大的穷苦农民，而且还阻挠着一切

的改革。我认为这也该是在西藏发动一种革命的时候了，当然，我并不希望出现我在书上读到过的那种暴力或流血事件。可是，我却无法想到在我们那种旧式的社会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改革开始发生。再者，中央政府正要把各级政府组织在西藏建立起来。虽然我还在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以及他们长远的意图，却也开始考虑到，也许在过去这十年来，西藏所经历的过程，可能正好借着中国共产党的入藏，解决了一些西藏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已经替我们发起了革命。他们已经把旧日的护法人士和剥削人的机构消除了，而且让广大的群众参与政府，这在西藏的历史上还真是头一次。在华盛顿大学一个学期接一个学期很快地过去了，我的脑子里也充满了这些杂乱无章的意念。

为了维持生活，我在夏天找了两份工作。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大学的食堂里工作，另外一部分时间我在一个叫红手的酒馆里当帮厨。我利用剩下的时间用藏文写了一本书。把东西写下来可以帮我澄清自己的思想，因此，我才决定把我对美国的印象记录下来。我并没有去做真正的研究工作，我只是把来到这里以后的见闻以及心里所想到的事情表达出来。我谈论到许多有建设性的事情。我觉得像那些真正的财富和物质上的东西，美国真是人间的天堂。我从未见过别的地方会有这么多的真正财富，这里多的是物质方面的享受，而且工作的机会又那么多。我写到我在这里遇见的人是多么地开朗和慷慨，而且在美国的文化里比较没有阶级的意识。我谈到这里的识字率很高，谁都可以到学校和图书馆去，让我最惊叹的是教育的普及，不分阶层和年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我并没有全部画成一副充满建设性的图画。美国的六十年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而又充满动乱的时代，随着时间的进展，局势变得更加严重。我看到什么就记什么。我写了种族间的问题，以及黑人在美国社会里的情形。要是说美国是一个拥有极其丰盛物质财富的地方，那也就是一个高度唯物主义的国家，我常常认为他们真是太过分了。我尝试着去记录我对离婚率的感想，很多和文化有关的暴力事件，以及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凡

此，随着六十年代的时序前进，引起了更多社会大众的关注。当我写完了以后，就把文稿寄到印度去给我那些流亡出来的同乡。那本书一九六三年在大吉岭出版了，书名为《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看法》，是以藏文出版的。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真正看到那本书。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主要是在说明我那年夏天里很慎重地在思索着一些问题，同时我在那段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远比所得到的答案多得多。

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当然是我要做什么？我只是坐在那里想些抽象的政治观念，或是去尝试一下如何决心奉献自己去协助自己的家乡？我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这些都不是容易的问题。

正当那个时候，我个人的生活也起了变化。在过去那一年，我在西雅图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西藏女子，并且喜欢上她，可她却和一位西藏的出家人发生了关系，并怀孕了。那个出家人拒绝和她结婚，于是，一个可能变成难堪的丑闻就隐约可见了。那个女子名叫萨迦泽青旺姆（她是萨迦氏族家里的人）。当事情一直拖延着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沮丧，想要自杀。我对她十分敬重，很怜惜她，所以，当她的哥哥问我是否愿意当孩子的父亲而跟她结婚的时候，我就答应了。婚礼是在西雅图的景县法院里举行的，当我们宣誓的时候，我把一个钻戒戴在她的手指上。几个月以后，孩子就在我工作的那个医院出生了，我当时是在医院的食堂里当洗碗工人（我还用了一些工作赚来的工资去支付医院的费用）。那是一个男孩子，长得很好，她为他取名索南次仁。虽然那不是我计划出来的结果，我突然间发现自己陷进一个很严重的关系里了。泽青啦和我很快就动了真情，相互体贴，可是，加在我身上的负担也就变得很重了。如果为了我刚下的决心，要把自己奉献给西藏而采取任何行动，我必须立刻就干，否则就不再可能了。我很明白如果我在那里再多留一会，就会无法自拔，也就不可能再回到老家去了。

当我把过去的事情回忆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人生中有三个转折点，也就是下过三次影响很大的决心；第一次是决心离开西藏

去印度，第二次是决心扔掉在印度那种比较稳定的生活到美国来；而第三次也是最困难的一次是决心抛弃在美国的安定以及在物质上的舒适而回到西藏。我的良心告诉我必须走。我越想越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进入，正好给西藏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改革机会，我也愿意去参与改革的工作。我知道那些不喜欢我的见解的西藏人绝对会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一分子！我知道当我只是为了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让一些流亡在外的西藏同胞失望过。这次又要回到“中国的西藏”去了，那一定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跟我亲近一点的美国朋友也认为我回去是发了疯。他们不懂我为什么要抛弃在美国那种既安定又舒适的生活，他们很害怕（结果证明他们猜得相当对）我可能会在中国遇到危险，很可能会被视为美国的间谍。要决定去做什么已经变成了一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几乎是与日俱增。

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之下，肯尼迪总统帮了我下决心的忙。当然，他是不可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的。不过，有一本我在美国读过的书就是他写的勇气论。我永远记得书里面的一句话：“应该做的就做，不要怕困难、阻碍和危险，那就是人类的美德。”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想那句话的意念立刻就跳进了我的脑子里，和我当时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因为自从来美国以后，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那种范畴里思索。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那句话就在那个时候显现在我的脑海里，鼓舞了我的勇气。在很短的一点时间之内，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朋友嘉乐啦，在信里告诉他关于我的决心，而且尽量在信里把我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虽然他是流亡政府和旧制度的一分子，我觉得他至少也会了解我所想做的事情，他也许会有开放的思想。我告诉他西藏应该现代化，而若要进行现代化，那种旧式的宗教政体就必须结束。现代化是不可能在流亡政府体制内发生的，所以我向他解释说：如果我们真想要实行现代化，我们就非得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才有成功的可能。这些话本来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可是我仍旧继续告诉他，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我已经决定了要接受共产主义制度，因为只有如此打算，才可能有机会把我所受的教

育用来帮助西藏，使它变成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家园。流亡在外不能满足我的心愿，我觉得能帮助自己故乡的惟一方法就是回去，我必须回到那个高原地区去和自己的同胞重聚。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当我离开西雅图时，心情非常沉重。那时，肯尼迪总统已经被人刺杀了。美国正处于震惊与哀悼之中。当时在越南的情势仍只是天边的一朵小云，后来才日渐嚣张起来。真是一个不吉利的时代。

要跟泽青啦说再见，还要抛弃索南，真是难过极了。在离开以前，我到每个朋友那里去道别，有的仍然不敢相信我真的要走。“他才三十出头，充满了活力，而且在美国勤劳奋斗，相当有成就了，而现在竟要回中国去？”有一个朋友这么说。“多珍重。”他们都这样提醒我。魏理教授问我就这样回中国去是否对得起达赖喇嘛，而且我将来又不能把所受的教育直接供献给他。那当然是问题的关键。若要协助我的故乡，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参加那个流亡政府，和他们共同努力。可是，这几个月来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走那条路线。我当时所能跟魏理教授说的就是：经过长久思考的结果，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认为我要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过，我会永远记住大家给我的帮助，让我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离开西雅图的时候和我来的时候一样，都是乘灰狗长途汽车。我这回离开的情景，有不少原因让我伤感，尤其是未来的前途又不可测，别的问题就更用不着说了。虽然如此，那次旅行却是我在美国最好的经历。与其像上次从纽约到西部那样只用了六天六夜，这次我却打算用一个月来旅行。我计划得非常周密，为的是要去参观几个美国的城市和拜访一些朋友，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可以沿途在美国人家里寄宿，因为有些美国家庭愿意接纳从外国来的旅行人士在他们家里寄宿。

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安排好了和嘉乐啦当面交谈的机会。他正好在美国，住在旧金山的马可哈普金旅馆。我乘的长途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美国太平洋海岸线，一直往南开，旧金山是第一个要

停下来的大站。当他知道了我的计划时，立刻就和我取得了联系，于是我们就约好了要见一面。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到了旧金山。旅行社规定可以在那里停留几天，我就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来，用了两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和嘉乐啦交谈。有时是在吃饭的时候，有时是在他旅馆的客厅里，也有时是为了避人耳目，就在他住的房间里——那是当我们交谈的气氛显得很严重或很激动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收到了我的信，当然也知道他不会同意我的论调。虽然我很高兴能见到他，可是也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因为我并没有期望那么快就会和他面对面地接触。我的观念和决心在当时来说是新萌发的，尚未完全成熟，我知道会很难应付他的反对意见。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去谈一些琐碎小事；那次和他交谈是我们谈得最长、最坦率的一次。那次交谈发生在我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虽然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是那么的痛苦和困难，那却是非常有意义的经验，因为那种讨论的过程帮我继续不断地澄清我的思虑。那次见面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直到现在我还能把当时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嘉乐啦的论点非常高明。他知道我对旧社会迫害大众的事实有何感想，在九月间他曾寄了一封信给我。在信里他表露了要与比较激进的以及一些老派的西藏流亡人士分离，却又很难，而且非常痛苦。当时他曾暗示我们——他和我——代表着年轻一点的、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像我们这种人就必须担负起和中国共产党对抗的责任。他认为我的决定做得不好，他想要说服我，劝我回到印度的西藏社区去。那时，我们在马可哈普金旅馆的会客厅里，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他开始用最严肃的词句陈述他的见解，慢条斯理地说明他的论点，非常郑重其事。

首先，当嘉乐啦谈起目前西藏的流亡人士在印度的情形时，他显得很得意——几年前我曾协助他记录了很多难民的困境，现在他们的环境和生活都好多了，他这样告诉我。有一个信托管理机构已经为他们建立好了。达赖喇嘛的一些金子已经投资在印度的工厂里了，那些工厂是属于西藏人的。从工厂里所获得的利润

就用来维持难民营以及他们的教育经费。

嘉乐啦说西藏难民营地区已普遍地进入了完善的状况。年纪最大的那些人当然是最难安排的，有些人已经迁移到别的国家去了。不过，成千上万的人被安顿在迈索和马迪亚普瑞德西等地区。至于儿童们，任何国家都把他们当作未来的主人翁，他们的现况就更好了。他说，在印度的西藏人当中大约有一万一千名儿童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其中约有五千名已经在各种学校里读书，那些学校有的是由印度政府设立的，有的是由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他承认要教育全部那一万一千名儿童，确实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可是他非常乐观，他觉得那种工作是可以做得了的，他对将来的成果抱着无限的希望。他很得意地说，这些新教育出来的儿童将来就是“下一代的领导人。他们是未来的医生、律师、技术人员和教师。即使他们永远回不了西藏，他们也将成为有高度成就的西藏社团在印度的核心人物。同时，当我们等待着是否可以回到西藏去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替印度政府贡献力量，因为印度也需要这种有价值、职业性的年轻人去服务社会。一切都会很好。你将来一定可以看得见。”

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变了一个方向，我很能体会到那种转变会即将发生（当时，我们已经退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以免引起人家的注意）。他终于直截了当地问我究竟想要做什么，我也就断然地告诉他，我已经决心不去为印度的西藏噶厦工作，我正在慎重考虑要回西藏去。我说我觉得那一小部分住在国外的西藏人无权代表仍然住在老家的大部分西藏人。

“我们绝对有权代表西藏，”他很快地接着说。“我们代表比百分之十还强的全部人口，而且我们不是自愿离开自己的故乡，我们是被中国人赶出来的！”

“不对，”我也紧接着很快地说，“若是我去为一小部分的西藏人工作，而他们又无法直接和大多数仍住在老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管辖下生活的西藏人接触，我的心里就不可能会有公平的感觉。”

嘉乐啦当时变得很气愤，所以，话也说得很厉害。

“扎西次仁，你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如果真的想要回去，那些你要面对的各种困难，简直就会超出你的意料之外。有一件事你要知道，汉人是世界上最会怀疑的人。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他们都不会信任你的。我在汉地住了很多年，很懂得他们。我亲眼看见过他们的行动。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从前如果愿意跟他们合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在他们建立的政府里获得一个很高的位子。毛泽东真的邀请过我去北京。他们对我那所谓的左倾思想非常鼓励。可是，如果我真的信任他们，我很明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简直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后你将会被中国人利用。他们不会杀你，他们会利用你！”

我当时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就往窗外看，只见那浓浓的雾正从浩瀚的太平洋上弥漫过来，渐渐地笼罩着整个湾区。嘉乐啦变得十分激动，便站了起来，一边讲话，一边在房子里紧张不安地走动。房间里显得非常沉静，那时，我可以听见他每一步因愤怒而踏着地板的脚步声。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太不友善了，突然又坐了下来，而且改用了另外一种计策。

“我必须告诉你，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你所作的决定并没有真正的反对意见。其他有些你我都认识的西藏人可能会感到很震惊，而我却不会。你那种想要再回去的念头，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令我钦佩。我们谁都不会否认，若要拯救西藏，就免不了要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和挑战。不过，我劝你要衡量一下我们——流亡政府——已经达成了多大的进步。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之下，我们的组织已比你最后一次在印度的时候要好得多了。三年前，当难民营住满了人的时候，我们以及其他同胞们都显得毫无秩序，那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够，只有几个受过教育的人协助我们，我们简直就不知道如何去应付那突如其来的流亡情况。达赖喇嘛虽然人在印度，他的感情却未曾与我们的同胞疏远。他用了很多自己的钱财去协助重新安置他们，开始训练他们面对未来。我们尽力向国际社会陈诉实情，现在开始有了进展，而且印度政府将继续协助我们，一直到达赖喇嘛自己能够回到西藏去为止。请你考虑一下：若要帮助你的故乡，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目

前所做的事业。”那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诉求。而且，他还做了一个更强而有力的推动手势。

他要给我一份工作，让我在印度当西藏之家的主任——薪水相当好。他告诉我，西藏之家将来的计划是要成为一个可以保存西藏文物的博物馆，同时要成为一个贸易中心，负责销售西藏的产品。这有双管齐下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西藏民族和文化上的传统，另一方面是要促进国际贸易，销售西藏人做的东西。当嘉乐啦描述完了这项计划以后，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诗人，富有充足的想像力。要是你接受这个职务，他说，“你的成就不但会让达赖喇嘛赏识，也可以让你在英国的朋友们知道，他们都会以你为荣。他们过去都支持过你的教育，现在能看到你有成就，当然会感到骄傲。我希望你能慎重地考虑一下这份工作。”这是他的总结。外面的雾是那么的浓，我当时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白色的棉花呈现在我的眼前。往窗外看就像在注视着云层的中心一样。

虽然他已经把那诱人的意图描述得很周到，可是，我知道我不能给他一个他所期望的答复。我当时就顺势表达了我自己的意见。我说，只要我可以不和流亡政府发生任何的关系，我就愿意尽力替自己的同胞们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流亡政府的努力方向只代表那些老派的保守人物，而不能代表穷苦藏族大众的利益。我接着又告诉他我要为自己而奋斗，也要为整个西藏奋斗——不只是为一个比较小的流亡团体。

嘉乐啦的反应非常锐利而且毫不迟疑。

“为西藏人做的任何事情都要经过神圣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你要做的工作和他是分不开的。而且也不会有一个分治的西藏。当你说你不要为流亡政府工作，那么，你是否也在说你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你的领袖？”

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说：在西藏以外是毫无选择的，西藏人只有跟随着达赖喇嘛。

“那就好了。”嘉乐啦又开始走动了。“达赖喇嘛要我告诉你：要是你心里真的是为西藏人的最大利益着想，你就应该回印度来

和你的西藏同胞一起工作。不过，他也希望你明白一点，在必要的时候，即使没有你，我们的工作还是可以进行的。别的人也同样可以贡献力量。”然后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选择——到纽约市的西藏之家去工作，最少要在那里工作两年以后再调职。我说我必须很慎重地考虑一下他的这种安排。我很明白这种决定会影响我下半辈子的人生道路，所以，一旦下了决心，就希望永不后悔。我说：我觉得我的决心不但会影响我个人，也会影响到我将来可能从事为所有西藏人贡献力量的途径。听了这些话以后，嘉乐啦立刻就勃然大怒。

“那真是可笑极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发出了闪光。“你完全不是在为西藏人着想。你只是在为你自己着想。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个性。等到事情发生了的时候，你不可能是中国人的对手。你的勇气是有，可是，你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能力可以帮助别人？请原谅我如此直率。”

不一会儿，那股突然冒出来的怒气又消失了。其实那也就是我们辩论的终点。我看得出嘉乐啦已经觉得他自己有点太过分了。我知道他对我的真正感情和尊重已经把他的怒气消除了，所以我也颇为感动，而且愿意言归于好。

“我们的意见不能完全一致其实并不要紧，”我说这话时有点激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交谈。真的，你的心胸非常开阔。你从未有禁止我回去的企图。从前你帮了我很多忙，我知道你现在还是想要帮助我。因此，请你相信，我是很感激你的。我也很珍惜能有机会如此自由地和你交谈，而且还能把心里的想法如此坦白地告诉你。很少有人能跟我用这种方式交谈。”我把这些话说清楚了以后，他也用很友善的态度对我，不过，我想我们彼此心里都很明白，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将会永远站在相反的立场。他的忠诚是对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我的是对仍在老家的西藏人民。当时已经相当晚了，我们彼此都已精疲力竭了，所以，我们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的谈话就轻松一点了。当一顿为时颇长的早餐结束时，晨雾已散，日光显得格外明朗。我们再一次到大客厅里去坐

在那舒适的沙发上。那时候已经听不到强烈的词句了，我们比较平和地彼此交换意见。我试着向他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他没有生气，可是，他有点厌烦地告诉我，要我当心被愚弄，说那些道路、医院、学校，都只是为了做宣传用的。“他们对西藏并不关心，”他说。我告诉他我听说有为数三千新训练好的藏族技术人员回到了西藏，而且他们都是在汉地接受训练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他摇着手说，“被训练成为政治上的领导人员。”

我换了一个话题，试着去告诉他我研究西方历史学家及哲学家的方法，以及他们对我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他很认真地听着，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地说他并不完全反对共产主义。“原来的理论是好的，”他说，“但是，虽然我可以很容易地和美国以及印度的共产党交谈，却很难和中国以及苏联的交谈。”当我正在考虑着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时，他突然间直接地注视着我。

“既然你的感受很明显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许最好你就回西藏去。然而，我们却永远不会向中国政府投降。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为我们自己的事业奋斗，同时也要尽量给中国政府增添麻烦——尤其是在联合国这方面。”

“你真正想要达成的任务是什么？”我问。

“我想要把西藏变成一个中立国。”他很认真地说。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确实感到很惊讶。我从前一直没有听到嘉乐啦这样谈论过。经过一夜的激烈争辩，以及这些有协调性的新论调，我们又长谈了大半天。

午饭后，我们到他的房间去，还是有心继续谈。可是，离别的时刻已到，我们两人心里都很清楚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们渐渐地侧重在谈些没有争执的话题，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他说，“多多保重。我希望能到印度见到你。无论如何，都要尽快让我知道你最后的决定和计划。”

我抱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我自己的旅馆房间去，顷刻间我的意志变得软弱无力了。想不到我对嘉乐啦的情感会那么深。我当时很难对付自己的情绪，远比对付他那些强力的论调还难。我相

信他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感，让他看不见中国政府从前为人民所做的真正好事，也看不出将来可能做的好事。我知道他以为我终究会变成一个在中国政府里“唯唯诺诺的人”，然而，我却觉得他没看出那些流亡在外的藏人基本上在印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们自己已经就是“唯唯诺诺的人”了。不过，理智是理智，感情是感情。在我当年的日记里，我那天晚上写着：“在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想得更清楚一点，而且要按照原则来下最后的决心，而不只是感情用事。”我想能帮助我保持坚定意志的还是嘉乐啦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意味深长地谈到孩子们是我们西藏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将是未来的医生、律师、技术人员和教师，”他当时这样说过，“即使他们永远回不了西藏，他们也将成为在印度那里很有成就的西藏社团的核心人物。”那些字句，我一直无法忘怀。嘉乐啦可以接受未来的西藏人可能必须永远在西藏以外居住的事实，那可能是因为他出生于青海藏族地区，而不是在西藏本土之内，或者，也许是因为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可是，我却不能接受那种观念。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那里的山脉、河流、多石的景色，以及村庄，都是我孩提时代就认识了的。别人的山脉和村庄总是不一样的，任何替代物我都无法接受。虽然当时我是那么的心绪不宁，而心里却已认定了回去是我惟一的答案。

我认为和嘉乐啦会面的时间能安排在我乘长途汽车旅行的开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尽管他的言词和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硬，对我的效应也会因时间的关系日渐消失，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盼望着看见新的景物，兴奋地增长新的经验。我自己的信念虽然受到了打击，却没有被消灭，现在又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茁壮成长，变得更为坚强。我离开旧金山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们的第一站是停在洛杉矶。在往南走的旅途中，那些沿岸的山脉以及内河流域的农耕地带，使我回想起自己的故乡。到达以后，我第一夜住在一个对于招待外国访客颇有经验的人家里。

在那以前，我所有的旅行经验都只是欣赏沿途的景色，而这次旅行却有机会仔细观察一下美国人生活的步调及家常细节——普通人的生活情形，而且非常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到的时候正赶上了圣诞夜，真高兴能看着他们用传统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也参观了著名的电影制片厂和好莱坞运动场。不过，我也很有兴趣听听接待人所乐于谈论的事情。即使在这种年节假期当中，大家还是在谈论着最近发生的肯尼迪总统被刺而死的事情，谈论着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及政治上的种族问题，因为那种问题已经开始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了骚扰的作用。甚至在吃着传统的火鸡大餐当中，他们家的那些人还是不能完全忘怀那些严重的问题。我过新年的地方是在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那是美国的赌博之都。顺便我还加入了一个旅行团去参观那个壮观的胡佛水坝，印象非常深刻。在科罗拉多温泉城，我去参观了空军学院的校园。

乘长途汽车最大的好处就是速度——很慢，所以，我不但有足够的时间去游览美国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思考。有一部分的思虑是很痛苦的。当我想到我那留在西雅图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心里就会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否值得如此顿下决心，把一切都抛诸脑后！所有嘉乐啦说的话以及所影射的意思都会让我焦虑，在那个旅行当中能有时间用来思考，对我的焦虑大有裨益。我用了些时间去想得理智一点，离开了他那强大的势力范围和友谊的影响，我又重新对自己的决定有了信心。

长途汽车继续向前滚动，我参观了芝加哥。在那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科学博物馆以及为哥伦比亚博览会而建的其他大楼。此外，还看了很多工业厂房，尤其是那些钢铁工厂。我们经过纽约州的水牛城，参观了附近的尼加拉瓜大瀑布。我们也在麻州的波士顿及康州的新港停过。在那些地方我参观了著名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耶鲁大学的校园。最后，我们弯到华盛顿首府，再转回到纽约市。

在纽约，我的朋友罗伯特·顿南姆和往日一样地支持我。我们长谈了好几次，他告诉我说：“你回去帮助你的西藏同胞是一

件很好的事情。”当我在哈瓦那等船去中国的时候，我给嘉乐啦写了一封长信。在那封信里，我再一次说明我下决心的理由，写得比较完整和具体。他的回信写得非常强硬。他的反应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这样写着，“要是你愿意为西藏以及西藏人的利益努力，我们认为是一件好事；要是你去为中国政府的利益努力，那就很遗憾了。”托尔斯泰先生寄过基金会的钱给我，让我能顺利来到美国。他也写了信给我说：“你必须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性，而不要听从那些共产党里面的野蛮人。”

虽然各种不同的声音还在继续传达着，可是我知道木已成舟。我北上到达蒙特利尔，在那里等了两个星期以后才乘船到古巴的哈瓦那。我在华盛顿首府的瑞士大使馆获得去古巴的签证。在哈瓦那的中国大使馆，我和那里的三等秘书谈过，并且申请了回西藏去的许可。经过两个星期的等待，我的许可就批准了。于是，我便乘船到广州去，其他一切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七

航行的路程好像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乘的船离开古巴，渡过加勒比海及南大西洋，徐徐地驶过地中海，穿越苏伊士运河及红海，最后才慢慢地经过南中国海抵达广州。除我以外，其他只有十个旅客，他们都很老，好像都是为了要完成叶落归根的心愿而回广州去的样子。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五十七天，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太和别人来往。

我用了一部分时间写作。当我在哈瓦那等候北京方面批准我的申请时，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在旅馆里为我定了一个房间，带来二三十本书给我消磨时间。那些书都是用英文写的，包括各种不同的内容：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史、思想论集和外交政策，等等。只身流落异域，空闲的时间很多，所以看了不少书，以打发

时间。后来上了船，哪儿也去不了，必须尽量自己去找事情做，同时也要把自己的想法组织起来。所以，我决定写些东西，因为我发现当我记载自己对美国的印象时，写作是一项很好的方法，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发掘出来。因此，当我们的船在大海里随着起伏的波涛载浮载沉地日夜前进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文稿。这类活动能帮助我保持高昂的情绪，当然，有时也未必尽然。

你可能也想像得到，我当时下决心要回去的念头并非毫无疑虑。上船以后再改变计划可就太晚了，然而，我有时还是免不了会对自己的决心有所怀疑。船长是瑞士人，他和他的奥地利籍轮机长也帮不上我的忙。他们两位对中国都抱着否定的态度，所以当他们知道了我所要去的地方，便直截了当地说我犯了大错。“扎西，”船长说，“要是你去共产党的中国，你就会失去自由。”他们根本就不懂我的观点，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以及那些曾经支持过我的人也不了解我。因此，我担心他们会以为我不感激他们对我的恩惠，以为我会不顾他们协助我到美国来所尽过的力量。我怕他们会把我当作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为了坚定自己的意志，我反复不断地思考着我给嘉乐啦的信里所写的论点，那封信是在旧金山那场激辩以后所写的。主要的论点好像仍旧很正确。我认为我自己这一代的西藏人——也许就是我这种阶级的——有一种特别的任务。我们没有创建那个旧时代的西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当担负旧社会责任的是那些统治阶层的人——那些贵族、僧侣和寺院的首领。在流亡当中，从前那些做过统治工作的人现在要寻求西藏的独立，要是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很容易地加入他们的阵营。可是，我费尽心力要向嘉乐啦说明我不同意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的努力对我们的家乡是无济于事的。我很担心，即使现在有独立的可能，那也只是意味着要恢复从前的那一套。我深信，在寻求独立以前，我们先要跟上这个二十世纪的时代，而且我们必须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这个大好机会。我认为我们这代人都必须有牺牲的精神，冒险犯难，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至于西藏是否独立

的问题最好是留给后人考虑。要是将来的年轻人觉得继续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很舒服，那么，又有什么不好呢？要是他们觉得被压迫了而要起来抗争，那也是他们该做的事。我自己的任务就在这里，也就是现在——在西藏。

这些都是庄重的词语，我绝对相信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可是，这些词句并没有让我免于孤立和恐惧的感觉。最使我坐立不安的是我竟然找不到更多的选择，我似乎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参加流亡政府去赞同他们那一套，或者就是回到共产党的中国去追随中国的政策。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保持中立的方法。愈接近目的地，我心里就愈感到惶恐，而且还对自己充满了疑虑。

说实在的，我一上船就觉得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必须把护照交给哈瓦那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大使馆保留我的护照，另外写了一封信交给船长。这些手续未必会有不妥之处，可是，仍旧使我感到紧张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这条船要开到哪里去，可能要经过些什么港区？

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回去的决心真的变成了事实。那就是在我们即将靠岸广州的时候，我们船上升起了中国的国旗。五十年代，我在拉萨见过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旗帜，可是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个真实的旗帜随风招展，听到那和清新空气相互击拍的声音，让我感到我真的到达了目的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不论是好是坏。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我也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震撼：不准我上岸！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任何事情。船长把我那封信（那封用来替代我的护照的信）交给了边境公安人员，我被转到一只小船上，叫我就在那里等着。

有好几天都不准离开，我感到十分困窘——简直就像一个犯人似的，非常不舒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点害怕，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政府要限制我的行动。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有四个人突然来看我。其中两位是广州政协的人。他们是代表当地政府来欢迎我的，而且给我带来了一包东西，里面有一床棉被和一套蓝布衣服。另外两位先生当中有一位年纪比较大一点，是汉族的样

子，那位年轻一点的看起来也像是汉族，其实他是一位来自藏东地区的藏族。那位年轻的藏族是来当翻译的。他让我大吃一惊，所以，当他突然间说（虽然带着口音，却是正确能懂的拉萨藏语）：“赵先生（那位汉族先生）和我是由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派来欢迎你的。”我真正感到惊讶的不但是他的藏语，也是他所说的话。“请再告诉我一下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市？”我这样地问。

这次接触让我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人办事的方法。由此可见，当我还在哈瓦那等候批准还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替我安排各种计划了。后来我回想当时的情形，就记得大使馆的秘书曾经问过我许多有关为什么要回去的问题，也问过我有什么计划，等等。我曾经告诉过他说我想要回西藏去帮助自己的同胞，不过，首先我希望能获准到一所大学里去继续求学，而且，北京大学是我想去的地方。虽然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什么，这下我心里就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老早就决定了我要去的地方，也决定了我将来要做的事情。他们不会按照我的要求把我送到北京去，而是把我送到一个新成立的民族学院去，那个民族学院的设立是为了要培养一批藏族干部和教师。因为我在美国有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还有在美国学校里的经验，我将被培养成教师。当那位赵先生到了以后，我就得到即将准许上岸的通知，而且在一两天内我和赵先生以及那位藏语翻译员就一起搬到码头附近的一个又热又闷的旅馆里。那里真是热得难以忍受，惟一让人感到舒服一点的只有那个罩在床上的蚊帐。

我随身带着几件值钱的东西：一个计算器、一个米诺塔照相机、两只手表和两箱衣服。可是，我没有人民币，而且当时也不容易找到兑换钱的地方，所以，赵先生帮我付了一切开销。我们在那个旅馆里住了两天，这期间他去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夜里，他通过翻译员和我交谈。他告诉我说他已知道我从一九五七年就离开了西藏，而且暗示着这些年来在西藏的一切变化我可能都不太清楚。他很自豪地陈述近年来中国正在推行十大建设。虽然我很虚心地听着，可是，我记得当时我一直在想：国家正需要

的不是那种“伟大”的建设——至少像西藏那个地区是不会需要的。当年共产党在拉萨一带很快地修建了公路以后，我感到非常的惊异，后来，我用了很多时间一直在慎重地思考这件事情。我在威廉姆斯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所选修的课程增长了我的视野，而且我认为西藏目前所需要的是在农业和工业的领域上建立一个可以发展也可以与人竞争的基础，同时，也应该在现代化的基础结构上努力。首先，所有的人，尤其是一般普通阶层的人，都必须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就像西方人那样有受教育的机会。然后，西藏才能去为那些大建设计划之类的奢侈项目担心。虽然我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可是，如果我敢冒着这么大的险回来，心里必定是对这些事情彻底地考虑过。所以，我虚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第二天，我们上了火车，驶过八百英里的路程，朝着中国腹地的西北地区进发，前往西安市。火车日夜不停慢慢地开着，旅途经过湖南、湖北两省，穿过长江，然后再行北上，向西转进陕西省，在那西部的荒野地区，毛泽东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总部。最后，我们到了西安，那是中国一个最古老的城市，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咸阳，那就是我要住下来的地方。

我永远不会忘记刚到的第一印象。咸阳火车站离学院很近，走一会儿就到了。学生宿舍是几排简陋的砖房。我分配到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房间里有一把破椅子、一张烂桌子和一张木头床。光线暗淡，惟一的窗户已经破损得非常厉害。我曾经在华盛顿大学那种颇为豪华的宿舍里住过，也经历了美国那种比较富裕的环境，相形之下，真有天壤之别。我曾经从政治和道义两方面来长期考虑过，而且很慎重地想过我下决心要回来的这件事情。在那些方面我很清楚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也知道理由何在。可是，现在才知道我并未考虑过在共产党的中国过日常的生活会像什么一个样子！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当时真不知身在何处，因此，我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明智的抉择。虽然我的计划包括要在内地求学，但是，我一直憧憬着自己要到西藏去。当我为自己的形象写照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应该是在拉萨，受

到欢迎，而且工作做得很好。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根本就无法掌握自己的行动，更不知道何时何日才能回家乡去。除非政府准许我回去，才可能决定我回西藏去的时间。不过，我也会自我安慰一番，我想既然他们把我送到民族学院去受教育，学院里的目的又是培养西藏的干部和教师，等我受完教育以后，他们终究是会把我的送回西藏去的。而且我很愿意成为教师，以后我又可以利用学到的知识去帮助别人。但是，我已身在咸阳，那时的情况和上船以前就有点不同了。当时，我已经完全决定了要加入那个旅程，不到终点是不可能离开的，不管是到哪里，我都必须勇往直前。

我被送去的那个学校叫做西藏民族学院，是一九五七年建立的。我进的是教育系，有五百个学生，大部分都是贫农家庭的孩子。平常我们都在一起活动，在学习时，我们当然要分成小一点的班组。教育系在三楼，我们班就在三楼上课。全班共有藏族学生四十名，约有一半是从藏东和内地交界的昌都地区来的。他们的汉文程度比较好。另外一半大部分是从藏区来的，很接近我的家乡，我们这一半的藏文程度较好。我发现我们班里的同学比其他学生的程度要高一些，而且都是有备而来的；其他有些学生几乎就是文盲。尽管我们大家的背景和事先预备的程度各不相同，而我们要达成的任务却是够清楚的：我们都要在那里被培养成为教师，然后再送回西藏去教别人。

每天我们都要按照很严格的程序行动。学校里的纪律和操练就像军队里的一样，事实上我发现很多老师调到这个学院来以前都曾经在军队里服务过。每天的正常生活如下：我们一早就起床，大家都在一个公共的盥洗室里洗刷，然后就参加集合做操。我们每天三餐都在学校的食堂里吃。早操完毕后就吃早饭，饭后就去上课。我们不是像在美国一样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不同的课。当我们分配到一个班级以后，所有那班的学生就属于那个班，都留在同一个教室里——即为该班的专用教室——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来那里给我们讲课。有些老师要给学生教藏文，因为那些学生需要加强对藏语文的读写能力。而且

我们也必须学汉文（快点学会汉文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需要特别辅导员来加速学习进度）。上午从八点到十二点有四堂课，完了以后就吃午饭。在夏天，午饭后我们可以休息到一点半，然后再回到教室去，平常是上政治课程。这样一直上到快吃晚饭的时候。

对我来说，要适应西藏民族学院的生活实在很难。我这个刚从美国来的立刻就发现学院里的组织过分有权，而食物和卫生却很差。我们吃的东西真是粗糙无味——青菜、米饭或馒头，以及面条，煮熟了就算。平常我们就喝开水，没有茶。厕所里的状况也让我恶心，臭气熏天，从来就没有人去清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像我这样讨厌那种脏乱的情形！有时我还主动去清理一下厕所，但是，那也无济于事。后来我觉得最难忍受的就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课程。他们不断地表示对旧式封建社会的痛恨，经常鼓励我们重视集体主义的价值，不要搞个人主义；要重视团体的需要，不是个人的需要。虽然这种信息翻来覆去令人厌烦，我仍旧接受这种方式，因为有必要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所有未来的西藏领导人员都能够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观念。

按照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学校方面非常尽力地照顾那些在校读书的学员，因为他们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新干部和教师。很多新招来的学生都快要二十岁了，刚从乡下或农村里出来，校方特别安排了辅导人员为他们服务。要是学生们想家，或是听到家里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要不然就是功课赶不上了，凡此皆可能会令学生变得意志消沉，打不起精神来，于是，学校里负责辅导的老师 and 学生们便会协助他们解决困难。

其实每组都有一个特别的“政治辅导员”。我们这组的是一个汉族女士 M，她每天下午都要和我们见面。她的工作是要掌握和训练我们的思想意识，要确定我们在政治上的发展正确和顺当。她给我们讲解毛泽东的思想。她教共产党的历史。有时候她会告诉我们有关共产党的先烈和英雄们的故事——那些人曾经为革命而奋斗或是死于战场。M 女士总是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讲她的课。不过，有时也可能会突然间令人受到感动。有时候 M

女士真的动了感情，在她讲述故事的时候就哭起来了。在那种情况之下，学生们也经常跟着哭了起来，好像大家都能领略到她的心意。虽然我的年纪比一般的学生大得多，而且去世界各地旅游过，我有时也不能自禁。有时候我觉得我是被群众的心理反应所感染，可是，有时候我听到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为了人民而牺牲自己，确实会让我感动，所以眼泪也就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我也有难于控制自己说话的问题。举例来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到咸阳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说——完全没有经过大脑——在这里要点开水比在美国要牛奶还难。我真的是无心冒犯，那只是一种观察出来的现象突然间跳进了我的脑子里，可是，其他的同学们却冷酷而又带着怀疑的态度反应我，意思就是指明我已经犯了大错。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说美国好是不可以的。经过两次类似的不幸事情以后，我明白了自己是不可以公开表达不同的思想，批评的事情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

我也发现当我用一些从美国带回来的东西的时候，必须很小心。譬如说，有一次我把一包盥洗用的东西带到公共盥洗室去，把几瓶美国的皮肤保养膏及发油之类的拿出来用，有一个学生就说：“你看，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首先，我很诚心地说明那些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实在无法和美国人用的相比。可是，他们立刻就反驳我的说词，“哦，你跟美国站在一边。”当时，说那句话有一部分是带着开玩笑的性质，可是，很明显地也有严重的一面。类似的情形还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是从美国来的，他们绝对不会问我有关美国的情形，或是有关我在那里的经验。好像无形中就有那么一种规定，不准谈论那种事情。我猜其中的原因是他们害怕一旦对美国表示了太多的兴趣，就可能会被怀疑其动机。

有一个最大的社会适应，就是我必须面对如何保持自己私人的生活，就是我该决定做些什么。经常都会有人在监视着你做什么和说什么，而且，什么事情发生了大家都会知道。正因为我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我发现自己被监视得特别紧，开始时真把我给

烦死了。

一般来说，我们的社交活动和其他活动一样完全是团体行动。虽然在学校里男生、女生都有，从来就看不见像西方人那种约会的行动——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然，人总是人，男人和女人有时也会搞在一起。可是，学校方面有其既定的晚间活动节目，规定学生必须遵行，那就是学习政治思想。有时候 M 女士会把每星期的晚间集会安排在她家里举行，并鼓励男女学生一起去讨论政治问题。学生们可以分成两人一组去商讨私人的感情问题，不过也只限于交换政治性的意见，或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解决一些假设性的问题。每星期教育系都举办演讲会，星期六晚上也放电影，大家都必须参加。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这些活动。

另外还有一种定期的活动，相形之下，使我们那种平凡的宿舍和课堂生活好像变得比较容易和舒服得多了。那种活动叫做“劳动教育”。事实上就是我们必须定期到附近的农村去工作。那是党的政策，而且即使——也许特别——是像当老师的以及知识分子那些人都必须全力参与那种用体力的劳动。意思就是：这种“劳动”有助于“教育”那些人，让他们增加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同情，减少与他们在社会意识上的距离。其动机也好像是要羞辱那些知识程度高一点的人，让他们明白谁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从理论上来看是很合理的，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对我来说却很困难。每年都有好几次要派到农村去参加为期数周的工作：平常是在六月间去锄草和搞灌溉的工作，然后是在九月底去收割。有时我们在冬季也会被派去帮农民的忙。全部安排工作皆由学校负责，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大多数时候我们全教育系五百人都一起出动。

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因为当地的土壤虽然肥沃，却永远缺水。灌溉工作是一大问题，打出来的井又很深。我们经常都要把水桶放到五十英尺以下去才能装满一桶水，再提上来。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些工作。记得在第一年夏天的时候，我穿上了在古巴买的衣服，其他同学看到我那副样子，把肚子都笑痛了。像我们这些不是农家出身的人，在学习怎么用那些普通的农具

时，出了很多洋相。我记得当地农人用一种特别的镰刀割麦子。要是你知道怎么干活的话，那是一种很利落的工具，而事实上是很难学会那套本事的。我真的无法学到使用的窍门，而且我想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学会。冬季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派出去协助农民干活，可是我们不会住在农村里。我们会一早出去，当天晚上就回到学校。我记得这种短程差事主要是因为天气经常是非常寒冷，而且我们必须用铲子和锄头在冰冻的土地上翻土。不仅工作困难，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当我们在农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睡在大仓房里，他们有时也叫它“公社房子”。农人吃得比较粗糙，分量也比较少，比我们在学校里吃的差得多。用这种经验来作比较，使我发现在学校里我们吃得真是好多了。

总的来说，我在第一年当中感到最难应付的就是“劳动教育”的工作。虽然那些工作让我精疲力竭，我却从未气馁。我觉得那只是个过渡时期，必须经过这段时期以后才能达到回西藏去的目的。我认为能到民族学院来当学生真是个绝好的求学机会，在那里学到的知识可以帮助我成为伟大革命浪潮其中的一个分子，那种革命浪潮将可改造西藏。所以，尽管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到困难，我仍旧因为能在这种有名的学校里读书而感到兴奋，而且这个学校是在训练未来的西藏领导人员。按照计划，我们这个班级毕业的时间是在一九六七年，所以我尽量用功学习，把成绩弄好，希望能如期毕业。

就在这段时期，从家乡传来了一个很惊人的消息，让我对一切事情都暂时失去了信心。自从一九五九年拉萨动乱发生后，我和家人就失去了联络，所以当我突然能在学校里接到一封家信，实在感到很意外。当我看完了来信的内容以后，感到格外的震惊！我的双亲被判为反动派。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而且他们被赶到麻尼去了，只准带去一些随身衣物及用具。麻尼是一个小尼姑寺，离我们村子不远。当时他们是被扫地出门，只分配到一点土地维持生活。

他们受害的起因是由于我那二弟的愚蠢行为。从我父亲的信里我才知道，当我一九五八年把二弟从印度送回去的时候，他没

有按照我的话把那支手枪还给旺堆啦，却私自留下，藏在我们村子里。不知怎么的那支手枪被政府当局找出来了，所以就判他是反革命的反动派。那正是我那个老仇家多吉次登等到的好机会。他对于多年前被我痛揍的耻辱以及法院的裁决又对他不利的往事，一直感到心痛。他在我们那个地区丢尽了脸，因为那次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一些当地的老人一直还记得当年上法院的情形以及前后相关的故事，这些人我现在还会遇得到）。但这时他得到了一个报仇的机会，并且没有轻易地把它放过。在我们村子里一个政治性的集会中，也叫做“斗争大会”，多吉安排了别人去告发——斗争——我的父母及家人，给他们的罪名就是反革命。多吉自己就抓着我母亲的头发，把她拖出来，他还用力拉我母亲的辫子，结果造成她的背部严重受伤，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她去世那年，她的背伤都没有好过。多吉也凌辱我的父亲。我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真是痛心疾首。每想到我的父母受到了那么大的凌辱，心里不禁感到悲伤与愤怒，尤其是我又离家那么远，而且还毫无能力去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在那个时候，我把我父母的灾难视为一种偶然事件，多半是个人的问题，不会因此而发生其他不吉利的事情。虽然每当我想到他们被打、被羞辱的时候，就会心痛，却又毫无能力去救助他们，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令我灰心丧气。我没有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直接联想到有任何事情同样会发生到我的身上。我二弟那么笨，会把手枪留下来，所以我父母才会遭受到不良的后果。当时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帮不上任何忙。将来回到西藏去了以后，我发誓一定要替他们雪冤。于是，我便收起心来继续读书，不再去想那些事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在我自己这个学校也有了斗争大会。

八

一九六六年初，我生活得相当舒适，而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因为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和我预料中的大致相差不远，虽然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上也免不了会有些困难。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会很快就蔓延到各个地区，并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和同学们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夏天才发现那种集体风暴的来势非常凶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听到许多有关一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北京的学生在那个运动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要粉碎资产阶级思想的余毒，不管那些余毒是在政府组织里面或是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里的艺术、教育和文学方面，责任就应该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尤其是在那些年轻的学生身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灌输进那些旧时代的价值观和旧文化。那种阶级斗争就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原动力。

我自己从未感到会有危险，尽管我在旧政权时代做过职员，也在印度和美国住过，当过学生，我却真的不是什么旧日的权贵，更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那些被抓出来的都是些终身在官方工作的人，资深的官员和教师，以及政府的主管。我是从西藏山村里出来的农民，“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对付我这种人。而且，我对封建的旧社会批评得很厉害，由衷地希望有革命性的改变。我当时和其他同学一样，非常积极地尽力参与各项活动。

我们开始听到北京的学生张贴大型的海报，用来批判大学里的领导人物，坚决要把那些潜藏着的革命敌人——称之为“牛鬼蛇神”——消灭。八月间，毛泽东自己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久，北京学生那种破坏和攻击当权派的活动就开始传播到了其他城市，这些消息我们是从收音机和报纸上得到的。学校

里的扩音器每天都大声地播放北京的消息，所以，校园里都知道了各种新的动态。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那是我用一个从美国带来的瑞士手表换来的，所以我很起劲地收听对每个新战果的报道。

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发现从北京来的报道非常令人惊异，却又很难完全想像出其中的底细。以我在咸阳的团队生活和与上级交往的经验来看，那种学生攻击他们的老师以及其他当权人员的观念，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正因为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才会令人兴奋。像我这样的学生，在中国就是继续革命的先锋队！我猜当时我可能是很喜欢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激进派和革命派的人物，但是，我却仍旧无法了解那些在大城市里强烈的政治运动，怎么会直接对我们在咸阳的人发生影响作用。据我所知，在咸阳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政府的敌人。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是全心为革命而奋斗。

在六月底一个闷热的夜晚，一切事情都起了明显的变化。当时我正坐在寝室里，打开窗户让凉风进来，正在专心练习汉字。大约是在九点到十点钟之间，我突然听到一阵不太寻常的叫喊声，便跑了出去，看看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令我惊异的是，我发现全校的学生都迅速地跑到我们那个大足球场去，那里的灯光已经很明亮了。当我走近足球场时，发现几百个学生已经聚集在那里，还有一批批的学生正在往那边走去。

体育场上的情景非常令人惊异。一个照得通明的看台已经架好了，上面站着四十个我们学校里最重要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其中包括院长王敬之。我挤到前面去一看，立刻就发现那不同于一个普通的政治讲习会。我们学校的领导人员都站在那里把腰往前弯着，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高而尖的锥形纸帽，上面写着大字，标示着嘲弄性的称号，如“走资派”，或“反革命分子”。控制场面的有二十几个积极分子，他们几乎都是藏族。后来我才知道整个示威行动都是由那些学生筹划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学校应该重视毛主席的呼吁，而且，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我真是无法相信会看见那些学校的领导人员老实地站在

那里，低着头让他们愚弄，而且还要听着好像有千万个声音朝着他们高呼各种口号。有时，学生当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会走到他们这些“潜伏的敌人”面前，对着他或她的脸，在很近的距离大声喊叫那些带着嘲弄性的口号。譬如，有一个学生跳到台上去大声喊着“打倒把我们带上资本主义路线的王敬之。”另外一个就高呼“我们要拥护毛泽东思想”，或是“我们是毛泽东无产阶级路线的先锋，也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动力”。带头示威的学生们都满怀自信，像打了胜仗的斗士一样，来回走动，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毫不存疑。一下子，我们这个学校就被搞得天翻地覆了。从那以后，学生们就骑在老师们的头上，他们认为当然有权去革长辈的命。虽然我仍旧很难相信那些领导人员真的都会是走资派，不过，所有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可是真的尝到了第一次“干革命”的心情和权力。

斗争大会——那就是大家都这么叫的名词，大约在一个钟头以后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就把那些台上的人员领着在校园里游行，以降低他们的威严。有一件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连 M 女士都被迫一边敲着大鼓，一边喊着：“我是××，我教政治课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没有一个“领导”真正被拘留起来，他们全部获准回家。然而，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文化大革命”当时就开始在我们那里发生了——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咸阳，不是在什么模糊的未来时日，而就是现在。对我们这些学院里的人来说，那个惊人的夜晚就是十年浩劫的开端。

从第二天起，我们的学校就不再有教育工作的机能，完全不像是一个求知的学院了。我们整天在干革命——写标语，筹备更多的斗争大会，还在校园里到处张贴大型的海报。我们班上的同学约有五十人，由少数几个积极分子做策划工作，其余的同学就帮着实行。

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参加了很多斗争大会，而且我们全部同学都参加了所谓的“深挖”。为了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有革命人士，也要有用来作斗争目标的“革命对象”。“深挖”的意思就是要把那些可疑的反革命人士的背景，更加深入地去挖掘

出来。在我们这个大学里一些年纪大一点的资深行政人员及老师们，都是在旧社会里长大的，他们很明显地就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从一些秘密的个人档案中把他们所有的证据都翻出来，看看他们在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如何参加反革命的行动，如何剥削人民。学生们也从那些老师的记录中去找他们从前所发表过的意见和批评。然后，把所有找出来的证据全部向那些积极分子报告，由他们去仔细研判，看看是否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同情过反革命的人士。

我不是学生当中的领导分子，却也参加了各种行动。现在我会感到当时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是，老实说，当时我真是全心全意地和其他学生站在同一阵线，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号召。我觉得要是毛主席叫我们去做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应该拥护他，所以，我就尽力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以免让革命运动停滞不前。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提着一大铁桶的糨糊，把革命标语往墙上贴，看起来好像所有的墙上都在大吼着革命的口号。我也自愿到厨房里去工作。那些汉字写得好的人就把显眼的红色或是黑色的大字写成标语，那些带头的积极分子就把他们主要的时间用在计划工作上，也要策划新的示威方法，和别的学校串联，以及加强联系其他干同样革命工作的单位。

后来我们就开始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学习”。这项活动就是要让学生到其他地区去旅行，到各地去交换工作经验，互相学习。有时是学生各自单独出去，有时是全校学生带着行李一起上路。最让学生向往的地方就是北京，在那里有时会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任何学生若想单独去“革命旅行”，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新气象之下，都能各如其愿。他们只要带着出去时所需的粮票就可以了，学校里的粮票申请处一定会把粮票发给他们。在我们这个学校，或是任何其他类似的学校，没有人敢禁止这种旅行，也不敢指示学生该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怕被认为有反革命思想的征象。就在那种时候，无产阶级的学生们当了家，他们自己可以做各种决定。

九月初就轮到我们乘火车去见毛泽东了。我们从咸阳带了帐

篷去，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在民族学院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帐篷城。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个人也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的资格不够当正式的红卫兵，所以不准戴红色的臂章。虽然如此，我仍旧觉得自己是个优良的革命分子，和其他同学一样，绝对效忠毛泽东和党的路线。所以，在该我们去见毛泽东的前一天，当我们班里两个积极的领导分子——他们都是藏族——告诉我不准跟其他同学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见毛泽东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没有指控我有任何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只是说我去见毛泽东是不合适的。当时我实在很气愤，因为我想我已经完全表明了有革命的热忱，而且我的忠心是毫无疑问的。我不是已经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生活而回来为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服务吗？自从到了学院以后，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所以不该当众被挑出来说我不够资格去见毛主席。那真是太不公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会有那种感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能够被革命的学生群众所接受，又能参加团体去见毛泽东，对我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决定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我首先要说服那些积极分子，要他们让我去，理由是我和旧社会的剥削行为毫无关系，事实上我还是被剥削过的。我提醒他们我是从农民家庭出身的，曾被强迫到拉萨去用工作来抵消封建税责。同时，我也让他们相信我爱毛主席以及他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应该获准和全班同学一起去见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我平常是称毛泽东为“毛同志”而不是“毛主席”，因为我真的把他当作一位在奋斗中的伙伴和同志。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效益。那些学生领袖让我尽量表达意见，可是，最后他们只是无动于衷地瞪着我看，而且摇着头再次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决定了我去是不合适的。那也就是他们说出来的惟一理由。

我的个性向来都是顽强的，对于他们那种冷酷的拒绝手段非常气愤，因此，我就采取了一种大胆的行动。当时中国到处都新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办事处，我知道有一个就在我们住的民族学院里。我决定越过学生领袖这一级，直接去那里申明我

的处境，而且我告诉了那些积极分子我要立刻去申诉。他们感到非常惊异，还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当时实在是怒气冲天，立刻就冲了出去，还告诉他们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我一定要去申诉。当他们发现无法阻拦我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一直跟着我走到办事处去。

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非常客气，要我把事情全部告诉他。我向主任报告时，那个跟我来的学生积极分子就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冷静地听着。我说话的时间相当长，重点是在说明早年被征召去达赖喇嘛的歌舞团里工作，为的是要偿清封建制度下的税务，还说明虽然我有在美国住过的事实，可是，我却拒绝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观点而回到中国来了。我也说明了自从回到中国以后，一直就很努力地工作，一直就决心要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效忠祖国。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很忠实的革命分子，所以应当可以去见毛主席。那个学生积极分子一直对我怒目以视，但是他提不出任何对我不利的事实来讨论，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能举出我不忠的证据，我也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我当时的情绪一定非常激动，因为我一直不停地说了大约有一个钟头。最后，那位革命委员会的官员把手举起来让我们停止讨论下去。他把视线转到那个积极分子那里去，向他说：“可以啦，就让他去吧！没关系，没关系。”我真是欣喜万分，觉得完全得胜了！

我们去见毛主席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的上午，因为我终于达成了心愿，精神大振，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们大家都很兴奋，而我则更加激动，因为我曾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参与其事。我们在日出以前就起床了，大约是在四点和五点钟之间，连鸟儿都还在睡梦中。在那空气凉爽的清晨，我们就列队往十五里外的天安门广场进发。我们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但是，谁也没有时间和距离的感觉。我们当然都知道不可能真正得到毛泽东的单独召见，而且也知道还有很多其他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在那里（后来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那天共有一百五十万人）。我们只能在老远的距离外看到毛泽东。不过，因为他是我们革命的原动力，即使只能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下他本人，也会感到无限的光

荣。

我们到达广场时，已经快要十点钟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对那个伟大的场面感到多么的激动，千千万万的学生都跟我们一样站在队伍里面，耐心地等候着。所有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从毛泽东站着的高台下面步行过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群众共同努力的一分子。当他们宣告该是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骄傲似的在毛主席的注视下往前走，大家手里都拿着载有他的语录的小红书，向他挥动着，而且还大声喊着像“毛主席万岁”那样的革命口号。他的样子很特别，长得也相当高，所以他在阅兵台上显得非常有威严。他很仔细地注视着一行一行在他眼下经过的学生，听着他们的口号呼声，而且，当我们经过他的面前时，我真的觉得他是直接注视着我们，也注视着我。所以，尽管我们不能更接近他一些，也是没有关系的。他已经注意到我们，我们已经成了他的革命中的一分子。我对当时那种戏剧性的活动记得非常清楚，高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实际上站立在新中国的中心，亲自参与了创造新秩序的行列，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我没有问过别人，不过，我想我们大家当时都有同感。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回咸阳去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底，我们一直在学院里面和附近地区继续搞“文化大革命”。不过，接近年底时，我们学校决定到拉萨去和当地的藏族分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拉萨开始了，因为学院里有些同学曾经单独去参观那里的革命活动，还回来做过报告。我真的高兴极了，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回家而且还是以革命先锋队的身份回去的。

得到了拉萨军区司令部的许可以后，我们那几千人就准备行李上路。我们乘火车从咸阳到兰州，再到格尔木，就到了从北路去拉萨最后的一个火车站。在那里我们换乘军用卡车，往南开到拉萨，在路上开了差不多七天。

那时已是十二月了，从格尔木进藏的路程要经过西藏北部的广大高原。那个地区的平均高度超过海拔一万六千英尺，坐在敞

篷卡车上，冷得不得了。我们白天上路，晚上就在军车休息站过夜，在那里，我们可以食宿、加油，也可以得到必要的补给。第二天天一亮，我们立刻又继续辘辘行驶。第七天的傍晚，我们到了拉萨，布达拉宫的金顶仍旧和十年前我离开时一样，在山谷里闪闪发光。因为我们来的团体那么大，所以就分成两部分来安顿，一部分（我这批人）住在招待所里，那是从前的小昭寺；另外一部分就住在功德林寺，那是从前一位西藏很有名的喇嘛的寺院。我们到了以后不久，政府的最高指挥官张国华将军就到招待所来看我们。他很热忱地欢迎我们，说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说：“你们是最好的先锋队，也是捍卫毛泽东和他的观点的红卫兵。”他能那么重视我们，真令我感动；同时也觉得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发生那么多不同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我第一次到拉萨来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来当达赖喇嘛的舞蹈员，而今我又回到了拉萨，这次是参加了一项全国性的伟大运动，献身于肃清我从前曾经服务过的那个社会里的余毒。要是当我年幼时有人告诉我有这类的事情会发生，我一定会说他发疯了！然而，这种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我们在拉萨住了四五个月，从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的三月间。自从我离开西藏到印度去了以后，十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其间的变迁相当大。当我开始到各处去看的时候，最使我震惊的是那么多新盖的房子、建筑物和公路。拉萨的范围显著地拓宽了。尤其令我惊叹的是看见了在公路两旁种了很多树，觉得这种新加的景观真是好极了。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这种外在的改变，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我在拉萨还有朋友，不过，当我去看他们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市区里最大的改变是不再有那种热闹的中心市场了。街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摆出来卖了。堆满了各种物品的摊子也看不见了，卖东西的叫喊声以及顾客们的笑声和那种讨价还价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还有那些我从前常去的茶馆和酒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存货不多的公家商店。

我很快就发现人民的生活也不充裕。食物是用配给的方式分

发，当时几乎看不见肉类、酥油或马铃薯。我从前在拉萨住过很多年，从来就想像不到会有缺货的可能。而且从前食物一直就很丰富，要是有钱可用，什么都买得到，还可以任意挑选。可是，现在食物配给的水平却非常的低。每人每月只能得到 1.1 磅酥油和 26.5 磅我们的主食糌粑，而且得到的糌粑品质也不太好。此外，他们只能配得很少一点面粉。大家可以生活得下去，却不宽裕。

对我个人来说，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得知一位过去和我相知甚深的朋友的不幸事件。索白啦很早就是藏族的“进步分子”，他和我一样都曾在旧时代的政府里做过办事员，我们都不喜欢旧式封建制度，而且一直梦想着有一个现代化的西藏，没有农奴制，也没有阶级剥削。他参加了新成立的西藏青年团，成了早期的积极分子，鼓励人家去开会、跳舞，要大家把思想打开，改革西藏。我曾跟他一起去参加过一些青年团的活动，觉得很有趣。当时没有像交际舞之类的活动，所以他们的活动都很新鲜，也很刺激。索白啦不久就到北京去上学了，除了藏文以外，他的汉文也不错。

我们到达以后，过了几天，我就决定去看索白啦。当我走近他的房子时，看见他在街上。我立刻就跑过去张开双臂去抱他。但是，他却毫无反应，只是站在那里，一点生气都没有。他的眼睛往地上看，脸上显着恐惧的样子。虽然我在紧抱着他，他却好像是装着我不在那里似的。在那时刻，我猜不透是怎么回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我就往四面看看，才发现周围还有别人。当我发现他时，我只看见他一个人，现在才看见有几个拉萨的红卫兵跟他在一起，那意思就是他已经成了“革命斗争的对象”，而且已经在“群众的监视”之下了。他实际上什么也没说，看起来非常不自在。因为我怕由于自己的出现会把他的情况弄得更糟，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的会面，简短地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真高兴能看到你，”“我要走了。”然后我就离开了。

当我走开时，我的视线一直保持着往地上看自己的脚步，脑子里却非常的迷惘。一个那么积极的分子，而且还主张要改革的

人，怎么会变成了现代革命的对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事情弄错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发生在索白啦身上的事情，同时也发生在我其他的一些朋友身上，他们早年也曾经是很积极的人士。这些消息非常令我不解，深深地困扰着我。不过，当我慢慢地镇静下来去思考了一下以后，我发现（或者是推理）他们已经成了中级阶层的官员了，所以就符合了“文化大革命”的典型目标，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当权派的人士，又是在旧社会里长大的，就有可能成为潜伏的走资派。可是，我绝不相信索白啦会是革命的敌人，他真是一个现代化的西藏人，看见他如此潦倒，真令人心痛（我必须补述一下，令人高兴的是索白啦没有被“文革”毁掉，在邓小平一九七八年落实了他的改革政策以后，索白啦又变成了一个官员）。

我也碰到了从前就认识的女士，她叫桑吉啦，后来还做了我的妻子。当时她在拉萨的日子也过得不愉快。无论怎么说，桑吉啦都不会遭到被斗争的危险，因为她的确是出身于无产阶级，不过，由于她极端崇信宗教，痛恨寺院被关闭，连在家里也不许有宗教活动。要是任何邻居或干部发现你在信仰宗教，都会加以告发，你就会被抓到群众面前接受批斗，“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所有的旧价值、旧习惯和旧信仰的余毒。可是，我们西藏人的脑子很顽固，很多藏族，不分阶级和背景，还会冒着被处罚或被斗争的危险，偷偷地在家里念经，或是绕着寺庙转，装着去散步的样子，只是一直默默地在念经。桑吉啦就是这样的人。她甚至还继续点酥油灯来向神明祭拜。她会把每月经有的一点配给的酥油省些下来去点一盏小灯，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面，当作她的神坛（把柜子的门关上），而不是像正常的方式一样把灯放在上面。当她把这种情形告诉我时，我所担心的是那个点着的灯放在木柜子里面，总有一天会把整个房子都给烧掉。当我恳求她不要那样做时，她只是笑着，一点都不在乎我对安全的顾虑。宗教对她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很奇怪，我们那些乡亲对宗教的信仰会那么深，可是凭良心说，我却认为那是一种迷信。不过我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谈论那种事情。

和拉萨的老朋友们交谈的机会愈多，我就愈感到失望。

当有些朋友带着怀疑的口气问我为什么要离开美国而回家来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泄气。在这种时候，他们大多数都想要出去，所以一直问我：“你为什么回来？”“你是怎么啦？”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回来帮助西藏的，他们一定会觉得很荒唐，所以我总是不去直接回答那种问题。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确实令我非常吃惊，于是，各种不同的感觉立刻就把我弄得心绪不宁。我实在没有想到会看见和听见那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可是，在当时那种舆论的情况下，我不敢向学校里的任何同志吐露我的疑虑。在那种时代，如果我敢表示对老友们的同情，或者是把他们的抱怨当作一回事，我就会有被视为革命的敌人的危险，所以，我必须把一切感受都抑制在心里。

我和其他大部分的同学不一样，我没有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简单。大多数的同学——年轻，充满了革命的热忱，对于他们自己生长的村镇以外的生活知识了解不多，都以为事情只有黑白两面，对问题的看法很单纯，下决心的根据毫不含糊，从不加以考据。我的年纪大一点，受的教育也比较多，甚至在我决心回来以前就已经有了自己对于改革的概念。当我对自己说改革必定会发生时，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构成西藏文化的全部要素都给毁掉。我觉得有些事情像卫生、保健，以及其他服务项目是必须尽快建立起来的。和其他较为先进的国家相比，西藏地区是很落后的。我认为上面列举的这些项目若能尽早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早点提高。在西藏，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特别重视，那就是教育，尤其是要给一般的普通民众有受教育的机会。我实在不愿意再看到孩子们像我小时候那样费尽了千辛万苦，才能学到如何去读写自己的本土语文。要是一般人民连基本的识字能力都没有，那又怎能跟上现代化的文明世界？我也特别强调政教必须分离，至少在政治意识上是有此必要的。在旧社会中，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是僧侣，他们不从事生产，要依靠社会大众来养活他们。我希望有一天僧侣们能从事生产，自给自足，而且我还绝对赞成一种能把僧侣人数减至最少，而又能把每一个僧侣的程度

提高的制度。

不过，我想也有些事情是太过分了。譬如，桑吉啦的例子就很让我感动。我对宗教并不热衷，所以我说过很赞成西藏的宗教应该彻底改革。然而，我却不认为宗教应该全部毁灭或是禁止。僧侣们滥用他们的权力是一回事，而一般的民众从他们的信仰中可以得到安慰和依靠也是事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种事情看成非此即彼的现象。同样的，我也反对毁灭古老的神像和经书，我不觉得毁灭了那些东西革命就会得到什么好处。那些东西一直就存在着，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不去干扰他们呢？

有一点我认为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虽然我赞成要把那些掌权的老年人斗垮，以肃清旧派的思想体系，而大家所采取的方式我觉得有些是太离谱了。我不能忘怀老友索白的例子，我实在觉得他被单挑出来的惟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易于受到攻击的目标——也许是因为若要推动革命继续前进，就必须不断地找到新的牺牲者。是的，索白啦曾经在旧社会的政府里工作过。可是，他们显然完全不了解他。他不是反革命，他只是处于一个时间和地点都对他不利的情况下。

尽管有那么多疑问和争执，我仍旧和同学们站在一条战线，赞同各种新的活动。后来我曾经和不同的外国朋友们多次谈论过当年的那些活动和我的矛盾心理，他们也老是问我同一个问题：“扎西，很明显的，你是一个很有民族心的西藏人，你很爱自己的文化和人民，你怎么能成为一个红卫兵呢？”我对那个问题也想过很多次，而答案却总是相同的。就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认为毛泽东的基本意识对西藏是有好处的。我相信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以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首先就必须把那些私下反对革命的当权派彻底消灭。现在回想起来，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想法，让我和很多其他的汉藏学生们，对那些过分的和错误的行动，都有了合理化的借口，认为那只是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运动下所产生的副作用。虽然我从未被接受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卫兵，在我自己的心里，却有一种纯洁无瑕的革命精神

和热忱，而且，我还尽力去追求红卫兵所设定的目标。看到了拉萨当时的变迁，以及那些居民的生活情形，使我产生了深切的疑虑。我曾经在寂静的夜里长久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很想去研究一下其中的重要性。不过，最后我还是继续对革命满怀热情。像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只有我一个，在西藏到处都有红卫兵和革命活动分子。老实说，我当时真的是以自己能参加那些活动为荣。我们是在西藏和整个中国创建一个新的而且又是更公平的无产阶级文化，为所有的西藏人，甚至于全体的中国人造福。至少我们当时是那么想吧！岂知不久后就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九

日期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没有任何前兆。

上午过得够正常的了，午餐后我就去参加下午安排好的集会，大家都在那里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和计划。我刚坐下，班上那位坐在我旁边的积极分子突然间站了起来。他用洪亮的嗓音大声地喊：“我提议把这个反革命的扎西次仁隔离起来，让我们监视着他。”我简直就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很明显，整个事件老早就已经安排好了。甚至于在那个告发我的学生还没有发言完毕以前，有两个人就站了起来，开始向我这边走过来。第三个人从教室里跑出去，又立刻回来，手上拿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扎西次仁”的大字。我正在注视着那块黑板时，那两个刚走到我这边来的学生便抓着我的手臂，强推我到教室前面的空处。他们强迫我跪下，把我的头往下压，同时把那块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当那块黑板挂好以后，我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当一个人到了危急的时候，脑子里的速度也就会转得非常的快。在他们把我的头压下去挂那块写着各种口号和标语的黑板时，我的脑海里就映现着过去一年来发生的各种事情，真想知道

为什么我居然会那么盲目，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大家都对着我大喊各种诨名或绰号，而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自信已尽全力去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也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怎么会控告我呢？我实在找不到答案。

那块黑板的重量和周围的喊叫声把我带回到现实的场面。全班同学都离开了教室，推着我在他们的前面走。当他们带着我在校园里游行时，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开始跑出来看我这个革命的新敌人，而且一下子就有相当多的人聚集起来参加我的第一次批斗大会。刹那间，我竟从一个干革命的人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对象。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因为在那时候，有一个班里的头目举着拳头大声喊着：“打倒反革命的扎西次仁！打倒出卖祖国的叛徒！”好几百在场的群众立即大吼大叫地响应着“打倒扎西次仁，他是三大剥削者的余毒！”

这次批斗延续了好几个钟头，一切过程都搞得模糊不清，因为同学们一个接一个上来指控我这个，指控我那个，甚至连我从前只是说着玩笑的话也搬弄了出来。譬如有一个从藏区西南部来的女同学站在我面前不到几米远的距离对着我吼叫，说我曾经侮辱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我一年前有一次在课堂里说中国的人口这么多，就像是个蚂蚁窝一样。她大声地说中国人不是蚂蚁，她认为我那种论调就是反革命观点的证明。我很想诚恳地向她解释我的意思，可是，我的努力反而把当时的场面弄得更糟，因为那些同学变得更加气愤，而且骂我顽固不化。有些人乐于把我的头往下压，强迫我弯着腰站在那里。每当我痛苦得受不了时，就会调整一下姿势。他们一直让我把腰弯着站在那里——那是一种规定的姿势。我实在不知道像那个样子在那里站了多久，不过，好像就那样被折磨了一整天之后，事情终于告了一个段落，于是，我又被推着游行，往教室那边走去。而批斗却还在继续进行着。

我被放在一个从前用来储藏东西的房间里，就在宿舍旁边。大约有三米见方那么宽，里面除了两张粗糙的木床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当他们把我带进去时，其他的积极分子就到我的寝室里去仔细清查，把里面所有我的东西都拿走了，同时还到储藏室

去拿我存放在那里的衣服、箱子以及其他的东西，连我的手表和钱包也不放过。我把在美国时所写的日记本和信件都带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拿去以后，把其中的内容全都译成了汉文。那些跟我在一起的学生就在我身上仔细搜查，学校里的医生甚至于还真的检查了一下我的肛门。这可真的把我搞糊涂了，全然不知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子对待我。我是从美国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里回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而今他们竟在这里检查我的肛门，真是天晓得！当时所感到的羞辱和卑贱，真是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掉。

从那以后，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同学们全天候的监视。无论是当我睡觉的时候，到饭厅去的时候，连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有人监视着我。一般来说，他们不跟我讲话，只是看着我。第一个星期整整七天我都要当众受辱：开饭时他们要我在饭厅前面站着，脖子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我对国家的罪名。我必须等所有的学生都吃完了以后才能去吃饭。

第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因为我非常害怕，也很愤怒。我一直在想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我要怎么做才不至于落到这样的下场？我真害怕会被送进监牢——听说那会受到很痛苦的折磨。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进监牢呢？各种想法都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好像实在无法去控制自己的思虑了。有好几次在我困得昏昏欲睡时，就做一个噩梦，我梦见有一匹马跳到我的身上，把我压死了。真恐怖！我当时真的害怕极了，而惟一可想的办法恐怕只有当火车开来的时候，跑到附近的火车站去，躺在铁轨上。

第二天，早饭后我就真正开始受审了。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姓陈的纺织工人，陪着六七个学生积极分子，以及我们的政治思想老师 M 女士一起进来。他们这一组人是专门来对付我的。陈先生其实是一个很老练的审问员，也就是我的主要对手。我已经被隔离起来，但是，我的“罪”却尚未定论，所以当时的目的就是要让我自己认罪。其过程就像挤牙膏一样——我们有时候是如此来描述那种过程的：内容都在管子里面，如果没有人去用力挤

压，就出不来。那天上午，挤压的工作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大约有四十五天。

我坐在一个凳子上，审问人员把我围在中间。他们首先问我是否知道为什么我被挑出来受批。当我说不知道的时候，陈先生说：“哦，不对吧！我想你心里一定很明白。”当时我很紧张，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知道有一条很微妙的分界线处于所谓的完全固执己见，即什么都不承认和过分合作而坦白一些连审问人员都还不知道的“罪”之间。学院的领导人王校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学生们最后认为他的态度很好，而且有革命性，所以就释放回去工作了。另外有一个例子是有关一位副校长的下场。因为他被标明为“顽固”而且还敌视“文化大革命”：他一直坚持自己从未犯过任何罪，自认从年轻时期开始就为党忠诚地服务，所以他被批斗得很惨，受了很多的罪。

起先我决定说真话，不要只是为了讨好他们而编造谎言。同时，我也不要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回答那位姓陈的说：“对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M女士和其他人员已经很仔细地调查过我的案子，于是，那位陈先生立刻就把主要的问题针对着我早年的事情：“谁把你从拉萨送到印度去的？”他问了一系列关于我这方面的各种生活情形。我在那里做了什么？谁在那里帮我的忙？他翻来覆去地审问我，一会儿说东，一会儿道西，然后又回到第一次的问题上，用稍微不同的内容再问下去。我不想告诉他我去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学英文，所以我说我是去做点生意，同时也去参观一下佛教圣地。可是，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而且，他们提出来的各种难于回答的问题，简直没完没了。譬如说，他们特别强调其他的藏族青年都很支持社会主义，到内地去学习，参加青年团，甚至有些反革命的贵族都把孩子从印度的学校带回到拉萨来，而我却反而到帝国主义的印度去，而且一去就是那么多年，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为什么会那样子呢？你不喜欢中国？你反对我们的社会？那天审问的范围包括得很广——至少对我来说是那样。总结起来就是三个主要的问题：谁送我去印度？谁送我去美国？谁送我回中国来？他们认为

我的活动太不寻常了，绝对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其中一定有更深切或更阴谋的策划，所以他们坚持要我全盘吐露出来。

我很诚实地说明没有任何人送我到任何地方去，一切都是我自己安排的。我一开始解释如何从事贸易去筹足所需的款项，那位陈先生就不动声色地打断了我的话题，并且向我讲述党对这种审讯的政策：“扎西，我们对你的行动一直在调查，而且已经对你怀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才要把你揪出来。你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之下。毛主席要给你一个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机会，让你去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你必须说实话，把你那旧的和观念和观念全部革新。要是你不愿意清洗你那肮脏的脑子，拒绝说出你过去的罪行，不把那些和你共犯的伙伴供出来，我们就不会对你客气了。党的政策是：我们会宽容地对待那些跟我们合作的人；那些顽固的而且又不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就要把他们送进监牢或劳动改造。因此，请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你所做过的事情都非常清楚，由你自己去决定是否要自我坦白和痛改前非了。”

一天又一天，他们一直对我疲劳轰炸，问了许多问题：我旅行时用的是什麼证件？谁帮我找到一个英国的老师？我怎么付所有的费用？我的目的是什麼？我做过什麼工作？日子久了以后，我就开始力不从心了。他们审讯的本事真好——就像把牙膏挤压出来一样。

无论我怎么回答，审问我的人还是不相信我是自己一个人安排了所有去印度和美国的一切计划。当他们无法证明达赖喇嘛把我送到印度或美国去以后，他们便进一步想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破坏我的说辞。有时候审讯的气氛会温和一点，审问人员只是想哄我跟他们合作。但是，他们有时候又大声对我叫喊，用各种方法来恐吓我，譬如他们说如果我再执迷不悟，就要把我送进监牢去。所以，我一直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什麼话是应该说的，我应不应该百分之百地告诉他们一切事情，或是把我认为他们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不说出来？慢慢地，我就开始承认犯了一些“小”错，诸如去了印度而没去内地，以及崇尚美国多于中国，

例如把美国有大量的牛奶喝和在中国连开水都不够供应作比较。我常常埋怨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我的思想才会被人厌恶，因为我以为他们会接受这种解释。不过，我始终没有承认任何严重的罪行。他们不停地审问我，到了第三星期开始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详详细细地盘问我在印度那几年的生活情形，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要诚实地告诉他们我如何为达赖喇嘛的大哥嘉乐顿珠工作，以及他如何把我送到阿萨姆去访问那些在一九五九年拉萨动乱以后刚到那里的西藏难民。因为那些访谈记录后来成为国际法庭撰写的那篇严厉报告的基本资料，用来谴责共产党在西藏的不当措施，所以，我知道这项承认是很冒险的，可是，我觉得宁可坦诚一点，然后再把自己当时所处的地位尽量放低，说成只是一个低层工作人员（其实那确实是真的）。没想到那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很高兴获得这个消息，而且用来证明我是主张西藏独立的，那真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我实在不该告诉他们我做过那种工作，他们从前是不知道的，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可是，我当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知道，也是因为心里太害怕了，所以不敢说谎。

如此继续不断地受到严厉的审讯，日复一日，每天晚上我还要把生平故事全部写下来——所有我与人民作对、与国家作对，以及反革命的事情。在这段时期，我与群众完全隔离，除了与守卫人员及审问我的人交谈以外，没有任何人来跟我说话。一般来说，这种审讯会谈并无暴力现象，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学生滥用职权，拽我的头发或是对我施以拳脚。当时，我既痛苦又悲戚，心里还很害怕。

不过，无论他们怎么问，我绝不承认有人“送”我去美国，也不承认回来的时候是为了替谁工作。我坚持回来的意愿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而且是回来为人民服务的。有一天，大约是在开始受审以后的第三个星期，审问员正在看我头天晚上写的记事录，他们看到了一段我从毛泽东语录里引下的句子，大意是说“黑暗的乌云即将消失，明亮的曙光马上就会出现。”他们立刻就怒气冲天，大声对我吼叫着说：“你怎么胆敢如此引用毛主席

语录。你认为我们是你的敌人吗？你觉得我们这些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都是你的敌人吗？谁是那个黑暗？当你说到黑暗的时候，你是在指什么人？而且，当你提到曙光的时候，指的又是谁？今天你要告诉我们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写那些话？你把我们当作你的敌人吗？你是想威胁我们说那些支持你的人快要来打垮我们吗？”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意旨，所以，他们在结束时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必须改正。

第二天上午，当审讯开始时，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他们立刻把一块黑板挂在我脖子上，边推边拉地把我带到大厅里去。那里挤满了五百多名学生和老师，大家都等着批斗我。这是第二次组织起来对我进行的批斗大会，就是因为我用了毛泽东语录而必须给我一个教训。他们认为我过分自大，顽固，所以必须把我的气焰压下去。那就是他们用来使人崩溃的方法。这类的大型集会并不能真正发掘新的证据，却能把人吓倒，让人蒙受羞辱。

大会开始时，有一个学生当中的领头人便大声喊着：“把反革命分子扎西次仁拉进来。”正当我被推进去时，其他的学生就喊着：“打倒扎西次仁的骄傲自大”、“打倒祖国的敌人”之类的口号。然后就开始了那场极为戏剧化的控告。第一个起来控告的是一个从藏北那曲来的女生。她一开始就告我反对毛主席思想和马列主义。当我正在极力反驳时，那个姓陈的便立刻插入，说我反动、顽固、自大——不像一般人的那样自大，而是反革命的自大。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非常反革命，所以才敢坚决地用一些狡猾的话来反对革命，反对批斗，那就是反革命的自大的意思。后来，姓陈的又开始对我引用毛泽东语录提出问题：“你好像认为我们是你的敌人，对不对？要不然，那个黑暗指的是谁？你把‘黑暗’这个字挂在谁的身上？你指的是谁？”他如此这般地问我，“谁是黑暗，谁是曙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我回答他说那个黑暗就是我的处境。“现在，我在这里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很遗憾自己会变成这种样子的人。当我说黑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我自己在黑暗中，既不是指你，也不是指任何其他的人。这种黑暗的处境只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对于我

的回答，那个姓陈的自然不会觉得满意，所以他用一种苛刻的语气又另外提出了一个问题。“曙光是什么？”他提出问题的时候，把声音朝着大众那个方向散发，而且还表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我说曙光也是用来描述我自己的，“我期望自己能转变成为那种东西，那是一种比我目前所处的黑暗要好一点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曙光所要代表的境界。我真的没有意思要侮辱你们，也不会去侮辱无产阶级。”

那个姓陈的当然不在乎我说的话，所以他反驳我说：“你真顽固，而且还特别坚持你那种肮脏的意念。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非常可耻。你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伟大的。那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起的，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当时，所有在会的人都跟着他喊，另外还有人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反动走狗”，以及“打倒卖国贼扎西”。经过了好几个钟头以后，主持大会的人终于说出了：“扎西次仁，党的政策是很清楚的。你心里也很明白。现在有两条道路由你自行选择。你可以选择光明的道路走，也可以继续走你的黑路，也就是那条地狱之路。这完全由你自己去选择。要是你用诚实的态度对我们，而且对革命有好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从轻处罚你。不过，要是你还是顽固不化，我们就要把一切事情都给你挖出来，你还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第二天早饭以后，审讯又继续不断地进行。又经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真的被那些每天重复提出的相同问题，以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给烦死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便采取了一个蛮干的措施。我不再顾忌他们对我所用的手段了。我下定了决心不去表达他们要我说的某种话，而且我要他们明白我这个意向。看守人员当中我发现有一个男生人很好。在他看守我的那天晚上，我请他用汉字替我写几句话，因我的汉字写得不太好，我希望每个人看了以后都能正确地了解我的意思。他同意了。于是，我就把我的意思说给他听，由他把内容简要地写成三点。

1. 一九五七年我离开拉萨到印度去求学时，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不是由任何人送去的。

2. 我去美国求学时，那个机会是一个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罗伯特·顿南姆提供的。我是在印度遇见他的。我离开印度时，并没有得到嘉乐顿珠的同意。

3. 我离开美国时，和我那些藏族友人的意愿背道而驰。我是自己下的决心。所以，三次行程都不是由任何人送我去的。要是你们能找到任何相反的证据，我愿负全责。

我这么做就是要他们知道这就是我对这些事情所要说的最后几句话。于是，我用一根小针刺进自己的一个指头，挤出血来，在那三点说明下面签名以后，就压下自己的血纹。不管结果如何，当时他们就应该明白我是不会再承认什么了。后来，他们也就慢慢地停止向我发问了。虽然我给他们的答案并不能让他们相信我所说的都是真话，不过，最少那一期间的问题就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我一个人单独囚禁在一个地方的日子不久也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被送到一个大房子里去了。那栋房子靠近校园的中心，是临时用来囚禁像我这种人的监狱。里面脏得可怕极了，大家称之为“牛棚”。和我一起囚禁在那里的主要人士包括老师、作家、知识分子以及学校里的负责人，汉藏两族的人士皆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让民族背景去影响革命的目标。里面约有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人之多，而且每个人都被定为阶级敌人，因为大家都有各种成分上的问题。在人数中占最多的是老师和校方的行政主管。M女士的丈夫姓W，他本来是教育系的主任，也在其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幸免于难。

我们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很早就得起床，只给我们喝一点很稀的粥以后就得下田工作，去做一种故意折磨我们的粗活。我们要在猪舍里工作，也要把厕所里的粪便从学校挑到田里去做肥料。当然，我们还要接受各种严格而又冷酷的教条，为的是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晚上我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读毛泽东的著作，看他在报上发表的最新指示，以及党的文献。然后，我们必须每个人写出自己的思想报告和心得，把我们自己的罪过以及对历史上的和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想法都写出来。我们写的报

告还要包括一篇所谓的“思想汇报”——我们每天、每小时、每分钟在脑子里的各种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被叫出去受审，或是被抓到批斗大会去当中心人物，其过程就如我在前面所描述的一样。审讯时的情况有两种可能——粗暴的时候就是要挨打受辱，比较温和的时候就只是当面用大吼大叫和朝脸上吐唾沫的方式来羞辱你。在牛棚里的那些夜晚，我觉得最难受的经验就是大家有时要在就寝以前站上好几个钟头。我们都得立正站着，一些红卫兵就在我们面前走动，大声对我们吼骂，或是高呼各种口号。我们必须低着头，最高只准看到他们的胸线。他们当时嘴里高喊的内容诸如：“你们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之下。要是你们能把你们那些肮脏的脑子里的污秽清除，要是你们能诚实地向我们报告你们从前的罪行，要是你们同意把你们那些同事和共谋人的犯罪活动及思想向我们报告，党就会宽容你们，而且还会给你们奖励。”

在那个临时监狱里的生活一直维持到第二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们得到一种暂缓的时期。当时上面有命令像我们那样的临时监狱都要取消，要把关在其中的犯人释放。在那种情形之下，对我个人的问题却毫无改善。当我离开了牛棚以后，发现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已经修业期满，很多人都已经被送回西藏去分派了工作。没想到我吃尽苦头，下了很大的决心，想要回去工作，却还在这里受到怀疑，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不准和他们一起回故乡去。每念及此，真是又妒又恨，让我心痛！虽然事已至此，我却无暇顾影自怜。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又要举行一次批斗大会了。这回我觉得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在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红卫兵把我领到会场上去，并把我留在边上。我记得那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天空的颜色显得很蓝，空气也很新鲜。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现在大会开始，把那个间谍，而且还拥护西藏独立的扎西次仁带出来。”于是，那两个红卫兵就粗鲁地夹着我走到主席台前面，让我面对着群众。我稍微把头抬高了一点，看见会场上挤满了人，当时到场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六七百人之

多。我还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红卫兵就把我的头往下压，拉开嗓门让全场的人都能听见，大声地说：“你现在就站在人民法庭的面前，你最好明白如何行动。”然后，大会主席就宣读了拘捕我的命令，那是由长武县公安局发下来的。当那道拘捕令宣读完后，有两个年轻的红卫兵就把我的双手紧紧地反绑了起来。我浑身的血液都往上冲，吓得我发抖。从牛棚里释放出来以后，这是我最恐惧的时候：我已经正式宣判有罪了，说我既是间谍又是拥护西藏独立的。当我还在自我分析当时的情形时，一阵剧痛把我带回到现实的环境。先前那两个学生好像没有把绑我的绳子抽紧，所以有一个藏族老师就跑过来用力把绳子拉紧。我很明白他那样子用力拉就是故意要伤害我。那个年轻人对他自己的行动引以为荣。就凭那个戏剧化的动作，就把他自己变成了“人民的英雄”。

当我被绑紧了以后，M女士就从台阶上走到主席台上讲话。她用很大而且很清楚的声音说她是来揭露我的“滔天大罪”的。她说我的两个主要罪行就是我收到过一封美国人的来信，写信人叫托尔斯泰，他指使我向野蛮的共产党挑战，而且在美国报纸（西雅图的校报）上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当下面群众中的那些年轻的、理想派的学生们和红卫兵们听到了这些控告以后，就开始大叫起来，然后又嘘声四起，表示非常震惊。虽然那两件事情有一部分是有其真实性，但是，那都是在美国发生的，如今M女士却非常聪明地把那些事情说得好像是在我回国以后才发生的。M女士继续把我全部的罪行都向大家揭露，像我和嘉乐啦一起工作的事，等等。大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结束以后，我就被绑得紧紧的押上了一辆敞篷卡车，有武装士兵看守着我，一直开到长武监狱。我那最恐怖的人生经历，从那时起就真的开始了。

十

从批斗大会的场地到那所监狱开车只要十分钟，我还来不及澄清自己的思路呢，卡车就已摇晃到了终点。可是，当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监狱的门前时，脑子也就立刻清醒了过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的全部情景。

长武监狱周围的环境显得非常贫瘠——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水，只有干黄的山丘。附近只有几家砖房。农民大部分都住在小窑洞里。起初我还不知道自己就站在监狱的门前，因为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山坡下的入口处，和其他很多农家的门道没有什么不同。当我走到里面以后，就发现有所不同了。

我进去的那个入口处和山坡给我的初步印象不相吻合。当那些卫兵一打开门把我推挤进去以后，我发现地平面就在我的脚下裂开了，立刻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地下院子展现在我的眼下。那个院子是往地层下面把土挖空而成的，离地面的深度约有三十英尺。在外面的时候，看不出里面有那么大的院子。卫兵用力推我继续前进，我们顺着陡竖的梯级往下走，一直走到院子的地面上。当走到了最下面的时候，我看见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地。正前方有一堵高墙，守卫就在上边巡视。

带我进去的卫兵一直把我推向高墙那边的一个小门，让我进去。在墙的另一边，地方不大，再往前走，就看见了一排从山坡上挖出来的十个小洞，那就是牢房。每个牢房约三十三尺长，十尺宽，八尺高，让十个犯人共同住在那里。里面最少也有三分之一的空间做成了土坑，让我们睡觉。当我被送进牢房的时候，其他犯人都带着疑惑和好奇的神色瞪眼看我，不知道外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有些只是农民，犯了些大小不同的罪；有些是重刑犯——杀人的和强奸的；也有些是政治犯，像我一样。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们的眼睛。有些人是带着恐惧的神色，却仍保持着

希望。后来我才了解那些人都是新进来的。可是，多数犯人都是毫无表情地直瞪着眼，他们的焦距已经超出了这个监牢，超出了常人的地平线，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当我被送进去了以后，立刻就被里面那些人体的污秽、汗臭，以及恐惧所窒息，差一点就要呕吐了。

在那个监牢里的第一个星期真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里面的污秽实在无法忍受。我们每天只准去厕所两次，其余的时间我们的大小便只好排泄在一个大尿缸里，而那个尿缸只有每天早上抬出去倒一次。我们既没有毛巾，也没有肥皂，却要永远被那恶心的臭气熏蒸。此外，还有成群的虱子不断地向我们攻击，它们已经在牢房里安居乐业了，我们就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我们实在无法逃避上述的两种困境。

同时，我们也有饥饿的痛苦。每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有两个馒头，一根煮过的萝卜和一碗热水。下午四点钟，我们再吃同样的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在那个监狱里时，虽然没有看见有人饿死，但是饥饿的痛苦是永远地存在着。同样可怕的还有那种毫无活动和完全与世隔离的感觉。守卫人员不许我们乱动，更不许交谈。

守卫的整天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坐在那里让脑子和身体因为毫无活动而日渐麻木。我曾经干过粗活，也受过拳脚的肆虐，而这种不能活动的罪却是最难熬的。我认为那段时期是我人生的最低潮，我当时真的就想去放弃我的一切。事实上在到了那里以后的第十天，我真的决定要自杀。我想当时我的神智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因为我只想出了一种结束自我生命的方法。有一次轮到我去倒尿缸的时候，我没有马上行动，等到其他的犯人都上厕所去了以后，我立刻就乘他们来不及阻止我的时候猛喝尿缸里的尿。当时我自以为那样就可以把自己弄死。我还真的很有自信，最少也吞下了一升尿。可是，喝了以后我并没有死。奇怪的是根本就没有产生什么后果，我这种超越常规的行为居然没有把我毁掉。以后我再也没有干过这种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尽管我还是一直挨饿，而且身体的健康情形也是每况愈

下，我的脑力和意志却恢复了往日的坚强，让我渡过了各种难关。

除了上述各项日常生活以外，偶尔也有像已往在集体缓刑期内所遭受到的那种审问。从前那个折磨我的 M 女士有时也会来审我，于是，我们又得把从前那一套过程搬出来。不过，有一天，事情有了变化。没错，M 女士又来了，可是，那回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三个公安人员。当他们把我从那拥挤的牢房里叫出来时，他们很明白地表示这次的审讯可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去，把我加上手铐，锁在房子中间一把矮小的椅子上。然后，他们那组人员就坐在一张加了白布的桌子后面。我坐的那把椅子实在太低了，所以我必须仰着头才能接触到他们的视线。

和以往一样，他们总是想进一步了解我在印度时和嘉乐顿珠的关系。我当时负的责任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从前和现在的？他们还是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会舍弃在美国那种安定而又富足的生活，自愿回西藏去，要不然，就是有某种任务。那就是他们所要追究的。我担负了哪方面的责任？我替谁工作？我最好据实以告，否则就麻烦了。我给他们的答案和从前的一样，当然就把他们激怒了。于是，那个负责这次名为审讯的首席公安人员就开始胁迫我了。他叫我想想看我在干什么？叫我最好还是合作一点，因为他们不再会有耐心对付我了。虽然我来这所监狱还不算久，却被认为是一个很顽固的犯人，态度不好。那种人的下场会如何，知道吗？我当然知道。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突然冲动了起来，不但没有害怕的感觉，反而变得怒气冲天，当时，真是我人生中愤怒得最不可遏的时刻。记得我当时注视着我面前的那张桌子。我看得出他们用一条白布铺在桌上是为了要把场面弄得正式一点，可是却掩盖不住木头的干裂现象，而且，油漆也已剥落。我在那个房间里举目四望，所能看见的全是破旧不堪的东西。我觉得那种审讯真是笑话一个，而且还不值得一笑。审问我的人就像是些孩子们装着大人的模样，我再也不会怕他们了。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老问我同

样的问题，所以我变得非常恼火，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便大声地说：“你们要对我怎么样就随你们的便吧！我可不要向你们撒谎。我不要再跟你们玩这种笨游戏了，也不会因为你们要我说谎就顺着你们去说些毫无根据的话。我所说的话可以自己完全负责，而且我向你们说的都是真话。”

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审问我的人生气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几个审问我的人只是你看我，我看你，打开了我的手铐，然后就把我送回了牢房。就在那种紧张刺激的时刻，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个胜仗。当我回到牢房时，同房间的人都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下，可是，谁也不敢向我发问。我静坐着，脑子却无法停止转动，还在回忆着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自从在那个破房子里的审讯完毕后，我在监狱里的生活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起居作息照常，天天如是，春去冬来，永无休止。十一月底，有一天，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我突然从牢房里给带出去了，有一个医生给我做了全身检查，有人还把我的头发给剃光了。谁也没有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敢问，只是暗自猜测：究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他们要释放我吗？他们准备把我转到另外一所监狱去吗——要是如此，去哪里呢？

没等多久事情就明朗化了。一两天以后，就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从我被抓进监狱那天算起，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天了），我就永远离开了长武监狱。

有两个卫兵毫不客气地叫我离开牢房，也不作任何解释。我的双手被他们紧紧地反绑着，推上了一辆破旧的客运汽车，在崎岖不平的雪路上开着。一同陪着我的还有 M 女士和两个公安人员，他们从未说明目的地是哪儿。

当我们的汽车停下以后，我就被送进了靠近我们学校的咸阳监狱。我当时笨得很，以为他们把我带到那里去是准备要放我出去，让我继续完成学业，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当然我是猜错了。三天后，我又被叫出了牢房，再次迁走。我的手又被紧绑着，送上了开往四川省城成都的火车。

当我到了成都以后，起初一切都似乎比较好一些。那里有六七个犯人，因此，我至少也有几个可以交谈的对象。牢房里面也较干净，地面上铺着干木板，不像长武那种泥土地，也不像咸阳那样的烂泥地。比较起来，成都监狱的伙食真是好极了。我们可以吃到蒸饭和青菜，而且还吃得饱。

在成都的第四天，我又被他们从牢房里叫出去了。M女士和两个武装警察，默不作声而且行动一致地把我直接带到离那里最近的一个机场去。我们上了一架俄国制造的飞机，没有其他乘客，听说要把我带回故乡西藏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用那样特殊的方法来对待我，是因为把我当作一个危险的国际间谍来处理，要带我回拉萨去受审。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安排，而且也不知道到了以后究竟会怎么样，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时喜时忧。从表面上来看，我能回家去的这个消息是值得庆幸的，可是，心里却实在难以置信。如今我是以囚犯的身份回去，那种回家的兴致如果期望太高，也许会失望得更惨，到时候也许会比留在内地还来得更惨。

离开的那天我记得天气非常晴朗。在飞行期间我们没有怎么交谈，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从小窗子里往外看。看见下面的景物不断在改变，我的思绪也就起伏不定，使我泛起了一片遐想。当我们接近拉萨时，我认得出下面的雪山就是西藏的山，那些山从我孩提时代起就形成了我意识中的一部分。

当飞机降落以后，我立刻就体会到那不是我期望中的返乡方式。当时已经是严寒的十二月了。他们把我押上汽车，手上戴着手铐，好在我的两只手不是铐在后面，而是铐在前面（那种铐法舒服得多）。很明显的，这次回来不是为了释放我。看守人员还用一块白布盖着我的脸，只在嘴巴那里开了一个口，让我能呼吸和说话。同时，他们也给我戴了一顶厚毛帽。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不受寒冻，还是为了在送我去拉萨监狱的路上怕被人家认出我是谁。当时我对这些事情是无法了解的，不过，“从一个监狱拖到另一个监狱”的情形却从此告了一个段落。拉萨的桑益监狱就是我的终点站。

若和长武及咸阳的监狱相比，桑益监狱简直是太好了。那所监狱坐落在城外三里路远的地方，靠近色拉寺。监狱里有各自成套的厅房及作为特殊用途的区域。

当我们的车子开到那里进了大门以后，就在一个仓库前面停了下来。在那里，我的东西被交给了桑益监狱的保安人员。那些东西是从咸阳的学校里转送过来的，包括两个箱子（一个是山姆松耐牌的，一个是印度皮箱），其中装着我的全部财产。我自己把那些东西存进库房里，后来，当他们让我去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时，我发现大部分东西都还在，不过，我注意到那枝金笔——美国制的派克六一型——已经毁坏了。可能是哪一个人为了要看看笔里面是否藏着什么东西，他们故意把笔弄破，打开来看个究竟。那枝笔是我最心爱的一个纪念品。当我看到那枝笔已经被破坏得不能再用来写字时，让我联想到那就象征着我自己的处境。我觉得自己就和那枝笔一样，本来也是一个有用之才，我曾想要把自己所受的教育去协助我的乡亲，可是，如今我也已经破损不堪，对谁都没有用了。

从那时起，我在桑益监狱住了两年半，一直到一九七三年的五月。

在我检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以后，就把它存进了库房，那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一栋包括好几排小牢房的房子那边去了。那里是每个犯人单独住在一个小牢房里，我也被他们关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不管那个房间多小，那里的各种条件都比我在内地所住过的监狱要好得多。

那栋有好几排小牢房的房子是水泥结构，刚盖好。每个牢房里有一盏暗淡的电灯，墙壁和地面都是用水泥建成的。这里比我以前所住过的牢房要更温暖，也更干燥。同时，我们有更多的食物和自由。每天三餐供应的东西包括酥油茶和糌粑，有时甚至还有肉吃。每天早晨让我们出去把尿倒掉，清洗尿桶，还给一盆洗脸水。和我过去的经验相比较，这里的情形可算是相当的奢侈了。

在我来到此地不久，我就看见一群从前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

在监狱里的菜园中工作。他们被监禁起来是因为涉及到一九五九年的拉萨动乱。听说他们坐牢是有一定期限的，那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狱。白天他们被安排在菜园里工作，晚上则关在一个和其他囚犯一起的大牢房里。其实我真的羡慕他们可以有体能活动，而且又有和别人接触的宝贵机会。我虽然在物质条件上好得多，却必须与其他囚犯隔离。同时，我也羡慕他们都知道自己刑期的长短。我是被定为比较危险的犯人，所以我被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不准参与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劳动，也不许和社会接触，而且还刑期未定。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像当时在内地那么害怕。一方面我想是因为虽然我还是个犯人，却已经是在西藏老家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囚犯、狱吏和负责管理的人员都是藏族，我们使用的语言是以本土语言为主。无论怎么说，从那以后，我就变得比入狱以前更有自信了。当然，因为我在长武和咸阳监狱受过饥饿的痛苦，一直都还有那种恐慌。虽然我们在桑益监狱的伙食比以前好，却仍然不够。所以，我便开始设法争取更多的食物。

开始的时候我先和管理员及藏族的守卫人员联系。当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处罚我，也没有嘲笑我的请求时，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于是继续坚持下去。起先是有几个守卫人员可怜我，偶尔会给我带点东西来吃。后来，同情我的人就更多了。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还在一起商量过，因为他们最后不但给我带来了食物，而且还给和我同排的其他囚犯都带来了食物。终于，他们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让大家都能得到同样多的额外补给。我的狱友们都很感激我，好像认为我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因此，虽然我是处于被隔离的情况之下，我却能得到一种难得的支持，而且还给自己树立了一种特有的形象，让自己能继续生存下去。

六个月以后，我被转到监狱另外的一个区域去了，在那里，牢房宽了一些，里面的情形也好一点。譬如说，在我那个新牢房里，还有一个窗户，阳光可以照射进来，我可以自己把窗户打开

或关上。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可是，经过在长武监狱那几个月毫无转动余地，以及每次与人交谈都会受到监管人员追究的那些经验，即使是最微小的自控权，也变得很重要了。此外，在这里我还享有一些其他的小自由。

自从我被关进监狱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能看到报纸——汉藏两种文字的都有。我当时真想有点什么东西可以读，还获准到库房去把一本汉藏字典从我的箱子里找出来。有了字典，我才比较容易看懂汉文报纸，因此，我便也学到了不少新词汇。

然而，主要的问题一直都还是那种无所事事的厌烦——如何去消磨或者利用时间。因为我在这里有较多的自由，我就该安排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让自己适应下去。一般来说，我的方法是把一天分成几个部分。早晨是我锻炼身体时候。每天早饭以前我会做大约两个小时的体操。有时我在原地跳跃或走动；有时会适当地伸展四肢；有时我也会演练旧日的噶足巴舞步。虽然我已经那么多年没有再跳了，由于我年轻时努力地勤练过那么久，我的肌肉似乎都还记得每个动作。我特别喜欢跳那些舞步，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跳，当我全神贯注在那些出名的仪礼动作中时，我就会暂时忘却身陷囹圄的现况。

大约在十点钟的时候，早饭和清洗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我就会利用从十点到中午的时间看报。我先看藏文报，然后再利用手头的那本字典研读汉文报。我从未认为自己会永远生活在监狱中。我想，如果我有那种想法，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把汉文报纸视为继续学习汉文的好机会，而且汉文对我出去以后一定非常有用。要吃午饭了的时候，我就停止看报。我提到过在那个更大的牢房里有一个窗户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那个窗户上是装了铁条的，在铁条外面有一个玻璃门，阳光可以照射进来。因此，每天下午如果不是阴天，我会把上身脱光，让阳光透过窗户，晒在我的身上，直到太阳消失为止。那真是一件让我最痛快的事情。

我还做过另外一件事情来对付那永不停止流动的时光，那就是唱歌。我唱的都不是通俗的歌曲，都是我自己随意编的，好让

我的脑子有事可做。我会唱给自己听：虽然我被单独地关在一个房间里，我却可以自由地呼吸，而且在我的心里，我还可以遨游全世界。我会唱给自己听：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可以被释放。我会说：对了，虽然如今是暗无天日，可是我能看到天边将会有好事出现。有时候我也会拟出一些审讯人员经常用来对付我的论点和指控，然后再练习如何去回答和反驳。我如此这般地反复练习那些词句，实际上是让自己易于相信我所想到的那些事情真会发生，而且我所拟出的反驳论点，也终究能发生功效。

我也用了很多时间去追忆和幻想出一些人、地和事物的样子，因为我那时实在是看不到他们的。我会把我最后一次看到我们的村子和父母亲当时的样子回忆出来。我设法用想像的能力去看看他们是否还健康，后来又可能变得怎么样了。我想回忆出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正在为达赖喇嘛跳舞，以及后来又在政府里当办事员。我想把一九六六年跟红卫兵一起回来拜访拉萨时的一些快乐情景回忆出来。我甚至还把在美国时期的一些愉快的回忆，带回到自己的脑海里来。我记起了当时对我特别好的人，当我饥饿时，我又会记起美国的苹果甜饼的样子和滋味。有时，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记起在旧金山和嘉乐啦谈话的各种细节。这些都能帮我加强自己的决心。简言之，我确曾真正地想尽办法去鼓舞自己的精神。

可是，时间一月月地过去，一拖就是几年，因此，我发现，虽然我那些生存的方法非常有用，却仍然不够。于是，只要是能给我增加希望的，或是让我不致陷入比较黑暗的和比较悲观的任何东西，我都会设法去抓住它。譬如，我记得一九七二年，当我听到北京电台播出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已经到了中国，来拜访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消息以后，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兴奋是因为我认为从大体上来说，这种事情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中国可以从此结束关闭政策，而且也许就此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那么，西藏也会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于是，现代化的过程就可能会进行得更快一点。不过，有一部分的兴奋也是出自我的私心。我希望当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以后，就可能要把一些对本国公民不

适当的政策加以改善，而且最后可能也会对我们这些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好些。当然，那个希望对我是有点帮助，却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那段时期也有几件事情是值得回味的。其中有一件还特别有趣，那就是我居然给自己织了一双毛袜。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念头，怎么会有那种念头，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当时我注意到在监狱的院子里有几头骡子，它们背上放的鞍毯，一边是皮的，另一边是毛织的。有一天，我告诉一个守卫我很想了解一下当那些鞍毯破旧以后会有什么下场。当我得知那些旧毯子要不是马上就扔掉，就是找个地方放起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些。他很快就给我找到了几条破烂不堪的鞍毯，于是我就开始动手了。我先把毛织的那部分和皮子分开，然后把毛线解开，并将它们再纺成毛线。后来，我又到监狱的院子里去寻找一些可以用来当针用的枝条。我找到了一些和筷子般大小的枝条，在石头上把它们磨尖。有了针以后，我就开始织了。不过，我要确定在没有守卫人员看到的时候才进行工作。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阻止我去做那种事情，不过，能瞒着他们去进行工作，心里还真有窃窃自喜的感觉。

也许就是小时候每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在家里的记忆：在房间里烧着火，全家人一边聊天，一边不停地做点工作——织毛线、做衣服，或是缝缝补补。织毛线的手法可能就是我从母亲和姐姐那里看来的。不管是怎么回事，那种工作一直让我忙着。我编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一双毛袜，正好给我的冬天带来了温暖。当然，这种事情还给了我更多的成就感。从客观的立场来看，一双袜子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我能在那种环境下做成，确实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肯定自己的方法，证明自己即使是处于囚禁之中，仍然可以掌握自己生命和环境中的某些事情。我想，就像一双袜子这种小事情，让我暂时忘记了一些可怕的遭遇。当时真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获自由，即使可能，又要等到何时？那时的舒适程度确实比我以前所经过的任何监狱都要好，但那毫无期限的牢狱之灾，却使我的内心痛苦万

分。由于这些原因，我的情绪经常很低落，还有健康上的问题。

我在长武监狱时就得了慢性消化不良的毛病。我的身体机能出了问题，经常有严重的腹泻、胃痛和气胀的痛苦。我曾向守卫人员报告过，他让我去看监狱里的医生。医生给了我一些药，却并不太有效。久了以后，我只好自己揣摩出一种方法来对付这种痛苦。当我痛起来了的时候，立刻就在地上躺下，而且开始控制自己的呼吸：先是把气憋住，愈长愈好，然后再慢慢地把气送出去。以后还要收紧胃部的肌肉，并让肌肉蠕动，同时，用手在胃部按摩。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那样做就有效，可是，那种把控制呼吸、肌肉以及按摩合在一起的方法居然能消除最难过的胃痛和腹胀。我现在有时仍然还采取那种方法。

当我在桑益监狱的时期，还是有定期的审讯和写不完的报告。在报告里，我必须写出从前的罪行以及详细地说明新的想法。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我的想法还是没有改变过。可是，我也知道，将来我是否会被释放，多少也和被认为我的思想确实已经“改造”了的想法有关。所以，那时候我就只好尽量捏造些我认为他们会喜欢听的词句，当然，我也不会去承认那些严重的指控。我会坦白地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当年在印度批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这类的事情。真是很不得已，心里一直感到非常沮丧和无助。

正式的审讯没有在长武时那么频繁（也不太激烈）。从某个角度来看，那种审讯的过程真像是一场充分排练过的舞台剧一样。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总是提供同样的答案。我的回答是日久成自然，我想，即使是在睡眠中，我也可以安然撑过那些审讯。只有一次我记得是场比较特别的审讯，有一个审讯人员打了我耳光。

我最后终于能被释放和我当初会被囚禁，对我来说，同样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天，在没有任何预兆和准备的情况下，我被送到监狱的主任办公室去了。我一点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心里极端疑虑。

主任姓乔。当我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心中的疑虑变得更深。

我记得那是冬天，非常冷。可是，乔先生的办公室却显得温暖和友善。里面生着火，他没有对我叫喊，也不像平常那些审问员那样问我一些有敌意的问题。相反的，乔先生不但很温和，而且还很客气。他很友善地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那边为我放着一杯绿茶和一支香烟。等我坐定以后，乔先生才开口说话。他是一位镇静的汉族长者，也是干过革命的人。他面带微笑，直视着我说：“如果有人因为在不明白情况的时候犯了错误，那是可以原谅的；要是他能认错，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会让他转向光明的道路上去。我要你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政策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希望你能重新做人。”按照以往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家摆弄和指控。我在心理上没有接受恩惠的准备。所以，当时实在无法了解是怎么回事？他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又来设一个什么陷阱？要是和我当年畅怀直叙，在咸阳监狱的情形一样，图一时之快，最后受罪的不又是我自己吗？当我在考虑如何应对时，我心跳不已，手足无措。

乔先生坐在那里微笑着等我开口。最后，我凭自己的直觉反应，不再重复以往那种麻木不仁的答案，而决定冒一次险，将自己的感觉和盘托出。我感谢他热忱地叫我来他的办公室，也感谢他能为我着想。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决定回西藏来当时脑子里的真正想法是什么。我告诉他现在我知道了自己一再在犯错，有时还缺乏判断的能力，对于所受到的宽容非常感谢。我还说明自己最关心的就是西藏的人民，表明自己一定会相信共产党，因为我觉得共产党可以帮助一般的藏族大众。我告诉他从共产党人员一开始来到拉萨，我就觉得共产制度可以把西藏变成现代化，把西藏人民变成可与现代世界并驾齐驱的公民。因此，我要跟随共产党的领导，也赞成西藏自治区的设立。我是忠于住在西藏的西藏人，尤其要忠于劳动大众，当然也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我说完以后，发现自己浑身直抖。当时乔先生没发一言，我却很明白，无论结果如何，这次的见面已经是到此为止了。我们都站了起来，看样子乔先生好像还很满意。他在我肩上拍了几下，面带笑容。“你需要什么吗？”他问。“不，谢谢你。”我说。

等到我的脑子再度清醒时，我已经回到自己的牢房里了，竟记不得是如何回来的。

在那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是难以理解的。起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的日常生活照旧，也没有人提起我和乔先生见面的事。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后果。最先的那几天，我是既紧张又激动。我是否会受到处罚？真的又是一个圈套吗？要不然，我是不是就要被放出去了？那种可能性真是太让人高兴了。不过，我很少让自己有那样的奢望。那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当我在学校里被斗垮而送进长武监狱算起，已经有三年多了。三年了，谁知道还要挨多少年？

几个月又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动静——或是好的，或是坏的——我心里觉得那次跟乔先生的谈话，肯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就在我快要确认那次会面是毫无意义的时候，有一个姓王的来看我。他是上海人，资深的政保干部。他带来的信息很简单，“今天我们就释放你，”王先生说。“你被拘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决定放你出去了。我们现在认为你已经受到了适当的教育，变成了一个新人。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了，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要你去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大吃了一惊。要是你像我那么希望，甚至梦想那种出狱的事情，而且希望和梦想得那么深、那么久，你一定也会觉得那是一种幻想，而且还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当那种幻想一旦成真，就难以置信了。有一会儿我说不出话来。当我又能说话的时候，我也只能勉强地说出我很感谢，而且我一定会努力去为人民服务的话来。当时我真的是茫茫然。

在放我出去以前，有些正式的手续还得办理，那反而对我有好处，因为那样我就会有时间重新镇定下来，并且开始体会一下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效应。有一些重要的表格必须填好。当你被拘留的时候，有一些程序照理是应当按照政府的规定办理的。主管单位应当签发拘留的公文。可是，当我转到西藏的桑益监狱时，任何正式的公文都没有送来登记。所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那天当我可以出狱时，我还得等那些承办人员去填表、签章，而

且还要把所有文件写成两年多以前的日期才能符合规定。当然，我绝对不去介意他们的违规行为，除了能重获自由的念头以外，别的都无关紧要。

当王先生把一切官方手续办完了以后，他告诉我下一步会发生的情况。“按照规定，”他说，“你将被送回到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去，因为你是在那边拘捕的。他们会在那里为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工作。”我谢谢他，再一次说明会听他的话，尽量努力去为人民服务。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终于自由了。

十一

我重获自由那天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

经过多少岁月的等待，我始终没有放弃希望，突然间，一切事情都转变得特别快。王先生把该办的文件报备以后，立刻就到仓库里去把我的东西取出来，那些东西是我刚到桑益监狱的第一天就存进去了的。等我查点清楚以后，他就帮我把东西放上了一辆吉普车，不到一会儿工夫，我们就到了监狱的高墙外面，马上就开上了去拉萨的道路。

正因为我又回到了正常的人间世界，那一阵子我简直就无法遮掩内心的喜悦。那是一个温暖而又有阳光的日子，云彩浮悬在熟悉的山巅。车行所经，有良田，一片青绿的苗穗正开始成长，覆盖着地面；两旁有民屋，间或亦有零星店铺，凡此，若为自由之身，鲜加注意，因为并无任何奇特之处。现在看见这些，却感到异常清新。路旁熟悉的景色，随着车行的速度往后消逝，我当时真像孩子似的，热切地注视着，贪看不厌。

当我们到了拉萨以后，王先生把我领到一个大房子里去了，那栋房子曾经为达赖喇嘛的父母所有，现在已改作招待所之用。他给了我一些粮票，可以用来买食物，还给了我大约有三十元的现款，足够让我用到回学校去的时候。我在招待所住的那几天，

还去看了几个老朋友。同时，也有人来看我，桑吉啦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我上次跟红卫兵一起到拉萨时在旧地重逢的一位女士。从五十年代起，当我还在拉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她，这次她来看我，实在是让我既惊又喜。我对她那种亲切善良的品格，印象非常深刻。

我很庆幸能毫无拘束地看到很多的人，并且还能在他们之间走动。不过，我也看得很清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我的生活还是会困难重重。

大多数来看我的人都很对我很好，不过，他们都很谨慎（桑吉啦是个很特殊的例外）。他们大部分都跟我保持一种距离，所以我立刻就感觉得出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存在于我们之间。其理由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对我的朋友也好，或是对其他不认识我的人也好，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刚出狱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受到怀疑的政治犯。即使在情况好的时期，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已经就有其问题性了，而今又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是正常的关联也会让人格外注意。因此，当我获释的欢欣渐趋平静以后，代之而起的问题就是在某些方面，我仍旧还是一个囚犯，因为我有不寻常的背景和名声。

另外有一件我没预料到的事情也开始让我心烦。当时我所处的环境，其实还是我从前在那里生活过许多愉快年华的城市。从前我住过的几个房子的地址，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拉萨已经不再像是我的家了，我也不觉得是属于此地的了。自从我离开以后，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所以，对城市本身也好，对我自己也好，我们彼此都觉得很陌生了，就像是两个分别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再度相逢的时候，起初是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想，这种过程，当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就曾经感觉到好多次的震撼，现在——至少也是暂时的——我真不觉得是回家来了。

恐怕对我自己村子那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的父母自从被很多原来都是邻居的人斗垮以后，现在都不再住在我们的老家了。所以说，哪儿是我的家呢？古确？拉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是属于哪儿的人呢？突然间自由了，我竟觉得没有根了，

到处流浪。我从来就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感觉，真让我悲伤，也有点害怕。幸亏政府还为我安排了去路，否则就更惨了。

过了几天以后，王先生的一个同事来把我送上了去成都的飞机。在成都有一个保安人员来接我，于是，我们一起搭火车到咸阳的学校去。我们到达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

到了那里以后，我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自由真的非常有限。当我还在那里等他们的决定时，就有人通知我去跟一个叫罗桑顿珠的男子同住一个房间。他是西藏从前的一个僧官，有人控告他曾经猥亵过男孩子。把我跟他放在同一个房间住的意思也就是把我跟他归入为同一类型的人，这种安排不就很明显地表示如何看待我吗？我们两个人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那里没有牢房，也没有铁栏。不过，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而且对待我们两个人的方式也差不多是相同的。

等待学校决定如何安插我的那段时间，真是很难熬，因此，为了免除心里的焦虑，我跟些在校的学生一起到乡间去参加白天的劳动。没有人告诉我那是必须去做的工作，那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情。在开阔的田野间工作能让我的心境舒畅，可以和一个大一点的团体接触，而且所做的事情也还称心愉快。我回来以后，精神大振，还得知已分派到学校的印刷单位去工作，职务是做装订的事情。我以工人身份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四十三元。

那份工作并不是我所期望的。当然，做订书的工作远比回去坐监牢要好得多，可是我仍然感到失望，因为我原来的计划是应该被训练成为一个学校的老师，而今，这个计划却已经变了。我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打算将自己的才智和学来的东西贡献给西藏。然而，我当时可是什么都无法进行了。

那个印刷厂是直属教育系统的，共有六十多个工人。我工作的单位有一个负责技术方面的老师，也是领班，名叫魏世步，是陕西高原农民出身的。他的上司是刘培元，从前干过革命，现在是印刷厂的领导。印刷厂负责印刷教科书、练习本，以及信纸、信封——都是学校里每天必须用到的东西。

我们每天工作八小时。那里的工作对我来说从前都没有经验

过，刚开始时有点困难，因为我必须在实际操作中用很快的速度去学会那些新技巧。我学会了如何装订书本、折页，还要用竹刀平整书页。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只有一台是真正的机器，我们必须用很原始的切纸刀操作，把纸张切成各种大小的尺寸，或是把装订好的教科书修齐页面。有时，当魏世步不在的时候，我就要单独操作切纸刀。为了快点把工作做完，有时就会出错，操作起来显得笨手笨脚的。跟我一起做工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农民），看见我那种力不从心的样子，都会觉得好笑，叫我蛮干鬼，意思就是“魔鬼师父”。其实他们是说我又想要做得多，又想要做得快，却又不先把基本技术学好。不过，我起先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要把印刷的技术学精，而是要面对每天的现实问题：如何去善用那一点工资过日子。

按照当时的物价，我那每月四十三元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生活。我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一直等到我终于为自己列出了一个很周详的计划以后，才稍稍安心。我决定应该把全部收入的最大比率用在食物上。我的健康状况不好，在监狱里就得了一种慢性消化不良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当身体上的健康情形衰退时，就很难维持心理和情绪上的正常性，精神上的力量也就会日渐减弱。所以，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决定把每月四十三元工资当中的三十六元用在鸡蛋、牛奶、米、面、青菜和油上面，这些都是恢复精力、保持身体健康的必需品。我当时每天都会早点起来，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有一个送牛奶的妇人每天早晨五时许就来了，于是我便起来买鲜牛奶。每天我给自己两个鸡蛋、牛奶和馒头，在其他工人起床以前就做好、吃完。我一直都那么做，是因为当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我仍旧记忆犹新。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早餐时吃那么多东西而去传播谣言，说我还在过资产阶级或是美国式的生活。每天的午饭我就吃青菜汤和更多的馒头或米饭。我发现那些东西吃起来很舒服，而且容易消化。晚饭时，我就吃一大碗面条，没有肉，却加上很多醋、酱油和葱。每天我都在期望着吃一顿晚饭，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吃起来比在美国时吃的牛排大餐更有滋味！

因为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食物上了，当我对付其他必需品时可就得出心裁了。房租和电费是由学校付的，不过，其他日用品及衣服的费用就只能从每月所剩下的那七元里去支付了。因此，为了生存，确实要想尽法子去做妥善的安排。煤炭很贵，我必须尽量少在家里煮饭，尽可能去公共食堂吃饭。如果一定要在家里煮饭，我就把装订书籍剩下的废纸卷成纸团当燃料，以代替煤炭。烧纸时烟很多，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最好要尽量避免让人家注意我，所以，我烧纸煮东西的时候都在室外，而且在一大早。我每年也就因此而省去了很多燃料费。同时，我想学校里的各种火炉已经制造了很多乌烟和灰烬，从来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每天早晨煎蛋的那一点烟和灰。我在其他开销上的经济算盘打得更紧。我当时对人家丢弃的垃圾观察得特别仔细，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我经常都能找到一些像扫把、脸盆之类捡回来还可以用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自己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在衣服方面。幸运得很，当我出狱时，我所有存放在库房里的旧衣服全都拿回来了，甚至有些从前在美国买的衣服以及刚到学校时他们给我的整套蓝布棉袄和棉裤都还在。那些原有的衣服开始时足以应付我的需要，不过日子久了，当然会破烂。衣服破烂以后，我就变成了缝补大师。开始时是这儿补一方块，那儿补一方块。我到处去找可以用来补衣服的布，不久，我的外表就受到了影响。那些方块逐渐成群，慢慢地就重叠在一起了。有些衣服我需要常常补，后来，连哪儿是原来的料子都看不出来了。总而言之，我变成了一个拾荒大师。我从垃圾桶里找来旧鞋，先把它洗干净，只要是跟我的脚大小差不多的，就拿来穿。我记得有一天我真的像中了一个大奖似的。我看到一个叫做拉旺啦的藏族老师，他要把一件当初还不错的毛皮大衣丢掉。我跟他说，如果他把那件大衣丢掉，我就会去捡回来穿，于是，他干脆把那件大衣给了我。其实，那件大衣已经不成样子了，经我利用空余时间整修了不少日子以后，终于变成了一件可以穿的大衣了。同时，我织补袜子的手艺也非常出名。大家都知道我有法子把那些完全破了的袜子用来当材料，去织补另外的袜子，补好以后，还看不

出原来部分和我织补部分之间的接缝。

虽然在那段时期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当我回忆起那种尽量把衣服缝补再穿的方式，心里的感觉是既好笑又好玩。若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当时看起来一定像个小丑或流浪汉。可是，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和地点，我那与日俱增的“无产阶级”外表，几乎就是一种光荣的标记。正因为我曾受到指控和监禁，我永远忘不了早年在咸阳学校里的遭遇。当时我那些比较时髦的美国衣服竟然遭到非议，由此受到怀疑。我的同学曾经说我看起来太美国化了，应该听毛主席的话，“改造”我的穿着。我当时真的是敢怒而不敢言。譬如，我有一双很好的尖头皮鞋，那是达赖喇嘛的弟弟在纽约送给我的。同学们称之为“火箭鞋”（我猜那是因为鞋尖看起来像是火箭的锥形头部），我只好把那双火箭鞋拿到修鞋子的地方去叫鞋匠把那个让人看不顺眼的尖端切掉，让那双皮鞋不再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也把一套美国式的西服改成让人看起来不会奇怪的中国式样，同时还把几条相当宽的彩色领带重新剪裁成腰带。当然，这些努力最后还是徒劳无功。可笑的是，以后我所做的事情，还是因为实际的需要——并不是政治上或思想上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模范。

长年累月地努力工作（每星期六天，只有星期三下午的政治学习才能休息），以及如何去尽量节省开支就占了我日常生活中最大部分的时间。从某方面来看，那样的生活还算是好的，因此我就很少有时间去想那些现实生活以外的其他事情了。因为我每天不是要集中精力去忙装订的工作，就是必须积极去寻找燃料和衣物。我大部分的生活时间都是单独一个人过，我的最佳伴侣就是那个中国制的红旗收音机，我可以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的广播电台。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有学生知道我在收听，就向上级报告，说我“收听敌人的广播”。我觉得必须停止收听，于是，在那些非常孤独的日子里，我迫不得已，只好独居无伴了。

让我放弃收音机，强迫我和一个非礼幼童的被告者同住一屋，同事们把我当次等公民看待，因为他们也把我视同罪犯，在

这种环境之下，我对自己前途的悲观情绪与日俱增。我真的是不属于任何一方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在我那可疑的政治身份。虽然我已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仍被认为是一种罪犯，一个政治上的敌人。因此，名义上我是自由了，人们还是会跟我保持距离。没有人公开地回避我，可是，大部分时间人家都不愿意太接近我，也不会接受我加入他们的社交圈做他们的朋友。在心理上，我实在很难去对付他们那种犹豫的态度，尤其是当我想到自己是冒着艰难和危险，一心回来要为自己的西藏同胞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时，心里就更不好受了。如今，我是——在内地而不是在西藏——卑下地做些对我自己同胞没有多少直接用处的工作，而且还被人家看作是带有传染性政治病菌的人。我愈想愈觉得必须快点采取一个积极的步骤去达成——也许我应该说是去抢救——一些我从前的希望和梦想。因此，在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获准暂时离开自己的工作单位，回拉萨去探亲，我当时就有了一个计划。

自从回到学校以后，我对自己的情形想过很多。我刚出狱那几天的感触应当是很自然的，因为我离开故乡很久了，当然不易与人立刻再变得和从前那样亲近。如今，我体会到在内地工作，前途并不乐观，因此，便觉得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应该还是在西藏。我知道获准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也知道还是应该继续不断地试，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来。这是我自己的推理方法。当初我被送到学校时，我要面对各种困难。当我被斗垮入狱时，我要集中精力，只求生存——在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如今，我自由了，生活在内地而不是西藏，我必须改善自己的身份，以便设法回家去，即使是千里路遥的旅程，也是要从第一步开始的。

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结婚。我知道那是可能的，因为当我刚出狱的头几天，我的老朋友桑吉啦就来看我，她当时就给了我这类的暗示。当然她没有多说——她是一个羞涩却又很机智的人，绝对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明真意。不过，当我们交谈的时候，她表示得很清楚，说她当时是一个人住，很寂寞。我们已经

认识很久了，言下之意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我当时尚无成亲之心，因为出狱还不到两天，实在还没有结婚的念头。后来，我把自己的情况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愈想愈觉得那还真是个好主意，而且，心里也承认了桑吉啦可以是一个理想的对象。

我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子，和我一样，也吃过不少苦头。当她和她的妹妹还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不得已，只好自谋生路。她们利用仅有的一点钱，在拉萨开了一个店做卖酒的生意。不过，做那种生意是最复杂的，对没有经验的年轻女子来说，日子是不好过的。到她们酒店来的客人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物。他们都很粗鲁，喝酒过量，经常不付账，而且还老是动手动脚。当年即使有维护治安的人员，也没有帮上什么忙。他们对两个以开酒店为生的女子并不同情，治安人员自己有时也会喝醉，照样成为问题。所以，生意也就慢慢地维持不下去了。在她们那种生活环境中，两个女孩子几乎就没有机会遇到会娶她们的正派人士，也没有人会去帮她们挽回生意。

当酒店的生意失败以后，桑吉啦的生活就变得很危急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妓女，想要赚点钱维持生活。可是，因为她很羞涩，而且又很客气，所以有人经常会占她的便宜，不付钱给她。因此，连那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没有成功。在那种情况下，她另外又找了一个自救的法子，就是和一个木匠结婚。可是，没想到他竟是美国人所谓的花花公子。他不是个可靠的丈夫，经常贪玩，不去做工。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桑吉啦的公公就乘他不在家时对她动手动脚。当她丈夫在家时，他还经常打她。于是，她只好找机会逃走，想到印度去。有一次，当她想要逃到噶伦堡去时，几乎死在路上了，没有达成她的计划。她的丈夫尾随着她，强迫她返回拉萨。最后，她还是想要逃走，这次终于达成了心愿，在靠近锡金和不丹边界的亚东定居了下来。

在那里，桑吉啦遇上了一个富有的商人，他们结了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去世为止。那时，她带着所有的财产（主要的是她第二任丈夫生前给她的一个精致的纯金项

链和一个金子做的首饰盒)，搬回拉萨去跟她妹妹住得近一点。跟我一样，不到几年就遭遇到“文化大革命”，被迫把自己的珠宝包括她的金项链和金盒子，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卖给别人。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桑吉啦在以后的几年里必须生活得非常谨慎。我一九六六年跟红卫兵去拉萨时就见到了她，当时，她的生活情形就是那样。

我决定向桑吉啦求婚有好几个原因，大部分都是现实问题。其一是，我想，跟她结婚就可以在我住过多年的城里有一个家。另外还有，我想，真能在拉萨有妻和家，就会让我将来比较容易获准从现有的工作地点调到西藏来找一个工作，因为西藏才是我所向往的地方。而且，有了家室以后，就有助于解决我那老是感到与人隔离的问题，缩短和人家接近的距离，让人家不再经常视我为外人。最后，桑吉啦的年龄适合我，是我认为的合适人选。当时，我们两人都已是中年人了。我还有自己的计划，甚至还有一些期望和梦想。要是我去跟一个年轻的女子结婚，就可能会有孩子。我的工资养不了家，而且孩子们还需要照顾和教育。我不会有时间去追求那种梦想。同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会被桑吉啦吸引住。我了解她，她也了解我。我们都没有年轻人那种愚昧的幻想，我们都经历过苦难，我们都曾下过痛苦的决心，我们都很明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尊重她，她也尊重我。我们都愿意过简朴的生活，而且把我们的问题看得很透彻。

回想起来，我认为和桑吉啦结婚所下的决心是我一生中下得最好的决心之一。她一直就是一个善良、能干而且独立的女性。我们一直都能在和平的气氛中共同生活，因为我们彼此都能互相了解。当我们同意结为夫妇时，我们在口头上订了合约。桑吉啦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而我却对现代的科学和工业特别感兴趣。我们从一开始就同意不会对彼此的信仰和价值观加以批评或轻视。我们从未有过问题，而且一直就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过，当时也有一个问题。从法律上来说，我已经在美国的西雅图和泽青啦结了婚，不过，那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似乎和我目前的生活毫无关联。我不可能会再见到泽青啦了。在中国，

经过了谴责和入狱的灾难以后，我在美国的生活已不再会成为我目前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了，甚或也不可能和我的前途有什么关系。那时，我已经离开美国有很多年了，也看不出会有再回美国去的可能了。因此，我上次的婚姻其实不应该阻止我和桑吉啦结婚。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错事。

我在拉萨和桑吉啦一起住了两个多月。当时她受雇为建筑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元二角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她的住房很小，不会大于十尺宽、十五尺长的。跟其他在建筑工地上的人一样，她也是穿着缝了又补的破烂衣服。只要有机会，在她回家的路上，她都会把找到的树枝或其他可燃的东西带回来烧饭。事实上，她那种仅能勉强过日子的情形，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学校里的状况，真是不相上下。

我当时住的拉萨，也就是我上次以西藏红卫兵身份回去所看见过，而且还让我惊讶过的拉萨，什么也没有变。粮食的供应很缺乏，经济情况很紧张。生活必需品只配发给在城里的居民：规定每人只能有多少斤的酥油、米粮，而且也只偶尔在节日时期有肉品。这种配发食用物品的范围，仅限于那些可以证明在当地能合法居住的人。那些资格不合格的家庭就配不到粮食，他们的孩子也不准送去城里的学校上学（政府在那些艰苦的年代，严格执行那种规定，不管是在内地也好，在西藏也好，都要防止大量的民众涌进大城市里去）。市场上只有萝卜和马铃薯，即使有钱可花，也几乎不能像从前那样容易买到肉类或酥油。

无论如何，在我结婚后的那段短暂的日子里，我好像就生活在一个快乐的梦境里。桑吉啦的收入仅够支付她自己的生活费，那时因为我跟她同住，开销就得增加，所以我们每用一分钱都必须很谨慎。她仍旧继续在工地上工作，我也尽量去找些杂工。我到一些认识的人家里去替他们缝补孩子们的衣服。有时我也去附近的河边捡些芦秆回来，干了以后就可以当柴烧。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好像非常艰苦，可是，以后再回忆时，却觉得其味无穷。奇怪的是，我们当时并不在乎过穷日子。我想一半是因为我觉得又重新有了一个家，还有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而且，她也爱我。桑

吉啦是一个很可爱的藏族女子，坚强得很，同时又有一颗善良的心。自从生活在一起以后，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就更加深了一层。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她老早就开始对我有意思了。当我还在监狱里时，她每天晚上都把我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这点发现使我非常感动。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连接得愈来愈坚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生活得很快乐，一想到得暂时分离，心里当然会很难过。我明明知道终于还是必须回咸阳去，而且，那是一个毫无选择余地的事情。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学校正在等我回去，要是我不回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匆匆地回去看了一下父母和老家的那个村子以后，我就离开了拉萨。那是一个凄风苦雨而又寒冷的早晨，我当时的心情正和那种情景一样。

在旅途上没有什么可以鼓舞我的精神。车行的路线穿过一片绵延不断而又茂密的森林，在工布和西康地带，经过七天弯弯曲曲的山路，我们就到了昌都。又过了六天，从昌都到了成都。在成都，我搭上火车，又过了一夜，才抵达西安火车站。那趟旅程相当的长，正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下。当我把一切看见的情形加以衡量以后，由我和桑吉啦共度的新生活所得到的快乐，不但被在家乡见到的变化所冲淡，而且也被那短暂回家探亲时的痛苦感触弄得很不愉快。

当我正回去看一下老家的那个村子时，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那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的父母双亲仍然健在，不过，他们所受过的苦难却刻画在他们的脸上了。由于长久缺乏滋养身体的食物、适当的衣着，以及足够的医疗设施，他们看起来都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他们告诉我：自从我弟弟因为有一支枪而被抓去后，他们的财产，包括羊群和其他牲畜，曾经两度被拿去充公。多少年来，他们都是生活在仅够温饱的水平之下。他们的健康情形——他们那拉长的脸和枯瘦的身躯——几乎使我心碎。我没有在家呆满一星期，因为他们的粮食不够给我们大家一起吃，事实上我在家时，他们所得到的粮食几乎减去了一半。同时，因为我那次并不是回去定居，所以更显得心里不安。我当时仍然还被列

为可疑分子，对于他们的痛苦真是爱莫能助，也不可能帮他们改变当时的处境（不过，几年后，我却能对他们有相当的帮助）。

虽然村子本身的情况并不像我父母的境遇那么糟，看了以后却也同样令我非常难过。当我回到古确村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那个老村子比我年轻时要显得贫困得多。他们告诉我那个村子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改成了人民公社，后来却没有产生让人感到愉快的结果。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村子虽然算不上是个富裕的中心，在旧日的老制度下倒还过得去。在公社制度之下，所有的土地、农具和牲口都从每个家庭的手中拿走，而归整个村子共同所有。结果，每个人所生产的分量就少了。人口是在增加，而村子里的财富却没有增加。所以，当时村里的人愈来愈多，他们所享有的东西反而愈来愈少。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想得出一个好法子来改善环境，事实上也没有人会鼓励任何的改革。因此，当我在翻山越岭的旅途上，有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脑子里转，我跟新婚的妻子分开以后，一直不停地往远方漂移，而且去的地方又不是我的故乡，所做的事情也不能称心满意！

到了西安火车站以后，我立刻就回学校去了。不久，我又得面临我的婚姻问题。我先请求主管单位正式承认我的婚姻合法，可是，当他们告诉我无法批准时，我真的气愤极了。他们知道我在西雅图已经和一个女人结过婚，因为在中国重婚是不合法的，所以校长拒绝签发任何文件。不过，我还是决心去办好这件事情，所以就去见教育系的主任孟先生，向他说明我和泽青啦在西雅图结婚时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办的，根据中国的法律，那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婚姻。因此，在法律上来说，我并没有和任何人结过婚。我当时的决心非常坚定，理直气壮地陈述我的立场。孟先生听完以后，终于让步了，签发了必要的公文让我目前的婚姻合法化。不过，我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

虽然我的婚姻当时得到了校方的正式承认，可是，准我回西藏去的那线希望仍然是遥遥无期。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消失，一年以后，事情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桑吉啦住在拉萨，一直抱着总有一天我能回家去的希望。我继续做着订书的工作，却无法解决

我所遭遇到的问题。

后来，在一九七六那年，有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那年秋季，有一天我正在咸阳火车站给印刷厂卸运一箱一箱的纸张，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报告：毛泽东逝世了。

当时，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和大家一样，表现得非常惊讶与悲戚，不过，我并不是真的那么难过。虽然我相信毛泽东在世界的历史上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我却不赞同他那永无止境的阶级斗争，以及把人民分成斗争者和被斗对象的那种政策。牺牲了那么多人民的生命对中国有什么帮助？当时，我的脑子转动的速度也快得惊人。我想，也许这件事情就要使中国有所改变了。要是在政治上能开始减少疑虑，变得更民主些，那么，我回来以后，让我受灾受难的政策，也许就会放松一些了。

有很多人真的是感到非常难过，尤其是乡间的农民。听说有人听到毛泽东的死讯时，当场就晕倒了，也有人在大街上嚎啕大哭。那些情形我并没有亲眼看到，不过，类似的报道是很普遍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时也发生了一些让人紧张的事情。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人，她没有听到那个消息，穿着华丽的衣服出门，而且还浓妆艳抹了一番。到了街上就被人打了一顿，因为人家认为她不尊敬毛泽东。我的心里非常明白，所以继续守着自己的本分，和国内的其他大众一样，耐心地等待着。

和大家所预料的一样，有一阵子，什么变动都没有。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北京一定斗争得很激烈，当时却很难在遥远的咸阳感到任何影响。不过，那时的情形已经和毛泽东去世以前不同了，大家都有理由去期望，抱着乐观的态度。而且事情终于有了进展。不久，那个把“文化大革命”带上最坏局面的“四人帮”便受到了谴责，还关进了监狱。后来，在一九七八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中央全体委员会里，大家都很清楚，党里的温和派占了上风。那次的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的政策改变。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完全遭到否定。第二个是党里的官员强调要用推

动经济建设来替代阶级斗争。所有从前用来助长阶级斗争的力量和资源都要转而发展经济和建设现代化的政策。我真是再高兴不过了。我觉得这些改变不但会去除对我个人的压力，也会对所有的汉藏人民都有好处。我不仅希望能早日获准回西藏去，也希望政府那种现代化的希望能让西藏更容易达成同样的目的。我虽然充满了新的希望，但是，事情的发展却经常都和我所期望的不尽相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宣示的论调，把我的精神鼓舞起来了。于是，我就去见学校里的主管，请他们把我调到一个在拉萨的工作单位去。我知道有一项文件提到政府应尽量把丈夫和妻子安排在同一地方工作，我以为当时政府最有可能去实现该项政策。可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容易。

按照当时国家的法律，你不能任意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工作做。你是被分派到一个单位去的，只有在另外一个工作单位答应收留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转过去。要是你得不到许可而自行走动，你就找不到工作。因为无法谋生，也就不会有安身之处，那么你终究还是必须回到原单位来按照规定行事，否则，你就只有因为自己的愚昧而自食其果，要不然就得在法外求生存。多数人都不会把后者当作一个抉择。

开始的时候，我的上司根本就不理我请求调职的事情。他们说在拉萨找不到任何单位接受我。当我坚持我的要求以后，他们终于答应让我自己到拉萨去三个月。他们说，如果我自己能在哪一个单位里，找到可以安排我去工作的职务，我就可以办理调职的手续。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他们对那种情况一定也很清楚。

我真的去了拉萨。虽然能和桑吉啦重逢是件好事，而寻找工作的滋味却实在不好受，因为客观的条件实在对我不利。在那三个月的最初时段，我不停地按照人家提供的线索去找，结果都是不成功的。每回发生的故事都是那么一套：我会听到某单位可能有一个工作，也可能适合我去做，于是，就去跟他们谈。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就告诉他们有关我曾经进过监狱，以及被认为是

政治犯的事情。一听到我的历史背景，你就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不需再谈的讯号。我从一个工作单位走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每次发生的故事都是相同的：非常抱歉；目前没缺；谢谢你来申请。一扇扇的门继续不断地把我关在外面，让我愈来愈感到挫折、气馁和愤怒。真是莫大的浪费。我已经三十过半了，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能写三种语文。可是，我却被安排去做卑贱的工作，而且还非法地把政治和罪犯的记录强加在我的身上，因此，那就保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用我。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仍然还是像在监狱里一样：铁栏是看不见了，而结果却还是一样。

三个月过完了，我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便请求校方再给我一点时间去找工作。学校里的人不同意我的请求。我的假期完了，必须立刻回学校去。第二次的请求得到同样的结果，甚至于还受到更严重的警告：要是我不回去，他们就要停发我的工资。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无论怎么样也不回学校去。我必须在拉萨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我开始说谎，我告诉他们我病了，必须送到医院去。后来我又告诉他们我的妻子在健康上有问题，需要我留下来照顾她。我尽量想出理由来搪塞他们，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于是，我又停留了另外三个月。既然知道他们要停发我的工资，我就得设法找到一个工作，让自己能调到拉萨来。

我不知道要是我当时无法找到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可是，大约在一个月后，当我经历过无数次的失望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在西藏自治区卫生局工作的女士，她不但勇敢还很仁慈，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她给了我一个工作，要我在疾病预防站教英文。她不害怕。我对她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而且竟愚笨得以为一切的挣扎都可能成了过去，因为那时已经有人愿意给我工作，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有关文件了。

当我拿到了所需要的文件以后，就直接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劳动局去。我希望他们能在当地替我办理调职的手续，而不必再回我们学校去办。我的运气还真不错，他们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临时教课的工作。我的学生是卫生局的一些职员。我得到的工资正好解决了我的经济问题。不过，事情当然也不那么容易。在咸阳

的工作单位不准我人在拉萨而办理调职的手续。他们要我立刻回内地去。

于是，我又搭上了汽车到咸阳去。当我们在昌都停下来时，我在一位从前在咸阳学校里的同学那里住了一夜。他极为热诚地接待了我。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受人冷漠和猜疑地对待，对大多数的同班同学都感到害怕，如今，能得到一个热诚的接待，心里颇为愉快。我一边回味着当时的际遇，更希望那种情形象征着我的前途会开始好转。可是，当我再次回到学校以后，却发现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回到咸阳的当天，就急急地跑去找我工作单位的主管。我告诉他找到工作的情形，把有关的文件交给他，并请他保证要按照从前的承诺，把我调到拉萨去。“不行，”他说，很抱歉，我必须好好地了解。尽管拉萨劳动局发出了准许调职的文件，在咸阳的学校领导却决定不遵守他们的诺言。

我实在无法形容我的愤怒之情。当时我想我是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实际情形。学校里的人把我送去拉萨，原来是个虚伪的动作，是一种残酷的权宜之计。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学校的主管从来就没有让我走的意思。他们绝对不要冒任何的险。他们不相信我，所以，对他们来说，把我一直留下来是最容易做的事情，要冒的险也会最少。我自己却从未考虑过永远留在咸阳的可能性。所以，当时的情况实在不是我所期望的。有一段时期，我差点就要急疯了。我几乎获得了我所期望的自由：我在拉萨有了妻室，而且至少有一个人愿意冒险给我一份工作。我实在无法想像我一辈子留在学校里干那种卑下的装订工作。要是我不去改变那种身份，我将无法觉得自己像其他的人那样有人的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无法正视任何人，还觉得应该为自己向别人表示歉意。

我相信关键应当是在我的犯罪记录和正式列为低层劳工上面。当务之急就是要设法把那些问题改善一下。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我认为如果不能在学校里找到满意的答复，就应当到北京去，即使得不到学校的许可也要把自己的案子直接到国务院去申诉。那可真是一种不顾一切而采取的行动。

按照法律上的规定，我有权把自己的案子送到北京去解决。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也垮了，知识分子以及一般的人民，若是觉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冤屈，政府鼓励他们到北京去申诉，把各人工作单位对他们所施的不当行为提出来，要求平反。国务院照理是会愿意听取所有的申诉的。可是，我知道我们学校绝不可能批准我去做那种旅行——去控告他们没有适当地处理我的案子（以及其他事情）！事实上，要是学校当局发现我打算去做的事情，把我抓住了，其后果将会如何，简直无法想像。我很可能又会被送回监狱去。不过，即使那样，又还能比我当时所过的生活会坏到哪儿去呢？我实在觉得自己的立场是很正直的，即使要冒险去做，也在所不惜。于是，我就开始进行策划了。

十二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我挟着一小包的衣服，溜出了自己的房间。我住的是一个砖砌的平房，距离火车站还不到几百米远。我明知大家都在看着我，当时在场的有很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大部分都正在洗菜准备做晚饭。起先，好像没有人发现我要做什么，可是，后来，我的同屋，也就是那个有骚扰小孩子前科的罗桑，发现了我的行动。我一直在看着他的反应：他原先正要进我们住的房间去，可是，却转过头来往我那个方向盯着看。明显得很，他是看到我了，而且，当他注意到我往火车站走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转身快步走向学校的办公室。我不想跑，因为那会更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我还是加快了脚步。当我到了车站里面以后，便迅速地跳进了一个停在侧线上的空车厢里。

我很明白罗桑要去做什么，他一定会把看见我逃走的事情向上级汇报，以便为他自己立功。而且，毫无疑问地，他们也会立

刻追查我的行踪。我的心跳加速，可是我必须停下来，镇静一点，想一想下一步该如何做。我当时不知道要再过多久他们才会开始搜查我，无论如何，那是不会太久的。

我不知所措地到处张望，那时才刚过下午五时，去省城西安（距离在咸阳的学校约四十里）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到了那里我才能买到去北京的车票。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在侧线上停着装满了煤炭的火车，其中也有一两个空车厢。我看见有一个空车厢的门开着，就溜了上去，并且把门关上。我独自在那个黑暗的车厢里，连自己的心跳都好像听得见似的。

不到几分钟，第一批来找我的人就到了车站。透过门缝儿，我看得见从学校里来的人气冲冲地到处走动，到处打听，在车站和各处的车厢里查看。不久以后，他们又分头进行，进行比较有系统的搜查。有几个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来了，我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于是，我便尽量保持不动，控制呼吸。有一次，有个汉族人爬上了我躲藏的那节车厢对面的煤车顶上。他和我之间的距离只有几丈远。在那个时候，我害怕得几乎就要窒息了。他一直注视着我那个车厢，当时，我觉得我们的视线好像还交织过。好在我真的连一片肌肉都没有动过，所以，虽然他正对着我这个方向看，却没有看到我。他们继续搜查着，有一阵子我觉得在那里很安全，不过，每当我以为他们已经离开了的时候，又突然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离我近得很：“他在那边，就在那边。”“往火车底下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动。”有一阵子他们都离我很近，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可是，当夜色渐浓的时候，寻找的活动就缓下来了，终于，一切活动都停止了。

我的运气实在好极了。因为对于不能获准回拉萨的事情，一直令我非常气愤，而且，我从未隐瞒过我的怒气。因此，学校当局判断我必定是往西朝着西藏那个方向走，他们就注意看紧到柳园站的火车，那条线可以前往青藏一线。他们从未料到我会往东走，去北京。因此，大约在晚上九点左右，我就顺利地潜上了慢慢开动的火车，由它把我带到西安市的中央车站去。当我到了那里以后，我立刻就到车站里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这下可把我

仅有的一点钱差不多花光了。没有人来阻拦我，他们都把我要去的方向猜错了！

当火车在黑夜里向北京滚动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思考。大部分旅客都睡着了，而我却兴奋得坐立不安。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匆忙地决心采取这个步骤的，不过，从我没有得到许可就离开学校那一刹那开始，事情就不容我再多考虑了。我若回去，后果会如何，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只好往前冲，希望能逢凶化吉。我的钱所剩不多，那天晚上就没有买东西吃。我不但饥肠辘辘，而且还忧心忡忡，可是，我绝对不做第二打算，无论什么事情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好了。

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才到达北京。那天我把仅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个馒头和一些青菜当早餐，其余的时间只好喝些开水，不过，饥饿还是我当时最不担心的事情。到站后，我就发现那里的情况不对了，我当时感到十分惶恐：那里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很仔细地注意每个旅客，还会拦下一些人来检查他们的行李。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我会就此完蛋了吗？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的下落？当时我变得全身都麻木了，整个人就像在梦境里一样。

我机械地把自己的东西拿好，跟随着其他旅客下车。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即使我不是他们那时想要找的人，只要他们把我拦下来，我就完了。我没有旅行证明，也没有工作单位发的介绍信。只要他们把我扣留下来，他们就会向我的学校查我的底细，那不就全部都要揭穿了吗？

我在月台上慢慢地走，尽量避免和别人的视线相接触，而且还要行动得自然一点，以免引起人家对我的注意。那时，我每走一步，就好像突然会有一只粗手猛抓我的肩膀，或是会听到一阵尖叫向我喊来，要看我的证件。然而，那种情况居然没有发生。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在找谁，不过，至少他们要找的并不是我。我很庆幸，能通过第一关，却不知道自己的好运还能维持多久！所以，我立刻在候车室里找了一个灯光明亮的地方，开始撰写一份申请书，那就是后来我送到国务院去申诉的原稿。正因为天亮以前我无处可去，所以整夜留在车站里面写那份申请书。我是用汉

文写的，对我来说，那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花的时间远比我想像的要长得多。不过，我很清楚自己想要说的话，我心里早就有了腹稿。有一部分时间我非常专心地在思考我的申请书，竟忘了自己身处何地；另外一部分时间是处于恐惧之中。我在那里过夜好像没人不在乎似的，不过，警察却每隔一阵子就照例在那里巡视一下。我尽量不让人家对我产生怀疑，也尽量克制自己的恐惧感。我还自我安慰地想着：要是他们当时就把我抓起来，他们就会看到我写的申请书，他们便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哪里，受过什么委屈，那么，我的案子也许仍旧会得到审查的机会。

天亮以后，我的计划还是没有成为定案。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去提交申请书，也不知道该去向谁申请。而且，我还需要找一个比较固定而又不被太多人注意的地方住下来。更麻烦的事情我想还是在我们学校那边，他们一定不会把我的案子不加处理。要是学校得不到有关我的正确消息，他们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来控告我，说我可能跑到西藏去了，或是逃往印度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了保护自己，我在城里走了差不多六里路才找到一个最近的电报局。我打了一个电报到学校去告诉他们我在哪里，我为什么到那里去，而且还说明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我想校方接到电报后，一定会火冒三丈，不过，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又能怎么样？要是他们在我逃跑时就把我抓住了，那我成功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可是，当时共产党已经公开地欢迎受过冤屈的人挺身而出，况且我已身在北京了，所以，远在咸阳的学校当局不可能会有力量阻拦我去法院申诉。要是我必须再回到学校去，届时我就可能遭到残酷的报复，不过，当时我想他们也就只好让事情自然地发展下去吧！虽然我那时并没有完全脱离险境，但突然间我又感觉到事情的发展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

发完电报后，我继续在市区的街道上走着，希望能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灵机一动，我就走到北京广播电台去了。我知道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同学，就是在那里当播音员的旺久先生。当他听到了我的情况后，起先他感到很紧张，我看得出他有点害怕的样子。不过，他还是决定把我当朋友接待，所以，就直接去见他

的上司。当他把我如何来此的实情向他们报告了以后，他们便准许他让我住在他的家里。当时他是和妻子、女儿同住，我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一夜。

旺久答应收容我，真是够朋友，而且勇气可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份友情，所以，直到现在，我们都非常亲近。他当时不仅给了我一个过夜的地方，还尽其所能地帮助我。当他发现我没有钱时，便给了我二十五元做生活费。我想把一些衣服给他当抵押品，可他怎么也不肯要。他既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把我所需要的钱给了我。有些人经常都不理睬我，离我远远的，或是不愿意冒险跟我接近，这些对我来说，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获得他那么仁慈的照顾，的确让我感激不尽。

我只在旺久先生家住了一夜，因为第二天（我在北京的第三天）我得知国务院给在“文化大革命”时受了冤屈而来请求平反的人，提供了一个房费很低的招待所，那个招待所很容易找到。当我到达时，那里已经挤满了很多来自国内各省的人士，大家都是来申冤的。那里甚至于还有来自内蒙古的。来到那里的同胞们，人数确实不少，而当我发现每个人的遭遇都跟我很相像时，我就不再感到那么孤单了。我进到那个房子以后，就一步一步地打听申诉的方法和步骤，希望法律能还我公道。不久，我就开始相信那种希望毕竟是有可能的了。

首先，我找到了一位负责人，向他说明我的情形。他就是负责和新来的申请人联系的，而且也帮着安排应办事项。他直截了当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有没有旅行证明？我把实情告诉了他：我没有文件，离开学校时也没有得到许可。我还告诉了他一点有关我自己的历史背景。他好像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状况。很多其他来到那里的人也跟我的情况很像，而且也冒了类似的险，有的甚至还冒了更大的险才到达这里。这里的负责人毫不迟疑地决定让我住下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打听好该如何着手办理申诉事宜，下一步就是到调查人员的办公室去。来申诉的人可真多，所以，调

查员的办公室有好几排房间。按照指示，我先到一个大办公厅去。到了那里以后，我先作自我介绍，并且向一位负责人报告我的受害经过。他很仔细地听着，还把我的话不停地记了下来。当我把初步资料诉说完了以后，他就把我带到一位王先生的办公室去。那位王先生就是主持调查我这个案子的人。在我进去以前，那位从大厅里带我过来的青年，把我拉到一边。“记住，”他用很客气的语调对我说：“你可以把什么话都告诉王先生，千万别害怕。”在那么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连你最要好的朋友都可能会出卖你，告发你，而今，我却能完全自由地说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征象都显示着党是真的有决心要为过去受过冤屈的人平反。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王先生是位很沉着的长者，从一开始接下我的案子，就鼓励我把心里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不要害怕。他要我把事情的原委从头说起，把我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他，同时，也要说明我特别想要解决的苦情。我于是便按照他的指示，向他报告，并且把我第一天夜里在北京火车站写好的申请书交给他。我向他说明那是什么文稿，而且正式请他替我转到国务院去。王先生对这种事情好像并不惊讶，也不觉得我这种请求有什么不妥之处。他把那份申请书从我手里接过去后，立刻就看完了全部内容，做了一些笔记。对于一些特别的情节，还问了我一些问题。

在我的申请书中，有三个重点。第一点是：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无辜受害者，因为我被诬告为美国间谍及西藏民族主义分子而入狱。我从来就不属于那些集团，而且从未参加过。第二点是：我被关进监狱以及被定罪，都未经正式审判，我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尊重。而且，在我被释放以后，既没有获得任何合法的消案，也没有恢复我的法律权益。第三点是：我现在有妻子住在拉萨，而我的工作单位却在咸阳。虽然党的政策允许夫妻居住在一起，而我的工作单位却拒绝批准我调到拉萨去。

我的申请书是一份很激动的文稿，其中充满了我多年来郁积在心的情结。我谈到在我们学校里所见到的残酷情形，以及我

自己在身心两方面所遭受到的痛苦经验。我写下了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却仍然不能自由的感受：虽然我从未受到正式的审讯或判决，却被视为罪犯；虽然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且还可能会对国家对国家有大的贡献，却被当作卑贱的劳工；甚至还把我和我的家乡隔离得很远。当我记起所写下的一些细节时，心里不觉就开始紧张了起来，因为我曾经很急切地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表达在那个文稿上，而且还是在车站里，当时，铁路警察在我面前来回走动。不过，没多一会儿，我就发现无需那么担心，因为王先生并没有任何惊异的表示，也没有立刻加以任何批评。当他看完我的申诉书后，做了一些笔记，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就叫我回招待所去休息，两天后再回来见他。他说，在那两天内，他会仔细审查我所陈述的内容，并且也会和他的上司研究一下我所请求的事情。他对我非常客气。当我即将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叫我要小心点，因为他知道我跟很多其他来申诉的人一样，都没有旅行证。虽然我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情绪非常低落，不过，心里却充满了这么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希望。诚然，我仍旧还要等别人来决定我的命运，可是，大家那样慎重与仁慈地对待我，就已经给了我一个莫大的鼓励。

当我在招待所等待的时候，我就静下心来回忆一下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当时，那里的制度就像是一系列赛跑用的跳栏似的，每个申诉人都必须跳过去。我在每一个阶段陈述的内容——和其他的人一样——都要经过评审，然后，或是被驳回，或是被转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做进一步的审理。这种过程，我想就是用来去除一些不正当的，或是毫无实据的申诉。要是你的案子能够继续跳过那些栏杆，最后一定会得到国务院最高层人士的处理。当然，其间也可能有些危险的事情会发生。

虽然王先生从未向我透露过（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学校曾经想干预我的申诉过程，他们好像是在我等待消息的那两天里进行过一些活动。当我在北京时，咸阳学校有一位周先生，正好也因公来了北京。所以，学校在接到了我的电报以后，立刻就通知周先生，叫他到国务院去“看着扎西次仁”。我后来发现周先

生不但到过国务院，而且还跟王先生谈过话。我无法知道学校当局是否给了他任何明确的指示，不过，我确实知道周先生并没有对我的案子采取过任何不良行动。事实上，他可能还真的帮过我的忙。虽然周先生当时已经“被解放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是受过迫害的，而且他也看见过很多要好的朋友曾经受过迫害，所以，他是有过痛苦经历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是无从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从事情演变的结果来看，好像他很同情我的遭遇，而且也证实过我在申请书上所写的很多细节。要是在咸阳的学校当局当时想要把我的案子弄糟，他们就送错了一个来监视我的人，因为，当我回去再见王先生时，他很明白地告诉我说，我的申诉还是很有希望的。他又仔细地问了我一些有关的情节，然后就告诉我说我的案子即将交去给一个大一点的单位讨论，他自己也会去参加讨论，叫我第二天再回去打听结果。

当我再回到国务院时，王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他们那个单位认为我已经按照正当的程序提出了申诉，而且一切手续都很合法。他们会把我的申请书转呈到最高阶层的委员会去做最后的判决。听到了那个消息以后，我真是高兴极了，可是——一听到下面的那句话，我又立刻回转到现实的环境里了。因为在他们的判决书里还有一部分是：我的申诉书的确会转到最高审查单位去，不过，他们也特别说明，只有在我的苦难发生的地方——我从前在咸阳学校的工作单位里，才能完全解决我的问题。

我当时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我从前所经历过的苦难，又涌进了我的脑子里，那时候，我觉得这次申诉的过程，好像又是一个用来愚弄人的恶作剧。那只不过是让人以为可以得到帮助的幻觉。结果总是相同的，和已往的故事一样。我很机械地谢了王先生，感谢他们全体同仁对我的仁慈和体谅。然后，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我不要回那个学校去，”我大声地叫了起来，“我要回西藏去，我是那里的人。我痛恨咸阳的学校，你们也不能强迫我回去。”当时我一直叫喊着，完全无法自制。王先生看起来既惊讶又震撼，却没有跟我对抗。他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然后就正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扎西次仁，要是你真的照你刚

才冲口而出的气话行事，那你就会铸成大错。”他只说了那么一句话，但他当时说话的神色却立刻把我镇住了。我本能地对王先生很信任，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诚恳，而且在全部申诉的过程中，一直都很支持我。我当时对他大喊大叫，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所以，不久以后，我只好强忍着内心的失望和疑虑，去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且同意再一次回到学校去。我当时也让自己明白，这次回去并不是单枪匹马了，国务院一定会把他们的调查报告及建议送到我的工作单位去。我必须抱着希望，相信我一定可以讨回公道。我最后的惟一要求是向王先生表明自己身上没有钱，怎么回得去呢？他微笑着告诉我说，他们会给我提供路费，于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在回咸阳的火车上，我在脑子里反复地思量着很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一会儿我会心灰意冷，非常悲观地觉得回去以后会受到批评，被处罚。所以，这次去上诉的事情可能连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一会儿我又好像充满了希望，我相信校方最后一定会慎重考虑我的案子，因为国务院已经那么做了，中国共产党也有意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害的人平反。因此，我不觉得应该有什么遗憾，不过，无论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我只希望能快点把事情处理完毕。我当时虽然满怀希望，却无心久等下去。

回到学校以后，我一大早就直接跑到校长家里去跟他谈。他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这个学校里受到批斗。不过，他过去的罪名已经洗清了，而且早已“解放”了。那时他的政策是走非常强硬的路线，好像就是要向那些从前批斗过他的人表示不必再怀疑他了，叫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我相信他早就知道我那未经许可而去北京的事情，所以当我去敲他的门时，我担心的是不知道我会见到哪一位校长——是那个能了解被别人用不合理的方法批斗有何滋味的？还是那个仍然觉得人民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要看他如何对付我的？当然，没等多久，我就看出来了。校长的妻子来开门，她立刻就带我进去见王校长，他当时正在吃早饭。他看见我以后，一开口

就说：“扎西次仁，你给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和全部同仁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印象。从来没有人做过你刚干过的这种事情！我并不是说你没有去北京申诉的权利，不过，你是未经许可而去的。你违反了校规。这是很严重的过失。”

他一开口说话，我的情绪就变得非常高涨。当我激烈地向他回话时，我可以感到自己眼睛里噙着由愤怒而产生的泪水。“我没有请求任何许可而去北京，是因为我很清楚，学校是绝对不会批准我去的。这个学校一直就是我的最大敌人。我是抱着很大的信心来这里的，可是，我却在这里被大家用不合理的方式批斗。我曾经被安排在集体缓刑的行列里，后来又被抓了起来，还应学校里的群众要求，把我关进了监狱。我从未接受合法的审讯，而且，当你们把我释放出来的时候，居然还用罪犯的身份来对待我，限制我，把我定为最低贱的劳工，完全没有考虑我所受过的教育和能力。我并不是说你一个人作了这些决定，不过，所有对我不利的事情，都是从我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才发生在我身上的。你想，我怎么会觉得我能去向这个学校求助？”

我停顿了一下，当时，校长也没有说什么，因此我又继续说下去。不过，我的语气却显得比较温和一些了。当我有意提醒他在斗争大会上被谴责的滋味时，我的眼泪直流不停。那种毫无自卫能力而且又不能诉诸事实与真理的感觉，是何滋味？我说我想他一定会同情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也曾经受到不合理的处置，而且还曾经希望能帮助自己的同胞，帮助自己的故乡，而那种希望却不断地、不公平地被击碎了。“请恕我如此唐突，”我重复地说着，“不过，也请了解我的心境。”因为他无意阻止我，所以我就尽情宣泄了我的怒意和沮丧。我特别指明了一件事实，那就是即使当我被释放出狱以后，我还是很明显地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虽然党的政策明文规定应该让夫妻在一起工作，我却不被准许到拉萨去和我的妻子团聚。“这下你该明白了吧！”我最后对他这样说：“我没有在这里请求任何人帮助我，是因为我不相信会有哪一个人愿意帮我的忙。我自行到北京去，是因为我认为那是惟一可行之路，别无更好的选择了！”

我说完了。校长起先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屋子里显得格外安静，连时钟跳动的声音都可以听见。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你的行动给学校和全体同仁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你必须写一份自我检讨的信，说明你破坏了校规，要向你的同事们道歉。信写好了以后就交给你的单位主管。”就那样，我们结束了那次会谈。

校长的反应和决定，两者皆和我所预料的结果没有多少差别。也许因为我那时相当愚蠢，以为学校当局可能会当场承认错误，立即下个决心，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当时的结果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那么好。不过，当时的结果超出我所料的意思则是——若从现实的情况来考虑——没有谈到监狱或直接受罚的那种事情。当时既没有勃然大怒的情形，也没有任何可怕的恐吓态度。我甚至于觉得要求我写一份自我检讨书，可能还是让校方保持面子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当时也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便回自己房间去开始写检讨。

我写的自我检讨书，第一次写得很激动，充满了怒意，并且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中，我详细地列述了所有被冤枉的事情，大致和我向国务院报告的相同。当我把那份检讨交给单位主管审阅时，他几乎立刻就退还给了我。他说无法接受那份检讨，里面充满了各种借口和自我辩护。于是，我又重新再写了一次。我认为第二次写得比较温和，也比较合理，但是，他还是退还给我了。虽然我当时仍然不知关键在哪里，却明白了要用一些手法才能过关。所以我就写了一份简明扼要而且歉意十足的检讨。而且在检讨中说明我对于违犯校规以及让学生和单位同仁为难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

这次的检讨信写对了，我也知道可以被接受了。所以，我的单位主管便召开了一次自我检讨的集会。那次集会的规模很大，到场的人数最少也有六十人，学校里的全部员工都到了——没有学生。当时的用意是让我向所有的同事道歉，因为他们好像都曾因为我的行动而直接为难过。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是多么的紧张，也当然知道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群众斗争大会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我自己被批斗的那一次。历

史是否又要重演了？

集会开始时，他们叫我站起来大声地念我的自我检讨书，大约念了五分钟。念完以后，他们准许我对我所说的话加以解释，于是，我便说明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我会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有些工人曾经好几次打断我的话，对我加以批评。为什么我不相信学校？要是我能向自己的主管报告，他们一定会支持我提出的请求。他们说他们认为我只是想要为自己辩护，甚至于连现在也还是一样。

他们对我的反应并没有令我惊讶，在那种集会当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是很正常的。那种场合不仅是用来处罚和当众羞辱犯错的人，也是给大众表达忠诚和正当思想的机会。要是说当时在集会中有任何事情发生得很不寻常，那就是有人还真正敢支持我——公开地。在所有自以为公正、善良和带着批评性的声音当中，有一位女士——孙太太——她可真的很同情我的遭遇。“让我们听他说，”她说，“他有那么多事情要说，他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应该听听他的故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令我高兴极了。以前从来就没有人会对我如此同情和支持，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孙太太的勇敢精神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她还敢说出来，就象征着“文化大革命”中最过分的负面作用已经消失了，而且在咸阳的学校里，那种现象也看不见了。由此可见，一切情况的确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中。

那次集会开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在结束以前我就已经承认自己违犯了校规。我向同事们道歉以后，就回到自己房间去等候校方对我的处置。我没有期望他们会提前为我作任何决定。当时我已经很了解办事程序了：等到时机成熟以后，他们当然会告诉我他们想要告诉我的事情，我是无法去催促他们加速办理任何事情的。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不久，我又回到从前那个装订单位的行列里了。我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底从北京回来的。那个自我检讨的集会大约是在两星期以后举行的。很快地，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就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前，我什么消息都没有听到。当

我最后终于得到了学校的决定时，不由得让我大吃一惊。我简直就无法相信：学校当局竟然发出了一项正式公文，记载我曾非法被捕入狱；他们要给我补发全部未领的工资，包括当年我被列为集体缓刑时所失去的那部分工资；而且，应当立即把我从工人身份重新安排到知识分子阶层去。我所要求的事情全部都办到了。我连做梦也没想到居然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成就。我茫茫然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让自己好好地清醒一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和失望，我终于胜利了。

十三

和多年前从桑益监狱那种多少还有附带条件的释放相比，我这次的解放真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立刻就交上了好运，一切事情都变得很肯定了。我的工作地位马上就改变了，没几天，我就被重新分派到国家语言中心去工作。该中心位于学校的另外一个角落，跟装订部门不同区域。那时我的身份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而不再是一个普通工人了，以后我的工作自然也应该会和我新定的身份相符才对。同时，我也不必再和罗桑同屋而居了。在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以后，整个屋子也就成为我一个人了。于是，那些曾经让人用来衡量我（也曾让我用来衡量自己）的无形的枷锁，也就自然地消失了。

我那重新得到的自由，几乎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因为我同时也富裕起来了，即使只是暂时性的，也够让我高兴一阵子。他们立刻就把钱发给我，那些钱是补发我那些年在监狱时期所应该得到的。虽然我每月的工资少得可怜，累积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又因为是一次付现，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在那刚开始感到兴奋的日子里，我给自己买了一台日本制的收音机和录放机连在一起的大型音响设备。有了那套新的设备，我又重新开始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节目，他们都好像是我失去

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那时的政治气氛已经可以让人公开地追求这种享受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尽情地收听各种节目。

在国家语言中心，我获知自己将会继续被训练为一个英语老师。我原先也曾受过那种训练，可是，在我入狱后就中断了，现在能再得到这种机会，令我感到格外的兴奋。我自认为在教育方面真的可以贡献力量，其理由不仅因为我受过训练，也因为我在生活上有过实际的经验。我曾经努力地追求新式的教育，其结果是增长了我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而且，也激励了我要回西藏去的心愿。我认为有的藏族人士可能也愿意以我为例，追求同样的目标；每当我觉得能帮助他们去达成那种目标时，心里就会无比的高兴。

因为我很久没有机会练习英语了，学校方面决定把我送到西安外语学院去参加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训练，以便让我温习一下以前学过的英语课程。所以，在一九七九年的正月，我便搭火车去西安，这回是得到学校的许可而去的。我很高兴有机会再去学习英语，因为我已经很明白自己的确需要在英语方面得到一些帮助。当我重新开始收听美国之音时，对于自己的英语能力会退步得那么多，自然感到十分惊讶。多年以前，当我离开华盛顿大学时，听英语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时我每天都得阅读英文，用英文写作，当然也还需要借助于词典或别的帮助。然而，当我在监狱里的那些年，用英语的机会几乎完全中断了，而且，有一阵子我还担心从前所学的东西可能全部都给丢掉了。可喜的是，光收听收音机就开始把我那些老技能恢复了过来，所以，我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在外语学院增进我的技能。走过了十二年左右的弯曲道路，终于我又重新回到了正途。

那里的学生比我预料的多，来自全国各省。由于人数多，必须分班学习。我被安排到一些和我程度差不多的学员班里，其中有些是老师，也有各行各业的生意人和专家。很多都是来加强一下他们的英语能力，因为他们有的即将选派出国去进修或代表中国驻外工作。当时的情形很明显地表示中央政府有意向外发展

了，把重点放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是我回国后第一次感觉出来的。那种趋势非常好——我认为对中国有利，对我自己也有利，特别是有利于我回西藏去的可能性，并且一定会发展得比我预计的时间要快得多。

上课的情形非常令我满意。教科书是外国人写的，有些老师也是从外国请来的，像我的朋友诺门先生就来自澳大利亚。从“外面”请老师来的这种事实，我想就是中国开始向外发展的另外一个征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绝不可能有外国人在学校里教书。我们用的书当然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在教室里也要说英语，所以，我进步的速度很快。我发现班里大部分同学的英文都写得比我好，不过我的会话能力却比他们强。我从前在美国那些年所养成的说话能力，好像还保存了不少。我们白天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晚上不但准许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而且还受到热烈的鼓励。那种收听的效果对我们的帮助大极了。

那段时期我非常快乐，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困境。我不但觉得自己的能力恢复了，也觉得又和整个世界连接上了。自从我回国以后，那时才第一次写信到外国去。我写了一封信给华盛顿大学的魏理教授，因为他的地址是我惟一还记得的。不知怎么回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中受罪、入狱，而他的地址却一直还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信中，我问到萨迦泽青以及其他我认识的一些教授和同学，告诉他我很想收到他的回信。魏理教授从未回我的信。后来我才知道他很生我的气，因为他觉得我一意孤行，不去替流亡政府工作，就是背叛了达赖喇嘛。不同的立场真不知有多少，大家心里的情结也不知究竟会僵到什么程度！可喜的是，虽然没有得到魏理教授的回信，我却收到了好友梅尔文·戈尔斯坦的信。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人的事情，也告诉我说他即将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虽然我无法到北京去跟他会面，至少和一位在美国的朋友重新联络上了，当时我心里真是感到非常高兴。而最让我兴奋的还是，从那时起，我能有更多的力量去开创自己的前途事业，那种力量，在以前的岁月里简直就是不可能有的。

在外语学院上了六个月的课，当我回来以后，便急着要回西藏的家里去，所以立刻就申请调回拉萨。可是，我却得知校方要我最少也要暂时在那里多留一些时间，因为他们正在做计划，要成立一个英文系，需要我帮忙。要是在几年前，他们可以毫不考虑地不批准我的请求，然而，他们现在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好像真是由衷地要我留下来，所以，我没有生气。不过，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我不能立刻回拉萨去，就该让我把妻子接到学校来和我同住。校方同意了，甚至连我和桑吉啦的机票钱也付了。不久，我就去了拉萨——不是像上次那样去桑益监狱，而是回我自己的家去把我的妻子带回来跟我一起生活。

我在拉萨差不多住了两个星期，虽然桑吉啦很高兴能看到我，可是要她跟我一起到内地去，没想到却费了不少唇舌。原因之一是她不要离开她的妹妹。她们曾经在一起受过很多苦难，相依为命。当然，那也不是阻挠她离开的惟一理由。我曾提到过桑吉啦是信佛的人，所以她不愿意去那个她认为是“无神论”的汉地。我很尊重她的想法，很耐心地开导她。我提醒过她：在咸阳她仍然可以和在拉萨一样在家里敬佛，我们也不会永久住在那里。不会有问题的。

桑吉啦终于同意了，不过，当她决定要出门旅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非常紧张和刺激。她从来就没有坐过飞机，有关坐飞机的任何事情对她来说都是很新奇的。当飞机到达巡航速度的高空时，我们就超出了云层，那时，她能往下看到很多高山上面的雪峰。那种景象，真的把她给迷住了。

当我们在成都下了飞机以后，首先，桑吉啦被那么多的人群给吓住了。她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说，真怕我们会在人群中被冲散，所以，她就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寸步不离，一直到我们安全地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才松手。因为那也是她第一次坐火车，除了对火车本身的一切都感到兴趣以外，那些车窗外面随着铁轨韵律而掠过的异乡景色，也令她着迷。我想，当我们到达学校以后，在她第一眼看到了我的宿舍时，一定很震惊。自从罗桑搬走以后，我就自己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是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很

大，天花板很高。过去几年我一直都是关在小得可怜的牢房里，如今有了一个那么宽大的房间住，心里真的感到十分得意。对我而言，房间里非常整洁。里面有一张床和被子，一个书桌和一把椅子，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地上的那一两个箱子里面。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其他的当然就是剩余的空间了。当时桑吉啦什么也没说，不过，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以为我一定有些大包小包的东西存放在别的地方，真不敢相信我只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不过桑吉啦并没有难过很久。她曾经领略过真正的困难，所以，当她一旦答应了跟我一起来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离乡背井、适应新环境、不会说汉话，或是其他任何一种困难，都难不倒她。学校里给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她便把全部精力都用进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她在学校的医院里做清洁工作，在那里，她的汉族同事们很快就知道了她是一个“从不坐下来的女人”。她一直不停地在动，对于那些在她周围行动缓慢的工人，她是毫无耐性的。她要求去做另外一项工作，结果她就等于做了两份工作——所得的工资也就加了一倍。她一开始接下了那个新差事，每天就在天亮以前起来，先把医院里的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在下午三点左右就把所有的病房清理完毕。她真的很努力地工作，所以有些藏族朋友会开我的玩笑，说我妻子赚的钱比我多！

等到我们都安顿下来了以后，我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正当要新成立一个英文系的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我自认为想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每当我想起当初开始学英语的经验，就记得坐在康明先生对面的情景，那时候，在我们中间，总是放着一本词典。我深深地觉得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本好词典，最好有一种藏汉英三种文字对照的。据我所知，兼有那三种文字的词典，当时还找不到。因此，我的主意就是让我来编一本那样的词典。我首先把我的意见提出来和刘德军商量。他跟我同组，是从西安外语学院派来协办藏族教育方案的。当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他的时候，他说：“那真是一个好主意！那种词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得到他那种毫不迟疑的赞同与热诚，我的精神也就大大地受到了鼓舞。于是，我们就一起写了一份正式的计划书，要求学校给

我们安排工作时间和资助，让我们编一本英藏汉对照词典。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在校的学生学英文，让他们能够学得更快而且更有效。我的单位主管很赞同我的意见，所以鼓励我着手进行，我也就立即照办。

我们开始工作时的规模很小，学校没有很多额外的经费给我们用。不过，校方的主管单位拨出一个房间来让我们工作。买参考书的预算虽然没有，他们还是尽可能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书籍，他们也不让我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基本上他们是付我工资去编词典，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助理。我曾经考虑过要找的人选，觉得最适合和我一起工作的应该是刘德军，因为他对我的计划特别热诚。当我去问他的意见时，他当场就满脸笑容地答应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十三日，我们开始工作。起初我们只打算编一本小词典，给学生们在学校里用。因为我们什么都是从头做起的，所以就必须决定如何选字，如何分类，以及如何表达。我们从最简单的字开始选用，也就是先选日常生活必须用的字，那些字都可以用在实际的会话中。我们把使用频率高的字先包括在选字的范围内，那也是我们选字的首要原则。然后，我们便慢慢地扩大范围，把一些比较专门的和比较抽象的字也包括进去。起先我们用来当作模板的是刘腾言的《英文日常用语词汇》。不过，我们最后还是以侯恩比的《高级实用学生词典》作为最重要的蓝本和模式。我第一次看到那本词典是在外语学院的时候，那位从澳大利亚来的老师诺门先生给过我一本。因为我们发现侯恩比的编辑方式非常实用，所以就采用了他的方式来编我们的词典。不过，侯恩比的词典只有两种文字，所以，当我们开始编辑我们自己的词典时，必须用他的方式来编成三种文字对照的模式。

后来，那项编辑词典的工作竟成了我的主要职业，而且一直持续了好多年，那是一件我在开始的时候所未曾料想到的事情。那种工作非常繁琐，而且费时。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用来工作的小房间，以及里面那一箱箱的数据卡片。从现代科技的标准来看，我们的编辑方法实在很原始。我们把选好的字写在卡片

上，一个字一张卡。在每张卡片上，先写上英文字，然后就是国际音标、词类及定义：藏文第一，然后是汉文。我还记得开始的时候刘德军跟我争辩过有关排列定义的次序问题。他主张先排汉文，我却要先排藏文。结果算是我辩赢了，所以藏文排先，对于这个结果，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感到非常得意！

第一年我们努力不懈地进行工作，不过，那种差事真的很乏味，而且还要重复去做同样的事情。卡片堆得越来越高，因为每一个定义我们都要用手把它抄下来，然后还要进行反复的查对工作。我三种文字都懂，选字的时候可以兼顾全部的数据。不过，刘德军也一样努力地工作。当初我请他帮忙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最适当的人选，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效率相当高。他真的很勤奋，甚至于还练会了抄写藏文数据的能力。虽然他看不懂藏文，却能把任何藏文数据正确无误地抄录下来，所以，他最后几乎跟我做的事情一样多。当我们把第一期的工作目标完成时，我们收集了将近有一万个词条，包括六千多个单词。我们全部用手抄写，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得到任何现代化的工具和技术的帮助。除了没有助理人员帮助的问题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困难。

在一九八〇年的正月，桑吉啦和我两人都病得很厉害。桑吉啦必须住院，让我非常忧虑，所以我每天都去医院看她。有一天，我自己突然间也病了，因此，我不但不能去医院看她，也立刻就被送进了加护病房，一住就是七天。医生检查出我有内出血的症状，而且发了高烧。我的医生姓李，他对我很好，后来才告诉我说我几乎就接近了死亡的边缘。一个星期以后，开始退烧，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还有别的问题呢！

虽然我住的病房和桑吉啦住的同排，不过，我是在另外一端。由于我的病发得很突然，所以无法把我的情形通知她，而且也没有别人替我告诉她。后来我才知道，当她不见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担心极了。她怕我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要不然，也可能是我故意把她抛弃了。有一段时间她真的快急疯了，好在有些在医院里的人员发觉了她的问题，才把实情告诉了她，这才

让她安心。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快要复原了，可以起来行动，于是，我们之间的什么问题才告解决。那年冬天，我们两人一直都有病魔缠身，脆弱不堪。在我们的健康好转以前，索康晋美和他的太太德曲啦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当时还在咸阳的学校里当足球教练。我们早在五十年代就在拉萨的茶馆里认识了。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境况那么坏，我们当时都曾被认为是间谍，然而，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感情，真是患难之交。当我们住院的时候，以及后来正在复原的时候，他和他家里的人对桑吉啦和我真是关怀备至，替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们将会永远记着他们的恩惠。

一九八〇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的健康情形却日渐好转。开春后，天气就暖和多了，我也恢复了元气，重新回到编词典的工作上。从前花很多时间拼命工作，我猜那可能就是间接导致我生病的原因。要是说编词典的工作很繁琐，那份工作却在另一方面给了我报偿，那就是因此而让人家能对我另眼相看，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多了。从前人家对我老是抱着怀疑与恐惧的态度，如今却让我看到了友谊和尊敬。我那次未经许可的北京之行，以及所产生的结果，一定已经在大众里传开了，我可以感觉到有很多人都在称羨我的行动，而且还比较敢表露他们的情感，要是在从前的日子里，那是不可能有的事情。当时，我的同事们已经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了。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我在从事编词典的工作，大家认为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尊敬。那简直就是一个彻底的大转变。从前我被视为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可疑分子，曾经到过美国，是“美国化”的典型。在“文革”期间，“美国化”这个名词的涵义就是代表了一切坏的象征。可是，现在我则被认为是一个在外国留过学的人，学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技能，尤其是语言方面的知识，一定会很有用处的。从前我的行为被认为是顽固的，是不良态度的表现，而今，大家都说我很有勇气，充满了坚定与果断。简而言之，我当时可以睁开眼睛直视任何人，也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了。因为别人的态度多少总会影响到我，所以，从我那些同事们眼中，以及他们对我的反应中，我可以感

觉到自己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而且还是受到肯定的人格。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自然会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于是，我便快乐起来了，生活的情趣也相对地提高了，那种现象，在一两年内，可真是想像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了解不被信任与被孤立是什么滋味，所以，当时那种新的局面，让我感觉到特别甜美。虽然我的计划好像经常都会有些变动，可是，那种受人尊敬而又觉得有价值的新感受，却从未再消失过。

我的计划略有改变，是因为我们学校申请成立一个英文系的事情有了困难。我们曾经按照初拟的计划全速进行。我们大约有二十几个教员，连教室都准备好了，桌椅也排好了，甚至于还把所需的用品也堆满了一仓库。当然，刘德军和我也在积极地进行编那本词典的工作。可是，最后因为藏族学生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所以达不到成立一个新系的标准。我认为我们的困难就是当时西藏普通教育水平的结论。我们学校派人去过拉萨以及其他地区招收合格的学生，结果连一班的人数都不够，那就更不必谈招够学生去维持一个有二十多位教员的英文系了。当那项筹办英文系的计划决定要取消时，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了。

我们学校筹设英文系的计划没有成功，却给我带来了另外一个机会。编词典的工作并没有让我不愉快，而且，好容易才能跟桑吉啦共同住在一起。不过，虽然桑吉啦全心全力地投入在那里的的工作，她还是非常想念她的妹妹，同时她一直都无法习惯于住在那个地方。因此，当所有本来要安排在该校英文系任课的教员都必须另派他处时，我便请求准予调回拉萨去教书。这回，学校方面没有反驳我，也没有阻止我的去路。我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在拉萨找一份工作，我果然找到了——在西藏自治区的师范学院（一九八五年改为西藏大学）当英文老师。在我离开以前，校方为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把我的工资连升了两级，表示他们愿意把我在美国那几年的学历算作预备过程，因此也该得到承认。而且，他们还授给我“讲师”的资格（那时我其实还没有教过课）。有了那种资格，等我到了拉萨的时候，就

可以分到更好的住房。于是，在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桑吉啦和我就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了。

在我确知将要离开咸阳以前，我还没有感到自己会那么不喜欢咸阳以及那里的学校。即使在最后那段期间一切都已经有了好转，却因为那个学校给过我那么多的痛苦经历，让我实在无法忘怀。而且，那是一个与外界毫无关联的地方，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都隔得很远。所以，当桑吉啦和我再次在拉萨降落时，我心里的兴奋和情绪的高昂，远比我所预料的要强烈得多。正因为我当时的心情好，精力也很旺盛，要不然，还真不容易应付随即就发生在我们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在我离开咸阳以前，我曾经和校方的人士讨论过有关编词典的事情。我们都同意那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应该继续下去。既然在咸阳那个小范围里不能成立一个英文系，大家就觉得应该把词典使用的范围扩大一些，使它成为更有用的参考资料。西藏自治区师范学院方面同意支持我的工作计划。可是，当时的困难变得更大了，因为他们虽然很大方地给了我时间和办公室，在财务上的支持却很少，连一个助理都没有，也没有钱雇用打字员和抄写员，所以，什么事情都得由我自己一个人做。后来，我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在该项工作需要我全神贯注的时候，我每周工作七天是常事，而且每天最少也要工作十个小时。起初我还能按照这种节奏持续进行，因为我坚信这项编词典的计划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也很高兴那时新到的学校能赞赏我所付出的心血。于是，我不仅觉得终于能从事一种自己想要做的工作，而且还深信那项编词典的工作将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不朽的东西。那种贡献将会继续有其价值，即使在我离开尘世以后，其价值也许还会增加。有这种乐观的想法当然很好，可是，不久以后，那么多的工作和令人吃不消的日程表，又一次威胁到我的健康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家里也有了问题。虽然桑吉啦非常想要回西藏，可是我们回来以后，她却反而变得很不快乐。她在咸阳时拼命工作，赚的钱很多，所以，在她的工作环境内，与那里的社团相处得非常融

洽。在我们刚回拉萨时，起先她无法赚钱，所以整天愁眉苦脸，无事可做。没有她的那份收入，我们突然间也就变得比在咸阳时穷困得多，而且，我们也不能再安贫乐道地过日子，每天过得实在紧张得很。桑吉啦把她没有工作的事情怪在我头上。我曾经把她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让她不能在拉萨发展她卖酒的生意。如今，她不但没有工作，而且又不能再开店。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争吵。我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了，所以真的没有为家里做任何事情。因此，家里所有的事情，每天的现实问题，都落在桑吉啦的肩上，这些负担有时也是增加我们争吵的导火线。我很了解她所做的牺牲，但我当时实在是爱莫能助。当我的词典终于完成了以后，我在前言里面特别注明对桑吉啦的谢意，那当然是很不寻常的事情。西藏文化是以男性长辈为重的，所以，同事们经常问我为什么要谢自己的妻子。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很感激她那些年里给我的支助。也许赚钱的是我，可是，为了每天的生活，钱得变成桌上的食物、烧饭的燃料以及其他许多维持家庭所必需的用品。在那些日子里，她什么都做到了。

虽然在那段时间桑吉啦和我彼此都曾口出恶言，我们却仍然相爱，所以慢慢地，在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桑吉啦明知会遭遇到各种困难，可是，她还是决定要开一个酒店，卖我们自己酿造的酒，藏语叫“酩”。问题是要获得一张执照。当时想要申请执照的人太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什么法子都试过，也拜托过很多我们以为帮得上忙的朋友，结果都是一样。虽然如此，桑吉啦还是下定了决心要把生意做起来，所以她就不顾一切，开始非法卖酒，真是冒险得很。幸而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执照，于是，我们那段时期的生活就算是开始稳定下来。就在那个时候，我编词典的工作实在无法再由我一个人去单独负责了。即使我继续每天用很长的时间去工作，也得不到什么成果，因为我连最小的事情，最不需要用脑子的事情，都得自己去做。有时我必须步行到每一个地方去找参考资料，或是去跟一些可以帮助我的人士恳谈。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跟

顿珠卓玛啦生的那个取名为强巴的儿子，他有一个表亲，对我十分照顾，送了我一辆全新的自行车给我代步。我非常感激他。不过，我所能得到的协助，也只能达到这种地步。像我那样的工作计划，学校是不可能负担经费的，也从未有过先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会去期望他们给我钱。因此，当我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工作仍须努力时，心里真是相当的焦虑。后来，我居然还找到了一个替自己解围的方法。

一九八二年四月，西藏自治区政府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公开讨论会，目的是要听取各知识阶层代表的意见。出席的代表包括老师、作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要他们告诉政府，如何去帮助他们，给社会贡献力量。虽然是个公开的集会，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的。在拉萨的各学校、公司以及研究机关都要选派一两个代表——知识分子——去出席，那些派去的人都已经在那方面有了一些贡献。我服务的那个新学校派了两个老师去，我是其中的一个。学校里的负责人认为，我编词典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资格去出席，听到了那个好消息，我也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能派我去，也就是肯定了我的工作计划，表扬我每天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工作的苦心。此外，那也是第一次有人让我去参加那样的高阶层会议。我必须在这里指明的是，和从前跟那些流亡政府里的旧日贵族交往的经验相比，恰好相反。对于如何去找机会以及找人支持我完成那本词典，我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想起那次去北京请求平反，政府还那么慎重地研办我的申诉，真的让我对政府给我的协助感激不尽。如今，我觉得机会又来了，我必须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也许就有可能达成自己的愿望了。

那次集会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大会堂举行。开会的那个房间很长，是长方形的，中间放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们大家可以随便坐，我决定坐在会议主持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的正对面。在我两旁坐着其他两位来自我们学校的代表，一位叫尼玛维色，另一位叫次旺俊美，他们都是资深的干部。大家坐下以后，我就感觉到那次会议非常令人振奋，而且可以预料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当大家坐定以后，阴法唐便站起来致词。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邀请来的，开会的目的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尤其是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法子来，让政府能履行各有关政策，去协助知识分子。他没有用很多的字句解说，不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政府现在想要帮助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简直就被忽视了，甚至还曾受到迫害。按照新的政策，知识分子现在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了，他们的知识劳力也被视为可与体力劳动一样有价值。阴法唐很热诚地欢迎我们，他特别强调他是真的要听取我们的意见，要我们尽量自由发言，不要有将来会受到处罚的恐惧。若是在从前，我不可能去注意他那样的言论。可是，在当时那种新的政治气氛当中，我很相信他，而且在会议的形式上和所产生的效果上，都和我预期的结论相同。

那是一次真正公开讨论的会议。从前我所知道的很多会议，都是经过很仔细的安排，预先把要说的话写好，到时候大家就照着预定的计划进行，没有什么交谈，只是当众表演一下就结束了。可是，这次的确不同，是真正的会议，所以，我也就毫不迟疑地参与其事。我发言得很早，不过，我事先已经想好了一个策略。我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不是来向大家抱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能在这种会议上有发言的机会，感到非常荣幸。自从党的政策改变以后，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而且很高兴当时可以不必按照俗套发言。我说从前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口是心非的话，不敢把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虚假的赞美词和自私的怨言上。我必须把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计划说出来，把所遭遇到的困难情形向大家报告一下，而且还要说明政府如何才能帮助我。没有人叫我停止发言，所以我便继续说下去。

我先把编词典的经过简单地报告了一下，而且把重点放在其可能产生的价值上。我没有发牢骚，或是责怪任何人，我只是把纯属事实上所遭遇到的困难说出来。我说明能用来维持研究以及其他工作计划的钱是那么的少，在咸阳时，我还有一个助理，现

在我工作的那个学校连一个助理都派不出来。我向大家说明当时我工作计划的范围已经大多了，若要把事情做成功，我需要一个懂得三种有关文字的打字员。我还需要一个能和我一同工作的助理，最好是不止一个；请来的人还必须懂得那些文字，能帮着抄写，以及从事继续不断地查对各种数据。我说我很感谢自治区师范学院，他们能付我工资去编词典，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工作室。可是，如果得不到更多的支持，我实在无法完成那项工作计划。我已经是智穷力竭了，我已经没有钱了。我要不就立刻停止工作，要不就把自己那套值钱的收录机卖掉，卖来的钱也许还能让我再继续维持几个月。说到这里，我想我的情绪一定显得相当的激动。

我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用了多少时间，不过，我知道我说了很久的话。我还记得，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同事，曾使劲拉我的袖子，为的是提醒我快点结束我的话！我记得他是那样做过，可是，当时我觉得既然开始讲了，就决心将所有想说的话全部讲完。而且，阴法唐好像并不在意似的，还好像真的有心听我说的话。他很仔细地听着，偶尔也问我一些很有见地的问题——我当时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我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之类的问题。

当我终于坐了下来以后，的确有精疲力竭的感觉，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怎么样的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阴法唐竟能当众批准我的请求。在大众面前，当时他就告诉和我一起来出席会议的干部，要我们学校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财务支持。他说，如果当权的人能善用像今天来开会的这些人，一定可以造福人类。虽然当时我仍旧不知道即将产生的结果有何意义，也不知道阴法唐所宣布的支持，将会如何直接对我有所帮助，我心里却真的感到非常高兴。在我发言结束以后，别的人也继续发言，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觉得自己用的策略比任何一次的都更高明——至少我自己是觉得如此。

在阴法唐的指示下，我新工作的那个学校突然发了两千元给我用来进行我的工作，那可真的发生了想像不到的效用。我立刻

就雇了三个新人。第一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女打字员，她对三种文字都很熟练，果然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工作人员，而且，我相信她是我所有打字员中最好的一位。我也雇用了旺堆先生，他三种文字都懂，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校对员。突然间有了一批“工作人员”协助我，工作的进度一下子就快起来了，而且，我自己的生活情形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桑吉啦终于得到了她的营业执照，可以卖酒了，把生意做得很兴旺。在以后的三年内，我完成了全部扩充后重新订正过的词典，送到北京的民族出版社去请他们排印。他们接受了，而且终于在一九八八年把那本词典出版了。我想我对于自己的成就应该是感到骄傲的。我在序言里说，这本词典的主要目的是“给受过中等教育的藏汉青年，在使用英文时，作为工具书，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工具书的需要，与日俱增。”我说，“其用意是为了推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事实上，我是把那本词典当作我所要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方法，用来帮助我的同胞，让他们能追上二十世纪这一时代，同时，也让他们学会如何去和现代的世界竞争。我仍然相信，这本词典有很大的益处。不过，当我一直还在为词典工作的那些年，同时也想到了另外一个计划，那个计划的效益，可能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

十四

我回拉萨后的最初几年，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词典的工作上，同时也看着拉萨在邓小平新的“开放”政策下转变和成长。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旅客和做生意的人开始到达，于是，就很需要会说英语的导游人员。然而当时的藏族人士却无法利用那种新的机会去获益，因为学校不教英文。问题是当时的藏族学生要学藏文和汉文，如果在课程上再加英文，那么，学生们要不就是只学上列两种语文中的一种，要不然就把英文课程加上去，同时学

三种语文，可是这种作法，在逻辑上和教学法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最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为了给藏族青年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我们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我和西藏大学的同事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有一次，在谈论中我想起了当年在西雅图的时候，看到他们有给新移民教英文的夜校，上课时间是在下班以后。那种方式好像也就是拉萨所需要的，最少也可以暂时用来做一个补救的办法。因此，在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我就决定试办一下那种学校。那时我编词典的工作已经没有问题了，剩下来必须斟酌的细节也相当容易应付。于是，我便请求学校准许我进行筹划事项。果然被批准，所以我立刻就展开工作。

那时候在西藏还没有所谓的私立学校，所以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说动了一个叫巴朗雪的小型“观光”旅馆，租几个房间给我当作教室用，房租价格也特别优惠。然后，我就去定制教室里用的桌椅，聘请教员。我把重点放在尽量多聘外国人这个原则上，因为我知道他们立刻就可以提高学校的声望，让人家相信我们的能力。下一步就是做广告。我到处分送传单，鼓励年轻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学毕业生来报名。我甚至还把广告登在拉萨的报纸上，印上教室设备及一些外籍教员的照片。为了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去向任何单位申请官方的许可，我担心即使申请了，也可能会无疾而终。所以，我干脆就自行其是，结果反而成功了！自从一九五九年以后，我们看得见在西藏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变通办法。

我们第一次开班上课是在一九八五年的九月间。任课老师叫卡蜜穆尔，她是我西藏大学的同事罗伯特穆尔教授的女儿。罗伯特穆尔教授当时正在协助西藏大学开办一个英文系。没多久，我就招齐了两班的学生，多请了几位教员；教的课程，写作和会话两种都有。我租了一台坎农复印机来复印教材，在财务方面我管得很紧。学费定得很高，因为我要大家知道我的学校是很认真的。虽然我自己不教课，还是每天晚上都在那里，把所有应注意的事项都妥善地处理好。我对学生很严格，我要他们签字接受我

的规定：即使只上了半期的课程，要是他们中途退学，学费也不退还给他们。因为他们每晚都可以看见我在那里，所以他们知道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社会大众立刻就注意到了我的英文夜校，开始学英文，所以，我的事业办得蒸蒸日上。学生们都觉得他们的学费没有白交，我自己也很满意。我收来的学费不但够付一切开销，而且还有余钱在第二年给教员们加发一点工资。政府方面也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这是一位在市公安局工作的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的上司曾经跟他谈过有关我们学校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有人想要出面干预，不过，市政府的干部们最后还是决定不加干涉。以我看来，那可能是因为我的学校当时的确办得很好。无论如何，办学的主意是正确的，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现在拉萨已经有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夜校，学生人数也超过了一千名！我能很成功地创办了一个夜校，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也因此给我带来了困扰和机会。

那种困扰其实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一种。在第一年结束时，我发现已经获得了一万元的利润！事实上，当时在西藏的教授，平均年薪是二千三百元，所以，我所得到的利润可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打算过把那些钱用来买些多少年来一直买不起的东西——给桑吉啦买些礼物，做些疯狂的事情。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那时差点就把那笔钱全部给浪费掉了。让我悬崖勒马的原因是，我正好在那同一时期，回老家古确去了一次，不但见到了母亲和弟弟，同时也看到了村里的情况。能再看到自己的家人当然是件好事，而当我看到许多年幼的侄辈，仍旧和我小时候那样一字不识，可真令我感到非常沮丧。自从我离开古确去当舞蹈员以后，已经有四十年了，就村子里的教育来说，变化不大，而且那里还是没有小学。看到了那种情况，让我有了很大的感触，也给我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从那以后，我一直就朝着那个方向尽我的力量。在村里和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停地在反复思考：“在那种文盲的基础上，西藏怎么能变成一

个现代化的社会呢？西藏的教育问题究竟在哪里？”

当然，“文化大革命”曾经给西藏的教育带来过灾难。不仅是学校关闭了，当时尚存的一些学校，教学时主要是用汉语文。一九七八年的改革才把那种局势转变过来，当时发表的政策曾公开地宣称要尊重西藏的语文、宗教和文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胡耀邦曾于一九八〇年亲自到拉萨来视察。他曾公开地说过，将来要在西藏留下来工作的汉族干部，都必须学习藏语文。这项政策的宣布，对藏族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在胡耀邦视察以后的那几年，西藏的教育制度改善了，把最大的重点放在扩大藏语文的使用方面。政府设立了新学校，同时，一九八四年的官方文件还正式规定：在西藏的高等教育学院里，大多数的学生必须是藏族，而且要以藏语文为主。八十年代中叶还制定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方面的法规和执行机构。我一直相信大众化的教育和识字能力是很重要的，坚信藏语文应该是用来使西藏现代化的主要工具——那就是说，藏语文应当成为一种完整的现代化语文，既可用于讨论科学，也可用来探讨深奥的佛教哲理。这些改变都很受欢迎，而且听起来也是很有希望的。不过，当我回顾一下八十年代上半期所显示的结果，却发现，当时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行得尽如人意。

这种现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说。不过，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政策本身是好的，却在实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当一项改革方案一直往下层单位推行时——从北京到自治区政府，再到县级单位，等等——政策的原意与精神就愈来愈弱了。对于这种现象，藏族人士一般是用开玩笑的态度，拿冲淡青稞酒的酒精成分来作比喻。最好的酒（最浓的）是出自第一次把水加进酿好的青稞酒里的那种。然而，以后又再加了好几次水，每加一次水，出来的酒就冲淡一次。当然，这种解说的意思就是认为在北京开始计划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好的，愈往下走，就像愈被冲淡的酒那种比喻一样，愈来愈不行了。

另外一个理由是说，在传统的西藏社会中，教育上的成就未曾受到重视，那当然是因为农民和普通百姓根本就很少有受教育

的机会。我以为我自己的经验却兼有不寻常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一面。从不寻常的那一面来看，就是说我受到了现代化的教育；从典型的那一面来看，就连找一个学习基本知识的方法都难得不得了，并且总是要由我自己主动地去找。以传统观念看来，非宗教性的教育，在文化上简直就等于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它本身也发展不到哪里去。虽然我的父母曾经对我期望很高，他们却从未把我一生当中成功的可能性和我的教育连接在一起，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旧社会的思想中，像我这种阶层的人，谁也不会觉得有受教育的必要，这种想法在更高阶层的社会里则更为明显。西藏的旧社会里，完全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学校，学生的学习范围，超不出简单的读书和写字这一基本知识。如果贵族子弟想要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就必须到印度去进教会学校。一九四四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在拉萨试办过一个学校，想把传统的藏式教育和现代化的西方教育结合在一起，可是，那些以凶恶出名的多夺僧侣，扬言要是不停办那种学校，他们就要劫持那里的学生。西藏社会中的保守派势力，尤其是各种宗教团体，都认为现代化的教育会直接威胁到佛教所控制的范围以及神权势力的组织结构。因此，除了少数个体的实验以外，旧时代的政府从来就不愿意办理任何大众化的基础教育。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的西藏社会中，可悲的是，很多乡村里和劳动阶层里的家长们，看不出受到好的教育会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

这些观点多少有其重要的真实性，可是，当我观察了拉萨的几个中等学校的情形以后，我发现藏族学生缺少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由于层层稀释的作用，或是由于西藏文化中的缺陷，好像是有几个组织上的重要因素在那里运作。

第一，尽管在整个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比例小，却有汉族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文职专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住在那里。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干部，很重视学习的价值，也都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在拉萨的学校里为那些青年们设立一个单独的汉语教学轨道。例如在拉萨有一个中学，本地藏族学生

人数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余的就是汉族学生以及一些不同民族通婚所生的子女。

汉族学生用功，升学考试的成绩也很好，所以，他们升学——入高中和大专院校——人数跟他们全部的人口数字不成比例。在小学里，藏族学生的数字虽然远比汉族的大，而他们的表现却刚好相反。他们考试的成绩不好，升学人数的比例显得非常低。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差异，语言上的问题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初中以上的学校里，除了藏文，其他课程都是用汉文教学，而且全国性的统一考试用的也是汉文。因此，藏族学生必须用外族语言去学会那些难懂的科学课程，因为很多藏族学生的汉文很差，或是勉强可以应付，所以无法超越这种障碍，难怪藏族学生很少有人能表现得和同班的汉族学生那样好。结果就是，越是到了高级班的教育程度，藏族学生的比例就越少，因为他们考的成绩不够升学的标准。

这种局面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虽然我没有显著的地位、权势或影响力，可是，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说过：在新中国里，我们不仅要接受理论上的指导，也应该“实事求是”。既然我有了一些“实事”，而且因为近来我每次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都很灵光，我便决定再来为西藏的教育进言。

一九八五年九月，大家在拉萨开会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我知道会有党和国家的高级首长来出席，于是我便拟好了一份申请报告，陈述我对当前藏族教育的看法，以及改善之道。我谈到一些我所熟悉的学校的所见所闻，尽量提供一些客观的统计数字，说明藏族学生能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太小。在结论里，我提出三个建议：第一，政府要确保给藏族学生更多的机会；第二，用来办教育的经费要更多地去帮助藏族学生。无论以汉语还是藏语为主的教学单位，都应拥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材，以及最好的设备；第三，多用点经费在藏族学生多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即使这会造成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上大专院校，也应该在所不惜。

当我的报告内容传出去以后，大家都认为其中有批评政府当

时的政策的意味，所以在拉萨引起了很大的风波。甚至于在报纸上也有一个特写报道。若是在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我的建议是不值得特别注意的，也许会在不显眼的最后几页登上一个小标题。可是，西藏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人提出过像我那样的公开“建议”。受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训的人，都对我当时的鲁莽行为感到非常震惊，甚至还为我捏了把冷汗。我有些比较亲近的朋友，真怕我又会被送回到监狱去。

我却不像他们那么害怕。我已经发现了，“文革”以后政府官员们，很愿意倾听各种抱怨及反对的意见，甚至于像我这样的普通民众所提出的。当我那次从咸阳的学校逃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得到那么好的接待，实在令我感动。在北京的干部们告诉我说，我可以放心说话，把我所受过的一切不公平的遭遇，坦白地表达出来。他们没有骗我，确实协助我完成了我的心愿。所以，虽然我没有笨到以为我的申请书会导致重大的改革，我却不相信会因此而有什么危险。结果证明我的直觉反应没有错。我得到了好几位高层领导的鼓励，他们对我的意见都做了适当的反应和答复。

有一位干部写信告诉我说，他觉得我所描述的实际情况很正确，他会把我的文件往上呈送给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另外一位是党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他对我的诚挚非常敬佩。他还说他认为我的建议很符合中央政府对西藏教育政策的精神，所以，他已将我的建议交给了教育局的主管人员。我能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表达出来，实在是痛快极了。

在申请报告引起的风波平静下来了以后，我收到各级干部写来的贺函，虽然整个的社会生活仍旧和往常一样进行着，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动，教育方面的确是日渐有所改善，前一年就已经试办成功了一个新方案：那就是在几个中学里用藏语教物理、数学和化学等课程。不过，汉族学生的表现还是比藏族的好得多，虽然汉族的学生人数比例少，而他们升学人数的比例还是很高。

就在那个时期，二十周年的庆祝会刚完，我回古确老家去了

一次。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当地那种不可思议的教育情形。那次的经验让我看清楚了：光是在拉萨办夜校，还是没有对症下药。若要让西藏得到改善，关键是要把优质教育提供给乡村地区的所有藏族儿童，甚至于像古确这种地方，也要有良好的教育设施。要是在基层地区没有优质的教育基础，那就不可能在高中和大专里面有更多合格的藏族学生。我知道我不能改善整个西藏，不过，我却全心全意地想，至少也要为自己的老家做点事情，让我们家乡的孩子们不必再继续生活在无知的环境里。于是，我决定用我新添的财富，在古确盖一个小学。

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是一回事，要把它做好，却没有那么容易。在西藏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盖一所学校的，那是政府和教育单位的事情。虽然一万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却也不够支付所有的开销。我知道还要当地的帮助，而且，如果要把事情办成功，我就必须和政府合作。于是，我便利用很短的时间去想各种计划，并于一九八六年拟好初稿，立刻呈送到我家乡所在地的南木林县教育局。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愿意捐些钱在我们村里帮着盖一所学校，希望他们能协助我。我告诉他们说，据我所知，古确从来就未曾有过一个学校。当然，有些孩子出家了，在寺院里学习经典，可是，一般的孩子实在没有学习的地方。我提出一个老观点——仍然还是很好的一个，那就是说：群众是人类的资本。因此，我应当强调自己的见解，向他们指明：如果忽视在乡村里的孩子，就等于浪费了一批可能是很有价值的资源。

把建议书呈上去了以后，有好几个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天，有几个从南木林县教育局来的代表到我拉萨的家里来跟我交谈。我再一次表明态度，告诉他们说：我不会仓促地威胁要做什么事情。我不会不顾政府和古确的村民而单独行动。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有一笔可观的钱可以贡献出来，可是，还需要更多的钱。如果村里的人不愿意接纳一个学校，我就不能径自去盖。我告诉他们说我愿出钱购买所有未加工的材料，以及盖一个简单校舍所必须有的东西，把学校

盖好，准备招生。不过，县政府和县里的有关人员必须同意帮我维持那个学校，办理日常事务，聘雇教员，等等。我们交谈了一段时间以后，那几个县级干部告诉我说我的意见很好，可以办成，他们会支持我的计划。他们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我用这种方法来贡献力量是非常爱国的，帮助孩子们是很重要的，他们就是未来的希望，等等。当时，看起来我的梦想好像真的就要实现了，可是，又等了四年，第一个学校才开门教学。

拖延的原因有一大堆。有一部分是由于我的原因。当我正在和县级干部反复商议各项细节时，我就接到了通知，必须去北京为我那本词典做最后的校订。那本词典终于在一九八八年出版了。此外，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拉萨的政治局势很紧张，因为发生了一连串的骚乱事件。不过，同时也有一些别的问题——那是跟我自己在古确的家人及当地民众有关的。

拉巴占堆是我的兄弟，他却死命地反对我的建校计划，非常坚持己见。我曾提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家人吃过很多苦头，受过很大的迫害。当我弟弟听说我有那么多钱，并打算把钱用来做什么的时候，他便大发雷霆，觉得我不顾家。他想知道为什么我有那么多钱而不先为自己的家人着想？究竟为什么我要去盖一所学校？我家里的人很明显是需要救助的，为何我不帮助他们？他的反应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所以感到非常心痛。不久以后，情况变得更加难堪。我弟弟很坚持，继续不断地强调他的主意。没多久，所有我家的亲戚都加入了他的阵营。有时，连桑吉啦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为什么你不帮助自己的家人？你是怎么搞的？特别使他们感到恼怒的理由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在古确村盖一所学校，我就会帮助所有曾经害过他们的那些人家。在他们的眼中，我不仅忽视他们，忽视我对家庭的责任，而且，实际上我是在帮助他们的敌人。

村里的其他民众也没有人帮我的忙。他们没有一个人上过学，对教育的价值都抱着怀疑与谨慎的心态。他们反对提供免费劳力去盖学校，因为我多年前去当噶足巴舞蹈员时，曾经让他们背负过税责，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为那件事情记恨在

心，有的人还以为我一定是想因此而出名，所以才会提出这种计划来。“他就是想出名。”“他就是想要变成一个大人物。”他们说。甚至于还有人谣传我只不过是想玩弄权术，把用来盖学校的钱给自己在古确盖一栋大厦，以后就可以到那里去过退休的生活，还会骑在乡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正因为我明白我家的人当时受过很多苦难，他们的反对真的是我人生中一个最痛苦的经验。不过，我也很清楚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对自己的计划也很有信心。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我盖学校的目的，不是去帮助那些曾经害过他们的人。害过他们的人不是那些孩子。而今，是那些孩子没有基本的权利，去处罚那些孩子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应该背负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当时可能犯过的错误。真的，我告诉他们，我相信教育可能就是一种防止人们再受到迫害的方法。尽管他们对我的批评让我感到痛苦万分，我还是一直和他们沟通，我的家人以及村里的民众，终于平静下来了。于是，盖学校的计划便开始进行。

我和县政府最后签订了一项简单而实在的协议书，双方同意由我捐出一万元，等到学校盖好以后，学校就属于古确的民众所有。同时，我们也同意（用书面写的）由县教育局付工资雇两个教员。我们还同意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及维护皆由县政府负责，村里的民众也可以直接参与其事。学生的年龄为六岁至十二岁，他们可以在那里上两年学，学习藏语文及简单的数学。如果在学业期满以后，能通过为该年级学生所定的标准考试，他们就可以转到乡里的公立小学去上学。以后再按照他们各人的成绩和志愿，继续他们的升学之路。

在那以后，我们就算是准备好了，于是便开始进行工作。材料买齐了，校舍盖好了，书钱付过了，老师也雇到了。开学时，有四十六个孩子。为了筹办这个在古确的学校，花了很长的时间，当我看见村里的孩子们坐在那里学习读书和写字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这种我小时候所渴望的学校，如今已在我家的村子里开办了，而且，我还是办成这个学校的一个关键人物。我那想要帮着去创造一个现代化西藏的梦想，如今已有了

一个具体的例证。

当我开始在古确建校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不过，在开学以后，很明显的，我觉得，若是要在南木林县另外一个还没有小学的乡村里如法炮制，也相当容易。在我个人方面来说，只是要有钱和尽力推动；在县政府方面来说，只要他们继续合作就行了。然而，到哪里去找那么一笔钱呢？我去北京督导我的词典出版事宜时，已经把在拉萨的夜校业务结束了，因此，我在那方面就得不到任何的利益了。我必须另外想出一个可以筹到那么多钱的新计划来。虽然筹款的事情好像非常艰难，不过成功的可能性好像也不是没有。那时我已经从大学里退了休，所以有很多自由的时间。而且，桑吉啦卖酒的生意也做得很好，有了她的收入，再加上我那丰厚的大学退休金，我们的经济情况很宽裕，我不必为家庭的生计操心了。我决定把全部精力贡献出来，去筹款建校。我自己心里已经很明确地认定了这种工作就是我一辈子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不能只是因为很困难就退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筹款的办法。

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我决定致力于一种美国人称为非营利性的企业。多年来，在西藏从事研究工作或商务的外国人，都认为我可以给他们很好的指点，甚至还可以为他们的业务帮忙，所以，外国人到我在拉萨的家里来聊天、喝酥油茶或青稞酒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来看我，因为来访的客人一般来说都是热爱西藏的，都想为本地的人民做些好事。我正在考虑找一个筹款的方法时，我便想到那些经常来看我的客人。他们不断地给我机会跟很多的外国人接触，那些外国人可能也会乐意帮助我去做盖学校的工作。我想，与其只是请他们募捐，不如跟他们做点生意。我知道外国人在旅行的时候，很喜欢买些纪念品，经常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手工织成的西藏地毯，以及其他本地的手工艺品。因此，我便决定在家里准备好一些地毯，直接卖给他们。起初，我从拉萨一个最好的地毯工厂要来了十条很好看的地毯，以托销方式在我家里卖，我给那些来我家的外国人看，告诉他们卖地毯所得的利润，全部用在我盖学校的工程上。因为我没有业务

上的开销，可以把地毯卖得比外面的市价低。为了买主的方便，我还学会了如何把他们买的東西直接运送到他们家去。这种安排也让我可以替客人定做他们自己所喜欢的特制地毯。更令我兴奋的是，很多客人都相信我的建校计划是很重要的，所以，不但要买一两条地毯，而且还捐钱给我盖学校。同时，我还能联系到一些在欧洲和日本的店主，经常替他们购运西藏的书籍。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真是奇妙极了，就像是做梦似的。利润很快就增多了，不久以后，我就能资助第二个学校了。第二个学校设立在南木林县另外一个穷困的乡村，叫做卡孜，于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开始教学。

每开办一个新的学校，我们学到的事情就更多。例如，我们体会到雇用一个好老师确实比我们所想像的重要得多，也比较困难。当时没有多余的教员，而且县政府总是想要省点经费。我们是想要最好的，可是，有时我们仍然要退而求其次。我们经常必须雇用那些上过初中却不能通过升学考试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那么理想，不过，让他们来教我们的学生却还是够格的。虽然我们 must 做很多这类的让步，而我的热情却从未衰退过。建校的工作继续不断地快速进行，不久以后，我们就开始看到了成功的迹象，真是一大鼓励。

一九九四年，我从南木林县教育局打听到，南木林全县小学学生进行的考试中，我那些学校的学生获得了一项全县最好的成绩。我们在古确办的第一所学校的四十六个学生当中，有十六个学生通过了那项考试，可以合格升学，我的侄儿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们家按照现代化的方式上学的第一位！那种成功的比例（百分之三十五）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可能算是小了一点，可是，这种成功的例子，在一个像我们那样的村里发生，却真是前所未有的事。平心而论，这种事情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正因为我在最初兴建那几所学校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自从离开美国那个安定的环境以后，多年以来所寻求的目标。我已经找到了帮助家乡民众的方法，尤其是帮助那些生我养我的家乡人。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跟着我的学校转。一九九二年，我还去了一次美国。我在大学里的老同学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邀请我到 he 主持的研究中心去帮他做一些研究工作。该中心是在他任教的卡司委斯特吕瑟弗大学里。我在拉萨协助一个商家发展中外合资的地毯生意，他答应替我买机票，我便欣然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厚爱。让我高兴的当然就是又有机会去美国重游，还能去拜访老朋友。不过，我也有另外一项使命。我带了一些西藏地毯和手工艺品的样品去，在私人和公开的两种场合都展示过。在展示样品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向更广大的群众介绍西藏的各种产品，我还当场卖了不少东西。实际上我也赚了不少钱，并且把那些钱直接带回西藏去帮着建造更多的学校。到了一九九六年，就是在古确盖了第一个学校的六年以后，我们在南木林县总共盖了三十所学校，每个学校的学生数平均增加到九十名，是古确学校第一次入学人数的两倍。

在我离开人世以前，我不知道还能多盖几所学校，我希望能活着看到每一个西藏人都有机会上学，而且还能按照自己的能力继续升学。

后 记

我的这本自传的英文原名为《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后来由杨和晋先生译成汉文《西藏是我家》。这仅仅是书名的更换，内容却完全一样。改名后的这本书，五年前，已在香港以繁体字首次出中文版。此次承蒙北京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社的关照，使我得到了在国内首次以简体字出版发行的良机。对此，我向诸位出版界的朋友表示深切谢意。

我的这本自传以真实而详细的资料，描述了我一生中的大部分经历，突出表达了我为西藏的现代化贡献一切的理想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过程。

追求现代化的理想信念，对我来说由来已久。

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一个叫古确的小山村。十岁那年，我从家里冲了出来，到拉萨当“噶足巴”即宫廷舞员，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一些达官显贵享用着现代化的物品；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驻拉萨，我心中便滋生出一种对现代化的好奇与渴望学习的萌芽。这种对现代化的向往，导致了一九五七年我赴印度、美国求学。而在国外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看到美国的现代化社会，更激起了我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信心与决心。这是一九六

四年我毅然决然地重回故里的决定因素。不幸的是，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上下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这场大动乱，一度扑灭了我心中燃烧着的建设现代化西藏的火焰。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终究要按其客观规律发展变化。持续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作为伟大历史转折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式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从根本上清除了“左”的指导思想，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我本人也同千千万万个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公民一样，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

在这种大好形势的感召下，我为西藏的现代化事业奋斗的激情重新燃起来。一九七九年在西安外语学院深造英语，回校后与刘德军合作初编了《英藏汉对照词典》，最后由我主笔完成，并由民族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正式出版发行。

纵观国内外的经验，我深深感到，要想搞现代化，必须要有人才；而人才必须靠教育培养。为西藏现代化做贡献，首先必须为西藏教育事业做贡献。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九八五年我在拉萨创办了第一所英语夜校；在南木林县教育局，特别是在原县委书记白朗同志的有力配合和支持下，采取了政府、群众和我个人合作形式，在南木林县先后兴建了五十三所小学和一所职业学校，在西藏其他贫困县建立了十三所小学。在日喀则昂仁县和仁布县中学购置了电脑设备，开办了电脑培训班。现在我在拉萨正以个人名义筹建奖学金基金会，准备向每年参加理工科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目前，多数学校教学开展情况比较好，我本人也较满意。但是，经过我艰辛工作，投资一百万元建起来的艾玛岗职业学校，由于领导不得力，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对学校今后走以校养校的路子带来不少困难。对此本人也很着急，特别是看了今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文章《让职业教育热起来》，我更是坐立不安。最近我已同这所职业学校的创办者之一，原南木林县委书记

白朗同志取得了联系，我决心同南木林县领导和日喀则教体委领导一道，认真研究学校工作，配备得力的学校领导班子，把学校办成全区第一流的职业技术学校，为西藏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经过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海外中心主任、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张子扬，西藏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吴兴元和导演贡布顿珠同志的不懈努力，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期间，反映我在西藏办学情况的电视纪录片——《雪山下的酥油灯》于二〇〇五年九月一日，由中央台十频道作为向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首次在教育栏目中播放了，节目播放时间长达二十六分钟。九月中旬中央九台英语向海外播放，两天中每天播放四次，每次五十六分钟。不久前中央四台也已播放。这部电视纪录片以详实的资料，客观地报道了我在西藏奋斗不息、孜孜不倦的办学经过。

现在我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最近有一天，我的血压突然升至 190/90mmhg。这也许是一个偶然，也许是一个信号。不管怎样，它毕竟向我敲了警钟，促使我抓紧余下不多的时间，完成好我未竟的事业。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突然走向归宿，有人愿意替换我的任何器官，不管什么民族，只要对你有用，我将乐意捐赠，你可在梦中等待我出发，因为我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乐趣，在于能为他人服务。

有人说：“扎西次仁《西藏是我家》这本引人入胜的自传，改变了我们对现代西藏的认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本书起到了我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的夙愿。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情。这里应当提出的是，在我的这本自传的成书过程中，英文执笔梅尔文·戈尔斯坦、威廉木·司本石初和中文译者杨和晋三位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帮助支持，我很难写出这样的自传。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是的，我是两个世纪三个不同社会制度的见证人。西藏的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过去，我的老家南木林古确村，写一封信带往拉萨需要一个月。如今，电话

拨通就可以相互交谈，最近我家乡的儿媳妇就在电话里和我高兴地谈到了将要安装电动榨油机的事。

二〇〇六年七月，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我们每一个人将要成为它的历史见证者——火车开到拉萨来，把云南茶叶运送到拉萨只需一到两天，而过去的茶马古道上需要运送半年。这种惊人的速度令人感叹不止。我为可爱的家乡如此的变化而感到高兴和快乐！

扎西次仁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附录

航行手记^{*}

普遍的政治情况和权力集团

如果不把当今国际上的政治情况略加分析，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如何？他们打算把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领到哪里？对世界上各种不同国家的政策又是什么？而最要紧的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处于国际政治的生活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究竟是什么？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读者提供一些当今国际政治情况背景的理由。

我们目前这个世界所具有的特性，就是各种民族国家和政府，相互联合起来组成自己的集团。这些集团的组成有其广泛的世界性，因为人类的斗争已在世界各地继续扩展。那就是这些集团形成、落实和发展的基础。这些集团是根据大众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所产生的。为了要达到一般策略性的防御或是攻击目的，世界性的军事联盟网络制度也在这些集团间

^{*} 此文摘录于扎西次仁一九六四年由古巴开往中国的轮船上所写的笔记，原文近九万汉字，注释为作者于二〇〇四年所加。此为节选。

建立起来了。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则、文化传统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关联，对各集团的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简言之，这些集团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即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所主持的政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延续到一九六〇年，过去在这两个美帝国主义首领的领导下，西方集团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军事联盟，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他们所持的借口就是要用军事力量去防御国际共产主义对他们的“威胁”，而且要阻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他们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接管”所有的合法政府和国家，甚至还要逐步前进，把整个世界都拿过去。不过，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事实。几乎毫无例外，历史可以说明所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都是凶恶的殖民主义压迫势力，是殖民主义的维护者，也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人民的压迫者。历史还能证明这些势力不仅仅是在二十世纪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人民进行压迫，而且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那就是说已经压迫了四个漫长的世纪了。要是有任何方法可以说明这些被压迫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许可以说：他们的血、汗和眼泪，多得足以填满地球上所有的海洋。

不过，若要举证说明那些殖民主义势力究竟有多大，不会太难，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说，由于他们在落后各洲掠夺的结果，都已经变得很富裕了。关于这个论点，没有人能否认，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有所认同。然而，人的极限是每个人行动的自然法则，那种极限不但早已超越过了，而且已经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乎，这些受压迫的各大洲，就决定要把自己从殖民主义的铁链下解放出来，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就是世界性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成长的基础。但是，共产主义还不是民族解放运动成长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共产主义可以用来消灭殖民主义的统治，消灭外国势力的统治——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其附庸。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说：“现代的革命，基本上是起始于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那些劳动民众的侵略和掠夺。”

从逻辑上来说，受压迫的人民是不可能把他们自己跟西方的殖民主义势力连接在一起的，他们于是便转而去和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当然，有的就采取了所谓的中间路线——非军事联盟，以便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中获得独立。而在实际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阵营却毫无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组成自己的军事同盟，那就是华沙条约组织，以面对来自西方的侵略行动；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世界的和平。所以，那是一个完全正当的防御手段，因为西方势力早已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军事集团，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侵略，并且还要阻挠正义性的解放运动。这就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所以会成立的原因。

西方势力集团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持有力的统治，他们的方法是在外国的领土上雇佣当地的军人来当武装部队，在殖民地保持经济控制和政治占领，保持势力范围，维持较好的经济地位，还要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更糟的是，希望能把自己的殖民地位永远保持下去。根据这个理由，有人说他们是永远不会从历史的舞台上走下来的。这些殖民主义者的目标，不仅对那些决心要获得自由和权利的被压迫者，造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状况，而且，对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他们也同样无法忍受。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国际主义的工作者，是要对他们的阶级兄弟负责任的。这种世界性的利益冲突，让美国和苏联各自领导的两个实力集团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对抗。由于这种对抗和冷战的持续结果，历史就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转折。然而，任何事情或是任何人士都不可能阻止历史的进程。的确，历史的基本正面内容，一向是在被剥削阶级这一面。在现代历史上，这种情况又为何不是如此呢？

国际势力的平衡尺度，在敌对阵营的两端游移不定，他们在政治势力上的均衡，在力量上的对比，以及所有的得失，大都取决于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基层民众，以他们在进行全面性的斗争中所能得到的成果而定，也就是他们各阵营团结一致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相对地位是取决于：（1）快速变动的国际现实，（2）集团的统一性，（3）国家力量或统治的改

变。

按照常理来看，如果秤的一端重于另一端，另一端则非被扳下去不可。这就可以说明一项实事，那就是说即使是世界上强大有力的国家，也要依赖大环境里的均衡斗争——全世界各阶层的人民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因为无论是均衡斗争的任何一边赢了或是输了，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世界霸权地位，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去重视那些因素。这就是当前世界形势的状况。简言之，所有促进和平与自由的力量，都突然浮现出来了，每个国家都要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争取独立。几乎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在帝国主义控制下，所以，人民有权去要求实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于是便形成了一股最大的力量，把历史性的斗争对象转向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同时也为人民自己建立民主、和平的社会主义，而民主、和平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要求。

世界革命的“风暴中心”

不久以前，三个落后的大洲，变成了大众运动的主要力量，要求从各种殖民主义的形式中解脱出来。他们要求真正的全国性政治独立，以及他们自己的经济进步。他们不但要求人民大众有政治自由，而且还要有经济自由。他们要求制定政策，规定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都不得干涉他们的内政事务，而且要求完全根除那种谁都不想要的贫穷、痛苦的生活条件以及疾病和文盲。这些都是完全正当的要求，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提举出来，这也是他们早就应该有的合法民主权益。不过，事实上，这些合法的要求，在“冷战”中丧失殆尽，实在是太常见的现象了，要不然，就是被一小批认为有利可图的外国人士所忽视，有时，甚至还会遭到他们的拒绝。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进行统治，把人民限制在同一地区，继续围困他们数百年。他们实际上就是要

为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成品建立有利的市场，并且为他们的工业提供原材料。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根本动机。我们也很明白这一点。不管受到如何顽劣的阻挠，英勇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人民，还是为整个世界作出了一些有特别意义的贡献。他们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或控制下，或是在经济的压迫下，获得自己国家的主权独立。

诚然，他们的胜利就是全世界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毋庸置疑，这种世界性的革命斗争仍在进行，普遍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未来的各种革命也都正在步入佳境，将来一定会得到全盘的胜利。有一个和中国对外政策有关的参考资料，应该在这里提出来，因为那是在集团内部发生变动时所出现的结果。

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结构问题，在集团内部起了争执，这是西方集团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集团，他们的问题是以普通的思想方式，去面对国际问题。所以，每个势力集团的成员国，都要用很多的时间，把自己卷入内部的争端，而这些争端却与国际问题毫无关联。他们之间的争执已经延续了好多年了，其严重性也已影响到了他们彼此之间原来就有的相互关系。于是，东、西两方的势力集团，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美国的掌控下，曾经有过坚强的整体性，可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实力消长的结果，那种整体性似乎已经没有了。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曾如磐石般地团结在一起，现在好像也看不见了，至少目前是如此。这就是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相关力量起了变化的结果，当然，他们在教条上的争执也是原因之一。此外，最近的外交历史，似乎也显示着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不但正在改善，而且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超乎意料地缓和下来了。的确，缓和紧张关系是很好的。但是，代价为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动，那就是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上，苏联和美国，好像已经不再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相互的关系上，掌控主导权了。正巧，他们都是核垄断的超级大国，有时也会错用他们的势力，或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

的势力而掠夺他国的资源，以致造成不良后果。这就有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情形一样；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在国际势力结构的关系上，好像已经经过了一些重要的改变，而且，在转移政治势力均衡的关系上，在重新适应国际新形势的要求上，以及在适应目前国际政治温度的趋势上，好像也都有重要的改变。

欧洲和法国

从前，法国不可能会和现在一样，完全不顾欧洲人民的感受，在欧洲事务上把他们的声音喊得那么洪亮。他们也不可能会在没有他们特别指导和关注的情况下，把欧洲带进欧盟市场的结构中。而且，要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经济上没有进步，又没有自己的核动力设施，他们也就不会被视为世界级的列强。要是没有像戴高乐这样的英明领袖，在独立的法国外交政策上，他们也不可能会有正确的方向，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戴高乐一个人。要是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整个东南亚保持中立的问题上，他们甚至还谈不上会有一个合理的外交。要知道，他们还曾经是东南亚地区残酷的殖民势力。简言之，法国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了。

正因为法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了力量，他们才有能力去公然反对美国长久以来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军事组织和欧洲地区的控制政策。而且，法国进行他们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们也敢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军事组织必须进行改革。依我看来，这就是法国在现代历史舞台上标示着他们的发展实力，也表明了法国在客观的力量方面有所成长，而且，也能主观地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多么不喜欢在他们这个势力集团中有这种状况，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法国的进

展。美国曾经把英国带进欧洲共同市场，为的是要他们在欧洲共同市场里作为英美利益的发言人，同时也要英国去做欧洲团结的破坏者，或是在暗中进行破坏。可是，他们失败了。

不用说大家都会知道，事情的进展就愈陷愈深了，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争执也就益发不可收拾了。有很长一段时期，戴高乐好像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认为法国必须拥有独立的核武器攻击能力，因为他确实不相信所谓由美国来防卫欧洲的说法。他曾不止一次宣称，除非他们拥有自己的防卫力量，否则，欧洲是不会安全的。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一九六三年访问西德时，曾经说过：当欧洲的城市受到任何攻击时，美国会“冒着”他们自己的城市的危险，去防卫欧洲城市。不久以后，有一个法国政府的发言人回答说：法国不会怀疑肯尼迪防卫欧洲的“善意”，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说：但是法国却无法知道他的接任者是谁。戴高乐强调说，他要把“第三世界”的力量建立起来，使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有危险性的核武势力减低到最小限度，这也就是他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稳定所作的贡献。而且，他好像断定苏联在对欧洲局势的军事干预上，其“威胁性”比过去要少些，他的这种假设根据，是因为他认为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似乎已经给他提供了保证。易言之，他的想法也许就是说，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不会对欧洲进行攻击的，除非是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结果，从军事上来看，欧洲就不再完全受制于“美国战略性空军威慑势力的掌控”了，而且，欧洲也就在政治上变得更独立了。

在好奇心和提供资料的驱使下，我希望能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策略简略地加以说明，该计划当时是他们以防卫和重建欧洲之名而设立的。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据马歇尔计划，美国制定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做“遏制政策……基于两项垄断权”，因此，他们当时便享有下列特权：（1）在资金和科技上可以给欧洲提供协助，（2）在核武和新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联盟上，有绝对的垄断权。第一个战略计划是为了要在战后的废墟上，用美国的资金和科技去重建欧洲，并让美国能用他们在经济上的垄断手段，控制欧洲。第二个战略计划则是为了要保

卫欧洲，使其不被所谓的“共产主义所接管”；这种接管的方式有两种可能性：或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内部颠覆，或是从外面来的大规模苏联军事攻击。

但是，不到几年工夫，美国的这些战略方针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那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比方说，要求脱离美国控制，制定独立欧洲政策的声浪在不断增高，这就表示欧洲的力量正在成长，而且，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也为欧洲政治团结的最终目标奠定了基础。再加上苏联的科学与技术能力突飞猛进，他们所制造的火箭和导弹，可以把核武弹头射至预定的目标，他们也有能力在金钱和科技上援助别人。这些都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对欧洲政策的公开挑战，因此，也使“遏阻政策”受到挫折。该政策原来的用意是为了要遏制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欧洲的影响。这种挫折已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连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都曾发表过下面的两点意见：“首先，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好一个和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新世界有关的和平策略；其次，因为我们还没有为该策略付出所需的代价。”显然，他好像暗示着他们对欧洲的旧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而新的政策又尚未制定。那就是他所得到的结论。

光是笑敌人的不幸是不够的，唯有审视自己的不幸者才是聪明的。能看见敌人所犯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错误。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主观的成见。其义甚明，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幸。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经说过：到了一九七〇年的时候，世界上将会有四大列强。根据他的说法，那就是“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他曾暗示：各国政府在制定未来的政策时，必须对这些列强加以考虑，这样，将来的国际事务才会顺当，当然，这也是为了要把世界改善得更好而应采取的行动。他所暗示的就是：世界各国不要被他们自己不正确的判断所误导，而应该认清世界上的现实情况。

大英帝国的崩溃，美国和苏联的兴起和“古巴飞弹危机”之考验

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衰所给予我们的教训，并不是很久以前的历史，其实，在本世纪内，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形。那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而是曾为世界列强的英国——首席帝国主义。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查考一下这个大英帝国是如何建立的？他们又是立国于什么基础上？大英帝国和罗马一样，都曾经是往昔世界最大的奴隶主帝国，立国于经济剥削的制度上，所采取的手段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统治。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把这种制度扩展到全球各地。对帝国主义的扩展最有助益的，就是在生产上发生了科学革命，而且在国内又有了工业建设的科技基础。他们同时还利用贸易和福音派的传教活动，把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去全力推展。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也配合着军队，用武力、诱导和颠覆的方式进行各种活动，并且还会勾结当地具有领导地位者，本国的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有了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他们就根据现代工业、机械化的农业，以及有效的传播和交通工具，为现代经济制度打好有利的基础。这就是他们在政权和军事力量上的超级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他们什么也完成不了，到世界各地去开拓殖民地的可能性，也就更不必谈了。

到了一八七〇年代，当真正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进入了最高峰的时期，英国的资产阶级在英国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优越的企业制度。他们从各殖民地区榨取到源源不绝的原料供应，然后又把加工过的成品，运到各地区那些数不清的市场上去销售，事实上那些成品在他们自己的本国范围内是销售不了的。那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说，欧洲和英国的财富，大部分是把殖民地的所有物聚集起来而形成的。这就是说经济上的鼓

舞，是根据殖民主义的制度而来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制度的实践，英国虽然是那么小的一个岛，竟能成为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现实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在他们的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现代的科学和工业技术已经在被殖民者当中扩展起来了，从帝国主义制度中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又使他们那些被殖民国家发生了无法妥协的相互斗争。而且，各落后民族的觉醒是压制不住的，各地区的被殖民者也都要站起来反抗外来的统治。而最重要的则是那血淋淋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牺牲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那也确实促使这个殖民主义的大英帝国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建立得快，崩溃得也一样快。在这个攸关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中，不受英国思想约束的人类群体，他们在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又起了一次决定性的作用。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任何特殊变动，总会有些重要事件随之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其中一例。欧洲和英国因为受了上一次大战的影响，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实力，都没有唯我独尊的世界地位了。因此，他们在国际政治上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能促使而且还能助长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各地大规模地成长，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新成立国家的力量，从长期不得安宁的睡眠中醒悟过来了，而且还协助了五十多个新成立的国家，陆续加入了联合国。当然，还有不断成长的力量，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阵线，为少数民族权利所发起的运动，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与日俱增。无疑地，这些都是因为战争而产生的重要结果。应该再三强调的是，这都是第一次大战的真正产品，为民众的生活、自由、和平，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有利的新途径。此外，因为战争的发展，欧洲和英国在世界上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就转移到美国、苏联和其他地区去了，结果才使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能够提升得那么高。

政治力量的掌控——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的能力——基本上是以物质因素为依据，也就和智慧在思想能力上的情形一样

——能掌握一切生活上的知识并能作出不会被误解的结论来的那种能力——基本上依据一个人的脑筋在智慧上的能力。不过，要造就一个伟大而又有知识的人，就需要有一个大危机。按照这种逻辑结论来推想，当政治上的物质基础消失时，政治力量就无法掌控住，这正如没有大危机，就无法造就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欧洲和英国的“白人暴政”正好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对那些以美国为首的现代帝国主义来说，当他们用来维持政权的经济基础，被那些情绪高涨的人民夺走以后，这种情形也必将发生在他们身上。

从苏联建国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外交政策是由一些有控制权的团体所制定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观念、社会主义阵营，以及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形式，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具有很大的刺激作用，而且也一直在促成人类经济的进步。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因为他们是在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而且还自封为首席保护人。当然，他们也确实曾为人类进步作过伟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政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狂妄的反动政策。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无时无刻地到处去进行破坏工作，他们要破毁全世界进步人民那种鼓舞人心的革命意志和精神。那也正因为美国自称是在现代世界上的“精英人士”的支持者。这就是美国的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此外，美国不但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且也是第一个用那些恐怖的武器去对付日本的居民城市广岛和长崎的国家。当时虽然是处于战时，可是，他们却实在是没有真正的理由去那么做。这些罪恶的军事行动，以及许多由美国统治的政府所进行的类似活动，迫使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整个世界，不得不冷静地去再三考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有一段时期，美国之拥有核武器，曾使其国家实力上升，当然，也给全世界带来危机。不过，这种局面不久就到了极限，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那个有领导地位的苏联，也在四十年代结束以前拥有了核武器。即使美国仍是一个强大的核国家，他们却因此而永远失去了核动力的垄断权。

不过，由于本身的富足，并且又因为是核动力的垄断者，那些具有领导地位的核国家，直到现在，还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保持相当有利的地位：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上，甚至还包括了在太空上的探测——人类征服宇宙。他们一次又一次用核战争来恐吓，为的是要控制他们自己的盟国，而且还强迫弱小国家完全接纳他们的意愿。他们利用核讹诈的手段，使那些不能制造核武器的被压迫人民饱受惊吓，因为他们既无科技能力，又无财务能力，不过，他们却勇敢地为了正义而奋斗，为的是要从无理的殖民主义统治下，从外国的政治和金钱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最后，苏联和美国之间，因为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飞弹危机”问题，终于在核动力上摊牌了。当时，美国认为在距离他们十九英里的古巴岛上设置苏联的飞弹，会威胁到他们国家的安全，这就是美国出动海军封锁古巴的借口。

政治与外交政策

政治是和人生有关的事情。人生要靠政治才能发达和幸福；社会上普遍性的稳定、安宁与和平，也有赖于政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物质上的进步，要以政治为各项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政治是很重要的。从来就没有任何国家，曾在没有政治的情况下存在过，现在没有，将来更不可能。从希腊的政治城邦建立起，政治就一直控制着人类。正因为那是一种用来管理人民的普通法则，当然就有普通的形态和特征，那也是所有的政府，不论大小，都同样具有的。当然，这并不表示对所有的国家来说，政治都是一样的。事实上，不同的政府和不同的政治环境，需要不同的政治途径和不同的施政方法，最好是要能适合当地的情况。简言之，除了技能方面的事情以外，每个国家都会根据历史上的现实情况，以及人民与国家的最大利益，制定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每一个国家都会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制定指导原

则，这种原则所根据的是他们的政治哲学、国家利益和宪法，而且还根据各种国际法规、条约，以及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来往文件；每一个国家在利用政治和外交、工具和器械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策略。最后，每一个国家在执行外交政策时，都会有远大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因此就免不了要和远近的其他大小国家，在利益上公开地发生冲突。顺便提一下，这就是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这就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之处，中国当然不能例外。然而，我们必须根据政治上的各种特性，去分辨其不同之处。在整个世界上，有两个很明显的政治分界线同时存在，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两种政治上的特性：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性，另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特性。中国的政治特性是属于后者。水的性质是冷的，火的性质是热的。以同理推之，资产阶级的政治性质是反动的，落伍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性质是革命的，进步的。夜晚的性质是黑暗的，冷的；白天的性质是明亮的，快乐的。用这种对照的方法来看，资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本质是压制性的，不受欢迎的，而无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本质则是民主的，受欢迎的。既然不同的政治类型有不同的特性，它们必定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结论和不同的目标。的确是如此。不过，它们究竟又都是什么？

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上，资产阶级逻辑所坚持的是：除非受援者同意用所获得的援助去建立私有企业部门，否则就不应该给予援助，或者是，援助的给予者，从受援者的国家那里所获得的投资利润要比受援者多；而无产阶级外交政策逻辑所坚持的却是：如果有能力，就应该去援助人家，只要受援者能受惠就好，或者是，只要能协助那些受压迫的人从外国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也行。资产阶级在他们外交政策上的结论是：那些接受他们援助的人，最好是能跟着他们走，最坏的打算也还希望他们不会变成“共产主义者”。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无产阶级在他们外交政策上的结论则是：他们的劳动人民要尽他们的国际义务，去帮助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是过来人。资产阶级在他们外交政策上的目

的是：基本上他们是要保持他们在殖民主义以及其他事务范围内的影响力，要在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保护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防止群众起来反抗，而且还要和大部分的反动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那些团体皆非善类，像刚果那个罪恶昭彰的摩西措巴之类就是。而无产阶级在他们外交政策上的目的则是：致力于彻底摧毁在所有国家当中的殖民主义影响，不但要使他们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也要使他们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在这里，也许我们还要再加上一种政治类型，那就是中立的或者不结盟国家的政治类型。一个不结盟国家的政治特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当它们要达成它们的政治目的时，它们有自己的方法。它们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要发展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要从所有国家获得科技上的帮助和财政上的支援，这就是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所得到的好处。虽然这也许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说法，不过这就是不结盟国家在政治类型上的特质。

我的问题

十五或二十年前，世界上经常能听到的只有外国军队在中国开枪，在那里屠杀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群众，就像今日的南越一样；或是因为残酷内战的结果，中国人自己杀害中国人。但是，就是听不到中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上的任何声音，至于中国政治对世界政治有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在人类社会上获得受人尊敬的声誉之类，那就更听不到了。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与以前不同了，最近几年，世界各地都已经从中国的发言人那里，听到了很多中国人民的声音。

一个民族的自尊，只有当他们的国家情况良好的时候，人家才看得见。一个民族的声音，也只有当他们的国家在知识上、智慧上、科技上、工业上和经济上大有作为的时候，人家才听得见。简言之，世界上很多人都把这些中国的声音，推崇为崇高希

望和自由之光的象征，要把奴隶世界——备受压迫的世界——中的黑暗照亮。可是，有些人又怕他们的声音会成为“黄祸”，或是一股支持革命人民反抗运动的伟大中心力量，而且那些有革命性的人民，都勇敢地参与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因为有这些新发展，世界各地人民都对中国感到疑惑，也很好奇。他们说：“为什么中国会发展得这么快？”有的就回答说：“因为中国人迫不得已，所以必须努力工作。”也有人声称：“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急迫的计划，要迎头赶上西方国家。”正因为这些好奇的评论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要提出一些问题：

(1) 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重大改变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2) 经常与国际政治有关的中国力量基础是什么？使中国日益强大和快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3) 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政策，对落后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和进行革命的人民，已经开始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了？

(4)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它们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执，有任何关联吗？

在这个世界上，我没看见哪个国家会没有任何问题或困难。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心目中所谓的国家——不论贫富或大小——在社会上，或是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都很类似。然而，问题的程度却不一致，各有千秋：从饥饿线到奢侈的生活，或是从非常落后到相当的进步，什么都有。当然，那些在经济上比较不进步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大一点，或者还因为在他们有限的生命中，连日常生活上的基本所需都得不到，就免不了要受苦受难了；至于那些在经济上相当进步的人，他们的问题就会少一点，甚至于在他们全部有生之年，连一点痛苦都可能没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人性的关系吗？我深信，人类遭受痛苦的程度，是取决于经济情况的好坏和物质文明的高低。例如，我看见过一个很穷的人在加尔各答街旁的一个尿沟里捞起一些米。他那种因为缺乏食物而受苦的情形，实在令我非常惊讶。我在美国西雅图上华

盛顿大学时，看见学生宿舍里有非常浪费食物的情形。看过了这些景象以后，我的心里觉得非常不安，所以对世界上的饥饿人民深表同情。

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行为，纯粹就是由于经济条件而产生的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生活在不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下，或者也可说几乎都是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种现象更为常见。此外，有人说他们生活得如此痛苦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增长率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低是因为他们很懒惰；他们的工业成长率低，粮食生产少，正是因为他们不能把国家治理好；他们不能使经济快速进步，是因为缺乏资金和工业技术上的能力。头尾两个理由看来多少是对的，其余的简直就是胡说。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单纯，不过，有些人却老喜欢胡乱地去评论人类社会发展所要面对的复杂情形。他们忘了那些发展中的国家还要面对很多基本上的问题。

共产主义革命救了中国，也救了西藏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中国的人口最多，然而，他们还是可以养活他们自己的人。为什么？中国有广大的国土，也包括很多自治区，不过，他们还是能把国家治理得很有效率。为什么？中国在国家资本结构上和科技经验上都不算很充足，可是，他们仍能有效地从事各项工业建设。为什么？正确的答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社会革命，已经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基本问题——跟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要面对的相同。从这种分析上来看，那些尚未发展的国家，必须设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项问题，而基本的社会革命，或是其他类别的基础社会改造，可能是很必要的；唯有如此，那些被压迫的人民才能从他们目前那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中解救出来。我实在无法想像世界上有谁会不想吃得好、穿得好和住

得好。因此，我们实在不可能认为，那些未开发国家的人民，连设法去改善命运的欲望都没有，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要过好生活的志气，我们更不能说他们连脱离目前自身痛苦的意愿都没有。相反的，他们很明白自己要怎么样生活。他们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和国王的、地主的或是企业家的都没有什么不同。那些比较穷困、落后、无知的人民，便好像是从噩梦中惊醒了一样，开始要问：“为什么我们会搞到这种地步？”他们甚至于还意识到，如果他们本身不团结，却想要把自己改善好，将是一个很遥远的梦。各地广大群众慢慢地真的就觉醒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都希望不再受到压迫，这也就是他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所应担负的责任。对南越和刚果这些国家来说，如果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不先进行彻底的整顿，并视之为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的国家就不会有希望。

历史证明，任何国家都必须在政治上先统一起来，把国土加以巩固以后才能有所发展。举例来说：北美从前并不是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一直到林肯在一八六〇年代领导他的国民，打了一次猛烈的内战，把南、北两方统一以后，才开始进行工业化。从此以后，那个由多种民族所组成的美国，便尽速地进行工业革命，使原来的农业社会转化成伟大的城市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已经把大部分的乡村人口吸引到各大工业中心和城市里去了。在美国的南方，解放黑奴运动把那些很有工作能力的劳工都释放出去了，在那些南方的“棉花大王”的控制下，所有的黑奴都曾遭受过最残忍的剥削。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在北方的工业地区。而且，大多数的乡村人口都搬进城市或都市中心去了，于是，许多社会问题也因之而起。结果，有百分之八十^①以上的农人都变成了工业薪水的工人，因为农业已经变成机械化了。于是，今日这个工业化的美国便因此而诞生了，这就是南北战争以后使领土完整和政局统一的结果。

至于工业革命、农业现代化、动员所有的国家资源、国土完

① 目前在西藏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是农牧民。

整，以及联合各政治派系等各种局面，现在的中国也都同样经历过。其实，中国现代化的全部发展过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才开始，在那以前，他们必须面对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和目前那些新成立的国家所处的困境一样。而且，他们还要跟国内的其他政党进行斗争，对外又要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抗，日本也是外来的侵略国家之一。因此，那时候是无法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简言之，中国从整个解放斗争以及国家建设时期所累积起来的经验，对所有革命分子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教训。毫无疑问地，那些经验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任何社会革命问题都是很适用的。那些仍然觉得附属他人是很累赘的国家，他们的第一要务就要像中国一样，必须先获得自由，因为那是发展经济和政治体制最必要的先决条件。然后再按照自己国家的资源和能力，在稳固的物质基础和深奥的哲理上，建立起新社会，把他们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而且还要根据自由选择的方式，决定自己将来的目标。获得自由是全人类的愿望，不过，他们必须去努力争取。

中国共产党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最出色的领袖，他们的成就完全是革命化的。该党有经得起长期考验的政策，有全球革命的正确策略，有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成功记录。简言之，他们是马列主义的真正继承人，一直都很推崇列宁的革命观点，因为他认为“任何国家获得革命胜利以后，都不可因此自满，而要把革命视为可以使各国无产阶级都能加速获胜的助力和手段。”要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例如印度等国，都能像中国过去那十年一样，做出同样多有建设性的工作，那我们这个苦难的世界，就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了！我想，中国在过去十五年间所做的事，就足以证明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亚洲的意义。

有一次当我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时，我跟一位女性朋友辩论有关中国人民的成就。我问她：“你不认为要是中国的国内经济情况稳定，国际上的问题就会少一点吗？”她点了一下头，面带微笑地说：“我的确认为中国的稳定会有助于世界的和平。”我

说，其理由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和成就，都会直接影响到国际上的稳定性。要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稳定，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稳定的，这个世界就能得到和平。亿万双中国男女的手和他们的智慧，已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出物质上的条件，所以，他们的人民不再像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继续挨饿。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能确保本国的和平。同时，他们已经和很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而且还能帮助——尽其所能——亚洲和非洲的国家。

在这里，我要谈到西藏，谈到西藏的封建主义。^① 十年了，他们一直无意放弃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甚至也不愿放弃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其他封建特权，而去赞同西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大大地出乎人民的意料之外，他们声称要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且采取了最愚蠢的武力叛变方式，反对民主、土地改革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这些建设和改革，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进行的，毛泽东是西藏农奴、封建制度和落后环境的解放者。由于他们那种愚蠢的行动，就有了一九五九年在拉萨的武装暴动，结果，人民解放军在三天之内，就把那场暴乱平定了。于是永远终结了西藏的封建统治。

同时，对于广大的西藏农牧民众来说，新社会主义民主时代的曙光就开始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了。他们都曾满怀苦情、汗水和眼泪，去服侍少数的一些人士——具体地说，就是一些当权贵族、寺院首领，以及那些高、中阶层，甚至于低层的政府工作人员。西藏的统治阶级失算了：他们曾想和拉萨的少数旧中国当权者合作，以便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有时也曾用这种方法去对付旧日中国的腐败统治者；又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无知，茫然不觉中国和中国入已经和从前不同了。那就是他们失算的基本原因。他们怎么能要求去治理一个国家呢？可能

① 四十年前我对西藏政治制度下过的结论，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且将会继续证明是正确的。

也会有一些例外，不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但是腐败的，而且还是身披华丽黄色丝袍的土匪，他们把当地政府大部分的财物都偷走了，把政府的库房变成了一个外壳没破的空蛋。他们的第一要务是赌博（打麻将），视工作职务为次要。那些赌徒在赌桌上进行交易，他们的财产、土地、房屋，甚至连他们那些可怜的妻子的珠宝首饰，都可以在赌桌上买卖。像这样的情形，就是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中心，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那些人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有些是在流亡中过着痛苦的生活，有的降为普通的平民，有的已经死去。这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关于世界和平

当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每天上床时都是空着肚皮，^① 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长得肥肥胖胖的，我们怎么能有真正的和平呢？对那些饥饿的人民来说，若是要在人类家庭的社团中继续生存下去，惟一合乎逻辑的选择就是斗争，用暴力的或是和平的方式都可以。饿死也罢，在斗争的过程中丧生也罢，都无所谓，反正都是死。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可能会忘记，即使只是在一瞬间，人性中存在着一些很严重的残酷事实。我想其中有一个就是饥饿，甘地称之为“永恒的禁食”，另外一个就是无知，佛陀把它列为人类受苦受难的基本原因之一。

若要除掉人类的真正敌人，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事实上，任何高尚的事业都需要很高的代价，^② 当然，也只有高尚的人才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例如，有一次，佛陀以他无数化身中的一个，作为商船的船员，跟五百人一起在大海上航行。据说有一个

① 西藏谚语：吃得饱，睡得好，空着肚子睡不着。

② 我想我是付出了那种代价的。

作恶的人要把那条船推翻，让他所有的同伴都死在海里。为了要救那五百人，虽然佛陀自己大慈大悲，也只好把那个作恶的人杀掉。这就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① 卡尔马克思也有同感：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流一些血是正当的，因为目的是崇高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也说过类似的话：最大限度的福利是给最大多数人的，而不是把最大限度的福利给最少数的人。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那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指出：“以后这十年内，光是在印度，就有五千万儿童会死于营养不良。”让我们把这项报道当作是真的事情来讨论一下：假使印度在以后十年内会发生大革命，要牺牲五千万生命。要是因为革命的结果，消除了所有社会和经济上的灾祸，而且救活了二千五百万到五千万儿童，那种牺牲就绝不是生命的一大损失。这是不可非议的吗？就我个人的道德判断而论，那是不可非议的，因为那就相当于只受一分钟的苦，可以免除受一世纪的苦。^② 中国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牺牲了千百万人的生命，^③ 不过，中国人现在就能在国内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但是为这一代人，也是为了以后世世代代的人作想。最后，为了支持我的这种立场，还用得上共产主义的标语：“无产者除了锁链以外，什么损失都没有，而他们能赢得的，却实在是太多了。”

当帝国主义者竞相拓展殖民地的情形到了最大限度的时候，明显的对立情况促使各地区的原著民开始觉悟到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战争技术，而且还必须有新式武器去和那些入侵者作战。然而，那些白人入侵者竟是第一批教导他们如何把他们自己武装起来去保卫他们的家园的人，如果战术上的改变和新的自动式枪炮是决定他们防卫战胜负的因素，那些原著民就应该消失不见了，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实。可是，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在殖民主义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不过，那些可怜的红印第安人却是例外，他

① 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有时候这是很必要的。

② 四十年后，我很敬重那种观点。

③ 真的，中国的革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们在美洲大陆上被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家园。因此，殖民国家不是没有恐惧，因为他们会带来恐惧。我们也知道那些原著民从白人的统治和殖民主义的制度下，已经赢得了，或是正在赢取，或是将要赢得他们应有的自由和独立。简言之，从石器时代起，一直到目前这个核子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决定性影响的，其实就是人，不是武器，也不是新的战争技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真的不顾全人类的愿望，发生了那样的战争，我们就不应当低估热核武器惊人的摧毁力，毫无疑问，那种力量不但能毁灭世界的一大部分，因为有放射性“尘埃”，也会毒化大气层、空气、水和陆地。不像一般性的常规战争，核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同特性，它区分不出谁是军事人员，谁是普通百姓，也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资本家，在这方面，赫鲁晓夫说得很对；而且，它也区分不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间，当然，主要的还是要看战争的范围以及目标在何方。不过，十之八九，会把敌对目标定在最容易袭击的工业中心——尤其是军事工业——以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如纽约、^① 莫斯科和上海，目的就是要在第一回合的核攻击时，把敌人打倒，同时也要防止敌人报复性的还击。核战争不会放过老百姓、工业区和城市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准备那么现代化战争的过程中，从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开始，一直到运送核弹头去对准他们的敌人目标，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都要参与其事。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制造者。举例来说，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全部人口，包括军队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从事现代化战争上的准备工作，而且，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业产品都是为了供应战争所需和其他各种军事装备而生产的，这也是他们在现代化战争上，为了能自给自足所必须采用的手段。他们用于战备上的经费简直是大得可怕。有谁会指望美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① 美国“9·11”袭击事件，证明恐怖活动是目前世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可怕的威胁。我很同情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或受伤的五千来名无辜者，因此捐献了五千元。

呢？明显得很，没有人会。美国的军事工业每年都要生产大量的军火，而且都要卖给或是送给某些人。为什么？因为它们既不能吃，又不能用，除了把它们往一些不幸的人头上射杀以外，别无他途。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要把它们用掉，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要做来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已经变成了美国军火商的最大消费市场。就在那里，有人以“维护独立的政府，以免被共产党接管”的借口，用美国制造的武器来屠杀民众，其实那些民众只不过是在要求自由和民主。美国的军火工业主义者，所以要与统治阶层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并在各地区保持区域性和内战性的战争，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市场关系。那也是为什么各地的一般民众，包括很多美国自己的人民在内，都会那么不信任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因之一。

军事工业过多的问题以及终需转变成民需工业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第一个困境，也是资产阶级的主管人员，今天在美国所必须面对的。而且，那些问题对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因为真正的世界和平还是取决于如何解决美国的军事工业。

我的结论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工业问题继续存在，无法解决，世界亦将永无和平之日。不过，依据我的看法，大多数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商业专家都不会真正赞成全面性的战争，理由很简单，因为核战争对他们的商业会有极大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不能从核战争中，获得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2500 亿美元那么大的巨利。关于军备上的开支，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①曾经说过：“近年来，我们听到很多据说是列宁的语录，他好像说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灭亡，应该是在武器上超支而产生的结果。^② 我敢说，除了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以外，那可能是共产党人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语录。”其实，列宁并没有说过那句话。不

① 一九六二年，肯尼迪被黎奥斯瓦德刺杀身亡。当黎奥斯瓦德从一所监狱转运到另一监狱时，他又被杰克鲁比枪杀致死。

②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支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种情形难道不会比别的事情更会伤害到他们的经济吗？

过，在最近十年当中，这项标语一直展示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不断强调的是经济，而不是在军事上的考虑。

由此可见肯尼迪引用过列宁的语录作为权威性的资料，可是，列宁同时又被否定，以免遭受到美国右翼分子的批评，因为他们称他为“共产主义者”。所以，不管怎么说，连他都会为了军备费用而公然表示不安。因此，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尽全力去预防那么一种有破坏性的战争。美国人都知道战争的危险，所以跟其他的人一样害怕核战争，可是，狂热地备战，以便从工人的血汗中获取大利，壮大自己的财富。

我曾经有机会观察到人民如何面对核战争威胁所产生的反应，那就是一九六二年因为“古巴飞弹危机”而引起的。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强迫赫鲁晓夫从古巴撤销他正在进行的那种称为“攻击性武器”的设施。同时，“防空洞”的建立也已遍布全美，从学校到乡间俱乐部，从家庭到百货公司，到处都在进行，主其事者是民防局。这就是美国人民对核战威吓的普遍反应。在那种忧患之际，我那位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女老师说：“别担心，美国是相当安全的。”好像我只是担心我的安全似的。显然，她是误解我了。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和平示威运动，反对他们的政府干冒核战的危险去和古巴或其他地区作对，目的是要毁灭“卡斯特罗政权”，并以古巴存有“中程导弹”为借口。即使他们的兵力强大，当危险的局势变得很显著时，一般的美国人总是显得毫无安全感的样子，这种现象，在古巴飞弹危机期间，就可以看出来。因此，我相信，到目前为止，这种核武器摊牌，对美国人来说，是最大的恐惧。

我所以会把原来关于解放战争的问题拉得这么长，是因为问题的核心，可能是地区性战争和大规模世界性战争之间的一个环节。赫鲁晓夫也是以此为借口，特别郑重其事地宣称：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所有区域性的争执和矛盾，都不应该用武力去解决，因为那将会引起核世界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毁灭“整个世界”。他说人死了以后，自由就毫无用处了，好像一场战争会

使所有的人死光似的。其言外之意甚明：武装的解放斗争和正义战争——主要是在殖民主义或外力控制下为自由和独立而战——都应该消弭，免得让他们把我们置于世界大战新起的烈火中。更确切地说，被压迫的人民，应该自愿去联系他们的殖民地统治首领和当地的剥削阶级，在会议桌上用交涉的方法，或是经联合国的调停，共同解决他们之间那些有矛盾性的争执。不过，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在美国的旧金山，就已经把几个安全理事会大国所享有的否决特权，订入了联合国宪章，所以，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一直都是几个大国所使用的工具。这就是赫鲁晓夫要把它放在任何主要问题之上的那种主题，不过，就大体上来说，是具有修正主义的态度，不但直接违反了马克思和列宁所主张的群众武装起义的原则，而且也违反了莫斯科宣言所宣示的下列原则：“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经验也可以证实，统治阶级永远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权力。”那就是为什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称他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我认为他真的是站在那一边的原则上。

尽管在兄弟党之间有严重的差异，而且他们也都遭受到世界上那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言人的猛烈曲解，目前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路线还是正确的，应该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规范下，在他们的原则范围内，更有信心，更有热情。当然也不可以太离谱。从基本上来说，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中所处的地位，必然会成为很有价值的支援和鼓励，为革命方向提供宝贵的指导，对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民众来说，也是一大鼓励，尤其是那二十亿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的权利而战，发扬伟大的理想，都是我们在历史上所认识的伟大人物的崇高目标。具有这种崇高目标的人物，^① 包括那个慈悲的佛陀和先知耶稣基督，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阿伯拉罕林肯，以及马哈特玛甘地，而且，毛泽东同志^② 也实在可以和他們并列，

①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启发了我的智慧。

② 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毛泽东一样地坚定，因此我常称毛泽东为“同志”。可是当时我的同学批评我，说我称毛泽东同志不礼貌，应尊称“毛主席”。

因为他即将成为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都已经为他们的事业而牺牲了。那些伟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们用伟大的行动和勇气，去为同时代那些备受艰难的兄弟人民，执行他们那种很有意义的时代任务。他们都曾是忠诚的革命人士，完全不同意当时所存在的生活方式，于是便按照时代和情势的需要，进行他们的革命活动。他们都具有无私的精神，为了别人，也是为了他们崇高的目标，无非就是要让受苦受难的人民获得自由。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把广大的群众领导起来，朝着他们指定的方向前进，或是使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简言之，他们是不会误导民众的，因为他们都已经超脱了。

根据合理的逻辑推论，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因为他们自己“贫穷”，就去支持贫穷的人，并主张向富裕的国家进行斗争，有些人好像就曾提出如此可笑的理由。贫穷的国家很多，有的还比中国更贫穷，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贫穷，或是他们的敌人都很富裕，就去向富裕的国家进行斗争。混用错误的逻辑，其荒唐之情，莫此为甚。正好相反的是，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毫不妥协的自由斗士，也是主要的、第一线的无产阶级，他们要为贫穷的劳动阶级利益奋斗。主要是因为那些剥削阶级，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是非常贪婪，他们竟要把贫穷而又正直的劳动人民变成一种达到经济目的的工具，而且还要把他们当作机器来使用。同样的，一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他们优越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剩余的资金，作为他们的工具，把世界上那些被压迫的国家变成他们的附庸国，并使那些劳动人民，仅仅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勉强地生存着。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就是导致革命的原因。显然，人剥削人的制度所产生的实质效应和结果就是：穷者日穷，富者日富。这就是资本主义如何分化人类的真相。而且，这也是痛苦的阶级斗争的根源。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正遭受到攻击，不但是帝国主义方面有人攻击他们，而且也有来自一些兄弟方那面的攻击，这就是因为他们那种无所畏惧的革命立场所导致的结果。那些进行攻

击的人，巧言令色地给中国标上“战争贩子”的名号，说他们不怕核战争是因为他们除了损失“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以外，“别无他损”，而且，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家乡，资本主义者好像也不认为工农人士跟他们一样，同是人类。这就是那些在政治上落后的人的思想准则。

早在一九六〇年，为了中国重入联合国的问题而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进行辩论时，美国的国会议员瓦茨乌尔斯说：中国的“领导人说中国顶得住氢弹战争，因为即使会丧失三亿人民，他们还会有三亿人留下，仍然可以使世界进行共产主义化。……在帝国主义灭亡后的废墟上，胜利的人民将会极其迅速地创建一个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上千万倍的文明，而且还要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最近，苏联共产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中国的领导们公然宣称他们准备好了要在热核战争中牺牲三亿中国人，甚至还要牺牲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因此，全球的命运好像就掌握在北京领导人的手中。”这只是一些恶毒的诽谤事例，却都是由于美国的国会议员和苏联共产党，为了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而滥造出来的。有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说：“真理不怕诽谤和非正义的火焰。”

没错，共产主义最大的吸引力和强度就是在于那种有逻辑性的真理。因此，惟一可以防卫真理的必定是真理本身。然则，中国共产党对这种问题所采取的真正立场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下列的观点而已。如果帝国主义统治的寡头政体，明知战争有违全世界亿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真正心愿，为了席卷整个世界，竟敢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用原子弹和氢弹去把亿万生灵化为灰烬吗？当然，这绝不会是文明的终点，也不会是毁灭人类的起点，更不会是整个世界的浩劫，而是一场新的热核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其真正意义就是会使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很快灭亡、永远消失，而且还要在劳动人民的声讨中，迅速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埋葬，在所有人民的愤怒下，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那些恨之入骨的掠夺制度踩在脚下，总之，就是在覆灭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以及所有跟他们相关的反动势力——的“废墟”上，人类一定能建立好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比现有的资产阶级文明好上千百倍，而且，还要“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且有历史根据的处理办法吗？我想是的。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已经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渊源，并已适当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像这种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纯粹是因为要把整个旧世界分化而起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掠夺和征服。既然上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完全摧毁了欧洲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为什么一个新的世界大战，就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呢？但是，即使可能，没有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只是为了要快点消灭他们而想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会的，那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最近，在锡兰的一次演讲中，周恩来总理说：“只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也就是在未发展的各大洲的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劳工阶级和革命人民，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都能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战争，就可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世界和平也就可以保持。”说句公平的话，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他们外交政策中所提倡的“和平策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真正内涵则绝对不会像我先前提过的那些诽谤者所捏造的那样。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人，以及其他的外围人士，竟会那么夸大其词，远离事实？他们是永远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好处的。

根据一些明显的迹象，由于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的真正特质，万一真会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要发动战争的必定不是中国，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一个。那些主要是代表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员和追求私人利益的人士，经常都是一心为利益着想。他们谋利的方法很多，比如贩卖军火，从战争和军事冲突中获利；在别人的土地上投资矿产和银行，从属于别人的疆土上得利；或是从他们那里进口原料，并将卖不掉的产品出口到他们那里去。当他们这些不正当的权利被剥夺时，他们就咆哮

得像饿狼似的，甚至还以武力抗争。最好的例证就是一九五六年
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和一九六三年的巴拿马运河事件。有谁会不敢
说这些非法活动和武装事件必将“激发”世界大战，而不是一场
正义的解放战争呢？他们不必畏缩到如此地步，为的只是要反对
中国的政策而有损解放运动的真正价值。真是不公平。我们可以
想像得到，要是中国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主张追求和平，
他们就会以武力去解放台湾或香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可能
老早就发动了世界大战。我们知道，中国为了他们的疆土问题，
一直就在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① 从一九五六年起，就开始与
美国在大使级的阶层上进行和平谈判。将来，虽然他们完全有
理由用任何方式，包括动武，去解放那些合法的疆土，可是，到
今天为止，看来他们不像会去用那些方式，就是为了世界和平，
也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用和平的方式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
国。其实，依我看来，他们可能会继续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去
解决他们的领土问题，当然，这种问题迟早是必须解决的。关于
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战争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讨论。

虽然中国急切希望国际间能形成一个自由的团体，也不要
有任何帝国主义的遗迹和反动的征象，我相信他们还是不会坚
持以战争和侵略的政策为手段，使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化。然而，
这绝对不是说，他们应该抑制自己，不去给今日那些急需进行
社会革命的人民提供积极的政治支援，因为他们必须肩负起无
产阶级国际的神圣责任。关于战争和革命这个问题，在中国共
产党的合理政策中，另外还有惊人的见解，而且与目前在意识
形态上的辩论也是有关系的；他们说：“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信徒，已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渊源，明白表示世界大
战最后一定会导致革命，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信徒，认为一定要靠世界大战来进行革命，从前没有人这样
认为，将来也不会有人这样认为。”从记录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坚

① 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中印边境战争冲突。经过了四十多年以后，我高兴地看到中印两个亚洲最大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善和发展。

持这种观点。

当然，我不是为了要推销中国的政策就而作以引述，因为一般来说，国家当局说的是一回事，他们所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但是，总的来看，任何国家都不能把他们的政治运作藏起来，因为那些运作迟早还是免不了要从他们的政治行为上表露出来的。同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策上的可信度，也须经得起考验才能让人接受。我相信，有些人必定会怀疑中国对外政策的智慧，就像我一样，也是彷徨了很多年。^① 不过，事实证明那些政策都是正确的，我也就明白了真相。而且，唯有透过他们的政治行为，人民才能相信他们，革命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才会有所认识，对解放战争中那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也将会更加了解。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智慧，虽然我是力不从心，却也尽了最大努力，试作详细说明。

扎西次仁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稿于东风号

中国南海

二〇〇四年重新审定并加注

杨和晋译于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① 令人痛心的是，我一个当时在美国真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家乡建设的人，在“文革”中却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包括投入监狱在内前后迫害十年之久。

随 感

人类最关切的的就是谋生之道

每一个人，不论人种、信仰、性别和地位，只要是想维持自己生命的，就都有些东西可卖。因此，要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可卖，他就不能活下去。不过，要卖东西就要有买东西的人。所以，没有买东西的人，就不能卖东西，因为买和卖是连在一起进行的。人们走着、坐着、吃着、睡着、工作着、休息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活着。他们永远在寻找什么东西：“面包”。人们找面包的方法，各洲、各国、各家都不相同。作为吃面包的人类，自有其共同的特性，像爱、惧、乐，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欲望，就是要生活得好。当然，人类在感觉上的认知与动物不同，因为动物只有直觉。要是饿了，它们就会知道；要是受伤了，它们就会害怕。在智慧上和体能上，人类是发展得最高的生物。人的脑子是高度合理化的，他们能思想，能推理，能读、能写，而且有文化。

从可信的历史时期起，人类就已经发展出维持生活的各种方法，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了赖以维生的各种生产资料。不过，这种演变可视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步演进而来的结果。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根据经济上的结构，以及生产食物、衣服和居所的方法，社会就在它本身的各种机构与制度中，逐渐往前发展。每当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时，那个社会也就更往前推进了一步。结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条件也改善了。生产和科学齐头并进，相互推动，因此产生了大幅度的进步。

两个现代经济制度

两个不同的经济制度，已在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思想概念。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其特性；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特性。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具有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把我们这个尘世折磨到完全疲竭的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点，封建帝王、资本主义的老板和乞丐，都被认为是寄生虫，理由是基于他们不参与生产过程。虽然这三种角色有其相似处，却又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在上层，一个在中间，还有一个在下层。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帝王以面包为主食，老板也以面包为主食，而且，乞丐还是以面包为主食。这三种角色之间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帝王和老板在历史上都有他们的位置，而乞丐却是被遗忘的人。那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一样，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不同。此后，帝王的存在象征着封建制度；老板的存在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乞丐的存在就象征着贫穷。因此，所谓的“流浪乞丐”也不过就是懒惰而已，至于其他的游民则是贫困的受害者。人类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同，却都是以面包为主食。大臣、贵族、僧侣、哲学家，都有他们所要卖的、要买的、维持生活的东西。面包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就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人的思想是由社会的存在而决定的，同样地，社会地位就是由经济条件

而决定。像政治结构这种东西，也不外就是经济结构的副产品，而政治则是经济利益的反映。

伟人是社会的产物

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伟人是生而伟大的，他们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过，他们的伟大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天资和能力。他们给人民带来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上的好处。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些伟人当中的两位。

佛陀的信徒夸口说他是从他母亲的肋骨间生出来的，还说他是他前生的转世。他只给人精神上的慰藉，那可不能用来替代物质上的需要。耶稣基督的信徒也曾夸口说他是从死亡中复活的，不过，他也只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宗教的基本弱点就是不能解决人们生活上的真正问题。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舍弃宗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觉得那是毫无益处的事情。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像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马克思等人，他们为解决人们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做了很多事情，为了对他们表示赞扬，他们被认为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基本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家从科学的观点去解释宇宙，并且驳斥了宇宙间的神秘定义。社会科学家第一次作出了人类的中心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的结论。社会进步是基于生产而来的，一个人能达到的生产水平越高，他的生活条件就越好。“适者生存”的原理和亚当斯密斯的经济理论，对十九世纪的社会进步有很大的影响。在自由竞争时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起了重要作用，那是在二十世纪的开始直到结束以前，因此，原始的社会主义就先在欧洲逐渐生根，然后才到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了东欧，并使他们跟随着苏联的路线。最后，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到了亚洲。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简化了经济问题上的一些关键重点，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比如说，那些控制着生产资料的人，就变成了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因此而成为统治阶级。社会等级具有经济特性，而阶级斗争的目的是要控制生产资料。空前的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方法上新的科学发现，直接影响到现代工业的进展，使社会的情况有时不得不有所改变。那些违反社会进化规律的人，必然会被无情的历史结论所碾碎。“四人帮”就是属于这一类。因为这种改变，解决经济问题的老法子好像就过时了。历史已经再三证明从来就不会有一种现成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将来也不可能会有。重要的是随着潮流走，因为任何规律都会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历史中存在着不平等

人们有句话说：人人生而自由，而且彼此间是平等的。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有人与生俱来地拥有特权，可是有人则生下来就戴着脚镣和手铐。不过，自由指的是民主的权利，就像平等指的是经济上的机会一样。后者比前者重要。实际上，自由和平等都得看民主是否存在。自由真的很可贵，人们在想任何事情以前都会先想到它。自由是经常需要的，我对那种需要也抱着相当同情的态度。但是，谁都不应该忽视一项事实，那就是自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社会进步又和生产的发展有关。因此，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无法享有和美国一样多的自由，理由很简单，中国的物质背景和社会条件尚未达到美国那么高的标准。我们所期望的自由，只能是那种可以跟我们目前的物质和社会生产水平相

当的那种自由。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大洲，如南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是最落后、最贫困的，他们在生产上的低水平，使他们享有最少的自由。有限的自由和落后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也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对应。唯有在达到现代工业化的阶段以后，这种问题才能解决。建立在经济能力上的物质条件越好，就越会有更多的民主自由，而且终将导致普遍性的福利。

物种并存

动物聚集成群，而人则分成不同的阶级。这两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历史上，剥削阶级、土地的所有人、或是拥有牲畜的人，都是经济制度的产物。他们各自控制着生产资料，因此而决定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个阶级一直就是统治阶级。一个只有空手一双，别无他物的人，就变成了人家的属员。在任何的历史关系上，那些站在附属地位的人都是人口的大多数，而且，自从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一种特有的形态——所有权的私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这种形态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具有极其复杂的特性。

神权政治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政府和教会形成一种连锁性的统治机构，统治人民的范围包括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政权和神权完全掌握在神职领袖和专制领袖的手中。他们利用政治力量和散布迷信，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经济目的。他们在物质上的挥霍就是建立在勤劳大众的痛苦上。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都是以神圣的权利和国家主权的名义行事。而所谓的神圣权利和国家主权，也

不过是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让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去达成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目的。结果，所有的财富就集中在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手中了。在另一方面，那些农奴和农民也就别无他途，只能靠自己的血汗，勉强活着。他们对面包和自由的需求，往往会遭受到刀剑之祸与无情的压制。

从十七世纪起，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就被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在欧洲还没有根深蒂固，可是，后来却在亚洲找到了适当的社会环境，而且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发展得更坚强了。目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就是胜利的象征，让所有的国家有目共睹。

资本主义引起工业革命

空前地积累财富，是利用大量机器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于是便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运用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资金，在全世界扩展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因为他们有进步的优点，所以他们在三百年后，仍然还具有活力和潜力。不过，他们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替代的现象，也已经有些时日了。俄国、东欧和中国，都曾尽其所能地进行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过，这种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比如，用最低成本去达成最高的生产率，必须建立在效率上的观念，还是非常的欠缺。政治上的干预太多了，所以会经常导致经济上的灾难。举例来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迫使中国丧失了相当于二十年的进步价值，因为政治性太多，对经济事务上的注意力太少，结果当然就没有为各种行业培训专门人才，在经济上自不例外。缺乏专家指点的结果，就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对比之下，资本主义的操作人士，却在生产上更有组织能力和经理能力，并能操作全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精于动员和组织劳动力。他们会慷慨地资助那些进行科学研究的人，让他们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结果，他

们就有更多而且更好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他们的生产率也比那些不发达国家要高出很多倍。他们也有非常机械化的农业生产，那就是工业化的结果。

在美国，不到百分之五的农村人口，就可以生产出中国广大农村人口所能生产的那么多粮食，因为他们的生产是用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关键是他们在机器上的运用，于是便改变了生产方式。这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确实，那些资产阶级中会赚钱的人都是恶毒的竞争者；他们彼此竞争起来的时候，甚至连生命都不顾。然而，竞争好像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促动因素，而且，追求利润或“剩余价值”也是一种强大的促动力，会很有效地从后面把它往前推进。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其正当地位，就像他们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一样。俄国和中国两者在某种历史情况下，都曾拒绝采纳西方在生产上的科学发展，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没有价值的资本主义副产品。不过，这种情形在俄国和中国现在都有所改变。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也正在改变。当然，科学和技术既然是大众的财富，就是属于全人类的，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的。

巴黎公社、列宁、中国

欧洲是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成立）的摇篮，甚至也是资本主义的故乡。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那样，在欧洲根深蒂固呢？我想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物质上的成就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顺便提一下，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俄国发生的，那里的工业和农业至今仍然落后。可是俄国当时并不能算是最贫穷的国家。俄国的帝王统治方式是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而列宁却能使俄国革命成功，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革命必须首先在一个国家经得起实际上的考验。在二十世纪中期，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发

生了，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既落后又贫穷的国家。中国被列强分割，又被国内的军阀等各种利益集团弄得四分五裂，从头至尾，这就是促使革命在中国加速进行的两大因素。另一方面，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最贫穷的，可是，他们却从未有过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每一个历史案例都必须按照它的现状和事实来处理，而不是按照政治理论家的预言。印度人从前做了很久的英国属民，可是甘地却领导他的国家用非暴力的方式获得独立。也许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暴力革命的原因之一。

划时代的纪元

现在，中国发生了一些基本上的改变。我们那种比较孤立和闭关自守的情形，已经结束了，已经为全世界打开了我们的门户，也在国际关系政策上作了一些很重要的调整：把那些宣称过他们是中国“牢不可破的伙伴”的国际奸商，抛在后面。我们现在进入了全世界人民的脑子里，彼此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合得更紧密。如果学习发达国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上的知识，就有助于完成现代化的计划。目前，正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国内外两方面的事务都对我们有利。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应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纪元的主要目的。我当然期盼着能看见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都有美好的未来。

重述面包

在这篇论文开始的地方，我说过每个人都有东西可卖，才能

生活下去。要活着就要卖东西，要卖东西就得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做毫无目的的生活。人以面包为主食，动物以牧草为主食，所以，大家都要靠某些东西维持生命。当一个人没有东西可卖时，就不会有面包，于是就处于绝望状态。若要活下去，就必须想法子做些别的事情。有的人也许就会想要杀人或是抢劫。在那种情况下，有的女人可能会变成妓女。贫穷、危机、绝望就是犯罪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人类的真正敌人，我们应该向它们宣布革命战争。事实上，中国的革命就起于缺乏食物和自由。

“白猫”或是“黑猫”

我非常赞同邓小平的名言，他说：不管它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不论是用什么手段，目的就是好的生活。人们经常发动革命，革命经常提供更好的生活。这就是革命的本质。因此，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们迫切的问题，诸如得到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居所。要享受由革命带来的平等权益和社会正义，社会成员也要为革命做些事情。用工作来养活自己，就是为革命尽力的先决条件。一个人的面包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的。要是连自己都养不活，却宣称能为革命尽力，那就是空口说白话。实际上，他就是社会的负担。

人类最关切的就是先养活自己

宪法上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很公平也是很正确的道理。没有技术的劳力过剩，而有技术的劳力却又不足，这就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要现代化就要教育千千万万的年轻人，让他们去学科学与技术。生产率低，人口增长率高，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所以，决定国家政策的高层人士，就必须抓紧考虑如何增加生产和减少人口。必须实行控制人口的有效办法——一胎政策。其实，这项政策十年前就开始了，可是，按照每人所得，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由于人口的增加，一九七六年的粮食生产，还停留在一九五七年那么低的数量。问题就在剩余的粮食都被更多的人口吃掉了。我记得“四人帮”批判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说：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可以跟人口的增长率齐步前进。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同学用同样的理由批评过。在一次斗争大会上，我的同学说：“你说中国的人口很多，就像挤满了蚂蚁一样，到处乱跑。”他们批评我说：“你竟敢站在相反的立场，说出反对毛主席的话。”我回答说：“不，我是说中国人就像垛码（藏语蚂蚁）一样。”他们惊奇地互相望着，就没再说什么了。这句话后来就用来当作取笑我的把柄。

“一九七九年世界上的新人物”

他当然就是邓小平。两个领导，一个是经验丰富，另一个是精力充沛，有他们这两种品质结合在一起，好像是一种巧合，而不是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叶剑英将军当时在那种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那正是“四人帮”垮台，在中国政治上有新领导出现的阶段。结果，就使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得到了自由——至少我是这么希望过——而且也从彻底毁灭的边缘救回来了。此后，中国的同胞就觉得更安全、更快乐、更满足了。新的领导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把国家推进得远比人民所期望的好，因为他带着九亿中国人民朝着进步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那也就是人民的梦想和根本目标。我也是因为这种胜利而极为兴奋，理由有二：第一是因为我的政治生活有了再生的体验；第二

是西藏第一次有机会实现现代化的梦想，那也是早在 1964 年我离开美国以前就希望看到的。

我学校里的各个家庭

从比较上说，个别的家庭比较会有效地处理他们的经济计划，比政府单位在处理预算计划和经费方面有效，因为一个是私人经费，另一个是公家经费。前者是关系到私人的利益，而后者则关系到公众和政府的利益。在效率方面，这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因为会导致更好的工作成果和更有效的开销。一般来说，个别的家庭收入是固定的。不过，要是有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每月收入为 1200 元，丈夫或者妻子受过经济计划的教育，那个家庭便会登记各项开支，拟定他们的家庭预算，而且还会规划好食物多少钱、衣服多少钱、储蓄多少钱（例如买房子或缝衣机等等）。在家庭经济处理的过程中，大家都会很小心地去落实自己的计划，而且还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尽量去有效地执行他们的计划。由此可见经济上的好处就变成了一种驱动力，促使大家用最少的成本去维持家计。因此，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丰衣足食。这就很明显地证明了那种坚强、有经济头脑的人，家家户户都有。当然，在购买消费物品或日常必需品以前，这些家庭会很仔细地评估各种可能的选择，都会去购买价廉物美的东西。而且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尽量去努力生产。不过，有时候个人的活动会占用公家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利用上班时时间，外出采购，或是在家里做一些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一种非法占用公家时间的行为，对资本主义的工人来说，这也完全是一种新的观念。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就会被解雇。比如说，一九六〇年夏天，我刚到纽约的时候，在一家洗衣店工作，因为迟到二十五分钟就被解雇了。

我看到很多汉族家庭都很有能力去做好家庭预算。一般来

说，没有任何藏族家庭能够比得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汉族家庭能够降低生活费用，同时，在他们的家庭预算上，不必增加任何额外的一分钱，就能提高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我到过的世界任何地方，我都没有见过哪个家庭能用那么节省、那么经济、那么有效的方法去管理家庭事务。

经济敏感是紧急的事情

在这种时候，我坚决认为确有必要让那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去管理国家的经济。我们非常缺乏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上的专才。为了要有这类人选，政府就必须拟定适当政策，以便进行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有效培训，而且，还必须让受训人员有机会从经验中增加他们的才能，这样，他们才能尽量有效地去管理国家的经济。经济研究中心应该按照全国性的标准建立，应该在那里进行经济上的科学研究。首先，国家的经济思想必须赶上时代，也应该将研究集中在生产上，目的就是要低成本、高质量，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改善服务，提倡消费。各学校必须开授更多经济学课程，让学生具备更优良的观念，懂得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花一百元，赚一千元回报”的观念，作为增加财富的理想办法。

“时间就是金钱”却是旧思想中的“禁忌”

“时间就是金钱。”资产阶级用过这句话，现在又被中国的企业家拿来用，这就是接受了资本主义时间观念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解放军进藏之后，西藏人脑子里的时间观念也转变得很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或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在创造财富这方面，绝对不应该忘记时间的重要性。空间与时间是无法

计量的，可是，像一支笔这类的物质价值，则可用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来计算。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对时间的价值观。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的价值是用纸币来表示，也就是交换价值的方法。“剩余价值”无他，只是时间价值体现在商品上，也就是任何附加价值的基础。可是，时间价值的抽象性质是很难让人类的官能去领悟的，而固体的物质本身却正好相反，例如一个面包就是有形的。这就是说抽象价值看来是有欺瞒人类感觉的倾向。

当我们谈到训练专才，目的是要生产超过全国人口数字那么多的货物时，我们就应该实际一点，头脑冷静一点。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无法去处理国内或是国际上的经济问题。除非我们能根除过去那些曾经妨碍中国进步的政治影响和余毒，否则，我们一定无法前进。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有胆量去改变这一切吗？

结 论

面包决定人的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这里，面包就是经济的同义词。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都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经济情况。科学和技术一向是促进高生产能力的基本因素，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却是经济进步的结果。经济有进步，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才能跟进。现在就清楚了，经济进步乃是一切进步的必要条件。

由于现代工业的关系，才有现代经济制度的兴起。若要成为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就必须特别关心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不过，这个问题又带来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和知识分子。要是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去全心全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思想自由就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关键。为了这种理由，让人民普遍享有自由是很重要的，而尊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权利，那就更可贵了。

这也符合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利益。无疑地，现代工业象征一个国家的力量和骄傲，也能赢得自尊！因此，所谓的现代文明，和一个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应该是有一致性的。

总 结

为了现在的这一代人以及未来的世世代代，为了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为了西藏和西藏的人民，为了面包和自由，让我来做我所能做的事；让我尽我所有、尽我所能地去卖。要活得有意义就要真正去服务人民。绝对不能让金钱、女色和政治压迫阻挡我去实现我的各种目标，我要尽量自由地去贯彻我的目的和想法。我很高兴去做我所能做的事，也很高兴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陕西省西安外语学院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

本文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距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几乎已有八十七年了，那个由十六个小国构成的苏俄帝国，曾经是世界第二个最大的超级大国，终于瓦解了。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于自愿把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力，分别让与各国一事，应负全责。后来，叶利钦先生正式获得俄国的政权。

经济制度改革在今日的中国发生了。而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效非常显著。在悠久的历史中，正逢这个难得的

千禧年大庆之际，现代的中国正与国际接轨，把自己融入全球经济的体系中，而且要迎头赶上，并在科学和技术的领域上，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竞争。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达到很高的指标。载人的宇宙飞船已经送上了太空，环绕地球作轨道运行二十三个小时。的确，自从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核弹试爆以来，中国一直能在科学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果。然后，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赢得二〇〇八年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在北京举行的主办权。这些胜利使中国人民感到欢喜和骄傲。我很高兴看到我国已经校正了自己的路线，正朝着现代化的强国迈进。感谢现代中国的设计师邓小平，他能及时抓住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四十年前我在美国当学生的时候，我是共产主义论者，可是，随着历史性的往前推进，在今日的中国，我竟然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企业家。而且，现在我是百万富翁了。富裕的感觉是很美妙的，我希望有更多的西藏人变得比我更富裕！

扎西次仁

二〇〇四年最后修订稿

杨和晋译于二〇〇四年八月五日

译 后 记

一九九七年秋初，我在拉萨的时候就听说扎西次仁当时就住在拉萨，而且还听说他的自传已经在美国出版了。我是在这位学长一九六三年离开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一年后才进华大的，所以跟他没见过面，只是在师友口中听到过一些他在西雅图的情形。因此，我当时没去找他。那年冬天，在我的圣诞礼物当中居然有一本扎西次仁的自传。原来是孩子们听我提起过扎西次仁以及那本书的故事，所以就投我所好，送了我那么一个礼物。我在那个圣诞节期间，一口气就把那本书看完了。感触良多，所以立刻给梅尔文·戈尔斯坦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不仅对扎西次仁为西藏现代化努力奋斗油然起敬，而且觉得书中的人、地、时都和我直接或间接地有些关联。

该传英文执笔人之一的梅尔文·戈尔斯坦也是我的学长。一九七〇年夏天，当他开始整理资料准备出版一部现代藏英词典时，我曾参与工作，就住在他家的三楼。后来，当他邀请扎西次仁到克利夫兰去进行另外一部词典的编纂时，也是住在我住过的那个房间。所以，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彼此都曾透过梅尔文的关系，在不同年代，却在相同的地方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

再说，虽然在他离开华大一年以后我才入学，可是，和他有

姻亲关系的萨迦巴家属，后来也是我在西雅图的藏族好友。而且，透过萨迦巴的关系，我也和达赖喇嘛的大哥当才活佛认识了，因为他在西雅图还俗后就娶了萨迦巴家的幺妹为妻。后来，我曾特地到印第安纳大学去拜访过他；那时他正在该校任教。至于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我却仍未找到见面的机会。早在一九六四年我来美国以前，恩师罗桑益西先生就曾告诉我说，他和嘉乐顿珠是当年在南京求学时期的同学，如有见面的机会，要我代为问候。

扎西次仁提到过的另外一位叫赖瑞爱普斯坦的同学，正好也曾和我在华大的内亚研究组相处过六七年，而且我们和梅尔文都是当时主导藏学研究的魏理教授的学生。在这种校友情谊的感染下，当我读完扎西次仁的传记后，立刻就问梅尔文是否有出版中文的计划。因为我认为像扎西次仁那样的经历，也应该让能看中文书籍的人有分享的机会。梅尔文问我是否能推介一个适当的翻译人选。我告诉他，我愿毛遂自荐，因为我自己不但对该传记中的情节很有感触，而且很珍惜那些在其他书本里找不到的数据。他的传记的确可以让一般人对最近七八十年来的西藏情形，得到更真实的认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和住在拉萨的扎西次仁保持密切联系。他仍旧努力不懈地为家乡的教育工作尽力：到目前为止，由他亲手筹建的学校已有五十所，受惠的学童已不止五千。如今他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愿他能长生不老，嘉惠更多西藏未来的主人翁。他对我的翻译工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且全部译文都经过他本人及校阅人士的过目。尤其是那位在西藏日报担任编译的扎西班典先生，劳神最多，特此致谢。当然，该传由英译中的任何误谬，译者本人应负全责。

杨和晋

二〇〇〇年仲夏

英文版作者前言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扎西次仁突然到西雅图我的公寓里来。我刚考完期末考试，结束了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忙碌的学期。为了轻松一下，我正和三个藏族朋友打麻将呢。我是一个主修藏族语言和文化的研究生，和扎西很熟，所以对这位不速之客毫不介意。串门儿这种事在西藏文化里是很正常的。在继续不断的麻将牌声中，我们互相问候，也谈了点期末考试的情形。随着学期的结束，我们也就轻松多了。扎西说他不打牌，就站在桌旁观战聊天。他和往常不一样，好像心事重重。我当时全神贯注在桌上，惟恐错过任何牌。大约过了几分钟后，扎西突然问那几个西藏人，有没有什么信息要带回西藏去给他们的亲人，因为他要回家了。当时我们的反应是：哦，别开玩笑吧！正经一点吧，扎西。对此，扎西并没有再说别的，他只是重述，他马上就要回西藏了，朋友们要他带给亲戚的任何信息，他都愿意带去。麻将牌虽然没有停下来，可是我们却立刻转成了严肃的态度。我们都警告他不要做这种错误的抉择。我们告诉他如果他在经济上

有问题，我们一定设法帮他解决。可是扎西却不改初衷。他很率直地回答我们：他的决心与金钱毫无关联。事实上，他自认为可以代表一般的普通人，要协同大众，创建一个新的和现代化的西藏。当时说话的气氛变得有点紧张起来了，因为其他的几个西藏人都是贵族出身，痛恨共产党，而且都以把西藏从共产党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为己任。所以没有人要扎西带信回去。过了一会儿，他就走了。事后我们几个牌友还谈论着他的怪异行动，大家都没有把他那种回去的念头当回事，我们谁都不相信他真的会离开美国而回“红色的”中国去。

我有二十二年没有和扎西见过面了。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得到中国的许可到拉萨作一次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工作。该项研究获得美中双边交换计划的协助（赞助单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在先前几年中，我曾和扎西取得联系，通过信。当时负责接待我的人已经替我安排好了宾馆，但是，当我发现他在那个宾馆中等我时，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在我们重聚的欢乐中，他建议我搬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名叫雪域的小旅馆去住，我同意了。真高兴能看见他一切安好，却也为他的惨痛遭遇而难过。就这样，我们的友谊又开始转世再生了。

从一九八五年起，我经常去西藏考察，而且都住在雪域旅馆，这样就可以离扎西家近一点。我们可以常常见面。扎西记得我爱吃西藏菜，爱喝酥油茶，所以从第一次旅藏起，他就一直要接待人员供应我足够的上好糌粑（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的面粉），而且每天早上把打好的酥油茶用热水瓶装好送到旅馆房间来给我作早餐。他就是那样子的人。

有一次当我到西藏去的时候，扎西突然问我是否可以协助他出版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他认为外国人需要知道普通的西藏人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说不是西藏的贵族或高级宗教人士，也不是转世喇嘛。他觉得他的生活故事应该是有助于西方人士和在流亡中出生的藏族青年了解真正的——非香格里拉式的——西藏。我同意他的见解高明而且愿意尽力协助。不久以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机会邀请他到卡司委斯特吕瑟弗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来协助我做几个月的研究工作。

扎西和我同住，很快就在我家三楼安顿好了。在他到达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又提出要我协助他写书的事。身为人类学系主任，还要作几个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当时我实在很忙。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扎西深切地认识到他这部自传需要我们两人共同合作；既然是老朋友，我觉得是有义务（按照西藏文化的规矩）要出时间来协助他。不过我要求他必须原原本本地把全部生活细节都告诉我——好的和坏的都要全部交代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我告诉他，我不能和别人合作一本与事实不符或是会损人利己的书。市面上早已有了几本无关痛痒的西藏书籍，我们不必再著一本。扎西毫不迟疑，立刻就赞同了我的见解。

于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们最先合作此书的工作就开始了。每天晚饭后看完电视新闻，我和扎西就打开录音机，扎西叙述，我问问题，录音机不停地一转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用藏语和英语讲，而且很坦白地把他的经历、想法和感触说出来。直到他准备好要回西藏的时候，我录到了将近五十个小时的录音带。

扎西走了以后，我把录音带译写成了文字，却找不到时间去撰著成书。以后我几次去西藏，每当扎西很客气地问起我那本书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我快要去了。而事实上我却无法找到时间去整理那本书稿。后来，在一九九四年，扎西又有一个机会到卡司委斯特吕瑟弗大学来，这次是来协助我进行一部大型字典的工作。他这次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能在克利夫兰（Cleveland）同时也能在当年完成那本书。所以当扎西再次搬进我家三楼那个房间时，我也就认真地开始了拟写他的自传初稿。几个月以后，我发觉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时日相当长，于是决定物色一个可以跟扎西和我一起合作的撰稿人。

有一天下午，当我在大学的蒸汽浴室里享受排汗的乐趣时，英语系的司本石初（Siebenschuh）教授也逛进来了，坐在我旁边。我提到我们的出书计划，问他是否知道谁会愿意协助扎西和我撰稿。他说这个计划很动人，他会尽力推荐适当人选。第二天

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自己愿意参与此事。我真是高兴极了。于是，我们两年的三边合作便开始了。

二

和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说完话以后我就离开了大学的健身中心，当时我就已经上了钩。梅尔文简单地把扎西的故事——精彩部分——告诉了我。当我回到办公室以后，总共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决定了由自己去协助此事，不再另找他人。

我开始从梅尔文和扎西的录音带译文着手。在那一大堆稿纸当中，梅尔文已经完成了前言和头两章的初稿。他俩对我承担的前几章稿件甚表赞同。于是到了一九九四年六月间，我们就认为可以加速进行了。

进入八月，故事的发展使录音带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计划。于是，我就每星期找一次机会和扎西交谈。我和扎西约好每星期三在大学医院的食堂里共进午餐，然后再到新建的勒纳塔（Lerner Tower）的接待室去找两张舒适的椅子坐下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平常都会约好当日所要讨论的内容，而且扎西经常会带一堆写好的笔记来帮助自己回忆往事，以免把思路搞乱了。不过他是以讲述为主，有时候他说得实在太快了，而且又非常激动，我很难把他所说的话全部录下来。工作结束以后，我会把我的笔记和他的手稿一起带回办公室，然后开始写作。他也会把我写好的章节带回家去审阅。就这样，我们的工作一周又一周地进行着。

这项撰著工作从一开始就采用合作的方式进行。每当我完成了一部分章节后，梅尔文和扎西就会仔细地审阅文稿，然后我们再约在一起共同核对故事中有关的日期和连贯性，而且还要讨论历史的真实性；用这种反复核对的方式来证实扎西的思路和感情。这样的进行方式也让扎西回忆起一些他几乎忘记了的事情；

也有一些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的事情，如今他也要和盘托出，重新评估，以便安排在他的自传中。我们一直努力地干到一九九四年的秋天。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扎西和我每周见面两次。同时，梅尔文也和扎西核对文稿中的每个细节，而且还特别要扎西把他当红卫兵的过程详述一遍，列为新的章节。幸运得很，在扎西一九九五年二月必须回拉萨以前，我们能完成全部初稿。在他回家以前他能把原稿全部看完。

全部撰稿的过程给我留下了很多愉快的记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一个我们两人都觉得特别丧气的星期三。当我们交谈时，扎西很激动地描述他第一次到长武监狱的情景，我实在无法弄明白该地的实况。那天大概真的不太吉利。我越挫折，他说得越快；他说得越快，我就被搞得越糊涂。最后，我几乎吼出：“扎西，停一下，我不明白你要说些什么！要是在我的脑子里搞不清楚你要说的是些什么，我就无法把你所讲的描述在书上！”他微笑着说：“好吧！”然后他就果断地站了起来，在那个宽大的接待室里快步行走。那里经常都会有很多人，我真不敢想像当那些过往的医生、见习生、病人和访客等，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六十五岁的西藏人，在该室右角边旁若无人地大步行走，后面跟着一个人，捧着一本破旧的用卷线装成的笔记本奋笔直书的情景，会作何感想！“这儿就是第一道墙的所在地，”我马上就开始照着他说说的绘图，“门就在那边。那儿是往下走的楼梯。那边——在院子那边——就是牢房所在地。”当他看到我终于明白了以后，真是开心极了。我觉得从那时起全部情景就深植在我的脑子里了，因为扎西用他那种审慎详实的力量，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表明他的故事的重要性。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有幸认识他，而且还能和他共事，当然也要和他一起努力，把他的故事公诸于世。

梅尔文·戈尔斯坦 (Melvyn Goldstein)

威廉木·司本石初 (William Siebenschuh)

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Cleveland, Ohio)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电视纪录片 《雪山下的酥油灯》解说词

顾问：张子扬 编导：贡布 撰稿：吴兴元

《雪山下的酥油灯》

一次爱心碰撞的火花

一次刻骨铭心的牵手

一次呼唤奉献的行动

一次寄托和平的祈祷

《雪山下的酥油灯》

一段牵动万人的故事

一段凝聚温暖的旅程

《雪山下的酥油灯》

一部拍摄时间长达八年的电视记录片，

一部个人、民族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温暖故事，

《雪山下的酥油灯》，一位年近八旬的西藏人讲述西藏，讲述自己。

扎西次仁/一位山里的孩子/因为对世界的好奇/走向了世界

扎西次仁/一位从贫穷走上富裕的人/因为尊重知识，崇尚科

学/他回归故里

扎西次仁/一位充满传奇的西藏人/因为对民族的爱戴/他千辛而万苦

扎西次仁/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三种社会制度/他见证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序

扎西次仁一九三〇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古确村一户农民家庭。十岁时成为布达拉宫宫廷舞乐团的一位艺员。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印度、美国等地求学。一九六四年回国，因受“文革”的迫害遭受牢狱之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平反，先后在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大学担任英语教师。曾编撰第一部《英藏汉对照词典》、《美国和美国人民》等五部专著。一九八九年退休从商，主要经营民族手工业品。二十年中，扎西次仁在西藏的贫困乡村资助开办六十六所学校，一所农牧技术职业学校，建立了西藏个体第一家农牧民教育基金会。一九九五年被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二〇〇一年，扎西次仁获得国家教委等颁发的全国“两基”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现在，扎西次仁老人已成为备受人们尊敬的爱心办学者，成为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参与者和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见证者……

电视纪录片《扎西次仁的故事》

扎西次仁出生的时候，西藏还处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得占西藏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农奴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当扎西次仁在南木林县古确村生活到十岁的

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一九四〇年，按照旧西藏地方政府惯例，布达拉宫宫廷舞乐团的招生函送到了古确村，送到了扎西次仁的家里。

（同期声：村里的亲戚朋友，家里的老小都来相送，他们都为我献哈达，敬美酒，送我和父亲走出村庄……）

那年，扎西次仁的家人和乡亲们把他送到了村口，临别时，乡亲们为扎西次仁唱酒歌祝福，母亲为他系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点燃了一盏酥油灯，保佑他一路走好。

（同期声：记得母亲送我那个场面，母亲特别疼爱我……）

扎西次仁随着驮队，牵着父亲的手，第一次走出了古确山村。翻山越岭，经过十多天的艰难旅程，扎西次仁终于来到了圣城拉萨，走进了神秘的布达拉宫。

（同期声：仰望布达拉宫，雄伟，庄严……）

布达拉宫宫廷舞乐团早在公元十七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已组建，是旧西藏惟一的官办舞乐团。进入舞乐团工作的每批成员有二十多名，一般是十岁的男童。这些演员从进宫的第一天算起，要为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的达官贵族们献艺八年，这期间这些演员的家庭可以不向政府交税，还可以在宫里学习文化知识；等到十八岁时还会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所以，在历史上凡被录用者，都被看做是家庭和个人的光荣。

（同期声：在布达拉宫供应处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地处雪域高原的西藏人民还没有从旧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这时候的扎西次仁已经结束了宫廷乐团的演员生涯，在布达拉宫后勤供应处找到了一份小职员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扎西次仁和百万翻身农奴一道热烈拥护“协议”的签订，同时也加入到了欢迎解放军进藏的群众队伍中。

（同期声：解放军进藏后建学校、建医院、修路、修电站，还记得有广播。那时我经常从广播里听见有关对“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等的宣传，我经常在想这“主义”是什么东西，从而对外面的世界有些好奇，加上那时还想学习英语……)

由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神秘世界的好奇，一九五六年，在扎西次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拉萨，踏上了去往国外的路。

(同期声：学习了世界历史，毛泽东思想等等……)

扎西次仁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印度、美国等国家求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扎西次仁曾站在太平洋岸边思索着是否回国的的问题时，他去了地处中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研究国际政治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

(同期声：到了古巴后学习和研究很多有关中国政治形势的书，选择回国……)

一九六四年，扎西次仁带着这种美好的向往和满腔的热情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投身到了祖国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在他的自传《西藏是我家》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原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学，去谋求一种符合我们民族前途的希望；但没有想到，自己在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中，最终自觉地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忠实的拥护者，我向往没有压迫，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共产主义社会。”

(同期声：回国向组织要求学习汉语文，更好地为西藏建设做贡献……)

回国后扎西次仁首先向组织提出了学习汉语文的要求。通过几年的学习，很快就成为了具备藏语、汉语以及英语三种语言工作能力的人，同时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然而，正当扎西次仁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候，一场席卷全中国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在入狱期间，艰苦的环境和岁月的煎熬，并没有打垮扎西次仁勇敢生存的信念，他深信总有一天自己会走出监牢。

(同期声：我被抓到监狱后没有感到害怕，相反我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我扎西次仁今天进到这里，总有一天我会走出去”……)

一种力量使扎西次仁从绝境中找到了希望。一位纯朴、善良的女人走进了他即将枯萎的情感世界，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对生活的希望，扎西次仁终于找到了和他共度一生的亲密爱人桑吉啦。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样也改变了扎西次仁的命运。一九七八年，扎西次仁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终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雪域高原，西藏到处呈现出春意盎然的景象。这个时候，扎西次仁的家庭得到了巩固，事业得到了发展。同时，历时十多年的编撰词典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同期声：我这样说不觉得有什么过分……)

一九八五年扎西次仁编撰的《英藏汉对照词典》正式出版发行，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同时他自己也得到了一笔丰厚的稿酬。

在此期间，扎西次仁针对拉萨兴起学习外语的热潮，在古老的八廓街开办了两年的英语夜校，收入极为可观；加上平反后政府兑现的工资，扎西次仁已经拥有了十万元左右的积蓄，成为当时众人羡慕的万元户。

(同期声：那个时候我有了钱……)

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扎西次仁回家探亲，面对着家乡的贫穷，面对着村里的孩子们，他在心里默默地许下了为家乡办学的心愿。

斗转星移，当扎西次仁为家乡古确村兴办第一所学校的梦想成为现实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扎西次仁在西藏各地已经兴办了六十多所学校。

说到现代化，在扎西次仁的故乡，在江河源头的牧场草原，在青稞飘香的山川河谷，这始终是一个十分新鲜而又陌生的概念，因为现代化所蕴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无论是扎西次仁的父辈还是他的同龄人，大多数的西藏人是不能理解的。但是，现代化早在扎西次仁流落异乡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扎西次仁对民族事业追求的根本所在。

(同期声：只有依靠现代化，只有走向现代化道路，才能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这个梦想，扎西次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欢笑也有泪水，但不管怎样，他认为这一切在他的生命里增添了许多光彩。

二〇〇一年，随着国家对西藏各县乡村教育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被列为全国贫困县之一的南木林县完成了国家“普六”教育达标任务，其中，扎西次仁捐助修建的五十四所学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期声：南木林教育局局长：扎西次仁先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我县范围内修建乡村一级扫盲学校五十四所，投资巨大，投入的心血无法估量。为二〇〇一年我县完成国家“普六”教育任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面对着南木林县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扎西次仁心里又酝酿了一个更大的投资计划。

(同期声：建小学已是饱和状态，这是战略转移……)

二〇〇一年，扎西次仁和老伴儿桑吉啦协商决定捐助一百万元资金，与日喀则教委、南木林县三家联合，共同兴办南木林县中学农牧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这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农村职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将会成为日喀则农牧民子女从事农牧职业技术教育的场所之一。一年后，南木林县中学农牧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在土地肥沃的艾玛岗乡建成了，在乡亲们的热切盼望中开学了。

从这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中，扎西次仁感受到了自己梦想的意义和光荣。扎西次仁老人这些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事业，他尝尽了酸甜苦辣，也经历了艰辛和坎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位老人能够持之以恒，一如既往地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同期声：做好事实实在太难，我是无条件的，我没以为做了这些善事我能成仙……)

每当扎西次仁老人静下来的时候，他也常常在想着这个问题，为此，老人受累过，委屈过，流泪过，但不管怎样，老人一

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他更充满了的责任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西藏现代化进程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扎西次仁面对着大好形势感动不已，并且时刻不忘自己的诺言和理想。

（同期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繁荣……）

二〇〇〇年，当扎西次仁听说国家将在全国农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时，他四处寻找办法，终于解决了学校师生看电视难的问题。

为了西藏的现代化，为了这个梦想，扎西次仁走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走访了偏远地区的村庄和牧场，就是为了让那里的群众早日了解时代的步伐，让他们的孩子也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得到现代化教育的熏陶。

这里是拉萨市最新规划出来的一片新村，扎西次仁在这里购买了一座房子，专门用作南木林县所属学生考到拉萨的大中专院校后，利用课外时间在校外学习的基地。他在这间房子里配备了各种教学用具，其中还特意安排了电脑室，这些学生可以直接触摸到信息网络化的现代知识。

西藏四方电子有限公司是经营电脑设备的一家公司，总经理李张平是来自陕西延安的一名汉族商人。当他得知扎西次仁十多年如一日为农村牧区爱心办学深受感动，愿意为扎西次仁的事业助一臂之力。

（同期声：李张平：扎西次仁先生为贫困地区办学的事迹很让我感动，我将学习扎西次仁先生多为西藏的教育办好事……）

昂仁县是日喀则地区较为偏僻的一个贫困县。二〇〇三年年初，经过扎西次仁和日喀则教育局、昂仁县三方协商，决定为昂仁县中学安装电脑教室。

（同期声：今天我和四方电子有限公司以及昂仁县在这里签订关于在昂仁县中学开办电脑室的协议。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我还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

通过扎西次仁努力，四方电子有限公司优惠提供了电脑、打

印机及其他设备，而且还提供了优良的售后服务。于二〇〇三年九月成功安装了昂仁县中学的电脑室。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西藏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受历史与自然条件的限制，现代化的步伐较为缓慢。支持各级政府发展现代化，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教育农牧区儿童了解现代化和掌握现代化技术，这几乎成了扎西次仁在人世间忙碌的最终目标。

扎西次仁常说，面对世界的发展变化，面对现代化经济如此迅速地进入西藏，我们不得不加快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如今网络已经成为扎西次仁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同期声：我的生意大都是与国外联络，客户也是国外的朋友……）

信息的快速发展，使扎西次仁的工作也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关注。他们专程来到西藏，与扎西次仁共商爱心办学的公益事业，很多友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扎西次仁的办学事业已遍布西藏各地，他的名字同样传遍了千家万户，倍受人们的尊敬。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西藏那曲的特大雪灾刚过，祖国内地又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本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发生了，接着“非典”病魔又无情地缠绕着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二〇〇四年年底，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因地震引发海啸灾难，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个不分民族、不分国界的爱的暖流中，扎西次仁作为一名藏族人也自觉地溶入到这股暖流中，每每为之爱心捐款。他祈求和平、祝愿世界平安。

扎西次仁时常认为世界给予自己很多，但从来没有索取过什么。他时常戴的帽子，穿的衬衫、毛衣、皮鞋等，已经跟随他走过了几十年的时光。这件外衣他已经穿了半辈子，从一件风衣式的长衣变成了今天这种夹克式休闲衣，不知道洗了多少次，缝了多少次，又改了多少次。

(同期声：这件衣服是我从美国带来的，已经快四十年了，过去是一件长风衣，最后我就改掉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用针和线修补的。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对这些要求不高，主要还是干净、整洁就行了。)

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扎西次仁给予别人的很多，但对自己却十分苛刻。但不管怎样，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神情和简朴的生活乐趣。

到目前为止，享受扎西次仁助学贷款贫困学生已经有十几位。有些学生已经在祖国内地上了大学；有些学生已经步入社会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些学生已经逐步在归还扎西次仁给予他们的无息贷款。

(同期声：格平：我以后有了工作，决心慢慢地归还扎西次仁先生的救助贷款，他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我们一生难忘，也激励我们一生去努力学习。)

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真实而又艰难，扎西次仁的梦想美好而又远大。随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看着农牧乡村的学校拔地而起，听着孩子们从校园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这一切使扎西次仁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这一天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扎西次仁在家里收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实况报道。

(同期声：十五大的时候我看了，今天十六大的时候也看了，感到十分高兴。最近我看到“与时俱进”用的很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记者：意思是与时代一起进步。)

这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盛大的会议。新上任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向世人宣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同期声：十六大把“三个代表”写进了《党章》，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我觉得很了不起，很好。)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西藏自治区农牧区职业技术教育

会议在扎西次仁的家乡日喀则地区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领导来到南木林县职业技术学校考察。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宋和平高度赞扬了这种职教的发展模式，希望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以科学的发展观为西藏的农牧业发展和农牧区建设，以及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要求把南木林县职业技术学校建设成为省一级职业技术教育示范点。与此同时，对扎西次仁捐资办学的丰功伟绩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同期声：宋和平采访……)

岁月如歌，时光如梭，历史的脚步已经迈向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年近八旬的扎西次仁已经真正步入了老年，一种异样的寂寞使老人想起了早已离开人世的母亲。

当扎西次仁最后一次看望母亲的时候，为她带去了桑吉啦亲手酿制的青稞美酒。当母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扎西次仁为母亲敬献了洁白的哈达，供奉了千盏酥油灯，照亮母亲去往天国的长路。

二〇〇四年春天，凝聚着扎西次仁和桑吉啦两位老人一生的梦想和寄托着老人美好祝愿的“扎西次仁农牧区教育基金会”，在社会各界和众多藏汉同胞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成为了西藏第一家个人设立的教育基金会。

(同期声：我和桑吉啦把所有的积蓄都基本上投到了这个基金会，我想通过这个基金会所赚来的钱都将用于西藏农牧区的教育上，将形成一种长期性的机制。我和桑吉啦的愿望就是这样，希望它能发挥效益。)

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绩成为世界经济的奇迹。这种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浪潮，同样也带动了扎西次仁故乡的发展。

(同期声：这五十年来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也将很快修到拉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沿着天边即将架到拉萨，这一条凝聚着民族团结和幸福安康的天路将进一步推动雪域高原的发展。

(同期声：我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处理好了，所以很幸福……)

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了，这是举国上下重大的喜庆节日。在新春佳节的第一天，扎西次仁与仁布县签订了仁布县中学电脑微机班的投资协议。

二〇〇五年恰逢春节和藏历新年是在同一天，这一年也正是西藏和平解放五十三年，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所以，二〇〇五年的这个新年在西藏显得格外隆重。家家户户都在为新年忙碌着，扎西次仁家里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辛苦了一年的扎西次仁在喜庆的日子里，想到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事业。

这一天扎西次仁高兴地说，这是他和桑吉啦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和父老乡亲们献出的新年贺礼，也是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献出的一份厚礼。

画面 解说词 音乐

《扎西次仁的故事》主题歌

作词：吴兴元 作曲：美郎多吉

那一天
我离开家的时候
阿妈啦点燃了一盏酥油灯
翻过雪山 走过草原
洁白的哈达 飘在我胸前
酥油灯 阿妈的情
陪伴着我孤独的心
阿妈的情 酥油灯
照亮了我 多少艰辛的路

那一天
我回到家的时候
阿妈啦手捧着一条长哈达
亲吻雪山 拥抱草原
甜蜜的笑容盛开的鲜花
酥油灯 阿妈的情
温暖着我寂寞的心
阿妈的情 酥油灯
化作了我 铺满鲜花的路

阿妈的情 酥油灯 啊
照亮了我 多少艰辛的路
酥油灯啊 阿妈的情
化作了我 铺满鲜花的路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日 拉萨